

宋庆龄年谱

尚明轩 陈 民 刘家泉 赵楚云 编著

宋庆龄年谱

居武



尚明轩 陈 民 刘家泉 赵楚云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宝辉 俞玉储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丹丹

责任校对：古为明

宋庆龄年谱
Song Qing-ling Nianpu

尚明轩 陈 民 刘家泉 赵楚云 编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大兴凤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8插页 307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统一书号：(平)11190·194 定价：(平)2.80元

(精)11190·193 (精)4.2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简明而全面地反映宋庆龄生平和思想的年谱。书中运用丰富的史料，具体而翔实地再现了宋庆龄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坚持不懈地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以及她顺应时代潮流，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历程。



宋 庆 龄

CHUNG-LING SOONG, A. B.

SHANGHAI, CHINA

Entered Fall 1908.

*"Radiance streaming from within around
her eyes and forehead."*

Literary Editor of *The Wesleyan*, 1912-13;
Theatrical Dramatic Club; Corresponding Sec-
retary of Harris Literary Society, 1912-13.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13年年鉴》登载的宋庆龄
大学毕业照〈上〉

一九二七年摄于武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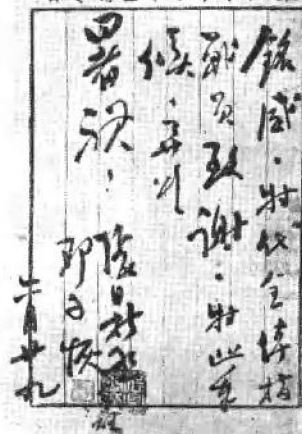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与中国
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
委员鲁迅（左一）、胡
愈之（左二）合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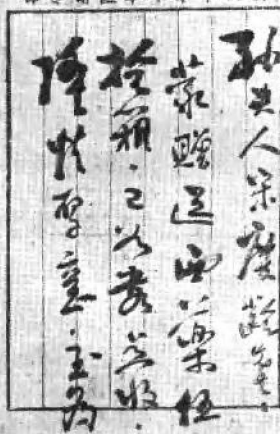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八月
向广州黄花岗烈士墓
敬献花圈〈下〉



新四軍中華區司令部令



新四軍中華區司令部令



一九四六年張鼎丞、鄧子恢代表新四軍
華中軍區致宋慶齡的感謝信



一九四八年親
自檢查運往解放區
的醫藥器材等物資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讲话〈上〉

一九五一年十月与何香凝合
影〈下〉





一九五六年十月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北京中南海合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随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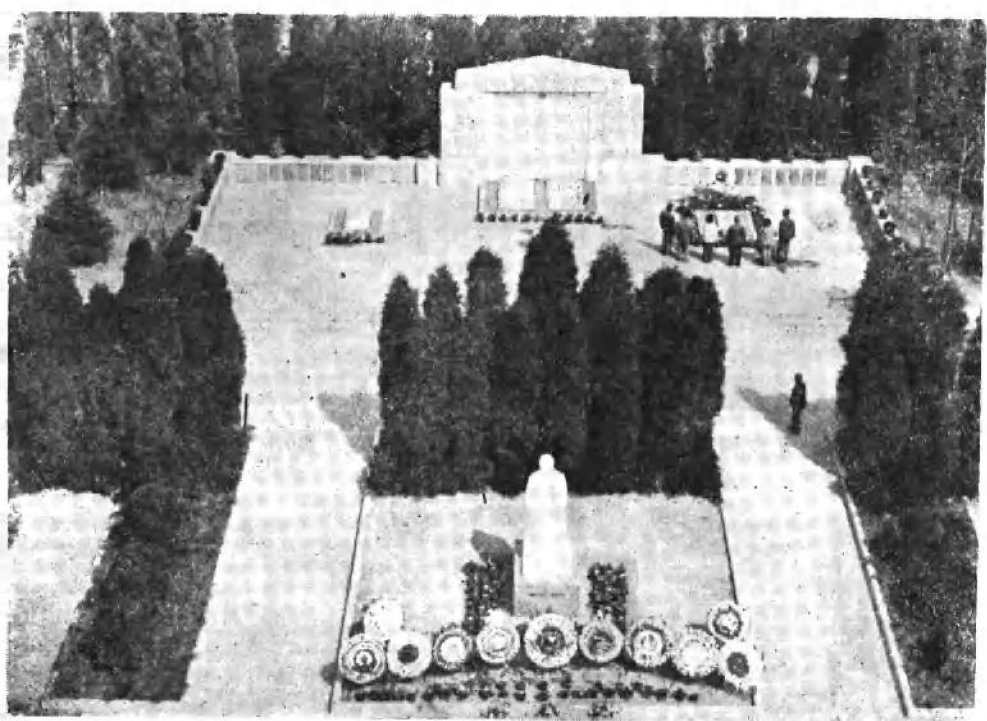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二月，和周恩来、陈毅对锡兰进行国事访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会见日中友协理事长官崎世民等



上海张虹路宋庆龄陵园



宋庆龄陵园中的大理石塑像

编写说明

198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五周年，又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谨献上这部年谱，用作纪念。

本年谱是一部力图简明而全面地反映宋庆龄生平和思想的书，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宋庆龄，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资料而编写的。

本年谱由集体完成。参加搜集资料和编写者，按年谱年代顺序如次：陈民负责1893至1918年部分，刘家泉负责1919至1949年9月部分，赵楚芸负责1949年10月至1981年部分。全书由尚明轩统编、修改、定稿。

本年谱的编写凡例是：

一、按年、月、日顺序，逐条纪事。国际、国内重要事件，结合谱主有关事迹，穿插说明。

二、纪事以公历为主，附以清代年号或民国年份及岁次干支。1911年前的月、日，附纪阴历。

三、纪事详其月、日。无月、日可稽者，或附于其同年、同月之后，或编排在较适宜位置。无年份可稽者，附于邻近年份或有关纪事之后，并酌加注释。如遇几条纪事时间相同，第一条注明月日，余则标以“△”号。

四、所收材料，力求引用原件、影印件或最初发表的报刊及书籍。不同书报所载，间有歧异之处，则择善而从，以一种为

主，参照其他。凡无第一手资料可资核实者，采取一般说法；诸说并存者，取其一说，加注说明。

五、凡属引文，尽量注明原始出处。所据资料第一次使用时，详细标明作者、书刊、篇名、版本、页码等；后出现者，只标出作者、书刊、篇名、页码。

六、对于引文，凡文稿、函电、演说等未曾发表而较重要的多录或全录；刊入早期报刊、目前鲜见的多录或酌录。

七、引文中有明显错漏者，将订正的文字置于〔 〕号内，脱漏字则用〈 〉号。底本原有小注，用（ ）号标明。

八、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在书中首次出现时，附以原文。

九、为方便读者，在卷首收有一篇《传略》，在卷末附录本年谱征引书目。

本年谱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北京宋庆龄故居、上海宋庆龄故居、上海图书馆、中国福利会、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文物出版社、《中国建设》、《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杂志社等单位及有关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

由于时间仓卒，学力所限，错误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编写说明	(1)
传略.....	尚明轩 (1)
年谱.....	(19)
1893年 清光绪十九年 诞 生.....	(21)
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一 岁.....	(25)
1897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四 岁.....	(25)
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六 岁.....	(25)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七 岁.....	(26)
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十五岁.....	(26)
1909年 清宣统元年 十六岁.....	(27)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十八岁.....	(27)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十九岁.....	(28)
1913年 中华民国二年 二十岁.....	(29)
1914年 中华民国三年 二十一岁.....	(31)
1915年 中华民国四年 二十二岁.....	(33)
1916年 中华民国五年 二十三岁.....	(35)
1917年 中华民国六年 二十四岁.....	(35)
1918年 中华民国七年 二十五岁.....	(36)
1919年 中华民国八年 二十六岁.....	(37)
1920年 中华民国九年 二十七岁.....	(38)

1921年	中华民国十年	二十八岁..... (38)
1922年	中华民国十一年	二十九岁..... (39)
1923年	中华民国十二年	三十岁..... (41)
1924年	中华民国十三年	三十一岁..... (42)
1925年	中华民国十四年	三十二岁..... (45)
1926年	中华民国十五年	三十三岁..... (51)
1927年	中华民国十六年	三十四岁..... (56)
1928年	中华民国十七年	三十五岁..... (68)
1929年	中华民国十八年	三十六岁..... (69)
1930年	中华民国十九年	三十七岁..... (73)
1931年	中华民国二十年	三十八岁..... (73)
1932年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三十九岁..... (76)
1933年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四十岁..... (81)
1934年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四十一岁..... (92)
1935年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四十二岁..... (93)
1936年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四十三岁..... (94)
1937年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四十四岁..... (99)
1938年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四十五岁..... (108)
1939年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四十六岁..... (116)
1940年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四十七岁..... (123)
1941年	中华民国三十年	四十八岁..... (128)
1942年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四十九岁..... (132)
1943年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五十岁..... (134)
1944年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五十一岁..... (138)
1945年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五十二岁..... (140)
1946年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五十三岁..... (143)
1947年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五十四岁..... (149)
1948年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五十五岁..... (152)

1949年	五十六岁		(155)
1950年	五十七岁		(165)
1951年	五十八岁		(177)
1952年	五十九岁		(190)
1953年	六十岁		(199)
1954年	六十一岁		(205)
1955年	六十二岁		(214)
1956年	六十三岁		(235)
1957年	六十四岁		(262)
1958年	六十五岁		(276)
1959年	六十六岁		(287)
1960年	六十七岁		(297)
1961年	六十八岁		(305)
1962年	六十九岁		(309)
1963年	七十岁		(313)
1964年	七十一岁		(319)
1965年	七十二岁		(326)
1966年	七十三岁		(329)
1967年	七十四岁		(330)
1968年	七十五岁		(331)
1969年	七十六岁		(332)
1970年	七十七岁		(332)
1972年	七十九岁		(332)
1973年	八十岁		(336)
1974年	八十一岁		(337)
1975年	八十二岁		(337)
1976年	八十三岁		(338)
1977年	八十四岁		(339)

1978年	八十五岁		(340)
1979年	八十六岁		(344)
1980年	八十七岁		(351)
1981年	八十八岁		(359)

附录		(367)

本书征引书目		(369)

传 略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她从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开始献身革命起，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坚强不屈地英勇战斗，始终坚定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人民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无私无畏，鞠躬尽瘁。

宋庆龄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宋庆龄把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为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特别是她顺应时代的潮流，“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①，尤其难能可贵。

正因如此，她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的衷心敬爱和永远纪念，也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正

^① 邓小平：《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义的人民的仰慕和尊敬。



宋庆龄，广东省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诞生于上海。

她的父亲宋嘉树（字跃如），青年时代曾经在美洲做工，在美国受过教育，回国后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师，后来又经营工商业。他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革命宣传的有数人物之一。他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同情反清革命，多次在家中接待孙中山。孙中山在其被清政府诬蔑为“叛逆”的年代里，始终是宋家言谈中的英雄。

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见过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他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非常爱戴和仰慕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企望以他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楷模。

宋庆龄七岁时，进入上海的新式女子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她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颖，学习勤奋，特别喜爱学习英语。1908年，偕宋美龄离开上海到美国留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准备投考大学。随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读书，这所学校因是世界上最早得到特许而设立的女子大学而著名。她于1913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宋庆龄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1911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用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更感到衷心的喜悦。191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把新国旗挂在墙上，为共和制度的实

现而欢呼^①。同年4月，又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指出：

“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②。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篡窃了。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被迫于1913年8月东走日本，重新组织力量，策划“三次革命”。

这年夏季，宋庆龄结束了学生生活，满怀革命理想到达东京。她在9月中旬见到孙中山，思想上充满着对他的深深崇敬。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在此后的十天中，她去访问过孙中山八次。随后便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孙中山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领导反对袁世凯统治的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所举行的武装起义连续遭到失败。宋庆龄在这艰苦岁月里，给予孙中山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积极地协助孙中山，担负着整理文件、处理函电及提供资料等许多繁重紧张的工作。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把通讯密码都交给她保管，并委以某些对外联络工作。在革命的战斗工作中，两人甚为契合。宋庆龄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高尚品德及革命精神的熏陶，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认识，大大增长了革命成功的信心；而孙中山因革命斗争一再失利和长期流亡而遭受的痛苦和孤寂，也从宋庆龄的支持和鼓舞中获得了慰藉。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志向，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

① 参见〔美〕项美丽（Emily Hahn）：《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香港1941年英文版，第82页。

②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The Greatest Even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原文见《威斯里安》院刊复制件，译文载于《中国建设》杂志1983年第五期。

在东京结婚。婚后，继续担任秘书工作。她既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和助手。宋庆龄漠视名利、权势和享受，她的唯一的理想就是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为求中国自由平等”的革命运动。为此，她宁愿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忍受宋氏家族的责难，心甘情愿地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合，过着艰苦、动荡的生活，勇往直前，坚强不屈。

继反袁之后，孙中山为维护政治民主，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一再进行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此期间，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许多地方劳苦奔波，协助孙中山聚集革命力量，从事新的斗争。1919年，她和孙中山一起，满腔热忱地欢迎并支持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她发动广州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并亲自率领会员慰问北伐战士，积极赞助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她在危急形势下，坚持孤身留下吸引敌人，让孙中山先行离开险地。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①，表现出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

1922年前后，孙中山于艰难顿挫中，勇敢地吸取历次失败的教训，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and 追求。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以及列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的商谈。她参与谋议，做了大量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真正的革命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① 转引自邓小平：《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全国的和平统一和经济建设，决定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犯难北上，宋庆龄毅然随行。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初，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在病榻前护理。她接受了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其未遂愿望的嘱托。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宋庆龄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二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遗志而努力。

宋庆龄于1925年4月回到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她指出，“凡中国国民皆当负起此救国重任”，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①。6月，又著文赞扬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②。8月，反动分子在广州杀害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她闻讯极感悲痛和愤慨，嘱告革命党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进行”^③。不久，便带病离开上海返回广州投入战斗。

国民党的右派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他们乘孙中山逝世之机，分裂革命力量，纷纷组织小团体，群起鼓噪，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坚持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攻击共产党

① 《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页。

② 《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宋庆龄选集》第11页。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5日。

人，叫嚷“清党”。在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右派，5月间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产”的谣言，与帝国主义者策划“驱逐广州及广东的布尔什维克”。年底，以谢持、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派李大钊”等提案，公然进行叛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着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短兵相接的形势，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予国民党右派以迎头痛击。她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严加谴责，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要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①。她的原则立场，赢得了与会代表们的尊敬，以最多票数之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这时，国民党内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也暴露出右派的面目。他在1926年3月，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等。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等坚决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宋庆龄积极地投身到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她于12月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鲍罗廷等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旋即在当地为妇女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还经常参加民众大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年4月版，第42页。

会，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战争。

正当革命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加紧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宋庆龄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叛变活动。1927年3月间，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吴玉章、林祖涵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要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宋庆龄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在武汉革命政府时期，宋庆龄为实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她非常珍惜苏联人民的友谊。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①；也和孙中山同感，要救活国民党“就需要新血液”，因此，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团结无间，成为共产党人的亲密战友。她把工农视为“力量的基础”、“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②，热情地支持工农运动，坚决赞成土地革命，稍后又明确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和随后的蒋、汪合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无比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祖涵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蝥贼”^③，声

① 《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5页。

②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18—19页。

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讨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在反革命的“宁、汉合流”前夕，她又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示了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鲜明的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她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志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①宋庆龄站在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立场上，与叛徒们实行彻底决裂，同时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在此后的长时期斗争中，她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遗志，始终恪守自己的声明，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坚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

同年8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革命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②。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宋庆龄虽然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她为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于同年8月底离开上海出国，代表长逝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赴莫斯科访问。行前，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对孙中山革命主张的不变的忠诚。她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和《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的宣言、声明与论文，表示要继续与中国新旧军阀作坚决斗争，努力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929年5月，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宋庆

① 《宋庆龄选集》，第18—22页。

②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龄离开苏联经柏林回国。1930至1931年，她到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地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都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她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性及其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深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① 她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并决心投身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行列。翌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宋庆龄高度评价这一反帝爱国行动，指出：“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他们“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② 她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抗日战争，随即与杨铨、何香凝等积极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一所容纳三百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亲自担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并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战士，鼓舞士气。

当国民党反动派用白色恐怖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时候，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于1932年12月在上海组织进步

① 《申报》，1931年12月20日。

② 《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宋庆龄选集》，第54—55页。

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把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屠杀，保卫人民正当的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她的领导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面积极从事营救被捕革命者的工作，一面大声疾呼，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它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日趋高涨的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反蒋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宋庆龄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黑暗岁月，以她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千方百计地支援、掩护和营救了许多被迫害的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理想和事业的坚定继承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始终不渝的亲密战友。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为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成立而斗争。1934年4月，她与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①。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不久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当1935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紧的时期，她在1937年2月，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认为“只有忠实执行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②。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给予了当时正在高涨的全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以重要的帮助。同年春，她热诚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了该会的执行委员。6月，她同何香凝

① 《红色中华报》，1934年9月21日。

② 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3月13日。

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十六人，共同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在其所发表的宣言中，严正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也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① 11月，她又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极力赞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今天“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② 再次表明她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终于携手进行抗日救国。这时，宋庆龄把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队作为主要工作。她邀集中外著名人士，于1938年6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此后四年中，一方面著文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运动，报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赞扬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一方面向全世界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及其他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抗日的战斗。她还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济工作，白求恩大夫所建立的国际和平医院，在抗日战争及以后的解放战争中，都曾经起了十分出色的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立即同何香凝、陈友仁等联名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严厉斥责蒋介石“把孙中山的遗训置诸脑后，破坏团结抗战”，并严正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

① 《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选集》，第112页。

② 《宋庆龄选集》，第126页。

行动”^①。

同年年底，在日军侵占香港前六小时，宋庆龄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之后，她在重庆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还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处境十分艰难危险，但她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种种利诱、威胁和迫害，坚持不懈地揭露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抨击他对内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同时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条件，忘我地、巧妙地从事革命活动，全力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阅览室、识字班以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劳动群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重新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宋庆龄于1946年7月23日，及时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人民性质，反动分子决不能期望从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出路只有废除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她坚决反对蒋介石推行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指

^① 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而“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并要求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①。这一义正词严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和响应。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日子里，宋庆龄面对着反动势力的种种恐吓和威胁，坚贞不渝，继续募集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及其他物资，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和其他途径，运送到解放区，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资支援。她为了支援解放区，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暴和腐败，驳斥他们对解放区的诽谤。宋庆龄把人民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以她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绩。

1948年1月，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李济深、何香凝等人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文章，热烈欢呼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领导者”，满怀激情地“向共产党致敬”^②。9月，她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③

由于宋庆龄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5日。

② 《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③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92页。

她在1949年9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9、12月分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连续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宋庆龄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取得很大成功。1957年11月，她随同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她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共商国际国内的大事，在政治上从来同共产党保持一致。正如刘少奇所说，宋庆龄在“历次关键时刻”，“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①。

宋庆龄一贯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工作，热情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长期领导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她在1949年1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1953、1957年和1978年的全国妇联第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她从1957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在救危扶伤、群众福利方面，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宋庆龄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工作，

^① 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

受到广泛的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她无私无畏，英勇战斗，忠贞不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紧跟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宋庆龄从热爱祖国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顺应时代的潮流，她的爱国主义先是发展到革命民主主义的水平，随后又提高到共产主义的水平，进而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早在三十年代，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还关怀和帮助在她周围同她一道工作的人员学习，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安排他们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她早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且在1958年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愿望。同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作为一位伟大的女政治家，宋庆龄曾经发表了许多犀利的文章，对于推动中国人民的革命，维护国际的正义，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侵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这些著述的大部分汇集在她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三书中。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决定为她举行隆重的国葬。6月4日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为国为民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纪念。她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成为激励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鼓舞力量。

尚明轩

年 谱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 诞生

1 月 27 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既是传教士，又是教师和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党人的家庭。^①祖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②当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压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但同时，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封建专制压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兴起。上海则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德，又译作洛士文（Rosamonde），曾用名庆琳，化名苏吉、林泰。

父亲宋嘉树（1866—1918 年），原名乔荪，字跃如，西名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原姓韩，是客家人韩宏义之子，由于十二岁时（即 1878 年）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

① 参见〔美〕尤恩森（R. Eunson）：《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纽约 1975 年英文版，第 30 页。

② 今文昌县昌洒区庆龄乡牛路园村。另据〔美〕项美丽（Emily Hahn）所著《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香港 1941 年英文版，第 4 页载：“宋氏远祖原居山西，因战乱南迁，于宋嘉树出生前数年定居海南岛。”特注录备考。

宋。^①之后，被舅父带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其开设的丝茶商行当学徒。翌年，由于受到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不甘心长期生活在小小的商行店铺中，便怀着探索茶店外陌生世界的梦想，逃离了舅父家。旋在美国一艘税收巡行船上作侍童。1880年11月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后，先后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和万德华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回国，在上海美以美教会传教，兼在教会中学任教。1892年辞去教会职务，转营工商企业，创办美华印书馆，出版中文圣经及其他宗教书籍；同时又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②宋嘉树虽然辞去教会职务，却仍是一个虔诚而活跃的基督教徒，他创办了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美国的上海圣经公会有密切来往。此外，他于1892年结识了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③是国内最早一批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道理的人，随后又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曾被孙中山

① 另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 (Sterling Seagrave) 新著《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一书第一章“逃跑的天朝人”记载，认为韩乔荪 (宋嘉树) 没有过继给宋姓舅父之事，是他十二岁时，由一未署名的远房叔伯将他带往美国去的。他在1879年1月8日船员花名册上填写的名字是“Chiao Sun”，当他学会英语后，把“Sun”字改写成“Soon”，在他回国后，又按中国习惯把“Soon”字改写成“Soong” (这是“宋”字的公认英语拼法)。这样，韩乔荪便由姓韩变成姓宋了。这一说法是否可信，由于我们目前未能看到该书所述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难以遽下结论，暂注此备考。

②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 (即使用机器的企业) 为数很少，总数约五十家左右，而且多数在上海，主要是轮船修理、缫丝、轧花、粮食加工 (碾米、磨粉)、火柴制造、印刷出版等行业 (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200页、1202页)。宋嘉树当时经营的美华印书馆与福丰面粉厂，属于我国早期的新式企业之一。

③ 宋嘉树与孙中山结识时间，一般认为是1894年，但孙中山在1912年4月17日《致李晓生函》中却说：宋嘉树乃是“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据此，再结合1892年陆皓东曾到广州与孙中山等人有过交往的史实，可以推断宋嘉树有可能到广州通过陆皓东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因此，他们结识时间则应是1892年。

誉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隐君子”^①。

母亲倪桂珍（1869—1931年），浙江省余姚县人，为我国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是一位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妇女，曾在上海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她爱弹钢琴，热心慈善事业和上海艾伦纪念教堂的活动，同西方教会的许多教徒结为朋友。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②

共有姐妹兄弟六人，她排行第二，有一姐、一妹和三个弟弟。

姐姐宋霭龄（1890—1973年），1909年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2—1914年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4年与孔祥熙（1880—1967年）结婚后，协同丈夫经营以山西为基地的家业和铭贤学校（该校于1919年成为美国奥柏林大学的附属中学）。1928年后，因孔祥熙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等职，即以夫人身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48年国民党政府衰败时，全家移居美国。^③

大弟宋子文（1894—197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15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国际银行工作。1917年回国，任汉冶萍煤铁公司秘书。1923年，任广东军政府英文秘书；后继廖仲恺担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并兼国民政

① 孙中山《致李晓生函》中说：宋嘉树虽是“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② 关于宋嘉树与倪桂珍的身世等情况，参阅：（一）〔美〕包德华（H. L. Boorman）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第三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英文版；（二）（香港）经济资料室编：《宋子文豪门资本内幕》第1—2页，1948年沈阳印刷；（三）〔美〕项美丽（Emily Hahn）的《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第20、22—26页，香港1941年英文版。

③ 参见：（一）〔美〕斯宾塞（Cornelia Spencer）：《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THREE SISTERS—The Story of the Soong Family of China）第107页，纽约1939年英文版；（二）〔日本〕《亚洲历史词典》（アジア歴史事典），第五卷，平凡社1960年日文版。

府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后，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部长等职，1933年10月后，以主要精力从事企业活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重新投入政界，历任国民党政府全国航空委员会代主席、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47年9月，改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败亡，1949年1月，辞去职务，逃往美国，定居纽约。1971年4月，病故于旧金山。^①

妹妹宋美龄(1897— 年)，1908年随其二姐出国赴美求学，因年仅十一岁，在威斯里安女子学校注册为特别生，至1912年始准为正式生入学。1913年转到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至1917年毕业。1927年12月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婚后担任蒋的秘书和英语翻译。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革命军遗族学校校长、儿童保育会会长等职。1936年初又任全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为美国杂志撰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作广播讲演，并在1943年先后到美国国会和加拿大议会作讲演，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1948年，蒋介石为了争取美援以扩大内战，又派她去美国求援，便长期留在美国，直到1950年1月回到台湾。此后，仍负责指导“妇女反侵略同盟”工作，并多次以亲善使节和蒋介石个人特使的身份去美国活动。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即移居美国。^②

二弟宋子良(1899— 年)，1921年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及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长、六河沟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兼协理、中国国货银行董事兼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理事、中国银行董事等职。1936年任广东财政特派

① 参见：(一)〔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昭和十四年日文再版。(二)〔日〕《亚洲历史词典》第五卷，平凡社1960年日文版。

② 参见：〔美〕包德华(H.L. Boorman)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三卷(英文版)。

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抗日战争期间任滇缅路总办。1947年定居美国。^① 1981年5月，其二姐病危时，曾由纽约发电北京慰问。^②

三弟宋子安（？—1969年），1928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松江运副（辅助盐运使掌管盐务行政事宜）、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经理及中国国货公司监察等职。1948年担任香港广州银行董事会主席，由于定居美国而常往来于旧金山与香港之间。1969年2月病故。^③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 一岁

是年 大弟子文出生于上海。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四岁

是年 妹美龄出生于上海。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六岁

是年 二弟子良出生于上海。

① 参见：（一）〔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昭和十四年二月日文再版。（二）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第二册，1936年版。（三）王正元：《宋美龄的姊妹情谊》，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57页。

② 慰问电全文是：“上海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甚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宋子良1981年5月22日于纽约哈里森。”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

③ 参见：（一）〔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昭和十四年二月日文再版。（二）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第二册，1936年版。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七岁

是年 入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读书。性格文静，学习用功，善思考问题，对英语和文艺尤为喜爱，曾参加该校幼稚园的游艺会演出，颇受观众赞扬。

△ 惠州起义前夕，孙中山于8月28日由日抵沪，住在宋家，与宋嘉树共同探索救国道路，畅谈反清革命问题。由于其智慧早开，深被大人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因“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①的献身精神，对其起了启蒙作用。对孙中山十分崇敬，曾对人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②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十五岁

7月 在上海中西女塾毕业。

夏 偕同妹妹美龄，在温秉忠^③夫妇的监护下，乘太平洋邮船“满洲里号”离上海赴美求学。

秋 入美国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补习法语与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

① 《宋庆龄选集》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

② 〔美〕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第22页，（英文版）。

③ 温秉忠（1862—？年），广东新宁县人，我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曾在上海参与经办棉纺织厂；先后参加南京、天津外事局工作，曾任苏州海关监督等职。1908年奉命率代表团赴美考察教育。（参见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载《南开史学》1984年第一期。）

1909 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十六岁

夏 考入乔治亚州梅肯市(Macon)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文学系。9月5日入学。^①

是年 入学后，学习勤奋，对哲学课程特别感兴趣。曾担任学校院刊《威斯里安》(THE WESLEYAN)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Harris Literary Society)的通讯秘书。

△ 在校期间，经常接读父亲的来信，教导其关心中国局势及多多阅读中国历史书籍，从而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报纸，了解祖国情况。当在班上讨论问题时，虽态度温文，声音柔和，但却雄辩滔滔，颇有见解，深得同学的敬重。在回答同学询问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的事而不无忧无虑地享乐时说：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②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 十八岁

11月 在院刊《威斯里安》发表童话短文《四小点》(The Four Dots)。文章是叙述古代一个叫杨韦林的孩子，勤奋善良，刻苦读书，并曾救助过蚂蚁；后来，他得到蚂蚁暗中帮助而获得应试成功的故事。^③

① 据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08—1909 年新生注册登记表》影印原件，转引自《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

② [美]斯宾塞(C.Spencer)：《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16页。

③ 全文见《威斯里安》院刊复制件，译文刊于《儿童时代》第十期，1982年5月16日。

△ 在院刊《威斯里安》发表政论文章《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Educated Students on China) 该文论述中国早期留外学生在政治、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对中华民族的良好影响, 抨击中国封建官吏的愚昧, 并列举鸦片烟、缠足、蓄辫子等陋习, 说明“中国赋与这些留学生广阔的工作领域和无限的机会”,^① 抒发自己为改造和建设祖国而学习的胸怀。

1912 年 (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 十九岁

年初 接父亲来信, 获悉中国革命党人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 孙中山于同年 12 月 29 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极为欣喜。为表示拥护共和, 立即扯下学校中的清朝龙旗, 踩在脚下, 并挂上新国旗——五色旗, 高呼: “打倒专制! 高举共和的旗帜!”^② 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

4 月 在院刊《威斯里安》发表政论性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The Greatest Even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文, 以卓绝的见解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 “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因为辛亥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这一制度已持续四千多年; 在它的统治下, 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 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 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 沦于极度贫困。推翻满清政府就是剷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

① 见《威斯里安》院刊该文复制件, 译文刊于《儿童时代》第十期, 1982 年 5 月 16 日。

② [美] 项美丽 (E. Hahn): 《宋氏姐妹》(英文版), 第 82 页。

还明确指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争取它们，许多高尚英勇之士献出了生命。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文中预言：“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它方面起作用”，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从事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 and 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对他们来说，笔比剑更有力量。他们尊重和平这门学科而漠视战争这门学科，他们崇文轻武”。“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起来。它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①

是年 在回答历史教授提出的：“从历史课上学到的，你觉得哪件事最重要？”问题时说：“我想，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有真正的进步。”^②这一具有卓越见解的回答，得到了历史教授的极大赞赏。

1913 年（中华民国二年 癸丑） 二十岁

4 月 在院刊《威斯里安》连续发表《现代中国妇女》(The Modern Chinese Women) 与《阿妈》(Ahmah) 二文。

① 原文见《威斯里安》院刊复制件，译文载《中国建设》杂志，1983 年第五期。

② 〔美〕斯宾塞(C.Spencer)：《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31页。

《现代中国妇女》文中以 1907 年中国开始招考美国韦尔斯利大学提供女留学生的^①事实，说明女孩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孩子差，并进而论证要提高人类中占半数的男子，不能不同时提高人类的另一半（按：指妇女）。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①《阿妈》是篇散文，通过一个保姆的感人事迹，抒发了对保姆深切怀念的真挚感情。^②

春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指出：“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③。

8 月 离美回国，为探望父母并会见孙中山，决定途经日本，于 8 月 29 日抵达横滨。当时，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迫流亡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准备发动讨袁的“三次革命”。宋嘉树夫妇及女儿霭龄也随同流亡到日本，宋霭龄仍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嘉树则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并帮助处理一些英文函电。

9 月 16 日 满怀仰慕、崇敬的心情，并带着一些革命同情者送给孙中山的一盒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到东京看望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文件档案记载，此后的十天中，曾八次去看望孙中山，坚定地表示愿为革命尽力的决心。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文的动向”专栏内的详细记载是：

（一）16 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宋氏姐妹带着中国随从来访”。

① 《现代中国妇女》，复制原件。

② 《阿妈》，复制原件。

③ 宋庆龄：《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对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载于《宋庆龄自传》，第 38 页，光华出版社 1938 年版。

(二) 18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 宋嘉树的女儿姐妹一起来访”。

(三) 20日, “上午十时, 宋氏姐妹来访, 十一时四十分, 妹妹离去”。

(四) 20日, “下午二时十分, 妹妹又来访 (四时二十分, 三人离去)”。

(五) 21日,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 来访的宋嘉树的女儿二人同乘汽车外出, 至神田区北神保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前, 宋的两个女儿下车……”。

(六) 23日, “上午九时四十分, 宋氏姐妹来访。下午四时半, 孙 (中山) 与马素、宋氏姐妹一起分乘二辆汽车外出, 顺路到神田今川小路二番一〇二号宋家, 又到赤坂青山北町六番五十三号下田歌子家访问, 六时离开, 将宋氏姐妹及马素送回神田宋家, 自己于六时半回到住处”。

(七) 24日, “上午九时, 宋嘉树的女儿姐妹来访。下午二时十分, 宋氏姐妹和国民党杨干事长一起离去”。

(八) 25日, “上午十一时, 宋氏姐妹来访; 下午四时二十分离去”^①。

1914年 (中华民国三年 甲寅) 二十一岁

1月28日 赴孙中山寓所访问。^②

3月2日 同宋霭龄一起赴孙中山寓所访问。^③

3月28日 孙中山患腹痛, 同宋霭龄一起到孙中山寓所进行护理。^④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 政务局第一课, 乙秘第294—345号, 缩微胶卷MT103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

②③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 缩微胶卷MT104号、105号。

6月22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

9月 因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经孙中山同意，接替宋霭龄担任英文秘书。此后，积极协助孙中山工作，负责处理函电，从事联络和起草文件，提供资料，并经管革命经费等，均能出色地完成任务，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离不开的助手。

11月 离开日本归国，抵达上海。

是年 热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积极协助工作，并经常和孙中山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其致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中表述个人的心情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①。

△ 通过工作，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熏陶，提高了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更增强了革命的信心。曾默默地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②而孙中山反袁斗争迭遭失败和流亡海外遇到的痛苦和孤寂，也从宋庆龄的支持和协助下得到了鼓舞和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两人在患难中建立起深厚的战斗情谊。

△ 在一次准备离日归国探视因病早已回国的父母时，曾向孙中山提到他们结合的问题，当孙中山要其多考虑一些时候，并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再作决定时，坚定地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③。

① [美]斯宾塞(C.Spencer)：《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51页。

② 同①，第157页。

③ 同①，第158—159页。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二岁

3月27日 由上海返回日本，抵东京，受到孙中山的迎接，一同乘汽车回寓所。

6月中旬 又一次离东京回国，到达上海。当向父母征求关于自己同孙中山结合的意见时，虽遭到全家的反对，仍不动摇坚定的意愿。在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信中写道：“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①。

10月下旬 在上海接待孙中山派来的使者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Muphia，系宋童年时代的好友）。接读朱带来的孙中山的急函，获悉孙中山于同年3月已与分居多年的妻子卢慕贞协议离婚，朱卓文是离婚协议书的证人之一。^②

△ 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偕同朱卓文父女一起离沪赴日。

10月24日 下午一时抵达东京，孙中山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① [美]斯宾塞(C.Spencer)：《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79页。

② 张珏：《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二十七集，北京1988年版。关于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一事，说法不一。当时孙中山是采取分居协议办法处理这件事的，名曰分居，实为离婚。此后，卢慕贞独居澳门，孙科等子女仍奉养一切。（参阅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171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应该说，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为顾全卢慕贞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一种较为妥善的办法。因当时中国的社会习俗，丈夫主动与妻子分离名曰“休妻”，妻子就被一般人视为“弃妇”而丧失社会地位。台湾罗家伦编、黄季陆增订的《国父年谱》中说：“卢夫人亦曾作与先生分离主张，时历数年，终成协议。”（见该书增订本上册，第567页，台北1969年11月增订版。）孙中山在给英国康德黎（J.Cantlie）的信中，用“divorce”一词，说明他与宋结婚前，便与前妻离婚了。（参见《致康德黎函》（To James Cantlie），载：《国父全集》第五册，第416—418页，台北1973年版。）我们认为，孙中山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态度是严肃的，先与卢氏离了婚，然后才同宋庆龄结婚。

与孙中山同乘汽车回到孙的寓所。^①

10月25日 上午，与孙中山在牛込区袋町五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婚礼。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并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②参加婚礼的有少数友人及日人山田纯三郎等。下午，又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举行茶会，招待少数几位友人，然后共赴新居青山原宿109号住宅（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二十三号）。

是年 婚后，以夫人身份继续担任秘书工作，在给美国同学安德逊（A. Anderson）的信中谈到自己和孙中山的结婚，“是尽可能的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语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象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③。孙中山对他们的结合也十分满意，在写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这样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

① 据档案记载：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十分，孙文乘汽车外出，到东京车站。宋庆林（龄）由上海来日，与另一名中国妇女于同日一时五十分到达东京，与孙文同乘汽车于二时三十分返回孙文住宅。”（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秘字第二〇七一号，缩微胶卷MT107，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

② 《誓约书》的全文（译文）是：“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原件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按：结婚日期，因日本风俗以双日为吉日良辰，故接受律师建议，填写为10月26日；签名“庆琳”，是因“琳”、“龄”谐音，又容易写，当时宋未带图章，故没有钤盖。该誓约书曾经宋庆龄亲为鉴定，确认系属真品。（参见赵金敏：《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誓约书》，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二期。）

③ 〔美〕项美丽（E. Hahn）：《宋氏姐妹》，第97—98页。

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①。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丙辰） 二十三岁

4月9日 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及日本友人，在日本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

4月27日 随孙中山由日本启程回国。

5月初 到达上海，住法租界环龙路(Route Vallon)63号(今南昌路26号)。在该处同住的，有马伯麟、朱执信、廖仲恺、马湘等人。

5月 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6月，袁世凯毙命于北京，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7月25日 患腹痛、腹泻，并有发烧。孙中山托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代请医生到寓所诊治。^②

8月中旬 陪同孙中山到杭州、绍兴等地参观、游览。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丁巳） 二十四岁

4月2日 在上海致书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日本的著名实业家，曾积极帮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慰问梅屋夫人病情，同时说明中国在欧战中严守中立的立场，并谴责那些为一己私利，企图把中国推向战争的野心家。信中写道：“至于我国的政治境况，你会意识到，有很多自私的野心家正竭力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

① 《国父全集》第五册，第416页，台北1974年版。

② 参见孙中山：《致山田纯三郎代请医生一名来寓函》，载《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08页，台北1973年版。

战。这样做，对我们来说即使无所失，也将一无所得。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为了些微小利的一点钱，不少人竟甘愿牺牲他们国家的命运。我的丈夫为中国的独立，几乎贡献了他的全部青春，他敏锐地感到有些官吏的卑劣行径，他们视金钱和个人的地位胜过于真理、忠诚和自尊”^①。

7月6日 随孙中山率海军军舰两艘离沪赴穗，协助进行“护法”运动。同行的有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炳麟等。

17日 抵达广州。

9月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11月7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当消息传到中国后，同孙中山一样甚感兴奋，并对之十分向往。除继续担任处理英文函电及法文翻译外，又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加强联系苏俄作准备。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戊午） 二十五岁

5月3日 父亲宋嘉树在上海病故。当宋嘉树病危时，曾守护其身边；病故后，又一直到办完葬事，方赶返广州。^②

5月21日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随孙中山离开广州赴上海。

6月26日 抵达上海，居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

夏 孙中山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贺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③孙中山和列宁间开始函电来

① 《宋庆龄致梅屋庄吉函》（英文），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会刊《辛亥革命研究》，第三号。

② 参见〔美〕尤恩森（R. Eunson）：《宋氏姐妹》（英文版），第57页。

③ 〔苏〕叶尔马舍夫：《孙逸仙》，第211页。转引自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第23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往。从此，便担负起孙中山致列宁之函电的起草工作。

8月 同孙中山迁居加拿大华侨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

是年 孙中山决心著书立说，以启发民众，唤醒社会，除继续撰写《建国方略》外，又创办了《建设》杂志。在此期间，细心照料孙中山的日常生活，并担负查阅资料，誊写文稿，与其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等工作。孙中山在此前后所撰写的《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和《孙文学说》等重要著作中，无不饱含着其一份辛劳。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六岁

5月4日 北京三千余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并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队伍至东城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北京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由此开始。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5月 和孙中山一起，满腔热忱地欢迎和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对北洋政府无理逮捕北京爱国学生表示愤慨，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7月中旬 桂系军阀和北方军阀北呼南应，疯狂镇压广东的爱国运动。根据孙中山的授意，代为起草要求广东军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的电报。指出：“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斥责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不惟为粤人之所共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①。

① 《致广东军政府请释放工学界被捕代表电》，载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集，“文电”第166页，成都近分书屋1944年版。

1920 年（中华民国九年 庚申） 二十七岁

11月25日 粤军攻克广州。是日随同孙中山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同行者有伍廷芳、唐绍仪等。

11月28日 晨，随孙中山乘船抵香港。

△ 下午五时，随孙中山乘车到广州，受到当地军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21 年（中华民国十年 辛酉） 二十八岁

4月7日 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于广州举行，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5日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并发表就职演说。广州数十万市民结彩游行庆祝。中午，随同孙中山在广东省财政厅前检阅游行队伍，后又随同孙中山乘汽车到马路上游行，与群众同欢。晚上，再随同孙中山观看提灯会等庆祝活动。^①

6月 孙中山为进行北伐，统一全国，必须首先要消灭在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6月20日，粤桂战争爆发，26日粤军占领广西梧州，各处桂军急谋自保，纷纷与陆荣廷脱离关系。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陆荣廷等。为了支援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的战争，和何香凝等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设会址于总统府。她们辛勤奔走，积极办理慰劳事宜。^②

10月15日 孙中山乘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北伐，北伐军三万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13日、6月25日。

②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人亦同日开拔，欢送者逾万。随同孙中山出巡广西。

11月15日 乘船返回广州，孙中山则从梧州起程前往桂林。^①

12月6日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行装甫卸，即成立北伐大本营，廖仲恺负责筹划财务，邓铿负责组织警卫部队。是日，率领红十字会员从广州赴桂林，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②

12月21日 率领红十字会员抵桂林。^③

12月23日 在桂林参与孙中山同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商谈。马林是经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双方商谈多日。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

是年 协助孙中山起草公文和稿件，负责处理大量的机密函电和其他日常工作。^④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壬戌） 二十九岁

5月6日 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督师时，率领红十字会员多人随行。

5月中旬 从韶关致电广东省红十字联合会，要求从速再派会员赴韶。在和何香凝等的共同发动组织下，广东不少妇女觉悟迅速提高，纷纷报名担任救护伤兵的工作，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⑤

6月1日 随同孙中山乘火车回到广州，即乘汽车返总统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1月23日。

② 同①，1921年12月7日。

③ 同①，1921年12月22日。

④ 参见原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广东省参事室主任李浩之谈：《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载《广州日报》1981年6月4日。

⑤ 同①，1922年5月18日。

府。^①

6月16日 凌晨，军阀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准备北伐而公开叛乱，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当孙中山要其先行撤离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走，勿以她为念。不顾孙中山的多次劝说，坚持留下来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让孙中山安全撤离，表现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无限坚贞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一直坚持到早上八时，才在两名卫士和一名副官的护卫下，突破包围。“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②后辗转到了岭南大学，住在友人家里。翌晨，转赴黄埔，到军舰上与孙中山会合，“真如死别重逢”。

6月25日 化装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轮到达上海，即寓于私宅。^③

6月28日——29日 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广州脱险》一文。文章揭露了陈炯明奸狡的叛徒嘴脸和发动叛乱的反动与残酷，详细记述了脱险的经过。^④

8月7日 接孙中山来电谓：敌人制造种种谣言，切勿信之。^⑤

8月下旬 孙中山离开军舰到达上海，着手改组国民党。在孙中山和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时，以及在孙中山与列宁所派特使的交谈中，均在座，并做了大量切实有

① 《申报》，1922年6月3日。

② 《广州脱险》，《宋庆龄选集》第3—6页。另参见原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李洁之谈：《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载《广州日报》1981年6月4日。

③ 同①，1922年6月26日。

④ 这篇文章系用英文所写，此时发表的是最早的译文。

⑤ 指叛军当时在广州、香港两地对孙中山所捏造的怪诞谣言。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0日。

效的工作。

9月 陪同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见美国记者希尔等人。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癸亥） 三十岁

1月20日 陪同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晤谈。^①

1月26日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宣言中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②。

年初 陪同孙中山接见北京大学学生黄日葵、王昆仑等，听取了他们汇报北京爱国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爪牙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的斗争情况。^③

5月2日 从上海抵广州，寓于士敏土厂。^④

5月4日 到广州各伤兵医院慰问伤兵。^⑤

5月6日 陪同孙中山到石围塘滇军临时病院、河口大本营野战病院慰问和犒劳伤兵。随同前往的有参谋长蒋介石、参军长朱培德等。^⑥

5月8日 陪同孙中山到英德慰劳前敌将士。^⑦

7月 陪同孙中山到广州大沙头飞机场观看由大元帅府航空局长杨仙逸装配的第一架国产飞机的试飞。飞机有两个座位，除飞行员外还可坐一个人。试飞开始，当孙中山问谁愿意登机试飞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1日。

② 同①，1923年1月28日。

③ 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

④ 同①，1923年5月3日。

⑤ 同①，1923年5月5日。

⑥ 同①，1923年5月13日。

⑦ 同⑥。

时，勇敢地表示愿意参加试飞。这一勇敢行动得到孙中山同意。登上没有舱盖的飞机，飞机飞到广州市上空作了飞行表演，然后安全降落。旋孙中山接受观众请求，用“洛士文”（宋庆龄曾用过的英文名字）命名这架飞机。这次参加试飞，不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胆略，而且还用勇敢行动表示了对孙中山发展革命武装和“航空救国”主张的坚定支持。^①

8月14日 和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并与全舰官兵合影。

10月11日 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②

10月21日至23日 陪同孙中山乘坐江固号炮舰和大南洋号轮船巡视虎门要塞各炮台，受到虎门要塞司令廖湘云、炮台官兵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登上炮台观看官兵的操练。^③

12月21日 陪同孙中山到广州岭南大学演说。孙中山在该校怀士堂（今中山大学小礼堂）的演说中，勉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④。同孙中山一起在岭南大学校园内合影留念。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甲子） 三十一岁

1月1日 陪同孙中山出席在广州大元帅府举行的庆祝元旦和民国政府成立纪念仪式，接受到会的军政官员及群众的祝贺，并陪同接见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又于随后举行的颁奖大会上，在孙中山讲话后，亲自将勋章发给在陈炯明叛乱时防守观音山战斗

① 区荣光：《宋庆龄在广州试飞》，载《新观察》1982年第十期。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4日。

③ 同②，1923年10月30日。

④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七期。

有功的卫士。^①

1月2日 陪同孙中山前往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参观运动会。^②

1月上中旬 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曾向孙中山提出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③。

△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夕，一次讨论改组国民党和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右派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在会上造谣污蔑共产党，妄图破坏国共合作，孙中山予以严厉斥责。他们中的某些人，以为其年轻可欺，找上门来，请“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④

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三十日闭幕。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指定汪精卫、胡汉民、李大钊、林森、谢持五人为大会主席团。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中，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2月24日 随同孙中山出席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列宁追悼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廖仲恺、孙科和各军、国民党各区分部的代表及各界群众。追悼大会由廖仲恺主持，孙中山主祭。祭台上高悬孙中山亲手所书的“国友人师”祭帐。^⑤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3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9日。

③ 《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④ 参见《宋庆龄选集》第465—466页；田桓：《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载《解放日报》1981年6月3日。

⑤ 同①，1924年2月25日。

6月16日 为培养革命干部，训练革命武装，创造革命军队，以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上午六时，陪同孙中山从大本营出发，乘江固号军舰前往黄埔，出席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在码头上，受到该校师生列队欢迎。除参加开学典礼外，并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登上主席台，检阅了部队阅兵式。^①

11月13日 陪同孙中山北上。上午八时，随同孙中山乘车到广州长堤天字码头，乘永丰军舰离广州去香港，换乘日轮“新阳丸”前往上海。在码头上受到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群众五百余人的热烈欢送。^②

11月17日 船到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③

11月28日 下午一时同孙中山到日本神户县立高等女子学校，接受学生代表所献花篮，并发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见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又指出：“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库尔特斯坦的广阔版图上，有一位妇女当了总统；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并满怀信心地说：“不论是种族和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7日。

② 《晨报》，1924年11月15日。

③ 同②，1924年11月18日。

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①这篇演说，被当时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认为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11月30日 随同孙中山从日本神户乘日轮“北岭丸”赴天津。各界群众四、五千人在码头上欢送。^②

12月4日 晨，抵达大沽口，中午抵达天津，受到各界群众两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12月31日 随同孙中山由天津乘车抵达北京，受到各界群众十万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北京车站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③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三十二岁

1月26日 孙中山病势加重，和国民党中央有关领导人及中外名医商讨后，赞同其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午，陪同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治疗。晚九时，医生为孙中山施行手术，确诊为肝癌^④。

1月28日 致电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本部，电报说：“自总理施术后，经过良好，现病势渐退，已无碍。请释念”^⑤。

1月30日 听孙中山告曰：“余所恃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战胜此病，决无危险”^⑥。

① 《孙逸仙夫人激励神户女学生的讲话》，日本《大阪每日新闻》，1924年12月4日。

②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2日。

③ 冯超编：《中山外传》第69页，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28日。

⑤ 同④，1925年1月29日。

⑥ 同④，1925年2月7日。

1月31日 在协和医院接待前来慰问孙中山病况的段祺瑞等。^①

△ 接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华妇女协会和中俄协进会三团体慰问孙中山病情函。午、复信该三团体说：“具悉诸君对于中山病状，至为关切，并承垂注”，“厚谊盛情，良深感荷。中山先生病势虽重，然私衷敢信必能获愈。请纾区念”^②。

2月7日 在协和医院接待前来慰问孙中山病况的黎元洪的代表黎澍。^③

2月9日 午一时，在协和医院会见从广州赶抵北京探视孙中山病况的何香凝等。^④

2月18日 以镭锭医治无效，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一起从协和医院护送孙中山至行馆，改聘中医治疗。^⑤

△ 旅京广东同乡会叶荣绰等五百余人所推代表五人，持银爵、瑯鼎各一具，到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馆，献给孙中山和宋庆龄表示敬意，及为他们莅京之纪念品。^⑥

3月11日 孙中山病危。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托着孙中山的手腕在遗嘱上签字。《遗嘱》指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强调：“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⑦在《家事遗嘱》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

① 《晨报》，1925年2月1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1925年2月8日。

④ 同①，1925年2月10日。

⑤ 同①，1925年2月19日。

⑥ 同①，1925年2月18日。

⑦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2日。

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①在致苏联遗书中，阐明了他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接受孙中山要求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其未遂愿望的嘱托。^②

3月12日 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逝世。终年五十九岁。中午，和宋子文等护送孙中山遗体至协和医院施行防腐手术。^③

3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

△ 上午十时，和孙科、宋子文等至协和医院，亲视孙中山入殓，“哀伤甚盛”。孙科令人扶之出院，送回铁狮子胡同行馆。^④

3月16日 致电上海孙中山寓所，嘱勿移动孙中山在世时书案坐椅等之原位，保持孙中山在世时之原状。^⑤

△ 在铁狮子胡同行馆接受苏联公使加拉罕夫妇的慰问，并接受所面交的二函：一表达其个人对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哀悼；二为莫斯科电报传来的苏联政府吊唁词。^⑥

3月19日 上午十一时，和亲属以及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宋子文、孔祥熙、张继，汪精卫、于右任、陈树人、李大钊、邓家彦等护送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供各界人士、广大群众吊唁。沿途有十余万群众送丧吊祭。和宋子文以及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在灵堂守灵。^⑦

① 《孙先生致家属遗书》，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3日。

② 《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32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9日。

④ 同③。

⑤ 同③，1925年3月17日。

⑥ 同⑤。

⑦ 同③，1925年3月20日。

3月20日 上午十时，和孙科以及部分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前往北京西山寻觅孙中山灵柩停厝之所，以便中央公园吊礼完毕之后，即将灵柩暂厝该地。^①

4月2日 护送孙中山灵柩到西山碧云寺。棺上放着其所敬献的花圈。上午十一时，载着灵柩的汽车缓缓驰离中央公园，和亲属等乘马车随灵柩后行。灵车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然后经海淀、玉泉山到西山。北京市民30万人步送至西直门。两万多人步送至香山。更有千千万万群众停立在灵车经过的大道两旁路祭。下午四时二十五分，灵车到达碧云寺，人们将孙中山灵柩置入寺内最高处的金钢宝座塔的石龛之中。^②

4月5日 孙中山遗体改殓新棺。上午九时和孙科、宋子文等到北京西山碧云寺石塔灵堂，亲视孙中山遗体改殓楠木新棺。^③

4月10日 晚十时，由北京乘火车抵浦口。晚十一时抵南京下关，受到当地党政官员和各团体群众数百人的热烈欢迎。当晚下榻南京花园饭店。^④

4月11日 上午与孙科等前往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下午乘车赴上海。^⑤

4月12日 上午十时偕母亲倪太夫人及孙科等出席上海市十万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隆重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会上由何香凝报告孙中山历史及勋绩，并指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先生已死，我辈之责任愈重，先生已为我辈播三民主义及废除不平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1日。

② 《晨报》1925年4月3日；《北京日报》1983年4月2日。

③ 同②，1925年4月6日；同①，1925年4月9日。

④ 同①，1925年4月13日。

⑤ 同①，1925年4月13日。

等条约之种子，我辈当日日汲水灌溉，使之滋生长大”^①。

4月14日 上海闸北各团体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因身体不适委派叶纫芳为代表出席。叶在会上致词说：“凡追悼孙先生，当继续先生生前欲达之主义。”“孙夫人及哲生（即孙科）公子当遵孙先生遗嘱，追随诸君之后奋斗实行”^②。

4月17日 上海国民党女党员派代表到莫利哀路29号寓所面致慰唁。由何香凝代表致谢并勉励前来慰唁的女党员代表说：“孙先生奋斗四十余年，毫无一些产业，先生所遗下来的产业，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最后之《遗嘱》。这不但是孙夫人之产业，也便是中华民国和东方民族的产业。希望女同志们以后当更遵守先生遗言，根据先生主义，努力为本党宣传，方能达到男女平等及中国民族的解放。”和何香凝及前来慰唁之女党员代表合影留念。^③

4月20日 从上海抵南京。

4月21日 和何香凝、孙科等出席南京各界在秀山公园隆重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

△ 下午和孙科等前往南京紫金山继续勘察孙中山墓址。^④

4月22日 从南京返抵上海。^⑤

6月初 在上海就“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解放。“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3日。

② 同①，1925年4月15日。

③ 同①，1925年4月18日。

④ 同①，1925年4月23日。

⑤ 同①，1925年4月24日。

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惜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势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还说：“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并“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号召：“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并说：“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之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①。

6月30日 由上海乘车抵北京。不顾旅途劳累，立即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登上中央主席台。与会群众约五万人，德国国际工人后援会、印度被压迫民族、日本工党、台湾等地区 and 团体的代表数十人参加大会。因身体不适不能演说，请刘清扬转告到会群众，表示极为抱歉。^②

是月 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首先指出收回海关权益的重要说：“孙中山先生始终认为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海关收入每年在数千万两以上。以巨额之现款均无息存入英商汇丰银行，为英人操纵我国金融之利器。”接着回顾孙中山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赞扬孙中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在广州力争两广关余，明知列强必以武力恫吓，而卒毅然行之者，一以公理所在不能屈于威武，一以国人习于帝国主义之侵略久而忘之，欲以独立反抗，唤起民众之自决与世界之公道。”“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9日；《宋庆龄选集》，第7—8页。

② 《晨报》、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1日。

为所屈，卒使美公使亲临调解。列强自知理屈，虽关余问题因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正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最后赞扬全国人民“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是“志（孙）先生之志，行（孙）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①。

8月下旬 惊闻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于20日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发出《为廖仲恺遇刺逝世给廖夫人的唁电》，指出：“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家母亦深哀悼。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竭力进行。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②。

9月20日 和孙科夫妇、杨杏佛等到上海大洲公司三楼，出席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召集的关于孙中山陵墓图案评判和选定会议。会上选定了陵墓图案，并决定了获奖名单。^③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三十三岁

1月3日 乘“林肯”号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参加1日开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国民政府接其离沪返粤电后，即派副官长马湘赴香港迎接。^④

1月7日 晚八时半和陪同者宋子文、马湘等抵广州。在码头上受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政军机关、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省港各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代表，约二万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何香凝所献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宋庆龄选集》，第9—11页。

② 同①，1925年8月25日；《宋庆龄选集》，第12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9月21日。

④ 同①，1926年1月6日。

的鲜花。^①

1月8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演说中赞扬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显著进步说：“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快慰的。因为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孙）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安慰，而且亦安慰了（孙）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义正词严地谴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要共同努力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强调：“（孙）先生主义的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②。

1月9日 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③

1月16日 由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原则立场，赢得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拥护和尊敬，以获得最多的选票数之一（有效票总数249张，获得选票245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④。国民党“二大”于19日闭幕。

1月17日 出席广州市妇女界在广东教育会礼堂召开的欢迎会。礼堂门前高悬“欢迎宋庆龄女士回粤”的横幅，到会群众甚为踊跃。在会议主席作过欢迎词后，致答词。^⑤

1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广州市党部妇女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信学校、省立女师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2页，1926年4月版；另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9日所载《孙夫人抵粤续闻，昨日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③ 同②，第53页。

④ 同②，第146页；另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7日。

⑤ 同①，1926年1月18日。

等在广东大学风雨操场召开的欢迎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推进女权发展之重要。对越来越多的妇女政治觉悟的提高表示欣慰。“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①。

1月22日 和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何香凝、李济深等以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会长名义发出通告，为募集该会开办经费将举行游艺晚会和物品展销部，征求各大商店、著名工厂捐赠商品、产品义卖，并征求艺术家蒞场义演。^②

1月23日 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由何香凝代理）。^③

1月25日 下午三时，接受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等八人代表全体罢工工人前往寓所的慰问和感谢。在鲍罗廷夫人陪同下接见苏兆征等，提出解决省港罢工的意见，并表示以后要与省港罢工工人代表见面^④。为支援省港罢工工人，曾向北方同胞，海外侨胞募集十余万元巨款捐赠省港罢工委员会。

3月4日 为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晨七时十分和孙科、邓泽如等乘船离开广州，经香港赴上海。^⑤

3月8日 到达上海，受到广大国民党党员和群众的热烈欢

① 《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0日；《宋庆龄选集》第13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2日。

③ 同②，1926年1月25日。

④ 同②，1926年1月27日。

⑤ 同②，1926年3月4—5日。

迎。^①

3月10日 和孙科、邓泽如及杨杏佛等，从上海乘车抵达南京。^②

3月12日 和孙科、邓泽如、杨杏佛等，以及各界群众数千人参加在南京紫金山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由邓泽如代表国民政府行奠基礼，杨杏佛报告葬事经过。^③是晚，离开南京乘车赴上海。

3月13日 晨7时，抵上海。^④

5月7日 发表征集孙中山著述启事，向海内外国民党同志和孙中山的友人征集孙中山著作的原稿墨迹。提出“拟于最短期间编印（孙中山）遗集，以重久远，而广流传”，并拟将孙中山著作“原文真迹”“一律影印行世”^⑤。

9月29日 接受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聘任的征募部部长职务，表示对该会的劳军等事项将予以积极赞助。^⑥

10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出席者八十人。和谭延闿、张静江、徐谦、吴玉章等五人担任会议主席团成员，出席了是日的开幕和28日闭幕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最近政纲、召集国民会议原则，省政府与县市政府组织等决议案。^⑦

11月16日 上午，和其他先遣人员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蒋作宾、鲍罗廷等六十余人，离开广州取道广东韶关、江西南昌等地前往武汉。接受欢送代表所献的鲜花，群众还燃放鞭炮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9日。

② 同①，1926年3月11日。

③ 同①，1926年3月14日；《晨报》，1926年3月14日。

④ 同①，1926年3月14日。

⑤ 同①，1926年5月7日。

⑥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30日。

⑦ 同⑥，1926年10月18、28、30日。

表示欢送。^①

11月22日 在赴武汉途中，和其他先遣人员到达广东南雄。^②

12月2日 上午8时，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到达南昌，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等的欢迎。欢迎群众“填街塞途”，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欢迎大会在当时设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门前举行，蒋介石致欢迎词。^③

12月4日 从南昌前往庐山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的庐山会议，受到群众两千余人的热烈欢迎。^④

12月7日 和蒋介石、邓演达等由庐山前往九江。^⑤

12月10日 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由九江到达武昌。^⑥

12月11日 中午12时，和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柏文蔚以及鲍罗廷等出席在汉口济生路广场召开的群众欢迎大会。到会群众达十五万人。下午3时，出席汉口市党部在普海春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上，出席汉口军政各机关举行的欢迎宴会。^⑦

12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以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以及鲍罗廷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各项重要问题。此后，每日都到“临时联席会议”所在地汉口南洋大楼去办公，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忠实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大革命洪流中去。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7日。

② 同①，1926年11月23日。

③ 同①，1926年12月14日；另见《林伯渠日记》，第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版。

④ 同①，1926年12月14、15、21日。

⑤ 同①，1926年12月21日。

⑥ 同①，1926年12月14日。

⑦ 同①，1926年12月14日。

1927 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三十四岁

1 月 1 日 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该地执行职权。是日上午，出席在国民政府大厅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各机关人员的元旦团拜仪式。

△ 中午12时，和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起出席为庆祝元旦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南湖举行的人民阅兵典礼。参加的群众达二十多万人。^①

1 月初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和孙科、陈友仁、邓演达、董必武、李宗仁等十三人被任为委员。出席了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第一次会议。^②

1 月 7 日 与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蒋介石等，谓：“弟等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国民政府之信用，得将时局改造日趋稳定，外交地位顺利，军事消息日升，财政大有气色。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不独战争必须身先士卒，政治亦然。中央领袖必须亲临政治冲激之地，始能战胜敌人。”^③

1 月 10 日 下午 2 时，和徐谦、鲍罗廷等参观汉阳兵工厂^④。

1 月 12 日 蒋介石由南昌经九江乘船到达汉口，和鲍罗廷夫人以及国民政府领导人到码头欢迎。^⑤

1 月 20 日 为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发表《敬告全国女同胞书》，指出：“我们民族要在世界上生存，非一致联合打倒帝国主义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1 月 11、14 日。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1 月 10 日；另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1 月 14 日。

③ 《电稿抄录》第一本，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同②，1927 年 1 月 11 日。

⑤ 同④，1927 年 1 月 13 日；《晨报》，1927 年 1 月 21 日。

不可，如要打倒帝国主义，又非先把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打倒不可，现在我们革命军，遵着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已将一部分军阀打倒了，得着很大的胜利，眼见国民革命就要成功了。我最可怜的就是我们的女同胞，受了国际上重重压迫之外，还要多受一层，男女不平等的压迫，我们本党党纲是主持男女平等的，对于一切法律皆极端平等，现在广州已正式颁布了，女子在公法上，私法上，民事上，刑事上，皆已得着平等地位。”该书中强调：妇女要获得自己的权利，“是要自己奋斗来做代价的，指望别人恩舍是靠不住的，我指点你们一条路，你们赶快起来一齐投入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做革命工作。”妇女要通过奋斗来获得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提高自己的觉悟，增长自己的知识。该书中还指出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的目的，正是为了“指导你们党务政治一切实用智（知）识，以求本身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同时呼吁：“我用最诚恳的意见，来希望你们大家起来，一同奋斗，再不要观望自误了。有志的女同胞，可以自由前来受训练”^①。

2月12日 在武汉开办的中国国民党妇女政治训练班开学，亲任班主任。聘请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等任教员。上午九时，出席在汉口四维路该班举行的开学典礼。会上发表《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的演说。指出：“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强调：妇女“在社会上的责任，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母良妻，她同时要为国家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孙）总理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的奴才’”。演说中还指出：既反对男子压迫女子，也反对女子压迫女子。“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这就是党务训练班所努力的目标，深愿诸位同学从此努力奋斗，完成国民革命。”在开学典礼上，与参加典礼的董必武、蒋作宾以及训练班的学员合影留念。^①

3月7日 下午2时，和孙科、徐谦等乘楚威号轮到武汉下游江面，迎接从九江乘船前来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公博等人。^②

△ 下午6时，和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陈友仁、邓演达、孙科、经亨颐、彭泽民、谭延闿、徐谦、李烈钧、陈其瑗、于树德、陈公博等，出席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会上，与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被选为全会的五人主席团；同时决定十日召开正式全体会议。^③会上提出不担任主席团成员职务，彭泽民、吴玉章等提出：“已推定，不必告辞”，决定维持原议。^④

3月9日 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指出：“孙中山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之革命家，并为妇女界之革命家，所至之地，无不提倡阶级自由、男女平等。自1911年以来，妇女即已参加革命运动，近二十年来中国已渐次觉醒，男

① 关于汉口妇女政治训练班开学的报导，见（一）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所载《妇女党务训练班开学》，（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4日所载《党主妇女党务训练班开学》。宋庆龄在开学典礼上发表的《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演说，见（一）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三）《宋庆龄选集》，第14至15页。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③ 同②，1927年3月8日。

④ 《江苏省公安局档案处卷宗》，宗1目录12卷17号；《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档案》，第2430和2482号。

女两界思想均大改变。”再次强调：倡办妇女政治训练班的“目的即在根据现在之背景，国民党之主义，着手训练政治领袖，先拣选百人入班，渐次推广不已。新中国妇女之职责，应使其姊妹均有世界眼光”^①。

3月10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三十三人。有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谭延闿、徐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于树德等十八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等十一人，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等四人。全会历时七日，于17日结束。在这次全会上，经过和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议案，和《对全体党员的训令》及《对全国民众宣言》等。重申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强调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实际上罢免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挫败了他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在这次全会上，所表现的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深得与会者的信任和尊敬，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②。

△ 是日下午1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党员二万余人集会，庆祝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并推举代表孔庚等五人到全会递交拥护加强党权请愿书。和全会的其他主席团成员谭延闿、孙科、徐谦及顾孟余一起接见孔庚等人。^③

3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新增加五个部，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同时被任命的有劳工部部长苏兆征、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1日至18日。

③ 同①，1927年3月25日。

实业部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部长顾孟余，农政部部长谭平山^①。

3月20日 和谭延闿、宋子文、徐谦、孙科、陈友仁、经亨颐、彭泽民、吴玉章等，出席在武昌国民政府举行的国民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典礼。^②

4月7日 在汉口会见林伯渠、程潜等。^③

4月22日 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④此后，在《通电》的号召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武汉等地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5月 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日子里，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屈不挠地同反动分子进行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因此，国民党右派对之极为忌恨，始则施展阴谋诡计，制造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继则进行武力威胁，反动军官何键甚至派士兵搜查其住宅。是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着人与发函慰问，指出：“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反动派所深忌，其始则用种种反间计欲使孙夫人离开武汉，孙夫人烛知其隐，屹不为动，反动派计无所逞，乃作种种流言蜚语，欲以中伤孙夫人。”同时指出：“反革命者此种流言，不特无损于同志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日。

② 同①，1927年3月23日。

③ 《林伯渠日记》，第10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版。

④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之令名，适足以彰同志之盛德。”并表示对反革命者的活动要“严密查拿，尽法惩治”^①。

6月8日 由于当时集中在武汉一地之北伐军逾万伤兵缺医少药，生活困难，备受伤、病的折磨，所以开展救护伤兵为主的劳军运动，成为巩固和发展北伐战争胜利成果的重要保证，便和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伤兵救护会，从事救护伤兵以支援北伐战争。是日上午10时，出席伤兵救护会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联席会议。会上，作出为救护伤兵筹募经费等决定。^②

6月18日 和何香凝、吴玉章、瞿秋白、高语罕、彭泽民、孙科、汪精卫、谭延闿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三单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联合举行的欢迎北伐凯旋将领的宴会。^③

6月25日 致电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请求募捐款项救济武汉伤兵。后，该会决定捐款三万卢布，并拟发动各工联团体捐款。^④

是月 为了及时培养救护伤兵的工作人员，创办看护训练班，并决定将毕业生分派伤兵医院工作。^⑤

7月12日 接蒋介石函，要求“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妄想借其威望以助反革命的声势。当即予以拒绝。^⑥

7月14日 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其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

① 《中央执委会慰孙夫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慰问孙夫人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0日。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③ 同②，1927年6月19日。

④ 《晨报》，1927年6月27日。

⑤ 同②，1927年7月8日。

⑥ 《蒋介石致宋庆龄函》，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断然拒绝参加他们秘密召开的“分共”会议，并委托陈友仁代表发言，坚决反对“分共”。

△ 同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中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叛徒同流合污，指出：“本党基于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在《声明》中，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强调必须依靠工农阶级的极端重要：“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并明确指出：“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还坚定地认为，是否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种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声明》中对革命的前途仍充满着信心，指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路。”“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下的千百万中国人

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①。

7月中旬 离开汉口赴上海。^②

7月30日 在上海应合众社记者的访问，进行了谈话，指出：“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并再次宣布：“此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③。

8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全歼守敌朱培德部一万余人，占领南昌城，成立革命委员会。是日，和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恽代英、郭沫若、彭湃、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等二十五人被推选为委员，并和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主席团。^④

△ 和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屈武等共二十二入，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并提出了七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要继续反帝和解决土地问题。号召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国民党新军阀和国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等的一切势力。^⑤

① 《宋庆龄选集》，第18—22页。

② 《晨报》，1927年7月21日。

③ 同②，1927年8月3日。

④ 《江西日报》，1927年8月3日。

⑤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 接汪精卫来函，函中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污蔑，造谣挑拨，并妄图借其威望以助反革命的声势。^①

8月22日 为了抗议蒋、汪之流的反革命行径，寻求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决定访问莫斯科，是日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声明》中阐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确和作用，高度赞扬三大政策的伟大业绩，表达始终忠于孙中山的坚强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打到长江这条历史性的防线，更击溃河南奉系主力，推进到黄河岸边。”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强调：只有坚持三大政策，“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声明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②。

9月3日 发表《向苏联妇女致敬》一文。说：“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的身份，谨向苏联的女工人致敬。”“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国家里最受压迫的阶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苏联妇女的解放是件令人惊羡的事。我们也正在为我们自己争取同样的解放而努力”^③。

△ 发表《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年青一代〉》一文。说：“在我们从海参威出发的漫长旅程中，每到一站所遇到的来欢迎我们的苏联青年，在我看来都象征着确保苏联胜利

① 《汪精卫致宋庆龄函》，影印原件，藏宋庆龄故居。

② 《宋庆龄选集》，第25—28页。

③ 同②，第29页。

的远景。”指出青年对争取革命胜利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极端重要：“就是这些青年人，他们保卫着革命的胜利果实，警戒着反动的陷阱，监视着反革命的活动。苏联革命青年的精神是一种比军队或战舰更为强大的力量。我们中国也正需要象你们这样的青年，来构成一条坚强的阵线，保卫已得到的与尚待争取的胜利”^①。

9月6日 与陈友仁等抵达莫斯科，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②

△ 发表《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再次阐明访问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代表孙中山访问莫斯科，“也是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来向苏联人民表示谢意”；二是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三是来表示我们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虽然中国的革命暂时丧失了它已经取得的地区，但它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充满信心”。现在背叛孙中山的人所造成的混乱，“这仅仅是表面的混乱。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③。

△ 发表《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说：“我代表中国国民党左派向苏联工人致敬。中国国民党左派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它保证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国外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④。

△ 发表《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说：“我代表国

① 《宋庆龄选集》，第30页。

② 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9日和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9日的报导，宋庆龄于9月9日抵莫斯科，但据《宋庆龄选集》所载《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一文的时间是9月6日，另据《晨报》1927年9月19日所载合众社发至莫斯科的电讯说，6日已抵莫斯科，故其抵莫斯科时间应为6日。

③ 同①，第31—32页。

④ 同①，第33页。

民党左派，向你们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致敬，因为你们首先燃起了世界革命的火炬。”“在向你们致敬的时候，我愿意表示：我深信我们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①。

9月17日 发表《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文中正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指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是很大，但地理是会骗人的”。“今天，所谓‘国民政府’的话，对于国内人民既不生效，对世界各国也同样没有作用。这是目前情况的一个基本事实。反动派在中国是没有力量的。”并提出革命必将胜利的根据是：“人民的坚强组织。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他们不仅明白反动派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弱点所在，并且知道他们自己很强，可以冲破表面的混乱现象而战胜敌人。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来面对未来。”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赞扬说：“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同时，以深邃的眼光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武装起义会“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②。

9月25日 发表《妇女与革命》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使两万万以上的妇女从半封建的、中世纪的社会意识和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广大的、占中国人口一半的群众一天得不到解放，不但国家的机构，就是一般的人民生活 和思想，也就一天不会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③

是月 发表《青年与革命》一文。充分肯定青年的巨大作用，对青年寄予莫大的期望。指出：“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

① 《宋庆龄选集》，第34页。

② 同①，第35—37页。

③ 同①，第35—37页。

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并说明孙中山非常重视青年，“经常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青年的热情和支持。甚至在他最忙碌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拒绝那些成群跑来找他谈话的男女青年们”。强调必须要把青年动员和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工作”。“现在革命组织所以能够仍然保持坚强与生气勃勃，就是因为有了革命的青年一代。主要是青年领导者们，他们始终拒绝妥协，始终对抗反动派，虽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仍是会胜利的”^①。

11月1日 与邓演达、陈友仁三人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汪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继续与新旧军阀作坚决的斗争，实现新三民主义。宣言称该临时行动委员会之责任，在“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②。

12月17日 当接到蒋介石反苏行动的电告后，即复电严斥，指出：“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③

① 《宋庆龄选集》，第39—40页。

② 《革命行动》，第一期；《邓演达文集》，第332—3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上海《新闻报》，1927年12月19日；《百科知识》，1981年第七期。

12月23日 再电蒋介石，对蒋介石于18日再次来电，诬蔑其在莫斯科的停留和复电是受别人胁迫的结果，予以严斥。指出：

“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揭露蒋介石及其一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并表明自己誓死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坚决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①。

是月 离开莫斯科，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旋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②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 戊辰） 三十五岁

3月9日 在莫斯科为纪念美国女新闻记者彭瑞娜^③而设立的教育基金，进行募捐。此项基金，是为纪念彭瑞娜对国民政府的功绩所设立，基金将捐助一大学内作为学生补助金之用。^④

3月12日 在下榻的莫斯科METROPOT旅馆，接见前来访问的薇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阿基莫娃（Ve Va Vladimirovana

① 《百科知识》，1981年第七期。

② 《晨报》，1927年12月5日。

③ 彭瑞娜曾于1926—1927年在广州、武汉从事新闻工作，积极拥护和宣传国民政府的革命主张。大革命失败后，随宋庆龄从上海到莫斯科，不幸因病逝世。

④ 同②，1928年3月10日。

Vishuyakvova-Akimova) 女士。^①

5月2日 在莫斯科首都旅馆接受美国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采访。驳斥所谓其流落莫斯科，住于贫民窟中，处境艰难的谣言，指出：“余寓此极安闲愉快。每日生活极富兴趣。各方称余对时局悲观，竟至失望者，实属奸人捏造蜚言。不久余将去西欧各地游历，至于游欧后能赴美与否，尚未决定，但余极愿赴美一行，因前留美六年（原文如此——引者注），友人极多云”^②。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己巳） 三十六岁

3月26日 被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③当时正在国外，並未出席该次大会。^④

4月底 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⑤

5月 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庄严宣告：“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⑥。

5月6日 离莫斯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归国。

5月16日 抵哈尔滨。^⑦

5月17日 下午抵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凤至到车站迎接，

① 《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By Veva Vladimirovana Vishuyakvova-Akimova，英文版第284页。

② 《晨报》，1928年5月4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7日；《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

④ 同③，1929年4月2日。

⑤ 同③，1929年5月15日。

⑥ 《密勒氏评论报》，1929年6月1日；《宋庆龄选集》第42页。

⑦ 同③，1929年5月18、19日。

并在张学良的私邸会见张学良。当晚乘车离开沈阳赴北京^①。

5月18日 下午二时三十分抵天津。在车站受到孙科及夫人以及傅作义等的热烈欢迎。下午六时零八分抵北京。在车站受到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即偕同孙科、宋子良、宋子安等乘汽车赴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敬献花圈。^②

5月22日 上午9时，和孙科、宋子良、宋子安等参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遗体改殓铜棺仪式，并在灵堂举行家奠，“哭泣甚哀”^③。

5月26日 凌晨，和孙科、宋子良、宋子安以及林森、吴铁城、郑洪年（林、吴、郑三人为国民政府特派的迎衬专员）、商震等参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移灵仪式，随即乘马车护送孙中山灵柩到北京火车站。沿途三十万群众默哀行礼致敬。下午二点半灵柩到达北京火车站，五时随灵车前往浦口。^④

5月28日 上午十时五十分，和孙科、宋子良、宋子安等随灵车抵达浦口，并和前来迎灵的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党政领导人等在孙中山灵前祭奠，行迎衬礼。然后，即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谭延闿、蒋介石以及孙科等护送孙中山的灵柩到威胜号军舰，於南京中山码头登岸，再护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沿途五十万群众默哀行礼致敬。下午三时，灵柩停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供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公祭。^⑤

△ 下午，由宋霭龄、宋美龄等陪同，前往瞻仰紫金山孙中山陵墓。^⑥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9、24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1929年5月23日。

④ 同①，1929年5月27日。

⑤ 同①，1929年5月29日。

⑥ 同⑤。

5月31日 下午二点三十分，亲自主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孙中山灵前举行的家祭。与祭者有：孙科夫妇及其子女，孙中山女儿孙琬、女婿戴恩赛，以及宋子文夫妇、宋霭龄、宋美龄、孔祥熙、蒋介石等。^①

△ 下午四时四十分，参加孙中山灵柩封棺仪式。参加仪式的除家属外，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领导人百余人。率领孙科、蒋介石、胡汉民、孔祥熙等亲自进行封棺。^②

6月1日 参加在南京隆重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凌晨四时，出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的移灵仪式。然后，和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孔祥熙、蒋介石以及何香凝等护送孙中山灵柩至紫金山陵墓。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国专使参加执绋。沿途数十万群众默哀行礼致敬。上午十时，参加在紫金山陵墓祭堂举行的“奉安典礼”，并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亲自将墓门“敬谨严扃”^③。

△ 晚，乘火车离南京返上海。同行者有母亲倪桂珍和宋子良、宋子安等。^④

6月2日 晨五时五十五分，抵上海，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妇女协会的代表等的热烈欢迎。在车站，派秘书代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回国是为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因“长途劳屯，故来沪休息，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⑤。

6月9日 宋美龄专程从南京到上海邀请其赴南京参加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断然予以拒绝。^⑥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6月1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1929年6月3日；胡云非编：《国文事略》第249—251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6月版。

④ 同①，1929年6月3日。

⑤ 同④。

⑥ 同①，1929年6月10日。

6月中旬 和母亲倪桂珍在杭州西湖游览，并因沪上烦嚣，“卜居西子湖头”，以求宁静（前曾派秘书觅得西湖蒋庄住处）。①

8月10日 对蒋介石于月初派戴季陶为代表到上海对其游说，软硬兼施，企图迫其就范，引诱去南京做官，以欺骗人民的行为，于是日发表亲自用英文记录的与戴季陶的谈话记要——《痛斥戴季陶》。在谈话中，义正词严地揭露他们的卑鄙阴谋，责问戴季陶：“你们可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蓄意正是一种侮辱。”痛斥蒋介石政权说：“妄肆屠杀几十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横征暴敛，苛取于民”；因而“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人民的”，“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严词拒绝要其赴南京做官的企图说：“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并且大义凛然地宣告：要想压制其正义呼声是办不到的，“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表现了富贵不移、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②

9月21日 为料理委托法国某公司制造孙中山铜像等事，离上海乘法轮士劳斯号赴法国。临行前，对中外新闻记者对其所造的种种谣言表示愤慨。③

9月24日 赴法途中抵香港，接见孙中山的侍卫官黄惠龙。其他要求接见者，均予拒绝。④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6月13日。

② 这篇谈话，原载燕京大学的《China Tomorrow》（《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1929年8月10日出版）上，后来天津《大公报》1929年12月12日又发表了它的译文。《宋庆龄选集》上第43—49页，即依据《大公报》的译文排印。

③ 同①，1929年9月28日。

④ 同①，1929年10月1日。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三十七岁

是年 在德、法等国旅行。经常到图书馆潜心读书，并深入研究孙中山遗著，常常整日“沈缅于书籍之中”^①。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三十八岁

7月23日 其母倪桂珍于14时40分病逝于青岛别墅。^②

是月 从德国经苏联回国。

8月10日 乘火车到达哈尔滨。^③

8月11日 乘火车自哈尔滨到达大连，转乘日轮大连丸赴上海。^④

8月13日 下午6时20分到达上海。在码头受到宋子良、孔祥熙、宋霭龄的子女，以及上海市市长张群、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工商部次长郑洪年等的欢迎。随即乘车到母亲灵前行礼祭奠。^⑤

8月15日 和宋霭龄、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见前来吊唁母丧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⑥

8月18日 和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霭龄、宋美龄、孔祥熙、蒋介石以及于凤至等参加母亲的葬礼。9时30分灵柩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和参加葬礼者在墓前行礼毕，即乘车返住宅。^⑦

① 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4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7月26日。

③ 同②，1931年8月11日。

④ 同③。

⑤ 同②，1931年8月14日。

⑥ 同②，1931年8月16日。

⑦ 同②，1931年8月19日。

△ 接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梭因等三十一人来电，为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于6月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巡捕逮捕，后引渡给国民党军事当局事^①，要求援助他们夫妇获得自由。电报说：“迫切的恳求女士关于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之逮捕事件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②。

8月19日 接德国劳动妇女领袖克拉拉·蔡特金来电，要求救援牛兰夫妇。电报说：“因为你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努力的援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局的工作人员”^③。

△ 接德国罗弗莱赫尔教授和卓越的艺术家长余人来电，要求援助牛兰夫妇获得自由。电报说：“迫切的恳求女士对于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之恶劣情况有所减除，及求得他的自由”^④。

8月20日 接德国珂勒惠支教授等十余名妇女界人士来电，要求援助牛兰夫妇获释。电报说：“最急切的恳祈你去援救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的释放。”此外，还接到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的来电，请援助牛兰夫妇获得自由。^⑤

8月24日 会见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并重申个人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时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 my 声明”^⑥。

9月5日 由上海到南京，祭扫孙中山陵墓。^⑦

① 《中国论坛》，第三卷第四期（1934年1月13日出版）。

②③ 《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

④ 同②。

⑤ 《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

⑥ 《字林西报》，1931年8月24日；《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宋庆龄选集》，第50页。

⑦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10日。

9月9日 从南京返抵上海。①

10月18日 和宋子良、杨杏佛等游览昆山。②

11月 赴南京，营救被蒋介石逮捕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曾亲自找蒋介石、何应钦交涉，未得结果。11月29日蒋介石将邓演达秘密杀害。对此，非常愤慨，表示一定要公开揭露蒋介石这些反革命罪行。③

12月19日 对国民党政府屠杀要求抗日学生的罪行非常气愤，是日，发表《宋庆龄之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宣言中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个人独裁、争权夺利、剥削群众、残害革命者的种种反动行径：“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却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并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之流所叫喊的“和平”，“不过是和平的分脏”；叫喊的“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10日。

② 同①，1931年10月19日。

③ 参见范良（孙中山前卫士）：《我所知道的宋庆龄同志营救邓演达的经过》，载《新华日报》，1981年6月3日。

亡于帝国主义。”表示：“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同时指出：“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①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三十九岁

1月30日 和何香凝等到真茹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并着手为处于困境的十九路军募集款项和物资。旋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于极短时间中筹设出一批伤兵医院。^②

是月 和何香凝、杨杏佛等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一所有三百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并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受伤战士、鼓舞士气。由于亲自号召和群众的爱国热忱，一时名医云集，慰劳品不绝而来。^③

2月 致电高尔基，要求声援中国人民的淞沪抗日战争。高尔基旋于3月2日在《消息报》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有力地证实，这并不是一句空话”^④。

2月底至3月初 在国民伤兵医院接受记者访问时，高度赞

① 《申报》，1931年12月20日。《宋庆龄选集》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见该书第51—53页。

② 参见蒋光鼐、蔡廷锴、载戩：《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集第10页。

③ 杨小佛：《宋庆龄同志——我最尊敬的长辈》，载《解放日报》，1981年5月29日。

④ 转引自戈宝权：《高尔基与孙中山和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扬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说“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指出：“人类惟有以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还指出：“日军谓四十八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某军事家谓日本三日可封锁中国，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①。

5月27日 接“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来电，邀请代表中国出席7月2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并通知其当选为该大会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当即复电同意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至于是否届时能出席大会，当视牛兰一案之情况而定。^②

7月11日 从上海到达南京。除赴紫金山中山陵谒陵外，偕牛兰辩护律师陈瑛意等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告他们进食。^③

△ 和杨杏佛、斯诺以及其他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任委员会主席。发表宣言说：“我侪与欧美各国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日为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之生命，国民政府视之如儿戏；牛

① 《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宋庆龄选集》，第54—55页。选集中未注明此文的月日时间，据文中所述：“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的内容，可断其时间应为2月底至3月初。

② 《申报》，1932年5月28日。

③ 同②，1932年7月12日。

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此污点。我侪欣然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①。

7月12日 为营救牛兰夫妇，亲自找汪精卫及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等进行交涉。^②

△ 由于和蔡元培二人具保，国民党法院当局同意允许牛兰夫妇移上海就医。^③（又据7月14日《申报》报导，关于牛兰夫妇具保移沪就医一事，由于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等以所谓违背法治精神为由，并以辞职相威胁，且蔡元培在具保问题上态度亦有所变化，因此使牛兰夫妇未能移沪就医。）

△ 晚，乘夜车返上海。^④

7月17日 由上海到达南京，和杨杏佛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望牛兰夫妇。经与国民党司法当局交涉，结果由其一具保让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亦同意停止绝食。^⑤

10月31日 晨八时从上海到达南京，赴孙中山陵墓稍事休息后，即乘飞机赴汉口。此行目的，为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向国民党中央提议组织一种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赴汉是为向当时在汉的蒋介石征询意见。^⑥

11月2日 向外报发出专函，谓：“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⑦，更未追论恐怖时代被牺牲之斗士。

① 《孙夫人领导下之营救牛兰会发表英文宣言》，《申报》1932年7月12日。

② 《申报》，1932年7月13日。

③ 同②，1932年7月13日。

④ 同③。

⑤ 同②，1932年7月18日；《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二十九期（1932年7月23日出版）。

⑥ 同②，1932年11月1日。

⑦ 与陈独秀案同时被捕的十一人是：陈善甫、饶志陆、纪维芳、李荣生、苏正海、吴俊臣、吴陈氏、刘志福、刘防芳、陈王氏（即帅孟奇）及朱彩弟（即朱镜如）。

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①。

12月上中旬 经过本年夏秋间的筹备后，和蔡元培、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所发表的宣言云：“中国民众，以革命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痛心之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虽公开审判，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我辈深知每对此种状态欲为有效与充分之改革，惟有努力改造产生此种状况之现境；惟同时亦知各先进国家皆有保障民权之世界组织，由爱因斯坦、觉雷塞、杜威、罗素及罗兰之流为之领导，此种组织之主要宗旨，在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根据同一理由，我辈提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组织。”并提出该同盟之目的是：“（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该同盟总会设在上海，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设分会于国内各重要城市。并规定：“凡赞成本同盟主张，并愿从事实现此主张之实际工作者，不拘国籍、性别及政治信仰，由会员三人之介绍，经执行委员会多数之通过，得为本盟之会员。”^②担任主席，副主席为蔡元培，总干事为杨铨。

① 《宋庆龄之新志愿》，北平《民国日报》，1932年11月3日。

② 《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申报》，1932年12月8日。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及发表宣言时间，无确切日期的记载，但据《申报》发表日期和该同盟在1932年12月的活动情况，可断为12月上中旬间。

12月17日 和蔡元培、杨杏佛等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和北平天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要求释放被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的许德珩等人。指出“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①。

12月29日 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出席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南京路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大厦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对新闻界发表了谈话。号召：“新闻界同人和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应该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指出：“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换句话说，民权保障同盟是倡导和保卫出版自由的。因此，新闻界为它自身的利益，应该热忱地赞助这一组织。”还强调指出：“本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你们新闻界当然知道有无数同胞被非法逮捕与监禁，知道那中世纪的残余——秘密军事法庭的存在。你们对这些暴行将熟视无睹、不加抗议呢，还是将全心全意与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为这些无数无人保护的不幸者主持正义呢？”胡愈之、邹韬奋、史量才、陈彬龢、钱华、顾执中、陆诒以及英文《中国论坛报》编辑伊罗生、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美籍记者史沫特莱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出席了记者招待会。^②

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许德珩等代电》，《申报》，1932年12月18日。

②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宋庆龄选集》，第67页；并参见陆诒：《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载《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32年11月版。

1933 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四十岁

1月6日 和蔡元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要求释放被非法逮捕的北平学校师生。电文说：北平学校师生许德珩等数十人“被非法拘禁，经各方呼吁营救，仅许德珩等少数人获得保释，其余诸人，拘押至今，既未依法审判，亦不释放，于党义法治，实有未合”。“又据确实消息，入狱者尚有十四岁之小学生，与十六、七岁之中学生多人，中央屡言保障人民一切自由，扶植民主政治，乃此辈中小学年龄之儿童，竟不获矜全，横遭非法，诚可痛心，务请贵会力持正义，尊重民权，即日令平公安局释放被拘马哲民师生。”^①

1月17日 下午四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会。和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龢、胡愈之、鲁迅等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分会章程，并修正发表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民众，至今仍无最低限度民权之痕迹。反之，杂志与报纸时被封禁，集会与结社动遭禁止。最近五年之中，出版物之被禁止或停止出版权力者，以数百计。……禁令之严，文网之密，致使被封禁杂志报章之编辑人，即幸免入狱，亦不敢出而抗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愿唤起中国人民，起而努力，实现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一切真正民权之利益，反对一切检查与禁止。愿唤起民众要求最低限度民权之普遍享受，停止对努力中国进步与解放之著作家、美术家与杂志报章编辑人之压迫”^②。

1月20至25日间 为慰问榆战伤兵，及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

① 《民权保障同盟请释平校师生》，《申报》，1933年1月8日。

② 《申报》，1933年1月18日。

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事，委派杨铨为代表专程赴北平。^①（杨铨事毕后，于2月2日离平返沪。）

1月30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于下午四时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当经议决，要求政府将21日擅杀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之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查办，并请监察院彻底进行弹劾等案。^②

2月3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抗议枪杀刘煜生，再次发表宣言。指出：“刘煜生之死非死于描写社会生活之文字，而实死于揭载鸦片公卖之黑幕，及赵育霖之不检行为。是刘非死于死时状况之法理，非死于戒严时期之情势，乃死于为吾民呼吁抗拒烟毒，而引起大之扶嫌报怨也甚明。愿同人对此案是非，有明确认识”^③。

2月17日 作环游世界旅行的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乘英轮皇后号于晨六时抵吴淞口。晨五时即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并与肖伯纳等在轮船餐厅共进早餐。中午在寓所宴请肖伯纳。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出席作陪。^④下午四时半，又偕杨杏佛送肖伯纳返回停泊于吴淞口之皇后号轮船，肖伯纳于当晚十一时乘原轮离沪赴秦皇岛。

3月8日 在上海三十余进步团体召开的“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全国抗日群众紧密团结，一致奋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并反对一切阻碍一个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的种种恶企图。大声疾呼：“我们愿意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这个奋斗与中国劳苦

① 参见《晨报》，1933年1月27日；北平《民国日报》，1933年2月23日。

② 《晨报》，1933年1月31日；《申报》1933年1月31日。

③ 《晨报》，1933年2月4日。

④ 《申报》，1933年2月18日。

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也是不能分离的。”强调指出：“只有这种奋斗可以产生出一种不可征服的民族与社会势力，来打破帝国主义与其在中国阴谋叛逆的联盟的势力。”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将赢得“不是被帝国主义征服与瓜分的中国，而是工人与农民的自由的团结的革命的中国”。提出了四项要求：“（一）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中国；（二）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三）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并号召全国每一城市和乡村，必须为实现四项要求而斗争。^①

3月18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于下午四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会员大会。会上根据会章规定，中央执委不得同时兼任分会委员，而她和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伊罗生等七人已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因此议决他们七人皆辞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职务，另选举沈钧儒、郁达夫等七人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选举揭晓后，还议决通过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名义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及推代表赴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待遇犯人情形等议案。大会散会后，召开了上海分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②

3月28日 发表声明驳斥某些报纸登载有关其行踪和在南京购置产业等种种谣言，严正指出：“此种记载，或为反动者所散布，实则庆龄近来始终在沪，每日处理中国民权同盟之会务。

① 《中国论坛》第二卷第三期（1933年3月27日出版）。原标题是《宋庆龄女士演说词》。此演说词后于5月24日在纽约《民族》杂志，改题为《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再次发表。《宋庆龄选集》所标之题目及时间均系后发表者。

② 《申报》，1933年3月19日。

庆龄愿声明，凡新闻记者，欲悉本人在沪之行动与工作者，可致函本人住宅，或民权保障同盟见询，传播无稽之消息，似非必要也”^①。

3月29日 和蔡元培等在中央研究院召开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两案：“（一）检查租界及华界监狱待遇政治犯之情形，检查员定吴迈等五人；（二）刘煜生案，质问监察院不办该案理由，并要求监察院全体委员辞职，以谢国人”^②。

△ 由于共产党员廖承志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五福弄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前往何香凝寓所，向廖承志的母亲、国民党革命前辈何香凝表示亲切慰问。^③

3月30日 为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以及陈藻英等五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主持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讨论营救办法，并和蔡元培出面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等为被非法逮捕者辩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特为此发表宣言，唤起国人注意。指出对罗登贤等人的逮捕全属非法，应立刻释放，强调：“在此国难期间，欲言御侮，国人必有反帝国主义之自由，不应对于努力此项工作者反愈加压迫，致伤元气。吾人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廖及一切政治犯之释放，尤为第一要图”^④。

3月 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首先阐明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以及为保障和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性。指出：“本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它的目的不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但另

① 《申报》，1933年3月29日。

② 上海《大晚报》，1933年3月30日。

③ 同①，1933年3月30日。

④ 同①，1933年3月31日。

一方面也必须了解，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政治性的。”指出保障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就是严重的政治斗争，“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强调：“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防止投降分裂的斗争的一部分。”接着她义正词严地批驳了种种对同盟性质的歪曲和污蔑，澄清了某些错误、模糊的认识。着重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者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国民党更糟糕。它的法律据说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实际上却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利益服务，有关‘人民’的纸上法律只是一种宣传，内容完全是空洞无物的，每天都发生极端残酷地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事件，这就说明了真实的情况。”同时指出：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是截然不同的”。她严正宣告：“从土牢里拯救上万的政治犯是本同盟的一桩重大的任务”。同盟必须和“虐害政治犯的制度”这个“可怕的罪恶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摧毁审问政治犯的秘密法庭”。最后，充满信心地说：“那些自以为可以无限期延长他们对人民的血腥统治的人是大错特错了。人民大众一定要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个斗争会加强起来，会席卷全国，会使中国强大和统一。”“中国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力量，但明天一定会解放自己的”^①。

① 《宋庆龄选集》第56—66页。据文中所述“汉口利用热河事件”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二事，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是1933年3月间。《宋庆龄选集》标为1932年12月，误。

4月1日 在上海发表《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严正指出：罗登贤等革命者的被捕，“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说明蒋介石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已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又说明“上海公共租界，这帝国主义称之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敌人、汉奸、中国人民的叛徒、鸦片贩与流氓们的天堂。租界本来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是反对中国人民和危害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根据地之一”。赞扬被捕的罗登贤等“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并指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①。

4月2日 和蔡元培为营救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藻英等四人联名致电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指出：罗登贤等四人“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②。

4月3日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及上海分会联席会议。讨论营救罗登贤等四人（廖承志已于一日交保释放）的办法。会上经过票选，和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四人当选

① 《宋庆龄选集》，第68—71页。

② 《申报》，1933年4月4日。

为代表赴南京进行营救。并决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和蔡元培、杨杏佛、吴凯声、王造时、沈钧儒、陈彬龢等七人被选为委员。^①

4月4日 和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及吴凯声赴南京，营救被非法逮捕的罗登贤等四人，要求国民党当局予以释放。同时，还将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严禁私刑，并给予现在狱中各政治犯以阅报读书自由及其他方面的人道待遇。^②

4月5日 凌晨，和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等到达南京。赴江苏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询问在监狱之生活情形。^③

△ 在下榻的扬子饭店，接见来访的汪精卫、罗文干等，并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汪、罗等书面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并要求即刻释放日前解京的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等四人。^④

△ 晚，和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伊罗生等赴国民党南京警备卫戍司令部探访被监禁的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等。^⑤

4月23日 致函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辞去该会主席职务。说：“因庆龄所任其他工作，已感时间精力穷于应付，万难再尸位误事”，“此后仍当以会员一分子之地位，追随先生之后，努力御侮工作。庆龄对一切事业，向来量力负责，不作虚伪谦让”^⑥。

是月 去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坚持要杀害红军将领陈赓。说：

① 《申报》，1933年4月4日。

② 同①，1933年4月5日。

③ 同①，1933年4月6日。

④ 同①，1933年4月14日。

⑤ 同④。

⑥ 同①，1933年4月24日。

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一役一直跟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的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骂得俯首无言。^①

5月13日 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在列举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说：“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事实，这些事实一再登载在欧美报纸上。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②。

△ 上午，和蔡元培、杨铨、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由该领事馆副领事贝连接见，表示将代转达该国驻华公使。《抗议书》指出：“本同盟由各国报章所载，得悉自法西斯蒂政党得权以来，被捕之工人，已达三四万，而知识分子横遭压迫者，亦在数千之数。对囚犯施以惨刑或加虐杀，事后诬为自尽或谓逃亡时中弹殒命，林中河上，时常发现尸身。工人团体解散，产业没收，文人学者，以犹太种族关系或政治左倾，迭受种种侮辱，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被迫出国。有名作家，如任卢微、佛希特万格、托玛斯·曼等，或被迫离国，或横受侮辱。大艺术家如利伯曼，音乐家如华尔得，家遭捣毁，书稿被焚，中世纪窘迫科学家之黑暗行为，及二千年前焚

① 廖梦醒：《我所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3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72—74页。

书之祸，不图重见于今日。出版言论自由，全被剥夺。”“以上事实，皆迭见欧美政党不同之各报，决非一方之辞，本同盟以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于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①。

6月18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被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暗杀。

6月18至20日 发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主指的一伙的卑鄙阴谋。说：“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强调指出：“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②。

6月20日 偕同伊罗生及女秘书一人，前往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成殓仪式，瞻仰遗容时，“深感悲切，盈盈欲泪”。对记者发表谈话云：“对杨被刺事，业已有一文告发表。民权保障同盟之会务，当然继续进行”^③。

6月下旬 接见报社记者时说：“我虽然受到某些方面的威胁，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停止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的。”又说：“杨杏佛之死决不会影响运动的进展，相反地此事将激励

① 《申报》，1933年5月14日。

② 现在尚未查明当时发表此《声明》的报刊及准确时间，据宋庆龄20日对记者谈话说业已发表了文告推断，其发表时间应在18至20日间。《声明》全文见《宋庆龄选集》，第79页。

③ 同①，1933年6月21日。

同盟加倍努力工作”^①。

7月2日 杨杏佛灵柩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吊唁时，送了挽联及花圈志哀。灵柩安葬于上海永安公墓。^②

8月6日 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委会主席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声明》。指出：帝国主义“把人类投向战争、死亡和毁灭的活动，正是当前时局的特点”。而帝国主义开辟的战场，“总有一天必将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墓地”。呼吁“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并号召“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③。

是月 在领导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远东会议筹委会的工作中，同妄图阻挠会议召开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前来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乘船抵达上海，遭反动当局无理阻拦，不准代表登陆时，以不畏艰险的革命魄力，蔑视反动派的禁令，亲自上船去欢迎出席会议的代表，挫败了反动派的破坏活动。^④

9月30日 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出席并主持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下举行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指出当

① 原载《密勒氏评论》。1933年7月1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② 《申报》，1933年7月3日。

③ 《宋庆龄选集》，第80—83页。

④ 肖辅玠、丁润英（上海党史调查组）：《伟大的战士光辉的业绩——十年内的时期宋庆龄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81年6月5日，参见《宋庆龄选集》第86页。

前时代的特点：“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又说：劳苦大众的迫切任务是在革命中找出路，“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还明确地表示对两种战争的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己放弃它们的权力。”最后号召：“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① 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被推选为主席。

11月21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签定抗日停战协定。晚，向各报发表亲自签名的《宋庆龄之声明》，指出：“一切报纸所载，余与最近福建变动有关，及更荒谬的传余已赴闽垣，诸种无稽消息，均系对余愚笨而又恶意的中伤。余郑重声明，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余之立场，始终不变。”^②

12月29日 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伟人民意测验，被

① 《宋庆龄选集》，第84—91页。

② 《申报》，1933年11月22日。

推选为现代女伟人的第一名。^①

12月30日 致电汪精卫、居正、罗文干等，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电报说：“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塞。前此政府人员所期许之正式手续等等诺言，今日已经证明完全为谎骗之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妇生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恢复自由，否则亦须即时释放牛兰夫人。因渠之孱弱身体，关系其目前之生或死，已非日而为时之问题也。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②。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四十一岁

1月10日 在江苏第一监狱绝食十四日的牛兰夫人致书说明他们绝食的理由。^③

1月12日 为牛兰绝食事再次致电汪精卫、居正。指出：“牛兰绝食二十四日已濒死境，其妻亦去死不远。政府苟愿有所举动，或接受渠等要求或即传令释放，二十四日以来应早有表示。此际补救仍未为晚。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德国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君等如欲成全渠二人之性命，请迅即为之，因完全责任均在君等之掌握中也”^④。

4月20日 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

① 《申报》，1934年3月27日。

② 《中国论坛》，第三卷第四期（1934年1月13日出版；《申报》，1933年12月31日）。

③ 《牛兰夫人致宋庆龄函》，载《中国论坛》第三卷第四期，1934年1月13日出版。

④ 《中国论坛》，第三卷，第四期。

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和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余人，在该“纲领”上签名，予以联名发表。“纲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想用武装力量来实行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条件，它并且用流血政策来开始实现田中内阁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即完全占领全中国及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因此，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族、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枪毙，砍杀，拷打，强奸，污辱的危险。”强调：“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唯一正当的方法了。”

11月 出席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马海德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在史沫特莱寓所举行的聚会。^①

是年 在上海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西普、罗森堡、威努斯等，在其关怀和帮助下，组织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把马海德在上海开设的诊所，安排给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并让马海德通过各种关系购买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材，送往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②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二岁

夏 请马海德以外国人的身份护送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③

①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

8月 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影响甚大。

11月23日 被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① 本人并未出席本次大会。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四十三岁

春 函约马海德到寓所晤谈。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②

3月下旬 和鲁迅、茅盾、沈钧儒等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从陕北派往上海的冯雪峰会见，听他传达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建立了联系。^③

5月31日—6月1日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参加。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上通过的《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中指出：“在这敌寇日深而内部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为了这种要求，全国各地各界的救国团体代表们，在上海开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宣言》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一，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

① 《申报》，1935年11月24日。

②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③ 刘敬章、柳淑卿、秦建君、郝喜兰：《上海救国会大事记》，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四期。

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大会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①

6月5日 致函救国阵线领袖，指出：“我们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担保你们将作坚持到底的努力。我们的路是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干去，这种胜利是有保证的。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②。

△ 写出著名的促鲁迅就医的信——《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指出：“我恳求你立即进医院去医治！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③。

7月 接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通知，邀请其以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9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扩大会议，共同讨论援助西班牙共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和声援各国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问题。^④

8月中旬 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使其实际上没有行动自由，难以赴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委派钱俊瑞为代表前往参加这次会议。是旬，通过史沫特莱约钱俊

① 《宋庆龄致救国阵线领袖函》，载《救亡情报》，第六期（1936年6月14日出版）。

② 同①。

③ 影印原函。

④ 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瑞到寓所晤谈，要钱代表在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和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同时，还对在座参加晤谈的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说：“你这次来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①。

9月10日 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巴黎开幕。主持会议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及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指出：“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②。

9月18日 毛泽东来函，表示对其革命救国言行无限敬意。函中云：“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提出在此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严重时刻，希望其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之资格，展开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建立。并介绍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介绍与其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央枢人员与潘汉年一谈。^③

9月20日 和何香凝为上海发生的“九·一八”惨案（即指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市商会、

① 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② 同①。

③ 《致宋庆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地方协会、律师协会、记者公会、市总工会等二十余团体，准备去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当抵老西门时，遭到国民党军警袭击，伤百余人，被捕失踪三十余人的事件。）发出快邮代电，指出：“严办负责官吏，抚慰受伤人民，释放被捕诸人，以安人心”^①。

9月22日 毛泽东致函蔡元培，力促“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偿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信中特别囑告：宋庆龄、何香凝等“统此致讯”，表达中国共产党对她们的敬佩之情。^②

10月18日 和马相伯、何香凝等，为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发表启事，指出：其等“对于救国阵线，或身居领导，或直接负责，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并严予驳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妄加诬蔑救国团体的可卑行径。^③

10月19日 鲁迅于上午5时25分在上海大陆新邨寓所逝世，立即到鲁迅寓所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并和蔡元培等组成治丧委员会。^④

10月21日 赴上海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的大殓仪式。^⑤

10月22日 参加鲁迅的葬礼。在送葬的行列里，紧随灵车，与广大群众一道行进。国民党特务慑于其崇高威望，不敢对葬礼

① 刘敬章、柳淑卿、秦建军、郝喜兰：《上海救国会大事记》，《社会科学》，1983年第四期。

②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6—6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③ 《救亡情报》，第二十二期，1936年10月18日出版。

④ 《申报》，1936年10月20日。

⑤ 同④，1936年10月22日。

横加干涉，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原拟破坏葬礼的卑鄙企图，使这次悲壮的群众爱国示威性的葬礼得以顺利进行。下午五时在万国公墓礼堂前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又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指出：“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①。

11月18日 和茅盾、蔡元培联名写信给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鲁迅通过自己的孤军奋战，揭开了黑沉沉夜幕的一角……鲁迅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代表，而这种精神的火光暴露出了现今统治者的无能和卖国嘴脸。”“虽然鲁迅出生在中国，但他却是属于全世界的”^②。

11月26日 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对救国会七位领袖的被捕，提出抗议。指出：“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上。”“这种违法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种有背景的逮捕很明显的证据，就是日本报纸（《上海日报》、上海《每日新闻》^③）今日突又传称余今晨亦为法捕房所捕，罪名是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关，或许日本报纸已获得要逮捕我的事前的消息。”《声明》说：“对我个人的攻击罪名，这是不值一笑的。我也用不着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的惯于诽谤造谣卑劣宣传，早已有目共睹，有耳皆闻。”明确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逮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并警告说：“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吧！”

① 《申报》，1936年10月23日。《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96页。

② 转引自米歇尔卢瓦夫人（巴黎第八大学鲁迅研究家）：《罗曼·罗兰和中国人，罗曼·罗兰和鲁迅》，载法国《罗欧巴》杂志，1982年第633—634期合刊。

③ 《上海日报》和《每日新闻》都是日本政府的御用报纸。

他们虽然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是在这里哩！”^①

12月13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团结抗日的利益为重，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并不顾个人安危，准备亲自飞往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俟由于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而未成行。^②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应张、杨电请，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于16日到达西安，俟在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开始谈判。周恩来提出双方停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等六项主张。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蒋允诺返抵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宋子文、宋美龄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至于应该如何进行，明确提出：将要“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③。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四十四岁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2日结束。会上，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并散发其《西安半月记》，对张、杨八项主张不予置理；汪精卫发表继续“剿共”演说。但在中国

^① 《救亡情报》，第二十八期，1936年11月29日出版。

^② 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载《宋庆龄纪念册》，第113—11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③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呼吁下，并经过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积极努力，迫使全会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以与共产党合作，将武装剿共方针改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使国内和平局面初步打开。是日，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案说：“总理于民国十三年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民国十六年以来内争突起，阵营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椎心泣血。本党同志负革命成败、民族兴亡之大任，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诸先烈不死之英魂，更将何以告数万杀身成仁残手断足之革命将士？”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救中国于危亡：“吾等受总理托付之重，执行遗嘱责无旁贷，苟且偷生，常自惭恧，每忆及总理当弥留之际，因关怀革命泪盈两眶，不肯遽逝，凄惨情形，尤觉不堪卒想。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①。

2月18日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说明所提出的“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日本的挑衅已使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继续发展中。”“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

① 《宋庆龄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新中华报》1937年3月13日。

大的政治意义。”而某些政客所患的“恐日”病，是“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深刻地分析了日本不能战胜中国的有力根据：

“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沦为赤贫的黠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同时，愤怒地斥责所谓“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说：“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内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明确表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①。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②；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

① 《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演词》，《宋庆龄选集》，第99—102页。

② 《解放》周刊，创刊号（1937年4月24日出版）。

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6月25日 和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为沈案送呈文致苏州高等法院文。指出：“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责任”^①。

6月下旬 和何香凝等十六人，为援救沈钧儒等，争取救国自由，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爱国有罪的反动实质，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为此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中指出：“我们准备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质问蒋介石国民党说：“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只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严正宣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并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中国人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②

△ 和何香凝等发表《为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再次阐明救国入狱运动的重大意义，要求新闻界对这个运动予以“宣传和提倡”，“以使爱国无罪，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信条，中华民国的光明前途，就将从这一事件开始！”^③

7月5日 和救国入狱运动的发起人胡愈之、胡子婴等十二

① 《宋夫人、廖夫人等为沈案呈苏州高等法院文》，影印原件。

② 《宋庆龄选集》，第112页；《救国无罪》，第128—130页，时代文献社1937年8月版。

③ 《宋庆龄先生等为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人（何香凝、王统照因病和刘良模、潘白山因事未能参加），各带简单行装，离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和反动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到法院后，和胡愈之、诸青来被推为代表，同该院长朱树声谈判。他们义正词严地提出：“如认为‘七君子’有罪，亦请同样将我们羁押起来。”这一正义行动，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响应和支持，纷纷要求坐牢同服“爱国罪”。是日到苏州高等法院递呈状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者，有姜源等三四十人之多。^①

7月中旬 和蔡元培等发起组织鲁迅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并被聘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②

7月31日 由于沈钧儒等坚强不屈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国民党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

7月 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于7日晚十时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当地中国驻军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驻守该地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爱国官兵奋起抵抗，史称“七·七事变”。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伯渠赴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合作事宜。是月，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等，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的主张。

8月 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指出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

“孙中山为了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曾给了我们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主义——和三大政策。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它决不

① 《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救国无罪》，第136—143页。时代文献社1937年8月版。

② 《申报》，1937年7月17日。

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又指出，依靠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力量，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充满信心地说：“我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如果不久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抱着利用蒋介石政府来征服中国的希望的话，那末，这种幻想现在也一定破灭了。”文中强调人民游击战的巨大作用：“在这常备军的背后却屹立着广大的人民，他们准备着为卫国保家淌尽最后的一滴血。他们打起游击战来，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文中在引用大量确凿的材料深刻地论证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所存在的弱点，并与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进行对比后，指出：“在这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即使中国不得不单独与日本作战，也不会打败的。”^①所提出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并必然要失败的精辟论断和光辉预见，曾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

△ 日本侵略军于13日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在此新形势下，尊重中共中央电告立即撤退到香港去的建议，是月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由中共同志陪同到达香港。^②

9月24日 对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感奋异常。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指出：“这几天读了中国

① 《宋庆龄选集》，第115—120页。

② 路易·艾黎：《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工人日报》1981年5月30日。

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党，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不到的。到最后〔近〕，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重〕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文中强调是否坚持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由于坚持三大政策“便有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的大胜利。假如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主张，以及联俄、联共、工农利益三大政策能够继续到底，则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铲除尽净，帝国主义也早被驱逐出去，而中国已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然而，“十年以来，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放弃总理三大政策，共产党提出推翻国民政府的口号，以至两党互相残杀，牺牲无数有为的青年，损失无数宝贝〔贵〕的精力，以从事内争，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因此，要记取国共两党分裂这一段悲惨历史，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并表示：“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的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惟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①

10月3日 发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

① 宋庆龄：《中国不亡论》，第40—43页，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并参照战时小丛书之四二：《妇女领袖宋氏三姊妹》（战时出版社出版）第34—36页同文互校。

信》。指出：“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中国人民必然不会灭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他们。全国各党各派都捐弃了过去的成见，团结在抵抗并击败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目标的周围。”“全国一切力量的团结，是我们无敌力量的源泉。”在阐述中华民族的斗争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时说：“我吁请你们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不要坐视不顾。只有通过仔细的审查，你们才能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同时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及他们血腥的和非人道的破坏行为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此，“不仅是为了正义和公道，就是为了自己的重大利益，英国人民也应该尽力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必须清楚地认识：要是中国的抗战一旦失败，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就完结了。”“我们的抗战是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由于这个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里向你们呼吁，请你们给我们支持和援助”^①。

10月20日 对美国人士发表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演说。指出：“十年来我们中国虚弱无力，是由于内部的磨擦与自相残杀所致。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普及全国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将全国统一起来，而成为伟大的团结的民族开端。旧军阀一个一个被打倒，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之下，中国已走上了完成坚强而民主的道路。但孙先生遗教与三民主义，在连年的内战中消声匿迹。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国家受到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日益贫困。因此日本

^① 《宋庆龄选集》，第121—125页。

才能够攫取我们东北四省，再继续侵略我们的土地。我们内部的分裂，仅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而现在，“内战是早经终止了，一切内部的磨擦是已经消除了。”“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竟成了结合全中国一切资源和力量以抵抗暴敌的媒介剂，过去的红军即现在的第八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正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我们全国的团结统一，已发生伟大的力量，如堡垒一样坚固，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的痛击。”并表示：“深信美国对于我国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奋斗，必然表示恳切的同情。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在孤军抗战。我们知道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①。

11月6日 发表《两个十月》一文，再次表达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的高兴和愿望。指出：现在“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我们的新团结必得克服一切的问题和阻碍。从大的洗礼中，我们必将获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并坚信：“我们将不再是自己国内封建的奴隶，也不再是这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隶。奴役的枷锁将不再束缚在我们民族的身上。”同时，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它“给数千百万的人民，给世界各地幻灭和失望的人们，高擎着希望的火炬。”“十月革命凝结了国家（指俄国——引者注）灭裂的碎片，而在那上面树立一个坚强有力的国家。他们一步一步地建设着，他们终于造成了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人类不合理的苦难，也没有自然的灾害”^②。

① 《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宋庆龄向美国人士广播演说》，上海《大公报》1937年10月21日；“战时小丛书”之四二：《妇女领袖宋氏三姊妹》，第30—34页，战时出版社出版。

② 宋庆龄：《中国不亡论》，第12—21页，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

11月 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支持国共第二次合作。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倘使他所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不间断地继续到现在，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了。”呼吁：“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①。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四十五岁

3月2日 发表《告英国民众书》。指出：“今日中国的民众，比较过去，更加团结，为着世界的和平，社会与经济秩序之进步和反对法西斯及战争而携手工作了。”并提出世界各国人民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要：“为了制止侵略势力的猖狂，没有比较帮助中国抗战更好的办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协助在保持世界和平。在今日以抵制日货制裁和封锁的办法去断绝法西斯侵略者的接济，就是世界在明天能避免整个崩溃。”书中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大量暴行后，强烈呼吁：“民主国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来责罚它，一定可以制止这个侵略”^②。

3月7日 发表《向全世界妇女申诉》一文。指出：“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那么我们就该认识现阶段的妇女解放和幸福，和中国、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的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分离的连系。”在提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应互相支援时说：“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在西班牙，今天在中国，谁能保证明

① 《宋庆龄选集》，第126页。

②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3月2日。

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援助无量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文中呼吁:各国人民“积极地排货、制裁,拒绝一切有利于侵略者的合作,我们就可以凭我们的血肉,来战胜全人类的敌人!”^①

4月14日 在香港和何香凝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表示拥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指出:“临时代表大会,总结九〈个〉月以来抗战之经验教训,订正今后抗战建国方针。如大会宣言及大纲所昭示全党全国者,确为保证彻底胜利之先声,亦即为本党今后矢志完成总理遗志之宣誓。但能否最后完成任务与达到最终之目的,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仅号召,而重实现,希望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致努力为建国纲领奋斗到底!”文中为真正实现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实现孙中山的遗志,向国民党中央和全党同志提出七点建议:“(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务使本党恢复民众先导之地位;(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先,摒除一切不利民族国家之私见,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国家民族之耻辱,胜固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耶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

^① 《宋庆龄选集》,第127—128页。

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以振党国纲纪；（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及作战区域，因战事影响，或遭暴敌惨杀奸淫，或过奴隶生活，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或遭死难……种种惨痛，当铭刻吾人脑际勿忘，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从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抗战期间，凡与抗战利益不相矛盾，而能改善民生之计，如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卹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①

6月2日 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应制止广州大批壮丁避难香港。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广州而避难来港的人中，“并非多数为老弱之妇孺，而为巨量之青年壮丁，亦并非全为家财百万，毫无民族国家意识之富有者，而为多数家无隔宿粮之贫苦同胞”，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世界各国凡遇外侮，全国青年壮丁莫不奋起为国效命，鲜有离国避难他去。故近日无数壮丁由省来港避难之现象，不仅对我华南政治动员之观感有关，且足以使外帮友人对之同情心理锐减！”因此，向吴铁城提出三点建议以制止壮丁逃港继续发生：“从速加紧壮丁动员参战工作；改善省市防空设备；迅予设立难民收容所”^②。

6月6日 发表《苏联的和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援助》一文。指出在制止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上，中苏两国是利益一致并相互依赖的：“民族独立的中国，是保障苏联，对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正如其于自卫武力以策安全的苏联，是中国反日自救的最主要的因素一样。”强调：为了制止侵略，保卫中国和平，关键在于中国自己决心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以奠定世界和平与远东安全的根底，争取苏联以及一切尊重中国独立和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4月17日。

② 同①，1938年6月5日。

领土完整的民族的合作”^①。

6月 在香港创建爱国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巨大的爱国热情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如贾·尼赫鲁、保罗·罗伯逊、冯玉祥等,并以革命家的气魄团结在政治上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如孙科、宋子文等,作为“保盟”的发起人。亲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克拉克任总书记,法朗士任司库,艾培(爱泼斯坦)任宣传。“保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投降妥协、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它出版了名为《保卫中国同盟通讯》(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的刊物,向全世界报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广泛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援助,并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它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运送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人民。此外,它还介绍颇多的国际主义战士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木克华、仇克华等大夫,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大夫,德国的米勒大夫,美国的爱罗色大夫和加拿大的于文女士等等。

△ 领衔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其他领导人宋子文、克拉克、法郎士、艾培等署名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于香港。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提出:“为了加强和扩大国外援华工作起见,所有愿意和保盟合作的机构,均可与保盟香港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1)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6月6日。

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2）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机的建议”^①。

7月7日 发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指出：“伟大的一年来的奋斗与牺牲，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最后胜利的获取，还需要同志们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努力前进！”文中痛斥“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投降派之流，“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提出为了坚持抗战，必须“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为此，“首先要实现抗战的全盘政治动员。”又指出《抗战建国纲领》虽已公布，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实际执行与迅速实现纲领所定各点。”并提出应迅速发动和组织农民；组织及训练战区难民和失业民众；发动国内及华侨富有者，迅速开发云、贵、川、陕后方；实现具体措施，改善人民生活；改革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及政府要听取并迅予执行参政会“所提有利于民族国家及保障抗战胜利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等诸点具体之主张和建议。^②

7月28日 在香港致函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详述中国各战区之难民因疯狂的日军侵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食粮、药品的救济至急”，吁请努力唤起全美人民对华同情心，积极援助中国之难民。是日，该社发表了这一函件。^③

8月20日 为安排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邓颖超到香港同自己和何香凝的会见，离港乘船到达广州。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省市妇女抗敌会，及各妇女团体代表的热烈欢迎。^④

8月21日 到广州各医院视察受伤的将士及被敌机炸伤之难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宋庆龄选集》，第129—132页。

③ 同②，1938年7月29日。

④ 参见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1日。

民，详细了解他们受伤的经过和日常生活，备极关怀，并予以亲切慰问。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发现一从敌机炸毙的妇女腹中取出之婴儿，甚为怜惜，“抚抱之余，频嘱各医生小心看护”^①。

8月22日 赴广州观音山麓，瞻仰中山纪念堂。详细询问该堂迭被敌机轰炸之经过，当目睹该堂屋椽阶石弹痕处处时，极表愤慨。^②

8月23日 在广州市长曾养甫等陪同下，前往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敬献花圈。旋到中山大学、黄埔港等处参观。^③

8月下旬 在广州发表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的广播演讲。指出：在残暴野蛮的敌人面前，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不退让一步，拚死的斗争，坚持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我国青年对于战争与法西斯威胁的一致答复。在这答复后面，有着一种永远不能征服的精神。”并指出“青年是能够而且愿意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这是我们的信念，而在中国，我很高兴已经一再见到它证明是对的。”“在中国的老大躯体中，流着永远会更生的青年的血，不断复活了她的精力，她的勇气与〔她〕的希望。那是由于我们今日一代的青年，产生了现在我们抗战的力量，使我们不顾一切艰险，向着胜利的目标迈进！”呼吁英美不要同日本进行贸易，不要将原料和技术输给日本，因为没有这些，“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罪恶机构，都将从他的内部崩溃，而一个新的光明的民主制度，将会出现于日本可爱的群岛上。”同时，要求美国青年呼吁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救济机关，不要再将钱送给日本所占领的中国区域，而将这些钱送给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将机器与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我们的政府将欢迎这一切你们能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2日。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③ 同②，1938年8月24日。

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①。

8月25日 由广州乘船返香港。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及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各界代表等到码头欢送。^②

9月20日 和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及广州各文化、青年、妇女团体的代表等到广州码头，欢迎自港抵粤的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兼伦敦《每日新闻》特约通讯员何登夫人。何登夫人系来华访问我国妇女领袖，考察我国妇女抗战期间工作状况，协助筹办在我国设立国际和平医院以及护送英法等国妇女捐赠给我国的药物等的。^③

9月 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热烈赞扬海外千万侨胞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援助，提出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使华侨总动员的问题。“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此外，“还须依靠和经过各种的实际工作，组织侨胞到实际工作中，才是真实的动员。如果今天仅仅限于纸上的计划，口头的空谈，是万分不够的。”同时，指出抗战以来有不少的华侨归国服务，“但惜我政府对回国服务侨胞，未能妥予招待，亲切接洽，予以指导，致使久离祖国之侨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请缨无由，进退两难，徬徨歧路，有挫华侨之壮志热忱。深望我政府今后对回国服务之侨胞，对国内华侨团体，予以亲切的扶植，给以工作的机会。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尽量为华侨解除痛苦与困难，更为华侨谋福利”^④。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② 同①，1938年8月26日。

③ 同①，1938年9月22日。

④ 《宋庆龄选集》，第133—136页。

10月上旬 在广州积极进行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的工作，除捐助五千元作为购制寒衣之用外，又亲自召集广州市各妇女团体开会，讨论征募寒衣办法，并提出“不许一个广东妇女不捐制一件寒衣”的口号。^①

10月10日 发表《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一文。指出：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发挥工作效能到最高点，就可以“将全面的游击战运动战配合起来，守住民国诞生地的武汉，给敌人以致命的创伤；而且一定也能保卫在严重威胁之下革命策略地的华南，争取更坚强的世界同情援助，推进国际和平势力的结合，打击整个的侵略阵线。”认为当时存在的违反集中力量，阻碍发挥工作效能的现象是：“不必要的磨擦猜忌仍是团结不能达到精神无间的主要障碍，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仍遭着人们的曲解或怠工，个人或小部分人的利益仍严重影响着争取民族利益的共同任务，抗战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仍多方受着束缚，外部上仍有一部分人士昧于情势，敌友不分，怀着各种不应有的幻想，出钱出力的原则，仍没有充分做到富的真是尽了抗战经济上的责任，有力的都得了发挥其能力的机会，前线虽然在浴血苦战，后方仍到处看见苟且偷安的现象。”所以，只有有了巩固的组织，紧密的团结，共同工作纲领，“我们才能发挥实力，增高工作效能，真正达到拥护政府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目的。”同时，强调：“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对于进一步巩固国内的团结，是有着一半的决定作用的。”因此，“妇女们应当怎样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②。

10月17日 参加晚七时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的保卫大广东示威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1日。

② 同①，1938年10月10日。

游行。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千万群众一道行进。^①

10月28日 日本侵略军于21日攻占广州。25日，汉口失陷，次日武昌失陷，27日武汉三镇全部沦入日军之手。是日，和何香凝、陈友仁等六人致函林森、蒋介石、孙科及国民政府各委员。指出：“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先生忽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公开宣言和言论，举国惶惑。今我政府既宣布抗战决策，则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函中提出四项抗战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按指孙中山）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并强调说：“凡此四端，必须政治与军事配合，实行民主集权，始能挽回颓势，转败为功，内得人民之拥护，外得友邦之援助”^②。

10月下旬 在广州沦陷前，离开广州赴香港。

11月22日 和何香凝、茅盾、阳翰笙等，出席在香港铜锣湾孔圣堂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③

11月24日 号召和领导香港妇女，积极响应法美两国中国之友会为帮助我国抗战所发起的义卖筹款活动。^④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四十六岁

1月 倡导组织“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正式组成“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并亲任该会名誉主席，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普律德，以及宋子文、何东等二十多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8日；李洁之（原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广东省参事室主任：《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广州日报》1981年6月4日。

② 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8日。

③ 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3日。

④ 同②，1938年11月24日。

人为委员。^①

2月24日 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和香港紧急济难会主席何明华联名致函社会各界人士，呼吁捐赠款项和罐头、炼乳、鱼肝油等富有营养的食品，以及药品、医疗器械，以救济桂黔等地难民和伤兵。^②

3月8日 参加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并发表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最危急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当前的世界正面临到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的生死斗争。在中国，这斗争和在西班牙一样，已经采取了公开战争的形式。”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是紧密不可分的，“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中国人民和笼罩世界的战争威胁作了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近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因此，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援助，并强调援助的重点应是在敌占区中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

① 参见卢广锦：《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第七十一辑第125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② 香港《大公报》，1939年2月25日。

粮食。”为此“我们需要扩大外来援助的数量与范围，以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①。

3月15日 致函旅美华侨陈其瑗、赵建生，告知“纽约陈李公司主人李德予君捐助八路军寒衣款（汇单）国币五百元正，及第二次捐款名单均收到。”指出：“先生等及侨美同胞为祖国努力，屡次汇款援助抗战将士，具见爱国热忱，不胜钦佩。现在抗战尚未达到最后胜利目的，端赖先生等继续努力，经常赐助，务求早日获得光荣胜利”^②。

3月28日 发表《救济战灾儿童》一文。指出：中国数以百万计“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的需要，比我们的同情和恩惠要多得多。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呼吁国际人士，“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积极救助我们的战灾儿童。”^③

5月1日 发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指出：“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公开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

①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在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上所作的演说》，《宋庆龄选集》，第137—141页。

② 影印原函，藏中国福利会。

③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同时代表保卫中国同盟要求世界各国朋友，“支援那些坚决要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并正在敌人后方为新的民主的中国建立根据地的英雄游击队员们。它请你们不仅给游击队的伤病员，还有游击区的人民以各种医疗服务。它请你们支援整个中国军队的新的医疗工作。它请你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①。

、7月9日 发表《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纪念告美国友人》一文。指出：“如果没有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没有两大党的合作，军队与抗日的群众运动不结合起来，对日侵略的抗战缺乏坚决性，要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斗争中所演变出来的这些条件，是我们迄今止成功的原因。更进步的民族统一和民主改善，将加强为未来的新中国所已经设下的这个基础。”而当时还存在着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的弱点：“主要是少数保守派至今还不深刻了解孙先生三大政策的理想，或明或暗的在以各种藉口，不愿加紧全民族团结。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不能言行如一，因此随着抗战发展有的政治民主化不仅不能循序发展，在有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民主范围相反的缩小”等等。同时，指出：“这些不忠实民族统一战线及限制民主政治发展的现象，不仅对中国抗战前途不利，且对民主国家在华利益的保障亦没有前途，因为对内团结不足，政治改进迟缓，必然逐渐削弱抗战的力量，以至妄冀和平停战，走向失败道路，那时候，民主国家在华一切利益亦将因我抗战半途失败，而遭日本扫荡尽净。”并强调要反对和平谈判、妥协调停等的阴谋活动，因为“这个活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动，不仅对我们中国抗战到底不利，同时亦即牺牲民主国家在华利益的愚笨行为”^①。

7月15日 发表《我们的第一年》，回顾“保盟”一年来成就：“在成立后的一年中，“保盟”为提供医药救济，为海外中国的朋友们提供情况，组织国内外友人支援中国抗战和集中及调整各项救济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在国内，在抗日根据地它组织了国际和平医院，给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贵阳医疗急救学校、中国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新四军医疗队、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很多援助。”“到1939年6月15日为止的13个月中，各国朋友们通过保盟的捐款共约港币25万元（约合美元8万元或1万6千英镑）。这些数目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送往内地。”同时，“在冬天到来之前，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中国的伤病员发起一次募捐二万条毯子的运动”^②。

7月20日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斯大林以及蒋介石、林伯渠、马相伯、沈钧儒、宋美龄、何香凝等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③

8月21日 和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冯玉祥、邵力子等，被聘任为欢迎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筹备会的顾问。^④

10月20日 发表《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指出：“保卫中国同盟是在一年多前成立的，它是积极支援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一个机构。由于它特别熟悉抗战的情况，它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中国战士和战争受害者以宝贵的援助。我们这种医药和难民救济工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7月9日。此文先发表于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编印的《祖国抗日情报》第六二九期（巴黎1939年出版）。

②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4—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③ 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

④ 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8月21日。

作完全依靠像你们这样的中国朋友的捐献。”由于“现在法西斯侵略的浪潮已经蔓延到欧洲，我们这个委员会愿意重申它和全世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团结一致。两年多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是走在这个斗争的前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永不让步，永不屈服的决心。”又指出：“从新近发展的情况看，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中国要首当其冲地受到日本一次新的更残酷无情的攻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恳切地向你们呼吁：千万不要放松你们过去为中国所作的努力，并且要继续下去甚至加强这种努力”，给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更多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①

11月7日 复函重庆《新华日报》社，就该报社10月24日函请代为收转援港三报工友的捐款事，告知说：“承付托转交南华、自由、天演三报反汪罢工工友之款第一批国币三千三百元正，经已收妥，并已转罢工工友”^②。

11月11日 在菲律宾马尼刺华文报纸《新闻日报》发表题为《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文章应《新闻日报》编辑的请求，追述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孙中山从事的革命目标。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结晶，因为这是我国全民众在国际上、政治上、社会经济上求平等的一致要求。孙先生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是有联带关系的，是救国目标中不可分离的部分。……三民主义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以锐利的眼光，来观察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机构来写成的。”强调：“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日。按：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为汉奸汪精卫派所办的报纸。该三报工友八十余人抗议汪精卫投敌叛国，不为汉奸利用，不做汉奸工具，于“八·一三”两周年毅然相继宣布脱离各该汉奸报社，引起海内外人士的赞扬与同情。三报工友离职后，生活无着，因此各界纷纷捐款支援，将其捐款汇重庆《新华日报》社请代转交。

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则处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所以惟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才有真正独立的中国。”又指出：“无论何人，对三民主义没有适当的认识，便不配算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这些一知半解的信徒们，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遇到了真正为国家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随时有思想发生动摇的危险，甚而至变成卖国的汉奸。”“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目下背叛国民革命的汉奸汪精卫，即对此点不了解，而思想发生动摇者之一。”文章揭露汪精卫曾奉袁世凯的派遣，充当袁的说客，公开反对革命，并痛斥其“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同时，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只要对动员全国工作，更加几分努力，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进一步，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全民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孙中山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①。

12月10日 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推进社名誉社长的身份，在香港 ZBW 无线电台，用英语发表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讲演。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并认为“目前委实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工业合作社。它们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元国币的货物。”又指出：“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援助，同时也是为生产

^① 《宋庆龄选集》，第142—145页。

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由于这种扩大的组织，人民的经济程度一定迅速高长。此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表示：相信当时在中国，“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①。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四十七岁

1月17日 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和何香凝、宋美龄、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郭德洁（李宗仁夫人）等，被大会通过聘请为名誉理事。^②

2月20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蒋介石、冯玉祥、孙科、蔡元培、于右任等三十人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③

3月31日 和宋霭龄及赴港疗养之宋美龄一起，从香港飞抵重庆。^④

4月3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称赞其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著的成效。”并表示相信：“重庆的，以至于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之下，一定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运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⑤。

① 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

② 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

③ 同②，1940年2月28日。

④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2日。

⑤ 同④，1940年4月3日。

4月初 和宋霭龄到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探视、慰问难童。^①

4月4日 购买糖果五百余份，作为儿童节（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儿童节为4月4日）的礼物，赠送给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的难童。^②

4月5日 和宋霭龄、宋美龄到重庆郊区，参观工业合作社所属的军毯合作制造厂、印刷合作社等。对生产情况和工人的工资、工时、健康状况，详加了解，备极关怀。旋又巡视被敌机轰炸的重庆市区，参观公共防空洞等。^③

4月7日 和宋霭龄一起，出席由宋美龄主持召开的重庆各界妇女欢迎会。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这次回来，和孔夫人（宋霭龄）看到了不少地方遭到敌机轰炸的残迹，看到了不少同胞的受难，但也看到了许多姊妹们的努力工作”，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兴奋的。希望全国姊妹们更加努力，要多注重妇女的教育工作，不要做表面文章，要做实际工作；还“要能多参加国民大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与妇女解放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并要求“妇女们都能够起来做坚持抗战的工作”。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出席了欢迎会。^④

4月8日 为重庆《新华日报》题字：“抗战到底”^⑤。

△ 和宋霭龄、宋美龄赴重庆伤兵之友社医院，慰问伤兵，并亲自向伤兵分送慰问袋。同时，还慰问被俘的日军伤兵，旋又参观中苏儿童生活照片展览会。^⑥

4月11日 和宋霭龄一起，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举行的宴请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5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1940年4月6日。

④ 同①，1940年4月8日。

⑤ 同①。

⑥ 同①，1940年4月9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夫妇的宴会。^①

4月15日 发表《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指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中国朋友，所有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男男女女，都认识到在中国发生的事，也是每一个人所应关心和负起责任的事。”再次说明“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和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呼吁各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不要减少这种援助：

“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的抗战直至最后一个侵略者被驱逐出境，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向你们呼吁，请你们以同样的决心，尽你们一切的力量去消除他们的苦难，坚定地不间断地帮助，不减少一分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胜利——也即是你们的胜利为止”^②。

△ 出席孔祥熙、宋霭龄举行的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蒋介石、宋美龄，国民政府各院、部长夫妇，英、美、法、苏四国驻中国的大使以及中外来宾三百余人。^③

4月18日 和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于上午七时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讲，由美国NBC电台向全美转播。其在讲词中指出：“中国人民坚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三年了。日本藉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12日。

②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6—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③ 同①，1940年4月16日。

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①。

4月20日 和宋霭龄、李德全等被聘为伤兵之友总社理事。^②

4月22日 和宋霭龄、宋美龄一起，离重庆飞抵成都。^③

4月25日 和宋霭龄、宋美龄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并在工人欢迎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会后，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会。^④

4月27日 和宋霭龄一起，出席宋美龄在成都励志社举行的欢迎茶会。在会上讲话说：“承被邀请到川，目睹一切，良足欣慰。余以为我妇女界所宜着重者，厥为教育工作。将来国民大会，不日召集，应使妇女界明了其重要性，由各团体推出代表参加宪政运动，动员广大妇女努力于此，亦为吾人对抗战上的重大贡献。”^⑤应邀出席茶会的有成都各界妇女代表四百余人。

5月9日 和宋霭龄一起，是晚离重庆飞返香港。^⑥

5月下旬 汉奸汪精卫于3月12日发表所谓《和平宣言》，提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共谋和平方案”。29日，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是旬，在香港发表谈话，指出：“只要团结抗战，必可战胜日寇；勿为敌伪造谣离间，互相分裂。”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制造的“国内分裂在即”的谣言，说这只能是“他们的梦想。际此大敌当前，困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19日。

② 同①，1940年4月21日。

③ 同①，1940年4月29日。

④ 同③。

⑤ 同①，1940年4月30日。

⑥ 同①，1940年5月11日。

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为日寇所乘。祇有少数不明大势之人，故作恶化之宣传，实妄人也。”强调：敌伪妄图“我国民族阵营自相分裂”，我们必须加以警惕。^①

7月15日 发表《中国、世界和你》一文。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足以抵挡敌人的打击。中国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三年抗战时间虽然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已经陷落，但是中国的抗日战线，不论在精神和物质上仍然坚如磐石。”赞扬国外友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援助说：“从斗争开始到现在，中国人民得到了国外友人的有力支持。”“各国支援中国的机构，给予全国范围的医药、孤儿和工业等方面的救济工作，证明了外国朋友的自我牺牲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亲眼目睹的例证。使他们看到所有用公正眼光看待中国人民的斗争的国外朋友同他们牢固的团结关系。与此同时，接受了国外朋友在物质上对他们斗争的支援。”并强调要加强这种团结：“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削弱这个团结。”“如果那最本质的人类价值不再有意地、或无意地被出卖，那就必须给予中国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援助，这是最清楚和毫不含糊的事实。公众舆论必须比以往更加坚持停止对日本的一切援助，并且要在各个方面坚持保存中国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而且直接的援助不应是减少，而应该增加。”同时，表达坚强决心：“‘保卫中国同盟’宣称只要外援不停，它将不断地注意到让委托给这个组织的捐献到达它的目的地。不论日本的封锁严密到什么程度，不论远东的形势变化到什么地步，不论保卫中国同盟的总办事处可能被迫迁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国外的中国朋友继续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我们也将在这方面竭尽全力”^②。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5月31日。

②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9—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 辛巳） 四十八岁

1月14日 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他们所发动的反共的“皖南事变”，是背信弃义，是违背孙中山的教导和遗嘱的。痛斥国民党“最近讨共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指出：现在“全国抗战进入第五年度，今年成为最艰辛最重要之一年，而剿共问题，竟愧若迫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①。

1月18日 和何香凝、陈友仁为“皖南事变”联名通电蒋介石，痛斥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②。

1月下旬 为“保卫中国同盟”聘请著名舞蹈家戴爱莲、著名低音歌唱家义桂君及香港合唱团，在香港娱乐戏院举行音乐舞蹈义演大会，为国际和平医院等医疗机构筹募经费。^③

5月上旬 在香港发起救伤济难的“一碗饭运动”，为救济抗日的伤兵和难胞筹募款项。^④

6月1日 针对宋子文5月30日突然从华盛顿发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电报，声明退出“保盟”事，发表《关于宋子文退

① 《宋庆龄等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函》，影印原件。

② 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③ 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月30日。

④ 同③，1941年5月7日。

出“保盟”的声明的声明》。指出：“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只有表示遗憾。由于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统一、民主和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宗旨，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保卫中国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的指责，指出：“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妥协、投降和屈服。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拥护第一种政策。如果这样做，便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并表示：“我们支持中国的统一从不动摇。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统一的事物坚决反对”^①。

6月14日 主持撰写《救济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文章，针对宋子文提出的“救济工作当一点也不涉及政治”的观点，明确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是“有政治立场”的，“我们的立场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的救济工作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的，阐明救济工作要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国民党千方百计阻挠“保盟”把救济物资运给最需要救济的抗日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正是出于“政治原因”。指出：根据“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救济方针，“保盟”支援的重点是抗日游击队。

“因为我们晓得，在全中国，游击区是最缺乏资金和医疗物资的”，而且，“游击战和动员前线地区人民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并指出重点援助抗日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主意，许多国外的中国朋友，也明白表示希望把他们的捐赠的款物用在这些地区。”同时，重申：“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机构，我们始终保持着对自由中国任何地区的受难民众和任何军队的伤病员，给予救济的自主权。”还明确指出：坚决反对“政

^① 香港《大公报》，1941年6月1日；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23—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府中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决定了游击队不应得到任何医药物资”的“这种歧视和威胁中国团结的现象”。并呼吁：“恢复中国的统一战线，加强中国的团结，放弃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国内争端”^①。

8月初 在香港“一碗饭运动委员会”成立会上讲话，阐明“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饭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指出：“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②

9月1日 主持在香港英京酒家举行的“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向有关人员颁发绣有亲自书写的“爱国模范”四字的纪念旗和奖品。出席典礼的有何香凝、孙科夫人陈淑英，暨中外来宾、各社团代表百余人。^③

10月 发表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作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名称并非偶然叫出来的，它是一个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名词。‘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

‘抗日’这两个字反映着一个事实，即日本今天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任何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团体。‘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25—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8月15日。

③ 香港《大公报》，1941年9月2日。

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说各个属于它的党派不能有各自的观点和目标。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党一派独裁。”并指出：“在今天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这种统一战线以后也要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建设的工作也与抗战一样地需要长期的团结。”还阐明加强民主是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关键，缺乏民主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是中国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进而呼吁：“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可缺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①。

11月28日 为纪念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十周年，发表《纪念邓演达》一文。说：“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这是活生生的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赞扬他在“宁汉合流”，革命处于危难的时刻，“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呼吁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②。

① 《宋庆龄选集》，第147—151页。

② 香港《华商报》，1941年11月28日；《宋庆龄选集》，第152—153页。

12月 日本帝国主义于8日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同时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日军在香港登陆，我东江纵队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在日本侵略军到达机场前六小时，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前往重庆，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四十九岁

3月8日 和宋霭龄、李德全等，被推选为重庆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主席团成员。^①

4月17日 和宋霭龄、宋美龄等，出席中美文化协会假孔祥熙寓所召开的游园茶会。茶会上，同时举行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献赠“海鹰图”的典礼。^②

6月3日 出席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的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两周年纪念音乐会。到会的有孙科、孔祥熙，和英国、苏联驻华大使及各国军事代表团人员等三百人。^③

6月22日 和邓颖超、郭沫若、史良、李德全、侯外庐、曹清华等，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的纪念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茶会，并在茶会上讲话。讲话中强调加强团结的重要，指出：“苏联之所以能够抵抗侵略者，并有力地击溃纳粹匪军是由于苏联全民之团结一致。”会上，李德全代表妇女界向苏联大使潘友新夫人赠送由宋庆龄等三十余人署名的、绣着“并肩克敌”四个红字的锦旗。孙科、冯玉祥、何应钦、商震以及苏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3月8日。

② 同①，1942年4月18日。

③ 同①，1942年6月4日。

联、美国、英国驻华大使等出席了纪念茶会。^①

7月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指出：“中国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正在为她们的祖国而战。在目前有关整个国家前途的斗争中，她们已经证明自己是我国历史上女英雄们的好女儿了。”在赞扬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杰出的妇女领袖时说：邓颖超就是在“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她是1925年到1927年时期一位活跃的领袖。”在当时，“成千成万的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参加了1925年到1927年的打倒北洋军阀的伟大战争”；“这个伟大运动的指挥机构，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和其他的妇女。邓颖超、蔡畅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的贡献的）；何香凝组织了国民党的妇女部。”在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时说：“只有在陕甘宁、晋察冀和其他边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年到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边区的妇女已成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战士了。”同时，指出：“我国妇女的斗争是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妇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战争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还深。当打退了侵略而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妇女将与各国妇女站在一起，愿意也准备使将来的一切都向前发展，使目前世界上的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6月23日。

可怕的考验时代永远不再来临”^①。

8月中旬 “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于春、夏季间，历尽艰险从沦陷的香港陆续到达重庆。是旬，在重庆重新组织起“保盟”中央委员会。^②

冬 在重庆寓所举行茶殮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一起欢送董必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参加茶殮会的有冯玉祥、李德全等。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五十岁

1月11日 为《新华日报》五周年题词：“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③。

△ 参加重庆《新华日报》社举行的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在邓颖超等的陪同下高兴地观看了文艺演出。

1月25日 就中美、中英于11日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事，发表谈话。指出：“两个新约的签订，展开了中国与国际关系的新历史。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孙）总理毕生致力的一大目标，到了现在开始实现了。”并提出三点愿望：（一）“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要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切皆归于平等。”“我们的经济与文化，尚未与国际的一般情况臻于平等。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尤以国防建设是极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亦惟有国防科学的猛晋，是促使经济文化跻于平等的坦途。”（二）英美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在实际上这种权利尚沦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

① 《宋庆龄选集》，第154—165页。

② 参见宋庆龄：《从香港到重庆》，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36—42页。

③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11日。

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予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因此，我们于庆祝签订新约之余，更应扫荡敌寇，拯救沦陷区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惟有如此，真实的自由平等才能实现。”

（三）“总理遗嘱，所期待于国人者两事：其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召开国民会议。余深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之中，国际关系已趋平等之后，国民精神必日见其发皂，民主精神因抗战建国而必日见其发扬。”号召全体国民党人，“均应淬砺奋发，以实现总理的遗教”^①。

2月23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郭沫若、冯玉祥、程潜、邵力子以及孙科、孔祥熙、商震、刘仲容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苏联红军节庆祝茶会。^②

3月8日 纪念“三·八”妇女节，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平等自由，声气相通，精诚奋斗，共建大同”。^③

3月 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应该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同时，指出：“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④。

5月15日 黄河决堤使河南省发生特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为此，在重庆发起“赈灾足球义赛”，要将义赛所得全部收入捐赠灾民。是日，出席球赛开幕式，亲到足球场上为球赛开球，并与运动员一一握手，代表河南受灾同胞向全体运动员致谢。球赛结束后，又亲自向参加义赛的各球队赠送奖旗，向运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

② 同①，1943年2月24日。

③ 同①，1943年3月8日。

④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宋庆龄选集》，第166页。

动员赠送纪念章。①

6月26日 和宋霭龄、宋美龄一起，被青年时期就读的母校——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由宋美龄代表三人前往该校接受学位。②

7月初 接河南灾民救济委员会为收到“赈灾足球义赛”捐款的感谢信。信中说：“承惠捐夫人主办之足球义赛全部所得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元，以为赈济河南灾民之用。该款现已照数收妥，至深感谢”③。

△ 为募款救济广东灾民，发起举办国际音乐会义演。得到中外音乐界人士的热烈响应，由在重庆的中、美、苏、英人士参加演奏。④

8月27日 上午十时，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议会议员艾伦、华德女士。⑤

8月30日 下午五时，再次会见艾伦、华德女士。⑥

9月初 接河南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函，报告“赈灾足球义赛”捐款的用途。⑦

△ 对曾帮助“赈灾足球义赛”的工作人士，表示深切谢意。⑧

9月15日 发表《从香港到重庆》一文。回顾“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五年多来的工作概况，指出到重庆后，“由于政治条件、技术条件的限制，和国外援助的减少，工作的开展遇到重重困难，由于“保盟”的艰苦努力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保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5月16日。

② 同①，1943年6月28日。

③ 同①，1943年7月8日。

④ 同①，1943年6月23日。

⑤ 同①，1943年8月28日。

⑥ 同①，1943年8月31日。

⑦ 同①，1943年9月2日。

⑧ 同⑦。

盟”在重庆负担起宣传和动员工作。为救济河南和广东的灾区人民设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义务工作人员和英、美、苏的外交和军事机构，举行戏剧义演和球类义赛，在重庆就募得了三十万元法币。由于美国援华会的帮助，保盟自联合救济会取得五万美元捐款，救济河南游击区灾民。还争取到美国劳工组织和驻重庆的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的援助等等。特别提出：“在保盟的整个存在的过程中，它强调团结。现在，当这些成果为不祥的阴影笼罩着，预兆着新的和自杀性的内战时，我们更要强调这一点”^①。

9月18日 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代表“保盟”对海外的朋友给中国人民斗争的支援表示感谢。提出要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游击区，“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它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明确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完全致力于救济工作，“但是，救济工作要有一定的目的”，保盟的“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生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②。

10月4日 和冯玉祥等十八人，被国民党中央第二百三十九次常务会议增选为国民政府委员。^③

11月7日 和董必武、郭沫若、沈钧儒、茅盾、潘梓年、胡风、史东山、刘清扬、李德全、程潜、邵力子以及孙科、孔祥熙、何应钦、商震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所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36—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宋庆龄选集》，第167—170页。

③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0月5日。

举行的招待会。①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五十一岁

2月8日 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阐明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的密切关系：“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同时指出：“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的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一个经济落后与缺乏武器的国家能够击退一个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唯一武器）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敌，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所以中国民主也与美工人利益休戚相关。”呼吁：“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并要求：

“美国工人公开表示他们希望在日寇战线后方与法西斯作战的人们也得到一份与他们战斗任务相称的供应”；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正是坚持积极地与法西斯作战的“民主部分”②。

3月12日 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广播演说。指出：要了解孙中山的遗嘱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民族或国家间的‘自由’和‘平等’的联系；‘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8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171—173页。

联系。”在阐明国际民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问题上说：“‘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

“只有当国际民主实现之后，世界上才会有巩固的和平。”同时，演说中回答所谓中国“有依赖外国的倾向”的批评，指出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固然需要外援，但绝不是依赖外援，我们绝不放弃独立自主的神圣原则，“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至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①。

4月7日 为募款赈济湖南省灾民，特约请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中国舞蹈艺术社与斯义桂教授以及中华交响乐团，于本月中旬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音乐舞蹈义演。^②

△ 出席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行的、由湘灾筹赈会主办的古今书画物品义卖展览会。捐出珠宝粉盒一个，当场义卖，并在义卖展览会上购买书画物品等，积极为赈济湖南灾民募款。^③

6月21日 中午12时，会见前来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④

9月26日 邹韬奋因癌症于7月24日病逝。和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柳亚子、许德珩、马寅初、夏衍、胡绳以及于右任、孙科等七十二人，发起召开邹韬奋追悼会，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启事。^⑤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3日；《宋庆龄选集》，第174—176页。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7日。

③ 同②，1944年4月7日—8日。

④ 同②，1944年6月22日。

⑤ 同②，1944年9月26日。

10月1日 和冰伯渠、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马寅初、史良等，参加在重庆道门口银社举行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亲题了“精神爱国”的挽词，对邹韬奋表示深切的哀悼。会场上国民党特务密布，但慑于其崇高威望，未敢下手进行破坏。^①

10月19日 和沈钧儒、茅盾等主持在重庆百龄殯厅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有重庆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等。^②

11月7日 和郭沫若以及孙科、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在重庆青年馆举行的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庆祝会。^③

是年 送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台X光机。同时，还送给陕北等抗日根据地大批的药品和医疗器机。^④

△ 赠送马德海医生一幅照片，以感谢其对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贡献。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五十二岁

6月6日 和沈钧儒、郭沫若、邓初民、茅盾、潘梓年、冯玉祥、左舜生以及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等，出席为欢迎苏联新任大使彼得罗夫和庆祝苏联红军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由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邵力子主持召开）。酒会上向彼得罗夫祝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胜利，向郭沫若祝贺其将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大会。同时，参观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照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日；另参见何子超：《挺身而出特务震慑——宋庆龄在追悼邹韬奋的大会上》，《重庆日报》，1981年6月5日。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1日。

③ 同②，1944年11月8日。

④ 参见中国福利会：《亲切的教诲，巨大的动力——深切悼念敬爱的宋庆龄同志》，《文汇报》，1981年6月5日。

片展览”^①。

8月30日 下午，会见从延安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②

9月1日 就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是日下午七时，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冯玉祥、张治中、陈诚、王世杰、陈立夫、郭沫若、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李德全、王昆仑、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等，出席由中苏文化协会主持召开的、为庆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盛大鸡尾酒会。^③

9月6日 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设宴招待抵重庆参加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④

9月8日 出席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在桂园举行的茶会。在讲话中，表示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在建设方面对边区、解放区继续予以援助。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英国援华会负责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茶会。^⑤

10月9日 上午，赴重庆市民医院，吊唁8日被国民党士兵误害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⑥

10月10日 下午，李少石灵柩移往重庆小龙坎八路军办事处公墓安葬。和周恩来、徐冰、潘梓年、柳亚子、郭沫若、茅盾、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6月7日。

② 同①，1945年8月31日。

③ 同①，1945年9月2日。

④ 同①，1945年9月7日。

⑤ 同①，1945年9月9日。

⑥ 同①，1945年10月10日、14日。

陈村人、张友渔、韩幽桐等前往执拂。出殡前，曾到市民医院太平间向李少石的灵柩行礼，把鲜花一束放在棺上，并慰问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及其女儿李湄。^①

11月1日 接何香凝是日来函（系致其及孙科、宋子文三人者）。信中说：“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临终囑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②。

12月 离重庆回到上海。“保卫中国同盟”随之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此后，为解放战争提供大量物质帮助，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和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把医药物资等运送到各个解放区；同时，为上海劳动人民举办了各种文化福利事业，如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等。

△ 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经济和医药等等的援助，并收养上千的战灾孤儿，“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枝的支援。”又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表示：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后，“我们将继续这样工作下去。我们将在中国的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中间起着联系作用。”同时，呼吁各国的朋友们继续给中国人民以“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渡过战后的困难时期”^③。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1日、12日。

②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9日。

③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48—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五十三岁

1月13日 就国民党法西斯暴徒于去年12月1日杀死手无寸铁，要求和平民主的昆明西南联大、南菁中学等校师生于再、李鲁连等四人，重伤六十余人，造成著名的“一二·一”惨案事。上海各大、中、小学及各群众团体两万余人，于是日在棋榔路玉佛寺举行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中于再等死难师生大会。和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等参加了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主祭团成员之一。大会由柳亚子致悼词后，一致通过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立即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政府四项诺言，惩办屠杀师生的凶手等十余条正义要求。^①

1月14日 在上海发表谈话，吁请国际人士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中国人民以更多的援助。说：“广大中国人民的福利，需要全世界的友人和同情者宽仁善意的帮助”；“中国现万分需要精神、物质和技术的支援，以渡过战后这一段困苦期间。”指出：

“国际上各救济机关虽则曾作过种种可敬和最大的努力，但还是不够”。“中国所受到的创伤，还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痊愈，……还需要外国友人进一步的援助”^②。

3月16日 被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但其并未出席本次会议。^③

4月中下旬间 中国共党政协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于8日冒恶劣天气乘机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16日。

② 香港《华商报》，1946年1月16日。

③ 同①，1946年3月18日。

同机罹难。史称“四八烈士”。中下旬间，和左舜生、黄炎培、柳亚子、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许广平、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胡风、沙千里、史东山、蔡楚生、柯灵、夏衍、华岗、潘梓年等，共同发起上海各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①

4月30日 上午九时，参加在上海槟榔路玉佛寺召开的上海各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并和左舜生、黄炎培、柳亚子、马叙伦、马寅初、陶行知、章乃器、叶圣陶、潘梓年、华岗、许广平等二十四人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向大会送了挽联。大会由左舜生任总主席、马叙伦主祭。^②

5月 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平剧义演发表题为《平剧义演的意义》的讲话。指出：“有千百万同胞正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交迫而在朝不保夕。我们今晚的募款，对于这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受难者，不过略尽棉薄而已。”又指出：“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世界，现在都正在力谋团结。团结的涵意，是说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进一步它说明人类这种共同努力，可以保证每一个人，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获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适当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正象今晚我们所享受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获得一个丰富、快乐和健全的生活。”并表示希望：“靠着大家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走上团结、和平的道路〔路〕，进而达成天下一家的理想”^③。

6月 为支援苏北解放区建立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医院，捐赠一批医院设备，其中包括250张钢丝病床、手术器械、显微镜、爱克斯光机、大批药品，和化验室、手术室、病房急需的其它装备物资，以及一些伤病员急需的营养物品。同时，还为医院约请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4月30日。

② 《四月三十日上海追悼“四八烈士”大会》，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4日。

③ 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1日。

曾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医疗队的美国外科医生薛示茨等外国医务人员。上述医药物资等，几经周折，克服重重困难，于是月陆续运到苏北解放区。这个建立起来的医院，即后来的苏北国际和平医院。^①

6月29日 接新四军华中军区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收到所支援的药品后，是日写来的感谢信，说：“隆情厚意，至为铭感，特代全体指战员致谢”^②。

7月22日 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最近几年来，我一直从事于战时救济工作，给中国的抗战增加一分力量。我避免参加政治方面的争论，以免影响工作。我的沉默是为了集中全部精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卷入这个战争。”“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凡是具有人性的人都必须发言。”严正指出：“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内战将使我们看到城市与农村相脱节。”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申明它是“孙中山的政纲。它也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而在共产党的区域中，“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同样民生主义的筹策应推行到全国。”大声疾呼：“世界规模的战火已经在我们国土内燃起了第一个火焰。我们必须扑灭它。我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7日；陈海峰：《雪里送炭——宋庆龄同志与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健康报》，1981年6月25日。

② 张鼎丞、邓子恢：《致宋庆龄函》，影印原件。

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并向“美国朋友们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强调：

“如果美国能明白表示不再供给军火和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的内战就决不会扩大”^①。

这一《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地强烈地反响。

7月26日 《声明》得到何香凝、李章达、黄药眠、李伯球和陈此生等的响应，他们是日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致电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要求督促其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指出：《声明》“正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我们除加紧团结中国人民，拥护孙逸仙夫人主张，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外，并向你们呼吁，请你们本着美国人民优良的独立和民主精神，督促你们的政府，立即实行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华军事援助。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友谊和援助，足以加速完成中国和平民主统一之局面，同时可以使中国人民从事农工商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②。

8月2日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发表谈话，赞成《声明》，认为为促进和平（美国）应放弃军事干涉，这是美国人民所欢迎的。^③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圣路易环球民主报》、《圣路易明星时报》等报刊，发表谈话或评论，支持《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主张撤退驻华美军。^④

8月9日 延安中国解放区妇联筹委会致电拥护其7月22日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5日；《宋庆龄选集》，第179—181页。
《宋庆龄选集》将发表日期署为23日，误。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8月3日。

③ 同②，1946年8月5日。

④ 同①。

发表的《声明》。指出：“先生发表严正声明，号召停止内战，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立即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中国之危亡，并谴责中美反动派狼狈为奸。对此正义呼声，解放区七千万妇女衷心拥护，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到底”^①。

8月12日 重庆工商、文化、学术、文艺、戏剧、新闻、律师和教育等各界人士史良、邓初民等一百三十六人，为响应《声明》，联名发出《给全国同胞的一封信》。说：“7月22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公开发表对时局主张，指出中国的好战分子发动内战，加深民族危机，威胁世界和平，主张结束独裁政体，立即成立各党派一致参加的联合政府；并吁请美国撤退在华驻军，于联合政府未产生前，暂时停止一切军事经济的援助，以扑灭今日‘在我们土地上燃烧起来的’‘世界战争的第一个烽火’。这完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与要求，我们呼吁全国的人民，一致的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的主张，誓为其实现而奋斗。我们并向美国政府与人民呼吁，要求他们本着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立国精神，尊重中美间多年来传统的友谊，彻底实践昔日罗斯福总统尊重中国独立民主的政策，……立即从中国的土地上，撤退那‘并不能增进中国人民间的和平与秩序’的驻军，收回美国于7月14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得到和平与民主的时候，暂时停止一切军事经济的援助。”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中国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穷困中拯救出来，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奠定东方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中美间的伟大友谊，也才会更加强大与巩固”^②。

8月13日 蔡廷锴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干部理事会，为响应《声明》，发表了《声明》。说：“我完全赞同孙夫人在7月22日的号召，它不但代表着全国主张公正和平人士的意见，亦即表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8月10日。

② 同①，1946年8月12日。

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内战烽火正在蔓延中，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已重临战争和死亡的威胁，我们主张立即停止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两党争端”^①。

9月 和邓颖超被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邀请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出席将于10月中旬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全国各地妇女纷纷发函、电给她们二人，表示拥护作为代表出席妇女会议，并要求把中国妇女因内战所遭受的痛苦与损害，以及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带到国际妇女会议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五十人的信中说：“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及美国十九个妇女团体共同发起的国际妇女会议，将于下月中旬在纽约举行，并且邀请二位先生出席为代表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欣慰与兴奋！并且热忱地拥护您们。因为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国际间提供中国妇女的意见，并且联合全世界各国妇女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和平的早日实现，以及国内的早日停止内战而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信中还请求其把她们要求美军立刻退出中国，并且停止一切对中国的军事物资援助；帮助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以及保障妇女的一切权利等意见带到国际妇女会议去。^②

10月27日 上海各界中外人士五千余人举行追悼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大会。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放置在陶行知的遗像前。^③

12月17日 周恩来给其致函。说：“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指出：“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因此，中国人民只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8月17日。

② 国立女子师范学生致宋庆龄、邓颖超的信，见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9月29日。此外，上海、北京、重庆、昆明、延安等地的妇女团体和个人纷纷发信拥护她们出席国际妇女会议。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发护照，她们未能出席国际妇女会议。

③ 同①，1946年10月28日。

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①。

冬 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募捐演出和义卖演出。出席观看在上海艺术剧场演出的《祥林嫂》等剧，并对观众到场观看募捐义卖演出表示感谢。^②

1947 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五十四岁

1 月 13 日 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齐仲桓函。指出：“我们对淮安附近的国际和平医院短暂的寿命，深表遗憾。虽然你们目前暂时的挫折，我们仍感到你们为这件有意义的事业所花的努力不是白费的。创办和维持国际和平医院的精神将激励人们不久重建该院。”表示将继续支援国际和平医院：“一俟一批急需物资到达后，我们仍将争取把它们运送给你们和其他国际和平医院”^③。

4 月前后 发表《向国外的呼吁信》，表彰曾对解放区的医疗工作作出贡献的美国医务工作者陶乐赛·桃爱尔、摩西·奥斯布尔、及丽琳·凯泰等，指出：由于“他们离开白求恩大学和国际和平医院，使该地区更需要医学知识和物质援助，并极端缺乏合格的指导。这种空缺必须用医疗物资和设备来填补。”同时指出：“中国

① 《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2 日。

② 袁雪芬：《令人尊敬的名字——宋庆龄》，《文汇报》，1981 年 6 月 4 日。

③ 宋庆龄：《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齐仲桓院长的信》，《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91—9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版。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即第四国际和平医院，是由中国福利基金会用国外捐款建立的。但医院建立不久，因战事激烈，医院又遭到国民党飞机野蛮轰炸，只得将医院撤离到鲁南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

福利基金会的任务是为华北晋察冀地区公共卫生工作提供必要的设备。然而这仅是这项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接到全国各地的请求上都注明了‘紧急’字样。只有不断收到外界的援助，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不论你捐赠的是钱或物资，我们无不欢迎。我们的谢意只是最终受惠者的感激心情的极小的一部分”^①。

5月30日 致电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吊唁该委员会主席卡尔逊将军逝世。唁电说：“对于卡尔逊将军的早逝深为哀悼，这是世界民主事业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将继续跟世界法西斯和人类进步的敌人作战。我们将继续奋斗，俾使卡将军所献身的，和几百万人曾为之而牺牲的世界人民胜利，得以达成”^②。

9月16日 在上海发表《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进行辟谣。指出：“此种传闻完全不确。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蒋）政府的意图。此外，我想这种消息是从广州发出来的，而我在广州既不是‘代表’，也不是正式居民”^③。

10月1日 为筹募艺术界医药救济基金，亲自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办的中秋游园会，并捐赠孙中山的遗物在游园会义卖。郭沫若、茅盾、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洪深、熊佛西、许广平、梅兰芳、周信芳、黄桂秋、俞振飞等，所捐赠的物品也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这份呼吁信，原件没有注明具体时间，此处系据底本所定的时间。

② 《孙夫人电唁卡尔逊，相信人民终必胜利》，香港《华商报》，1947年6月7日。据晋察冀豫《人民日报》，1947年8月15日报导：卡尔逊将军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因钦慕八路军，曾于1938年至1939年两度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考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况。美国对日宣战后，卡尔逊于领导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在太平洋作战时，即根据八路军的经验，征集坚决抗日不畏艰险和富有民主精神的美国青年，组织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在海上进行游击战争，并于梅金岛登陆战中负伤。日本投降后，卡尔逊在美发起组织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领导援助中国民主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倒行逆施，不遗余力，不幸于1947年5月27日因心脏病在美国西部波特兰城逝世。

③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9月20日；《宋庆龄选集》，第182页。

在游园会义卖。著名电影演员、越剧演员、平剧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秦怡、黄宗英、周璇、上官云珠、石挥、张伐、袁雪芬、言慧珠等，亲任游园会的服务员，参加义卖或登台演出。义卖共得款法币一亿五千三百万元。^①

11月 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在香港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争取其领导，何香凝、李济深等是月写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书中说：“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②。

是年 在其领导和关怀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向中外文艺联络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学术工作者协会及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等组织，捐赠大量的款项、粮食、药品、衣物等，以救济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贫病作家、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及新闻工作者等。同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又举办两个儿童福利站。

（连同在1946年设立的一个儿童福利站，共设立三个儿童福利站）。在儿童福利站下面，设立一些保健、救济机构，并为无钱上学的儿童开办几百个识字班。在福利站的组织下，在识字班学习的儿童到各里弄当小先生，教更多的儿童识字。曾多次亲自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看望孩子们，到识字班指导孩子们读书。

① 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1日；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日。

② 《上孙夫人书》，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五十五岁

1月1日 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等人为主，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该组织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布：“谨于中华民国37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前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①。

1月12日 发表《给海外朋友的信》，回顾中国福利基金会十二个月来的工作。指出：为筹募经费，曾举行两次儿童福利舞会，筹得美金二千二百元。1946年冬，“在新加坡路余凯路创立的一间小小的阅览室，现在已经发展到三个大的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儿童福利站和一个儿童剧团。”“自创办以来，这些站一直极受欢迎，目前已约有五千名儿童来到这里得到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到的益处。通过儿童剧团，贫苦儿童得到健康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娱乐。”“已演出了两个儿童剧，为上海的一万五千名热心的小观众免费演出。”同时，上海不少可靠的慈善机构，“也在这一年中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得到捐款和物资。这包括十所文化教育机构及十三所贫苦儿童义务学校。”其次，中国福利基金会还援助其他省的孤儿院，如1947年福利基金会曾“捐款给湖南省的四所孤儿院，使它们继续能让孤儿得以生存下去和受到教养。”再者，“在去年一年中，中国福利会继续把捐款和物资赠送给华北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和它们的四十所分院、白求恩医学院、药厂、孤儿院和实验农场。”还有，“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在别的方面

^① 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5日。

不断努力。为了使中国的文化生活，在这困苦岁月中，不致凋谢，我们继续帮助她的贫困的艺术家和作家。”提出该基金会一九四八年的工作目标，是使这一年“将成为更深入地为减轻中国的无知和贫穷而工作的一年”^①。

1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指出青年的责任是：第一，“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这是很艰苦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们跑得太快，他们会纠正你们的步伐的。如果你们和他们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估计他们的速度。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成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个步趋。”号召：“青年必须用行动来反对那些不顾上次战争中的牺牲而压制以流血争得来的自由的人们；反对那些借制止侵略之名而实际上却违反人民的意志支持反动势力的人们；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惜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保持自己的权力的人们”^②。

3月发表《给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信中除对海外朋友的援助表示感谢及呼吁请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外，指出：“要使人民胜利，那就必须参加我们的斗争，这一点必须搞清楚。你们对人民的关心，必须继续下去，你们为人民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并且已经取得了成效，你们这些捐献应该继续下去。”重申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指导方针是：“拥护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够自助这个主张。”“就救济工作的意义来说，就是我们要创办和维持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计划。”同时，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准则，即‘一视同仁的帮助’。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恶果，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援助。因此我们按照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84—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宋庆龄选集》，第183—184页。

这样的宗旨去做，即那里需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在自力解决困难，我们的援助就到那里。”并说：“我们的工作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人民，不论他们为了什么原因，居住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历史”^①。

6月3日 为筹募儿童防痨基金，前往上海华懋公寓主持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办的义卖。很多外国朋友应邀参加。义卖品大部分是各界热心人士所捐助。^②

夏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加紧镇压，使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的儿童剧团不能在正式的剧场公开演出，于是剧团改变斗争方式，编排一些歌舞节目，直接送到各个学校去演出；同时又把民间流行的街头木偶戏加以改造，扩大戏台，配以现代化的布景灯光，除表演歌舞外，更增加了一些富有战斗性的戏剧节目。当知道这些新的改变时，曾亲自前往儿童剧团观看新节目的彩排，并亲写热情洋溢的信对剧团的新试验、新成就表示祝贺，指出这个形式很符合孩子的兴趣，更能通过他们喜爱的形象对他们进行教育。^③

是年 发表《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给朋友的信》。指出：“本会的儿童工作，在1946年10月就已经开始。从那时以后，我们的三所儿童福利站就成为它们附近居民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不管他们遭遇个人的疾病或火灾的祸害，想读书或做一个舞台演员，无论他有怎样的要求，他们知道他们都会从福利站方面得到同情合作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这样，你们可以知道，我们做工作是如何的艰巨，而对于款项和物品的需要是怎样的在不断地增加。”因此，呼吁：“大家都能同情和支持这个工作，并给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88—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上海《大公报》，1948年6月4日。

③ 参见张石流：《永不磨灭的光辉——悼念敬爱的宋庆龄同志》，载《文汇报》，1981年6月4日。

予一切可能的援助”^①。

△ 继续通过种种渠道募集大量医药器械，药品和物资，源源不断地秘密运送到解放区，支援人民解放军。曾多次亲自到仓库，检查待运到解放区的药品、医药器材的包装，叮咛工作人员要包好扎牢，不要中途损耗。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继续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中贫困的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并号召和发动一些著名演员义演，救济国民党统治区中的贫苦儿童。例如：“1948年，中国京剧界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以义演来响应宋庆龄的号召。义演的捐款，使饥荒最严重的湖南省一千二百个孤儿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和生存的机会。这些孩子本来被收容在国民党办的四个孤儿院里。后来国民党拒绝再维持这些孤儿院、院内的孩子们面临着被抛弃在街头的危险。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这项援助，才使这些孤儿院能够继续工作”^②。

1949年（己丑） 五十六岁

1月10日 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批驳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谣传。声明说：“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③。

1月19日 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5—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② 同①，第86—87页。

③ 《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的声明》，《字林西报》，1949年1月11日。
《永远和党在一起》改标题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声明》，见该书第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

其致电。电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①。

1月21日 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是日，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后，即给其致函，说：蒋介石“凌然引退”，“不得不出而勉维现局”，希望其能到南京“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②但毫不为所动，仍留在上海，积极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春 由于上海即将解放，处境危急。在国民党反动派筹划劫持其离上海的罪恶阴谋威胁下，不能定居在一个住所，经常秘密地变换住地。同时，为使福利基金会所属机构及工作人员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殚精竭虑筹划将其转移到安全地点，并为迎接解放积极作准备。

5月28日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于27日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强有力的配合和接应下，解放上海事。在上海寓所接待史良。欢快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

① 《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电》，《人民日报》，1983年3月2日。这份电报是附在中央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并要他们设法转送给宋庆龄的。中央指示电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这些话是周恩来审改时加写的。两份电报均由周恩来修改审定。此中情况，亦见同日《人民日报》。

② 《李宗仁致宋庆龄函》，影印原件，藏宋庆龄故居。

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①

6月19日 毛泽东给其致函。信中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蒞平，以便就近请教”^②。

6月21日 周恩来给其致函。信中说：“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上命驾，实为至幸”。^③

6月30日 和陈毅、邓颖超、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茅以升等，出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祝词说：“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的力量和他们合在一起，加强这勇敢的战斗。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的力量增强了。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

① 史良：《人民的事业必胜——沉痛悼念尊敬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

② 《致宋庆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③ 《人民日报》，1983年3月2日。此函及上述毛泽东致宋函，均为他们的亲笔信。是邓颖超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为邀请宋庆龄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专程去上海递交的。

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①

7月7日 和陈毅、邓颖超、黄炎培、陈叔通、许广平等，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曾经准备了牺牲，这便形成了一个警告。必须承认，这一警告的重大意义正逐渐地加强，因为中国人民在今天已经处在一种更其不可征服的地位。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又指出：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在亚洲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势力正在崩溃中”；中国人民正充满信心地“瞻望我们国家的一个光荣的未来”。因此，严正警告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如果他们胆敢妄图阻挡巨大的民主浪潮，制造战争烟幕，威胁和平民主，就“将同归于尽”^②。

7月16日 在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大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和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共八十一人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③

7月24日 参加上海市邹韬奋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并致词。赞扬“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指出：“在我和韬奋先生几年工作接触的中间，他所发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特点，一直受到大家的敬仰。他完全舍己为公，凡是人民革命的利益所在，总是竭尽全力以赴；对于任何反

① 《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宋庆龄选集》，第185页。

② 《人民日报》，1949年7月9、10日；《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87—188页。

③ 《人民日报》，1949年7月17日。

人民、反民主的恶势力，他绝不肯作丝毫的片刻的妥协。”强调：

“韬奋先生的一枝笔，曾经鼓动了中国无数万爱国民众走上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道路，在反动势力不断的迫害下，他不幸牺牲了生命，然而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千百万爱国人民踏着韬奋先生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正在完成他遗下的任务”^①。

8月26日 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乘火车离开上海赴北平。^②

8月28日 抵北平。在火车站，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五十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洛杉矶儿童保育院的儿童所献的鲜花。^③

9月1日 和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张澜、何香凝、郭沫若、林伯渠等，出席在北平市艺术专科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冯玉祥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④

9月6日 和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担任该会主任委员，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二十四年前，孙中山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

① 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7月25日；《在上海市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词》，《宋庆龄选集》第189页。

② 《人民日报》，1949年8月29日。

③ 同②。

④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冯玉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1933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采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与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1948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

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又说：

“中苏友谊以广大人民为基础：中苏两国人民亲密地携手合作，深切了解彼此间的共同目标”。“中苏合作是和平与民主胜利的有力保证。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必须加强和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以粉碎世界新战争制造者的阴谋”^①。

9月21日 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是日至30日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通过了国旗、国歌及国都所在地的决议。会议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是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

^① 《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加强和巩固中苏友谊，粉碎战争贩子的阴谋——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93—194页。

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上海的解放，使“这个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上海市军管会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而在国际阵线上，“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反动势力如果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唯一结果，就是他们本身的灭亡。”并指出：“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这种人民力量的结合，已经改变了历史的均衡。这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世界亿万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们将献身于努力以阻止文明的毁灭，用每一份力量，保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应有的享受”^①。

△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八十九人，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②

9月27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和周恩来等共同担任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③

9月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和毛泽东以及其他副主席，共同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④

10月1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其他副主席、委员一起宣布就职。

①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②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23日。

③ 同②，1949年9月28日。

④ 同②，1949年10月1日。

下午三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检阅海陆空军和群众游行队伍。北京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旋朱德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①。当礼炮齐鸣，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激动得热泪盈眶。^②

△ 和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前往车站欢迎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该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③。

10月2日 是日为“国际和平斗争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和朱德、陈毅、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④

10月5日 同朱德、刘少奇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担任执行主席。在开幕词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指出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使我们确立了依靠工农群众的正确方向。“现在有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全人类的解放的希望就更

①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② 参见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同①，1949年10月2日。

④ 同①，1949年10月3日。

加接近实现了。”^①旋被选为该会总会第一副会长（刘少奇为会长）^②。

10月10日 自北京乘专车返上海，是日晨抵沪。饶漱石、曾山、潘汉年等到车站迎接。

10月18日 晚六时，在上海寓所举行鸡尾酒会，欢宴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西蒙诺夫等十人和苏联前留沪外交工作人员。饶漱石、曾山、潘汉年等出席作陪。

△ 晚八时，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沪部队代表在假逸园广场举行的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晚会。

10月19日 晚六时三刻，到火车站欢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10月22日 上海妇女代表大会开幕，莅会指导。

11月5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致电斯大林。向他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表示：“和孙中山一样，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希望的诞生。”满怀喜悦地说：“孙中山所梦寐以求的中苏两大民族的紧密合作，现在成为事实了”^③。

11月7日 应苏联驻沪总领事符拉基米洛夫邀请，出席宴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

11月9日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讲话，指出在华北富饶的土地上，看到解放了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劳动积极性，正在克服困难和障碍，积极同水灾作斗争，抢修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铁路、公路

① 《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宋庆龄选集》第197—19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原拟由宋庆龄担任会长，后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复杂，为减轻宋之困难，改由刘少奇任会长。宋对此安排，深能谅解。参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向斯大林致敬电》，《宋庆龄选集》第199页。

和桥梁。深信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劳动工作中，决不会比苏联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落后。从中看到“中国迅速复兴的希望”，并“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①。

11月10日 复电约翰·金斯贝莱^②，辞谢其邀请赴美参加保卫和平大会年会事。谓：“因为紧迫的事务待理，加以健康关系，使我无法应命，非常抱歉。祝大会成功。请转告美国人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将和他们携手同进，争取和平、谅解与友谊，为反对毁灭文明的战争和破坏而斗争。我们必须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而加倍努力”^③。

11月12日 是日为孙中山八十三周年诞辰。陈毅、潘汉年在梅达君陪同下，至上海寓所问候。

12月11日 致函祝贺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指出，由于亚洲国家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妇女“备受压迫和蹂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妇女得到了解放，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指出：亚洲妇女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除了要实现国家独立与自由这两项亚洲人民的基本要求外，要为妇女和儿童的解放而斗争。号召：全亚洲的妇女团结起来，全世界的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为确保妇女与儿童享有应有的权利而斗争！^④

12月16日 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来电，感谢对会议的关怀和

① 《宋庆龄选集》第200—203页。

② 约翰·金斯贝莱，美国人，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来电邀请宋庆龄赴美参加12月5日在纽约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的年会。电称：“我们将动员全国人民，要求禁用原子弹，停止冷战，呼吁为和平与安全所必须的国际合作。你如能以新中国人民的名义莅会演讲，对这个被公认为在我国国内和国际都有更大影响的盛举，必将增加无限的力量。请你考虑我们友好而迫切的邀请，美国人民将竭诚欢迎你的来临，我们为你的旅行准备一切。”见《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

③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

④ 《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支持。^①

12月21日 作《庆贺斯大林大元帅七十寿辰》一文，指出：“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是人民的导师，也是人民的学生。”必须认真研究、学习“他的生平”，这是“宝贵的课程”^②。

12月22日 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瓦扬·古久里夫人为首的亚洲妇代会参观团七十四人，与朝鲜文工团六十人到达上海参观，和华东及上海有关人士赴车站迎接，并致欢迎词。称她们是“为着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而斗争的代表”。兴奋地向其介绍正在转变中的上海说：这个都市曾经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堡垒。现在你们可以看出她已经完整地属于我们人民所有了。”并指出：“我们都将看出人民的力量是万分巨大的，任何势力不能阻挠我们从事和平建设”^③。

12月23日 晚，应邀出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酒会，欢迎参加亚洲妇代会的苏联、朝鲜、法国等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团及来宾。

1950年（庚寅） 五十七岁

1月1日 为庆祝元旦题词曰：“我们已实现了新民主主义，使今年的新岁愈加显得喜气洋溢。但仍应拿刻苦耐劳的新精神，从事于新中国的建设”^④。

1月16日 作《苏美外交政策的区别》一文，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如“白昼与黑夜那样地不同”。列举大量事实谴责美国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

① 《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7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222—223页。

③ 《解放日报》，1949年12月22日。

④ 影印原件，《解放日报》，1950年1月1日。

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他们在“践踏着人民的生机”。美国金融集团“无论在他们本国和国外，都是人类进步途中的一个障碍物、绊脚石”。而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友好”、“互助”、“互不侵犯”、“公平而忠实的政策”。它对“在奋斗中的年轻的国家伸出一双协助的手，直到他为能够自己航行前进。”表明：“中国将继续采用一面倒的政策，和一切热忱地努力于忠诚合作的人们‘一起工作’”，“来建设一个新社会，来保卫世界和平”^①。

2月22日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事，带病接见《解放日报》记者，指出过去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则是“平等、互利的条约”。它“不仅可以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拨阴谋，而且是持久和平的有力保证”^②。

3月 为中国福利会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创刊号题词，全文是：“过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许多小朋友得不到温暖的保护，充分的营养和文化教育，他们在悲惨的黑暗的环境中流浪与挣扎。现在，全国大陆基本上已获得解放，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一个人身上，民主的新鲜空气，充满在每个角落，使小朋友们自由的〔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③。

4月1日 因公带病离沪赴京，罗淑章等同行。陈毅、潘汉年等到车站送行。途经南京时，专赴中山陵晋谒。深切怀念孙中山，至为悲伤。^④

4月3日 晨七时，抵北京。张澜、林伯渠、周恩来、郭沫

① 《为新中国奋斗》，第189—197页。

② 《人民日报》，1950年2月24日。

③ 影印原件，《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插图。

④ 罗淑章：《痛悼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42页。

若、黄炎培、邓颖超等，到车站迎接。^①

4月12日 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发表谈话，指出：这是新中国建设的“最有力的保证，它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超过了原子弹的力量”。说“‘七·七事变’前，苏联曾经建议和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中国反动派拒绝了这善意的建议”^②。

4月25日 在中国救济代表会议开幕式上，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总结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指出：福利基金会是一个“人民的团体”。它“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并且一向设法使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在回顾了组织1938年6月在香港创立，1941年12月迁到重庆，1945年11月移到上海的历史后说：它在解放战争时期，“致力于遭受战争创伤的恢复与建设工作”。第一个任务是“对解放区的工作”。如边区和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和医学院工作，托儿所和孤儿院的工作，实验农场与制药厂的工作。第二个任务是“对上海穷苦儿童，开展服务工作。”如成立儿童工作组与儿童剧团工作，工厂区与贫民区的扫盲工作，医药保健及公共卫生教育工作等。而在全中国解放后，福利基金会全部工作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由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灾区救济工作的造谣攻击，福利基金会还继续致力于“国际宣传工作”。要使“外国人士晓得中国人民怎样在自力更生的决心中，向建设新中国的大道迈进。一个强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消息带到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去”^③。

4月29日 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闭幕式上致闭幕词，宣

① 《解放日报》，1950年4月4日。

②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话》，《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③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8—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把这次会议精神和决议传达给一切救济福利工作者和全体人民，使他们了解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是以自救自助为基础的，而且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一定能够战胜灾难。”第二，“全体救济福利工作者，经过这次会议，在救济总会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批判旧的，学习新的。”第三，“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自己的力量，通过生产节约、劳动互助，坚决以自力更生精神来克服目前暂时的灾难”^①。

△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正式成立，被推选为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②

5月5日 出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召开的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③

5月8日 为莫斯科《少年先锋报》作《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指出：“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翻动了地下的每一颗细小的沙粒。这可以使你们了解到我们人民曾受到多么沉重的压迫。这说明了我国人民是怎样一致奋起为反抗压迫而斗争，说明了中国儿童也参加了这个斗争，并且对于推翻封建和帝国主义取得胜利有过贡献。”我国儿童“所创立的革命事迹、有许多情形与英勇的苏联少年过去的事迹相似。……我们也有我们的‘帖木耳’和‘青年近卫军’。”“中国儿童热烈地负起了革命的任务，他们很成熟地带着坚定的信念而行动，而且今天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已有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宗旨是：教育儿童“认识群众力量的价值和作用，并以这个力量做基础，把革命真理传播到整个人群中去。”“在上海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特务的眼下，不顾随时有被捕甚至被害的危险，就向群众宣传社

① 《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的闭幕词》，《宋庆龄选集》第224—226页。

② 《解放日报》，1950年5月1日。

③ 《人民日报》，1950年5月6日。

会的病根何在。”在农村和人民解放军中，“还有许多儿童穿过敌人封锁线往来传递重要情报”，一旦被捕，象“刘胡兰那样英勇”。并指出：“少年人是异常重要的，因为将来是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正为了将来而天天在准备自己”^①。

5月12日 晨，离京回到上海。饶漱石、陈毅、潘汉年等赴车站迎接。

5月24日 发表题为《痛斥‘美国之音’谎言》的谈话。针对“美国之音”在广播中曾制造谎言攻击中国的救济政策，污蔑其曾致电中国福利会呼吁（一个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团体）要求运送粮食物资来华事，明确指出：“我敢断言这乃是……可耻的谎言。”“我从来就没有打电报给中国福利会呼吁要粮食”。“中华人民共和国常是准备接受善意的外国援助的，但我们却不需要接受任何蓄有帝国主义意图的东西。”严正声明：“我们对于任何用以破坏或间接地打击人民政府的所谓‘帮助’，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予以拒绝。”我国“完全能够克服任何灾荒”。并指出：“那些把时间浪费在忧虑中国人民的福利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最好还是在他们本国的福利问题上多花费些时间吧。……今天他们国内一千六百万以上人民的生活问题，他们或是部分失业，或是完全失业。中国人民还愿意建议这些虚伪的慈善家们少在伦敦会议上花费时间叫嚣战争，而把这所有浪费的精力转用来挽救他们工业指数已降低百分二十以上的现象。这一工业指数之低将极严重地影响美国人民的福利”^②。

5月26日 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作《新上海的诞生》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有无比的力量，磅礴的生命力和卓越的天才，……正在迅速扫除目前所有的一切障碍。我们不久将使我们

① 《宋庆龄选集》，第227—230页。

② 同①，第231—232页。

的都市和国家臻于史无前例的富强康乐。”“上海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地方。它是代表我们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作决斗的地方。”如今它“不但已属于中国，并且也是人民的了。”对未来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好象一个健康的婴孩，克服了一切疾病，日渐长大，将来欣欣向荣，有无限的前途。在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已进入新的时代，在地平线上已呈露出社会主义的曙光和一幅崭新而美丽的新中国的远景”^①。

5月27日晚，出席上海各界在市府大礼堂举行的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盛大集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有二千多代表参加大会。

6月1日为庆祝国际儿童节，给《人民日报》题词曰：“今天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我们要使他们得到温暖的保育，俾养成健全的体格，成为革命的生力军，肩负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②。

△给《解放日报》题词曰：“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③。

6月8日为苏联《真理报》作《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正在签名拥护世界和平。刚从文盲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四川农民，中止劳作而骄傲地把他们的名字签写在和平呼吁书上。上海和东北工厂的工人们，在下工时，集体写下他们对世界和平的热烈愿望。商业界、艺术家和作家，青年和学生——全都渴望加上他们的力量。在每一个村庄，在每一个城市，数千百万的人们，都通过和平宣言发出呼声，要求保卫和平、珍视和平。”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决心全力支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使它能尽速完成解放战争，把帝国主义永远赶出中国，

① 《宋庆龄选集》第233—236页。

② 原件影印，《人民日报》，1950年6月1日。

③ 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0年6月1日。

并消灭封建势力的最后残余。……人民才能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国家的重建。”我们“毫不动摇地反对所谓‘欧洲复兴计划’和‘大西洋公约’，以及它们在世界其他区域的产物。”明确指出：“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今天为世界和平运动所动员的力量。在和平呼吁书上的大量签名表示了我们斗争的决心是多么普遍。”中国人民“饱尝了持续近百年的战争。我们早就渴望和平。我们要求和平。中国人民要为自己生产更多的粮食，同时也要为世界的幸福而出力”^①。

6月15日 为上海市妇幼卫生展览题词曰：“要有强健的民族，先从母性及儿童福利着手”^②。

6月28日 为抗议美国囚禁进步领袖，致电在纽约举行集会的美国民权保障大会主席威廉·巴特生，指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千百万和平战士，对于美国反动派囚禁美国进步领袖，摧残人权，并推行战争政策，表示抗议”^③。

8月1日 出席上海各界在市中心跑马厅广场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大示威集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有军民各界二十万人参加集会。^④

8月12日 为上海首届妇代会揭幕题词曰：“树立以劳动为光荣的观念，参加生产建设，彻底解除封建束缚，才能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⑤。

9月30日晚，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董必武等一起，出席毛泽东举行的欢庆国庆节的宴会。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作《新中国

① 《宋庆龄选集》，第237—240页。

② 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0年6月15日。

③ 《抗议美国反动派摧残人权鼓动战争，致电美民权保障大会》，《人民日报》，1950年7月1日。

④ 《解放日报》，1950年8月2日。

⑤ 原件影印，《为上海首届妇代会题词》。《解放日报》，1950年8月12日。

的第一年》一文。指出：“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个快乐的日子。它标志着解放了的人民，新生了的中国的开始。”从此，“我们跨过了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时代。”1950年10月1日是“除旧布新的日子”，“和平的日子”，“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全副力量都投入了世界和平的事业。我们在战争贩子面前摇动我们的巨大的拳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建设！不要破坏！我们要真诚的国际合作，不要帝国主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发布的号令。”并指出：“我们把新中国的第一年不可磨灭地写进了历史”^①。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节，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兵种部队和首都四十万人民的游行队伍。

10月5日 给《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专刊》题词曰：“苏联是领导全世界走向光明坦途的先进国家。”我们要向它学习“建设的经验”，并且“要从它寻求保卫和平的真理。应以真挚的友谊和它紧密地团结”^②。

△ 晚，在北京出席纪念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盛大集会，并发表题为《友谊就是团结》的讲话。指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希望。”解放了的中华民族是“富有活力的民族，能够移山倒海，建立工厂，控制自然。”“苏联和人民的两个地大人众的大国家。他们携手前进，他们的力量一经结合，就能粉碎无论在哪里束缚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的黑暗势力的锁链”，就会使反动派“为之震惧”。中苏两国人民“携手前进，高举着和平的旗帜，缔造着未来的世界”^③。

① 《宋庆龄选集》，第241页。

② 原件影印，《人民日报》，1950年10月5日。

③ 同①，第242—243页。

10月6日 上午，出席上海救济代表会议开幕式，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致开幕词中指出：上海市救济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上海救济福利工作者孤军苦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动派对救济事业摧残阻挠和操纵利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假救济之名，行侵略之实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从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救济福利事业开始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上海的救济福利工作者将团结一致，在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领导下，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参加新上海的建设工作。”勉励大会代表“把人民政府救济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跟上海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并指出：“摆在我们的面前的任务是很重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许多老弱、残废者、游民、难童和失业者等等，迫切需要救济，收容以致改造、教育”^①。

10月11日 作《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一文。指出：“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那就是列宁所说的：掌握了政权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和辉煌成就，“证明了这一真理”。因为“战争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枪炮本身，而是取决于使用枪炮的人。”朝鲜人民“为着崇高目的而战斗。”“他们下定决心，坚决作战。”而美国“强迫人民进入战争，”“直接违反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当美国士兵“看到美国政策是不正义的以后，便向他们的同胞们广播，要求停止战争，让朝鲜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可见，“人民革命的纯洁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卑污——足以说明群众为什么能在战场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坚持斗争、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如此，越南与朝鲜也是如此。”同时，指出：“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① 《在上海救济代表会上致开幕词》，《解放日报》，1950年10月7日。

这一事实“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①。

10月28日 电中共中央吊唁任弼时逝世，电称：“任弼时同志献身革命，为中国与世界被压迫人民工作甚久，竟以积劳成疾，未及亲睹新中国的建设，与世长辞，实为莫大损失”^②。

是月 同林伯渠一起，由朱明、廖梦醒、沈粹缜、罗淑章等陪同，赴东北三省考察。访问了工厂、农村、部队，看到祖国建设事业在开国后很快得到恢复，边防得到巩固，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视察中，忘我地工作。早上很早起床，看材料，为视察作准备。每到一处，认真听汇报，提问题，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晚上，阅读文件。一天，冒着满天大雪，赴秦皇岛港（这里即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北方大港。）视察，还在船舷上眺望。这一趟辛苦的旅行，深刻地表达了她同孙中山的真挚深厚的情谊。^③

11月1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三周年，为《人民中国》俄文版创刊号作《三十三年进步》一文。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三周年，象征了“苏维埃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不断进步。”这“对于劳动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而对资产阶级的谬论则“施以致命的打击”。它把没有资本家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就不可能有任何生产的观念“扫除干净”。“苏联的工人证明：没有了那些从事剥削的老板，或从事战争的卡特尔企业家和垄断资本家，人民就能够创造奇迹。”“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梦想”的思想也变为“历史的陈迹”。“人民掌握政权的苏维埃国家矗立在我们眼前，社会主义正在生气勃勃，发扬光大。”证明“社会

① 《宋庆龄选集》，第244—249页。

②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0日。

③ 《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参见罗淑章：《痛悼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及沈粹缜：《我的追忆》，载《宋庆龄纪念集》。

主义绝不是梦想”，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苏联的经验还证明：国家工业化“非依仗人民自己的力量不可”。总之，

“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建基于荒诞无稽的上面，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植根于科学之中。”“资本主义导向战争，而社会主义则为和平而工作”^①。

11月18日 为中国福利会作题为《新中国的信息》的录音讲话。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救济和福利工作的整个观念，已经随着它的环境而改变了。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纯粹人道主义的永远结束不了的事情。相反地，它被认为是人民政府整个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仍旧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它的办法是积极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对救济的需要。福利的享受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讲话中，用大量事实说明新中国的人民是怎样战胜国民党破坏所造成的水灾、饥荒、失业，以及如何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并指出，“不论是执行救济工作，或是完成福利计划，在它的性质、方向和基础上，都是群众性的。”同时，指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原则是：“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解放了自己。他们将要同样的力量，从各种各样的痛苦灾难中解放自己。”“二，帮助人民自助，……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三，与一切从事真正救济及福利工作之个人及团体合作”。“四，欢迎而不拒绝善意的国际援助，并准备在任何可能的地点和时间，帮助国际友人。”强调“我们是一个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意。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最后指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越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阵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这是中国人民要告诉美国人民的信息”^②。

① 《宋庆龄选集》，第250—254页。

②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28—142页。

11月22日 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被推选为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①

11月23日 在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华沙召开的首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②

11月25日 复电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总会，告知因职务关系未能应邀出席大会。^③

△ 致电居里，祝贺第二届和平大会成功。电称：“二届和大集八十个国家的人民代表一千七百五十人于一堂，通过了告世界人民的宣言胜利闭幕，我以无限的热情向大会和您致以最热烈的敬礼”^④。

12月18日 致函日本劳农救济会，声援“松川事件”^⑤被捕工人。指出：“日本人民不能容忍反动政府蛮横残暴地对待无辜的工人，发起了要求释放‘松川事件’中被捕工人的运动，我们深表同情。我们对日本反动统治者屡次迫害工人，坚决抗议。……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反对反动统治者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的迫害，拥护你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松川事件’被捕工人的运动”^⑥。

12月31日 发表声明，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2月28日发布的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指出：“它是在经济上进一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正确的措施”。因为“美国在华财产的一部分是属于救济福利事业范围之内”，“被美帝国主义直接间接所利用而为其起了掩盖侵略、勾结特务、麻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致电居里祝贺和平大会成功》，《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⑤ “松川事件”，是美国政府和日本吉田内阁有计划策划的陷害日本共产党和打击日本工人的一个重要阴谋。于1950年12月6日，经由福岛地方裁判所，判处了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福岛分会委员长铃木信等五人无期徒刑，另有十人被判三年、十五年徒刑不等。

⑥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1日。《宋庆龄选集》第266页。

痹我国人民的斗志，收买人心的作用。”号召：“中国一切救济福利界人士都以实际行动来热烈支持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命令。认清美帝羊皮外衣豺狼内心的本质，积极参加控诉美帝侵略与侮辱的群众运动，清算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残余。”还“应在被救济的人群中宣传解释这一命令，更高地激发抗美援朝情绪，发扬爱国主义的热忱。同时也应阐明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而开展国际主义教育”^①。

是年 对于中共中央于五十年代决定专门送阅的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完全按照党的《保密守则》亲自拆封和保管。除照通知参加重要会议外，对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的当面通知，或征求意见的重大事情；以及由齐燕铭、徐冰、童小鹏请示办理的问题等，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处理。对党的决定，无条件地执行。^②

1951 年（辛卯） 五十八岁

2月19日 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名义，致函日本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及“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反对美帝国主义加紧片面对日缔结和约和加速进行武装日本的阴谋活动。指出：“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活动的基本目的，是在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使之充当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新侵略工具。这是完全违背了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公告与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表示“决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复活日本的反动势力，继续危害中国人民。”同时，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两国人民都是酷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因此，日本人民是中国人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1日；《宋庆龄选集》第167—168页。

② 参见童小鹏：《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纪念集》第149页。

民的朋友，但是压迫日本人民与出卖日本民族利益的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乃是我们的死对头，和我们的死对头相勾结的美帝国主义乃是我們双料的死对头。”并号召中、日两国人民“紧密地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①。

3月8日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给《解放日报》题词曰：“团结起来，以整个的妇女力量，对内提早完成土改，加紧生产建设。对外摧毁帝国主义阴谋，巩固世界和平阵营”^②。

3月30日 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但尼斯，祝贺出狱。电曰：“谨以十分欢慰的心情向你致贺。为了保卫和平及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屠杀人类的灾难，你曾贡献出一切力量。我代表中国全体救济福利界对你致崇高的敬礼。”^③ 旋收到尤金·但尼斯4月9日的复电，表示欣悦地接到贺电，并称：“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辉煌贡献，曾照耀着我被监禁的黑暗日子”^④。

4月6日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决定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此项奖金，是据1949年12月20日斯大林七十寿辰时颁发的命令设立的。），授予在维护与巩固国际和平斗争中有卓越贡献的世界各国民民主力量的代表宋庆龄等七人。^⑤

4月7日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斯

① 《致日本和平朋友们函》，《人民日报》，1951年2月21日。《宋庆龄选集》第269—270页。

② 影印原件，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③ 《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

④ 《解放日报》，1951年4月25日。

⑤ 同③，1951年4月9日。关于授予宋庆龄的决定全文，见《解放日报》，1951年9月20日，同宋庆龄一起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的，有法国的著名物理学家，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英国的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朝鲜的保卫人民自由和远东和平而斗争的朴正爱，美国的优秀的和平战士墨尔登及墨西哥的将军维拉。

科贝尔琴，在《真理报》撰文介绍1950年奖金获得者。指出：“宋庆龄贡献出她的力量，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摆脱国民党政权的统治而斗争，她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反对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主张维护远东与世界的和平”^①。

4月10日 为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发表谈话说：“我被列名为斯大林和平奖金获奖人之一，感觉无限的荣幸。能够和保卫和平的斗争，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是一个特殊的光荣。因为和平是全世界人民所最需要的，而斯大林的名字是最能代表和平的。”又说：“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最高的荣誉的。中国人民经过了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已经把我们全国的力量放在保卫和平的一边。”指出：“全世界人民的统一战线，今天正以最有力的步调展开保卫和平的斗争。”谴责美国的好战分子“借口为和平而进行侵略，……残酷地毁坏一切和平的建设，把勇敢的朝鲜人民的建设成就变为灰烬。……他们要奴役全人类，以供他们的掠夺剥削，做他们的奴隶和炮灰。”最后指出：“让我们趁着斯大林和平奖金颁发的机会，再一次重申我们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决心。让我们集合起新的力量，更加鼓舞起来战胜人类的敌人，创造人类应该获得和平地工作与愉快地生活的无比光明的前途”^②。

4月11—16日 先后收到周恩来、李济深、张澜、蔡畅、赵朴初等，和全国妇联、中苏友协及苏联人民、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国际民主妇联、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等国内外各界人士及群众团体的贺电、贺函，一致认为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标志其生平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卓越贡献^③。

4月19日 复函方王颖，表示：“蒙厚意祝贺，谨致深切的

① 引自《解放日报》，1951年4月10日。

② 《为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而发表的谈话》，载《宋庆龄选集》，第271—272页。《选集》把时间署为四月十一日，误。

③ 参见《解放日报》，1951年4月12、13、14、16日；《人民日报》，1951年4月23日。

感谢。”指出：“加强国际和平的任务，本来是世界广大人民所应共同努力的。尤其是在美帝国主义煽动战争阴谋的时候，我们更应积极号召世界和平人民团结起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①。

△ 复函周而复，答复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点要求，指出：“关于向朝鲜广播一事，暂时不能办理，须待稍缓时日。因为我最近曾写信给周总理对于朝鲜美国战俘有一个建议，最好先等他有了回信然后发表谈话。”关于斯大林和平奖金事，表示：“希望即利用我最近在报纸发表的讲话。”最后说：“目前，爱伦堡同志向我征求一篇写作，准备于5月5日在布拉格发表。因时间局促，我正忙着赶写。候我稍有暇晷，即当利用这个良机，从事广播”^②。

5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及《人民中国》发表《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一文。写道：“旅行了整个东北，深入地接触到人民生活中所起的各种变化。”指出：东北境内农业产量“空前激涨”，因为“农民已是土地的主人”，“耕种方法改良了”，“农业劳动力组织得好”，“模范工作者、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做了榜样”，“公粮和开支以外的余款和余粮鼓舞了农民扩大生产”。土地改革给“农民改变整个政治环境和政治机构铺平了道路。群众的自由，代替了旧日所受的压迫。群众的权力，代替了集中在地主及他们狗腿子手中的暴力。”“除开过去的地主之外，各阶层都积极地参加了政府的管理。”“政治上进步的另一表现，是农村中妇女地位的提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她们现在都积极参加。”“农民在思想上已经获得解放，他们渴求知识与文化。”工厂正在进行“改革和改造”，从“日伪统治下的殖民地性质转变过来，使它首先支援解放战争，进而改善人民的生计，使城市协助农村经济的重建。”“工业的产量已逐渐恢复起来，走上了重建与

① 《复方王颖函》，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方王颖是烈士方声洞的夫人。

② 《复周而复信》，见周而复：《永远留在人民记忆之中》，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6页。

发展的道路。……不仅完成了对于人民解放军和农民的任务，并且为经济建设积累了资金，为大规模生产积聚了经验。”“工人住宅、医院、疗养院、托儿所、俱乐部和其他机构也增加了。”事实说明东北工业“正在茁壮之中，工人们已经以主人翁的姿态来管理工业了。”最后指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割据，国民党的腐败政权都已经完全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我们灵敏而富创造性的人民正被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公民，逐渐变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人。”“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①。

5月18日 寄词祝贺印度加尔各答印中友好协会和孟买印中友好协会成立，指出：“印中友好协会的成立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希望“在发展这个协会方面以及在促进印度和人民中国之间的文化、商业、知识及情感的交流方面获得一切的成功。”指出：“印中两国在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古代就树立了基础”。今天，“必须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②。

6月1日 给《儿童时代》半月刊题词曰：“儿童是新中国的花朵”^③。

△ 给《解放日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刊》题词曰：“保卫和平！保卫儿童！”^④

△ 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杂志《保卫和平》，作《论和平共处》一文。指出：和平共处是“全世界人民赖以迈向持久和平以及求

① 《为新中国奋斗》，第243—287页。

②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

③ 影印原件，《儿童时代》，1951年第26期。

④ 影印原件，《解放日报》，1951年6月1日。

得一切福利与文化需要的一项政策。……是各阶层人民一致行动以争取世界安宁的一个号召。”它是“从人民大众的实力与能力怀有无比信心，从坚定的信仰中产生的。”和平共处是“可以成功地实行的。不但全世界各国能够接壤相处，和平竞赛，而且能缔造一个伟大的合作的时代。”从而“反对战争，解决今天一切的争端以达到普遍的和谐与合作。”谴责美英统治集团中某些分子，“居心要做全人类的剥削者。……从战争中获利。”他们“是和平共处的敌人”。最后指出：“帝国主义日渐衰颓的花朵正在历史的藤枝上枯萎了，而另外有着充满青春的朝气，结合着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的花朵正在怒放。”号召：“争取和平的人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下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共处！”^①

6月10日 同苏联《红色权力报》记者谈话。谈及中国在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的重要性时指出：新中国“站在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和平力量一边。这是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有利于全人类的最重大的转变之一。”中国“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热爱祖国的情绪。……团结起来的中国一天天更强大起来，一天天加强了和平阵营。”谈到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在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的重要性时指出：它“表示在防止战争的斗争中伟大的苏联站在最前线。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军火厂老板们正在靠军事定货合同取得亿兆美元，这一事实与和平奖金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它“戳穿了战争贩子说他们目前重新武装是为了防备苏联那种谎言。……在世界众目昭彰之中，暴露了真正的侵略者”^②。

6月 为《为新中国奋斗》一书撰写序言（该书是接受陈毅等的建议而编印的）。序言指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和复杂的斗争”，并且“有它的独特性”。说，“本集所搜集的就

① 《人民日报》，1951年6月1日；《为新中国奋斗》第290—295页。

② 《与〈红色权力报〉记者的谈话》，《宋庆龄选集》，第277—278页。

是我在参加中国解放斗争中所讲所写的一部分”。1927年7月到1949年5月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其中有一部分是访问苏联时发表的：一方面对于苏联人民给予中国革命群众的鼓舞和帮助表示感激，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坚持斗争直到全部胜利为止的决心”。其余的部分主要是“在中国通过英文报纸和其他国内外可资利用的媒介写给英美人民的”。因为“我站在中国人民一方面，因此我向广大群众说话的一切途径都被封闭起来了。出版和广播都完全操纵在反动派的手里。他们不是压制我的言论就是歪曲和曲解我的意思。”“有些中文出版物有时也能利用，而在必要的时候或环境许可的时候，我也利用它们。”“外国刊物和通讯社刊登我的声明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它们完全同情中国革命，或者能够让我畅所欲言。……它们有时拒绝刊载我的文字，有时即使刊载了，也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或是为了要有‘耸动性’，或是为了‘捷足先登的消息’。”此外，“我可以表达自己的仅有的媒介（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中期）便是通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所办的英文刊物”。高兴地指出：“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形势完全改变了。凡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愿意和人民发出一致呼声的人，都可以采用最普及的工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其他各种语言来发表意见。”现在，“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正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他们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先锋队。”表示：“以此书献给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和平建设的人民英雄”^①。

7月1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鼓舞力量》的谈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上升到空前崇高的地位”，并“从各阶层群众里获得了无比的尊敬，它激发了我们对祖国，对人民从来没有过

^① 《宋庆龄选集》，第274—276页。

的热爱。”它“唤起我们大家的责任感”。因为它是“工农大众的一部分，它彻底了解他们，而它的一切行动，也都是为了他们。”所以，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拥护”。还因为“它的统一战线政策，……巩固了所有国内民主力量，以及国际上的对中国友好的力量。这个政策是我们对人民的敌人给以无情的打击，和取得了一切朋友们真诚合作的基础。”“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末了指出：我们“需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显示出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的拥护，以及广大群众从共产党的自我牺牲和坚定信仰，获得了何等有力的鼓舞，这样伟大的团结注定了新中国将克服一切困难，达到国家建设中的最大成功，有了这些成功将会更加强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力量”^①。

7月8日 下午四时，在上海寓所热情接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元东根，副团长金仁春等。谈话中指出：“中朝两国人民不但并肩作战，而且将并肩得到胜利与和平。”对代表团的问候及赠送的朝鲜衣服一套和其它礼物表示谢意。还说已汇集其1927年至1951年的著作付印，不久将出版。这本集子将写明：“献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②。

8月 为印中友好协会帕芝辣分会成立撰写贺词，祝愿中印“两个强大的国家日益密切地、坚固地联系起来。”号召：“为印中友好的发展而全心全意地努力”^③。

9月15日 下午三时，到北京机场迎接爱伦堡、聂鲁达^④。前往迎接者还有郭沫若、茅盾等。

① 《宋庆龄选集》，第279—281页。

② 《解放日报》，1951年7月9日；《为新中国奋斗》扉页。

③ 《为新中国奋斗》，第301—302页。

④ 伊里亚·格·爱伦堡（1891—1967），苏联作家，社会活动家。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曾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两人均为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委员。他们来中国将以和平奖金授予宋庆龄。

9月18日 出席斯大林和平奖金授奖典礼。出席典礼的有爱伦堡、聂鲁达、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董必武、黄炎培、聂荣臻及郭沫若等。^①

典礼由郭沫若主持，他在致词中热烈祝贺其荣获和平奖金，并赞扬其“一贯站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并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她得到奖金委员会一致的推选。”爱伦堡致祝词，赞扬其“对和平事业曾有过很多的贡献，为了使您的祖国——成为亚洲的自由与和平的堡垒，您曾坚强地战斗不息，您的生活的道路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论他们生活在那里，都得到了鼓舞。您的生活道路可以奉为崇高的榜样。当着黑暗势力气焰万丈，胆怯者卷起旗帜或投靠敌人的年代里，您曾挺身为保卫人类的尊严，保卫正义与和平而英勇战斗。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您始终忠于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教训，您始终忠于自己的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为了救济自己的同胞，倡导了救死扶伤，抚育孤子寡妇的伟大事业。您以多年来的不倦的工作帮助中国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②。

在接受爱伦堡授予的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后，致答词，表示：“这个光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指出：“我们衷心需要和平，我们也充分表明了我們具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抗美援朝斗争“表现了我们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刚毅坚定，力量无穷，表现出当我们领土受到威胁时的同仇敌忾、随时抗击。”并指出：“我们必须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团结一致……使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③并在奖金（十万卢布）汇款单上批示：

①② 《人民日报》，1951年9月19日。

③ 《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词》，《为新中国奋斗》第303—308页。

“此款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①。

9月19日 宴请爱伦堡、聂鲁达。朱德、周恩来等应邀作陪。^②

9月29日 出席首都各人民团体，包括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团中央、妇联、文联、中苏友好协会，宴请来京参加我国国庆的各国人民观礼代表团。应邀出席的有：苏、匈、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人民观礼团，印度亲善访华团，缅、印尼人民观礼团。^③

9月30日 致电戈登夫人曰：“欣逢您七十大寿，谨遥致热烈的庆祝，并祝以更充沛的精神为世界和平运动努力，以期获得更大的成功”^④。

△ 晚，在北京出席毛泽东举行的盛大宴会，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国庆节。老根据地代表、英雄劳模及外宾千余人应邀赴宴。^⑤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为《人民中国》国庆纪念专号作《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一文。指出：两年来，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其规模、范围和成就都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为未来的进展准备了基础。”“土地改革的彻底和迅速实现”使“‘耕者有

① 原件照片，《永远和党在一起》画页。用宋庆龄所获得之和平奖金而筹办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于1952年9月18日——宋接受该项奖金一周年纪念日，在上海正式开幕。（见《解放日报》，1952年9月20日）目前，这个保健院拥有三百五十张床位，包括产科、妇科和计划生育科。它在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和科研成果，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参见陈维博：《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工作》，《宋庆龄纪念集》第211页。）

② 《人民日报》，1951年9月20日。

③ 同②，1951年9月30日。

④ 《解放日报》，1951年10月14日。

⑤ 同②，1951年10月1日。

其田’了。”并且“农民的政治觉悟得到启发，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受到了重视，而且出现了中国农民将来的远景——集体农民。”这是“孙中山的理想”，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纲领”，是“中国贫穷的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影响到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我们今天的生存的元气，我们明天的基础。”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效地揭露了那些图谋危害我们新生命的败类，逮捕和惩罚了他们。”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的又一个重大失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把我们祖国的安全与反对武装日本和西德、与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联系起来。它使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并肩站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断言：“中国人民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这是为我们的生存以及为全人类的幸福的一个正义的战争”。末了指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使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两年成为历史中最最辉煌的两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到为和平的斗争中去，并且给予和平的死敌以重大打击”^①。

△ 在北京，出席国庆盛典。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有四十余万人参加的群众游行队伍和人民武装力量。^②

10月5日 在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首届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到会各界代表一千二百余人。^③

10月7日 下午，在北京，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的印度亲善访华代表团、巴基斯坦人民代表团来访，设茶会招待。^④

△ 晚七时，在北京，同朱德一起，应邀出席德驻华外交使团举行的招待会，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⑤

① 《宋庆龄选集》，第282—291页。

②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日。

③ 同②，1951年10月6日。

④ 同②，1951年10月8日。

⑤ 同④。

10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派秘书给自己寓所的警卫战士每人购买一本，并嘱咐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并向他们赠送钢笔和笔记本。^①

10月23日—11月1日 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②

10月 作《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一文，指出：“福利事业在新中国所表现的空前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的热切愿望。”

“一个政府在福利事业方面所尽的努力，不仅可以正确地衡量它维护和平的诚意，而且可以反映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

“在仍然受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束缚的国家中，福利事业不是根本没有，就是仅仅象一件骗人的陈列品。”“每逢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企图保持殖民地奴役制度或者用武力来征服世界的时候，他们本国的人民首先就要遭殃。剥削加强了，福利事业取消了，钱都用在军事预算上了。”明确表明：“中国是站在和平这一边的，然而它有力量保卫自己，同时帮助邻邦，这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所特别关心的。”“只有和平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有了和平，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发展为我国人民服务的事业，扩大我们对世界福利的贡献。”强调指出：“这种见解，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所共有的，它空前地保证了和平将在世界各地征服战争”^③。

11月9日 复函“松川事件”无辜被告者，谓：“知道你们已经收到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赠与‘松川事件’无辜被告及其家属的三百万日元，我们热诚希望这笔款项能有助于你们为和平与真理而斗争。”指出：“正当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运动蓬勃开展，而美帝国主义者却向朝鲜人民进行残酷的侵略战争，缔结单独对日

① 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宋庆龄名誉主席关心战士的成长》，《宋庆龄纪念集》。

②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11月2日。

③ 《宋庆龄选集》，第292—295页。

‘和约’，阴谋武装日本，严重地破坏着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时候，你们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的反压迫斗争，代表着日本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意志。你们绝不是孤立的，全中国、全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愿做你们的后盾。正义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①。

11月26日 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是为响应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柏林会议关于加强和扩大保卫儿童的号召，并促进我国儿童福利事业而成立的。在大会上宣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宣言。旋被选为该会主席。（邓颖超等六人为副主席，康克清为秘书长。）^②曾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一直对该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物质上给予支援。^③

是月 视察张家口市干部子弟保育院和郊区老鸦庄，向农民了解生产情况。视察大同，并游览华严寺。在北戴河与人民解放军交谈。^④

是年 冬，在上海，邀请刘少奇到寓所作客，亲自为其煮咖啡。并对他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⑤。

是年 为营救被“麦卡锡”法陷害关进监狱的美籍日本朋友有吉幸治和一批革命者，把结婚时母亲送给的刺绣礼服，送给有

① 《写给“松川事件”无辜被告的信》，《宋庆龄选集》，第298页。中国人民救济总会9月20日汇给日本“松川事件”无辜被告及其家属一万美元（折合三百六十万日元），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该款由日本劳农救济会代转。宋庆龄接读了劳农救济会的复信和“松川事件”无辜被告者斋藤千、杉浦三郎、佐藤一三人来信，一致感谢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援助。（见《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2日。）

②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7日。

③ 康克清：《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宋庆龄纪念集》，第84页。

④ 参见《纪念宋庆龄同志》，第201页，202页，206页，204页照片，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⑤ 王光美：《永恒的纪念》，《宋庆龄纪念集》186页。

吉幸治的亲属变卖。^①

1952 年（壬辰） 五十九岁

1 月 为了把正在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友谊和了解，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号是月出版。此后，对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文版的增加以及工作人员的生活，都给予明确的指示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直到其逝世前四个月的近三十年中，还为杂志撰写过三十多篇文章。这个杂志最初只有英文版，后增加了法、德、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及中文版，俄文版已停刊。发行范围达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②

2 月 给《外科解剖刀就是剑》一书作序，指出：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是“一位医生。他曾用他所最熟悉的武器在医务方面进行斗争。在他本人的科学范围内，他是一位专家和倡导者——他把他的武器保持得锋利如新。而且他，自觉而一贯地，把他的伟大的技能贡献给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先锋。对他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他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他的输血工作曾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战士的生命。在中国，他提出并实践了

① 参见《纪念宋庆龄同志》，第 323 页照片。有吉幸治家属没有变卖这套衣服，一直珍藏到 1981 年 10 月送还中国。现陈列在宋庆龄故居。

② 创办这个杂志，是 1951 年 3 月初，周恩来同宋庆龄商定的，推陈翰笙筹办，借助了中国福利会的干部力量。还请了金仲华、李伯悌、爱泼斯坦夫妇等参加这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宋庆龄亲自为杂志取名为《中国建设》。参见《宋庆龄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和陈翰笙：《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格》，均载《宋庆龄纪念集》；以及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宋庆龄纪念特刊》，中国建设杂志社 1981 年 8 月版。

这个口号：“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他组织了一种游击队的医疗机构，挽救了成千成万的我国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总之，在西班牙和中国他都是“医学战场上的一员先锋”。并指出：“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①。

3月19日 作《谴责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一文，愤怒抗议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绝灭人性的细菌武器。指出：

“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朝人民，决不能容忍这种危害人类的暴行。”我们要把“使用细菌武器，作为一个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来加以裁判！”并深信：“我们有着全部和平人民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支援”，“中朝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要把保卫和平的斗争坚持到底”^②。

3月21日 同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联名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共同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③。

是月 作《〈中国建设〉致读者》一文，指出该刊前几期报导新中国建立以来医务卫生方面获得的伟大胜利，是“全面向疾病大进攻的结果，……也是伟大建设运动中的一部分成果。”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

① 《〈外科解剖刀就是剑〉一书序言》，《宋庆龄选集》第297—300页。

② 《宋庆龄选集》，第301—302页。宋庆龄曾亲自阅读老舍关于消灭细菌武器的一个剧本，并决定上演，以提高人民对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的警惕。参见胡思升：《她的“掌上明珠”》，《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③ 《人民日报》，1952年5月14日载：宋庆龄等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亚、澳及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国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至5月15日，已有澳大利亚、蒙古、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缅甸、印尼、哥伦比亚、朝鲜、印度、智利、墨西哥、萨尔瓦多、锡兰（斯里兰卡）、加拿大、巴基斯坦、美国、日本、越南、寮国（老挝）、苏联等二十个国家来电表示拥护。旋决定：5月28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痘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来危害人民的生命。还“撒下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人民赖以生存的谷物和牲畜。”严正指出：这是“一个违反了人类道德和国际法律的滔天罪行”。表明：中国人民“正如他们排除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馑疫病一样，他们正在预防着人为的疫病。”“为了粉碎细菌战，中国人民在医药卫生方面正走向新的水平”^①。

4月 为庆祝保卫儿童国际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作《保卫儿童》一文。指出：今天世界上好些地方的“儿童们正直接受到威胁”，因为那里已经“遭到战争的浩劫”。“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不让这些灾难和痛苦落在儿童们的头上。”号召：愿意为孩子们争取和平与安全的人们“必须采取一致行动”，“世界各地的儿童们，都应该得到自然所赋予的一切幸福，得到人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利益”^②。

5月29日 应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邀请，主持印度艺术展览在上海的揭幕仪式，并致词：“上海的人民和我都一致热烈地祝贺这次展览的巨大成功，并祝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伟大友谊万岁！”揭幕式后参观了展览。^③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儿童——世界之宝》一文，指出：“儿童是人类的至宝。……我们正把这种信念化为行动，我们开办了更多的托儿所和保养院、并不断地在扩充卫生和教育设施，用健全的道德风气，来实现我们的信念。”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确信“世界上所有人民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使我们的儿童能享受和平与丰满的生活”^④。

① 《宋庆龄选集》，第303—307页。

② 《人民日报》，1952年4月14日。

③ 《解放日报》，1952年5月30日。

④ 同②，1952年5月31日。

6月3日 从上海电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指出：这“标志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伟大而统一的和平运动的开端。这一良好的开端必将使爱好和平的人民更进一步动员起来担当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责任”^①。

7月31日 为《人民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一文。指出：“和平和民族独立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和平必须建筑在一切民族平等和各国建立互利关系的基础上。”中国“恢复了民族尊严”，国家建设“飞跃进步”。因为“我们胜利地进行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为亚洲和太平洋人民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还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平。和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现在，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争取各国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北京又成了他们新的团结的发祥地。”表示：“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因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的成员”，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全力和我们一道奋斗”^②。

8月4日 电贺印度举行“亚洲周”，祝其成功，并“向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前进！”^③

9月8日 被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各人民团体联席会议推选为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被推选为代表的，另有郭沫若、彭真等二十九人。^④

9月18日 在北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的首次会议，被推选为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彭真为副团长。^⑤

① 《人民日报》，1952年6月4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308—314页。

③ 同①，1951年8月9日。

④ 同①，1951年9月9日。

⑤ 同①，1951年9月14日。

是月 在国庆节前，亲率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到北京演出。出发前，亲自审定全部节目，勉励大家说：“现在全国儿童剧院很少，要拿出最好的成绩到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特意为女孩子选择了扎在头上的蝴蝶结，说：“用国旗上的五角星黄色，那是国色，很好看。”在火车上对他们十分关心，问是否晕车，夜间给他们盖被。到京后，因天凉，见演员穿短裙，特意为她们买长袜。请剧院人员到寓所作客，给每人一包糖果，领着参观书房，勉励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努力提高技术。^①

9月30日 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出席宴会的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各国驻华使节，在京其他各国代表团和人民访华团、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际组织代表，共一千二百余人。

是月 作《中国人民与和平》一文。认为人民的统治与和平两者“紧密相结合又互为补充”，是“一个统一体”。人类以此“实现自己的梦想、保护自己的创造并使之持久。”指出：人民的统治与和平是今日中国的“有力的支柱”。中国人民在解放后的第四个年头，成为“致力于和平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东道主。”中国人民欢呼这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热烈希望会议成功。明确表示：“中国将利用一切机会在所有地区促进和平”，“将用全部力量支持这次会议实现它的目标”^②。

10月1日 参加庆祝国庆典礼，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界人民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

△ 《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出版。该书收集宋庆龄1927年到1952年间所发表的重要讲演、论文和声明共六十余篇，内容分五个部分。全书计二十万字，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全部稿费人民币五亿元赠给

① 章薇娜等：《把生命的旗帜交给儿童》，《光明日报》，1981年6月4日。

② 《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5期。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①

10月2日—13日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在致开幕词中，指出：

“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事件。”它“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的。”并颇有感慨地说：过去“反帝大同盟代表着三千万人民。现在由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发起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运动，签名者已有六亿零三百万以上的人民，……和平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壮大，向前迈进，成为世界上一支占优势的力量了。”今天中国的榜样，使亚洲、太平洋区域及全世界人民“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又指出：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对于世界和平的要求，日益密切地连系起来了。”要把“争取独立与和平的要求熔合为一”。“只要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地保卫和平，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②旋被推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0月15日 主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致词中指出：联委会“要宣传大会的决议并促其实现”，要同各国联委会“保持联系”。建议会议讨论秘书处的工作如何积极迎接将在十二月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问题。^③

10月21日 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完成了它的任务，现已胜利闭幕。”与会代表“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将“派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前往出席”^④。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解放日报》，1952年9月20日。

② 《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宋庆龄选集》第315—321页。

③ 《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6日。

④ 同③，1952年10月31日。

10月24日 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观看儿童剧团的演出。

10月25日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作《中苏友好是和平的堡垒》一文。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息息相关”，“都进行着伟大建设工程”，并“决心在任何情况下继续创造我们的未来”，“使我们人民和友邦人民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我们也时刻准备着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和平。”“我们永远向各国人民伸出善意与友谊的手”^①。

11月2日 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

11月6日 下午五时，应邀同朱德一起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招待会。

△ 下午六时，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艺术工作团、红军歌舞团、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一同出席者有朱德、周恩来等。

△ 晚七时半，出席首都各界代表在怀仁堂庆祝十月革命节纪念会。致词中指出：今年11月7日至12月6日，为“中苏友好月”，其目的是“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苏联人民三十五年来，“击溃了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歼灭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建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光辉成就给予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莫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希望”。指出：“中苏友好月”将使“中国人民都知道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推动对于苏联建国先进经验的学习”^②。

11月10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茶会，招待来京演出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代表保委会把一面写着“为发展儿童文艺戏剧而努力”的奖旗授予儿童剧团。

① 《人民日报》，1952年11月5日。

② 同①，1952年11月7日。

11月15日 在北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调整省、区建制，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等问题的报告。

11月25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工作会议。讲话中勉励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学习，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家大规模建设，更进一步地做好救济和福利工作”^①。

是月 参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展览会。

△ 作《为了和平到维也纳去》一文。指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形成了这个区域“空前的争取和平的大团结”，它“使过去长期被地理的距离和历史的事件分隔开来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了”。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对和平作出的这一贡献，使各国人民充满希望，它增强了他们以坚决的行动迎击对人类的每一种威胁的决心”，并为“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准备了条件”^②。

12月11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与各全国性人民团体联席会议，被大会推选为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③

△ 率中国代表团五十九人到达维也纳，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及各国和平代表的热烈欢迎。^④

12月12日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开幕，被推选为执行主席。^⑤

12月13日 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发表题为《人民能够扭

① 《解放日报》，1953年12月14日。

② 《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7日。

③ 同①，1952年12月13日。

④ 同③。

⑤ 《解放日报》，1952年12月13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于12月12日召开，19日结束。参加大会的共85个国家，1,875人。其中代表1,604人，来宾105人，列席120人，各国团体和国际组织代表46人。

转局势》的发言。指出：“我们希望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执行的战争政策，任意侵略别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行动，能起来加以制止。”“美国人民决不是孤立的，他们应当经常记着，保卫和平的斗争有着全人类中决定多数的人民作后盾。”并对巩固世界和平提出了建议。其发言一再博得听众暴风雨般掌声，受到代表们，特别是美国代表的热烈欢迎。^①

12月20日 在维也纳，出席国际妇联理事会会议，并发表演说。指出：“国际民主妇联在争取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的工作上，尤其在保卫和平运动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强调指出：由于“朝鲜、越南、马来亚的战争还在进行”，“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和平”^②。

12月22日 晚7时，离维也纳回国途中抵布达佩斯。同车者有苏联代表考涅楚克、爱伦堡、西蒙诺夫等。下车休息后，游览布达佩斯中心市区，并登布达山，参观了苏军纪念塔。受到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拉科西的热情迎接和殷勤招待，畅谈甚久，并接受其赠送的匈牙利名产纪念品，和请代向毛泽东致意的嘱托。^③

是月 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应邀赴苏参观的还有朝鲜、越南、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区域其他国家代表团。^④

是年 在上海出席中国福利会在少年儿童文化馆举行的年会。

△ 在上海，到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探视初生婴儿。

①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出席大会的美国代表路易士·惠吞说宋庆龄的讲话和建议“是这样具体，这样合情合理，一定能为美国各阶层人民所接受”。

②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6日。

③ 《解放日报》，1952年12月26日。

④ 同③，1953年1月9日。

1953 年（癸巳） 六十岁

1 月 5 日 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还有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朝鲜、蒙古、印度、缅甸、澳大利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代表团。会后举行了盛大音乐会。^①

1 月 13 日 同郭沫若一起，会见斯大林。^②

△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③

1 月 14 日 离莫斯科返国。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晋谒列宁墓，献了花圈。游览了莫斯科名胜，参观了文化、医疗单位及博物馆。离莫斯科时，到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送行的有苏联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等苏联朋友，还有郭沫若、张闻天。^④

1 月 24 日 抵北京。周恩来、郭沫若（乘飞机先期返国）、彭真到车站迎接。^⑤

1 月 26 日 为欢迎我国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代表团回国，出席我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代表团“完成了人民委托的任务”。今后的工作是“把维也纳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传达给全国人民”。表示中国代表“将和全国人民一道，进一步致力于和平事业。”深信“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能完成建设任务，不断地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⑥。

① 《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7 日。

② 同①，1953 年 1 月 15 日。

③ 同①，1953 年 1 月 14 日。

④ 同①，1953 年 1 月 16 日。

⑤ 同①，1953 年 1 月 25 日。

⑥ 同①，1953 年 1 月 27 日。

2月11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被推选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委员（委员共二十八人，刘少奇为主席）。

2月22日 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日红十字会代表向毛泽东、宋庆龄献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代表受礼。

3月5日 致电斯大林慰问病情。电曰：“敬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听到您患病的不幸消息，我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祝盼您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早日获得持久的世界和平”^①。

3月6日 电唁斯大林逝世曰：“以最沉痛的心情，对今天全体进步人类所不得不承受的最悲痛损失，斯大林同志不适时的逝世，谨致衷心的悼唁。”表示：“从他的勇敢和预见中时常得到鼓舞！”将与苏联人民一起“为实现他的殷切的希望，实现世界和平，实现人类的幸福和自由而奋斗”^②。

3月8日 派专人到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向斯大林遗像献花圈。花圈上写着：“最敬爱的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③

3月9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悼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一文。指出：斯大林的逝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正确地继续着列宁的事业”，“领导着苏联人民进行建设”。他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导师和同志；是“最伟大的和平的保卫者”。“他宣告着世界人民只要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而且坚持到底，和平就能得救。这个号召给与所有要求和平的人民以无比伟大的鼓舞。”他“不仅对他自己的人民有着信心，而且对于一切人民具有同样的信心。”他相信“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人民。正象苏联人民一样，

① 《解放日报》，1953年3月6日。

② 《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

③ 同①，1952年3月11日。

能够经受最艰苦的考验、作出奇迹而获得胜利。”提出：要把“沉重的悲痛”化为“钢铁一样的意志”，把斯大林的“伟大作为我们自己为人民服务标准”，以他“的勇敢来激励自己”。“斯大林所完成的胜利正是全人类争取自由与幸福的基石。我们应该把他遗留下来的事业担负起来，奋勇前进”^①。

△ 在上海，参加华东和上海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

3月12日 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十八周年，清晨前往孙中山故居献花。华东及上海市领导，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上海政协和上海市人民团体代表也前往献花。

是月 作《斯大林为和平进步和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一文。说，斯大林的不幸逝世，“在中国大地上引起最深沉的悲哀”，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亚洲人民得到斯大林的特殊的关注。‘不要忘记东方’是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前，当法西斯进攻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中国时，“苏联对反法西斯的国家提供援助并表示同情”；当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给“侵略者以粉碎性打击，继而又歼灭了在中国国土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军队。”战后，他“继续领导人民为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又说：“斯大林教导我们，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可以和平共处。”最后说：“遵照斯大林的精神，我们将继续建设我们的幸福生活，并尽一切可能援助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苏联人民和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结成更紧密的联盟，以保证和平战胜战争”^②。

4月2日 致电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悼唁法奇^③逝世。谓：“法奇的不幸逝世，是保卫和平事业的重大损失。”指出：“法奇

① 《宋庆龄选集》，第321—325页。

② 《中国建设》，英文版，1953年第二期。

③ 伊夫·法奇，法国人，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斯大林和平奖金获得者。

为争取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不懈精神，将鼓舞世界和平保卫者的前进。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崇高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①。

4月16日 给15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发去贺词，指出：我国的“法律已确认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地位。事实上，妇女已经享受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给予的权利。”“在铲除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关系方面已有了伟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男尊女卑的观点”“根深蒂固”，“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明确指出：“除非中国的妇女大量参加工、农和文化工作”，否则，“就不容易按照必需和可能的速度推动我们国家的前进。妇女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的工人。”今后要“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还有妇女的“特殊权利”。还必需办“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逐步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稳固坚强”^②。

4月25日 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届执委会首次会议上，同何香凝一起被推选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③。

5月31日 为《人民中国》作《我们为儿童与和平而建设》一文。指出：人们“一切工作和努力的结果”，“应该使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得到改善”。这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条规律”，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原动力之一”。但是，旧日的“中国儿童由于战争、苛政以及从而产生的水灾、饥荒和疫病而受到的苦难是全世界所熟悉的，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现在，这些“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掌握在人民手中”，它“防止战

① 《人民日报》，1953年4月3日。

② 《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宋庆龄选集》，第326—328页。

③ 同①，1953年4月27日。

争”，保卫“生命的美好意义”及“儿童的将来”。“母亲和孩子们的福利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并指出：世界其他地方还“有许多父母受到残酷打击”，“孩子们过着困苦的生活”。“我们要坚决抗议这些苦难再继续”，“尽力阻止战争的扩大”。表示“中国将和一条路上前进的人同心协力，和一切愿做朋友的人友好合作，继续向前迈进，建设她的新生活。”并且“继续使她的儿童健康快乐”。这也是“为全世界儿童恪尽我们的天职”^①。

△ 在《人民日报》发表《致全体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一文。指出：儿童工作者“应该有高度才干”，“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来教育影响孩子们”。并且要把培养“儿童成为新中国的优秀公民”当成“光荣的任务”。他们将“得到全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支持”。特别指出：“中国工业化新时期已经开始”，儿童将“贡献他们的劳动与创造”，他们的“小手”将“变成工人的和技术人员的熟练的双手”。勉励儿童工作者“更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②。

7月 朝鲜停战后，为欢迎陈赓回国，亲自到饭店订制点心，到果园买葡萄，邀请陈赓夫妇到家作客。言谈中对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充满敬意，高兴地收下陈赓赠送的纪念章。^③

8月11日 晚，在上海同陈毅一起观看印度艺术代表团演出。

8月12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印度艺术代表团萨钦·森古蒙培和艺术团团员印度著名诗人瓦拉托尔·纳拉雅纳·梅农。^④

9月1日 为华东中学开学题词，曰：“我们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来进行学习，并且要养成优良的习惯来掌握现

① 《人民日报》，1953年5月31日。

② 同①，1953年5月31日。

③ 傅涯：《良师益友，革命情深》，《宋庆龄纪念集》第197页。

④ 同①，1953年8月13日。

代化的科学知识，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学习。同时，要注意锻炼身体，按时作息，在毛泽东的光辉旗帜下勇敢地向前迈进吧”！^①

9月12—15日 在北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听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和李富春作《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②

10月1日 出席首都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典礼。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和平建设的武装部队和首都四十万和平建设的人民队伍。今年国庆，首都和全国人民特别欢欣鼓舞。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胜利，基本上肃清了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从而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今年是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

10月5日 冯玉祥安葬仪式在泰山墓地举行，送了花圈。

11月12日 在上海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八十七周年，到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瞻仰。

11月24日 在上海静安区第十九选区进行人口登记和选民登记。

12月11日 电贺印中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指出：“业已增长的和平的可能性，在不小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印度和中国人民日益增加的友谊。”认为当前的责任是：“进一步加强这些友好的联系，并协力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取得世界的安宁”^③。

① 影印原件，《解放日报》，1953年9月1日。

② 《人民日报》，1953年9月13、15、16日。

③ 同②，1953年12月12日。

是月 参观湖北武昌九女墩，并题诗《无名烈士》一首。^①

是年 在所领导的儿童福利站的儿童文化工作的基础上，创办了少年宫。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少年宫之一。

1954 年（甲午） 六十一岁

1 月 4 日 下午，在上海参观波兰人民共和国经济展览会。

1 月 10 日 晚，观看捷克杂技艺术团的表演。

1 月 26 日 同陈毅、谭震林等参加上海基层选举投票。

是月 作《人民的友谊与和平》一文。指出：“国际争端不是因为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引起，而是在偏见、分裂、冲突中获利的少数人挑起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可以使人民把全副精力、全部资源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改善邻国人民的生活。”表明：“中国人民忠于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的国家是个和平的国家。在中国，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事正在日益成为现实，我们的人民健康，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文化生活丰富。”明确指出：我们的路线的基础是“合作精神，……我们在国际上高举友谊的旗帜。”坚信：“这面旗帜随人民及和平的胜利，将插遍全世界”^②。

2 月 作《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一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取得更大进步的手段，才能更好地发展工农业生产，才能把人民的生活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有了强大的工业，在当前

① 诗的全文见《宋庆龄选集》，第329—330页。这首诗由何香凝亲笔书写后刻在石碑上。九女墩在武昌东湖边上。传说太平军夺取武昌，军中有获得解放了的妇女参加工作。清军攻陷武汉后大肆屠杀，有革命女志士九人遇害，乡人敬慕她们的义烈，把她们的尸体葬在这里，本应称坟，因避清廷迫害，故改称墩。

② 《中国建设》，英文版，1954年第一期。

世界上，才能保卫我们的新生活。^①

3月1日 接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来函，对去年8月将所著《为新中国奋斗》稿费（五千二百八十万元人民币）捐赠遭受战争灾害的朝鲜孤儿的义举，表示感谢。信中说：“你的诚挚的爱和援助，鼓舞了在战争中站立起来的朝鲜母亲，并增加了她们在进行恢复战后人民经济中争取新的胜利的信心”^②。

3月5日 参加华东局在上海举行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3月23日 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正。

4月30日 在北京，陪同毛泽东接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参加接见的还有朱德、刘少奇等。

5月1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主席台检阅首都各界五十万游行队伍。

5月16日 为庆祝195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给《儿童时代》题词，曰：“孩子们！练好身体，学好功课，热爱劳动，将来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③。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是幸福》一文。指出：孩子们“生长在一个空前伟大的历史时期”，将参加“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队伍”，并且在他们面前“展现着无限广阔的道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是幸福的”。文中说：“不管你预备走那一条路，顶顶要紧的是先要为自己做好准备。”“必须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必须锻炼出健壮的身体和足够的勇气”。“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

① 《人民中国》，英文版，1954年第四期。

② 《人民日报》，1954年4月11日。

③ 影印原件，《儿童时代》，1954年第十一期。

好’”。强调指出：“学习和锻炼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健壮的和勇敢的人，准备参加劳动，保卫祖国的荣誉，这就是你们的幸福”^①。

6月11日 在北京，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6月13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授奖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北京一千二百名少年儿童和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妇女、儿童工作者参加了大会。给得奖作家张天翼、高士其等二十七人发奖金，同他们热烈握手。会后，观看演出的得奖节目。

6月14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会上发言，引毛泽东1940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的话：“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得到了独立和民主。”现在“制定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宪法，这是空前的、伟大的、非常光荣的一件大事。”它“将保证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谈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现在全世界都体会到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容轻视的。我们的宪法正是全面地表示了这样的精神和力量。”并特别指出：宪法“规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②。

6月19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通过《关于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③。

① 《宋庆龄选集》，第331—333页。

②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宋庆龄选集》，第334—335页。

③ 《人民日报》，1954年6月20日。

是月 作《能够赢得和平的一个证据》一文。指出：“和平谈判可以解除国际紧张局势并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印最近达成的协议^①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树立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榜样。我们非但没有用毁灭生命的原子弹，相反，为了使我们各自的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我们采用加强文化联系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声言：“中国主张和平，主张谈判而不主张诉诸武力。”鉴于当前的战争威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全力使世界导向公正。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必须支持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②。

7月6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在中越边界与胡志明会谈后返回北京。

7月26日 为庆祝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停止战争和恢复和平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书面谈话。指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和平爱好者一同为印度支那停战的消息而欢欣”。它证明“国际紧张局势能够缓和，各项问题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但是，“今天世界上还有些有势力的分子，……不让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继续存在”，在“人民之间制造仇恨”。事实上，“历史证明：这些企图已经悲惨地失败，而且还要继续失败。”号召：“竭尽全力发扬理性，并支持一切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要求”^③。

8月17日 被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者共六十三人。

9月9日 下午，在北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和通过各项任

① 《中印协定》：1954年4月29日，我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4月30日。

② 《中国建设》，英文版，1954年第四期。

③ 《人民日报》，1954年7月26日。

免名单。

9月11日 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参加接见的还有刘少奇、李济深、张澜等。

9月12日 下午，在北京，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15—28日 在北京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听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被选举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9月25日 下午四时，陪同毛泽东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节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格·阿波斯托尔等。

△ 下午五时半，陪同毛泽东接见捷克政府代表团团长瓦·柯别斯基及团员等。

9月29日 晚，周恩来举行酒会招待来我国参加国庆的各国外宾。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一起到会祝贺。参加酒会者一千六百余人。

9月30日 晚，出席首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建国五周年庆祝大会。

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检阅台上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

10月2日 晚，出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招待应邀来我国参加国庆典礼的各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宴会者八百多人。

10月3日 晚，出席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招待会，招待参加我国国庆的各国政府代表团。招待会后，举行歌舞晚会。

10月4日晚，应邀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的表演会，接见舞蹈团负责人，观看舞蹈团演出。

10月12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伟大和平进步的堡垒》一文。指出：过去一年来，“最显著的发展是中苏两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关系所进行的积极活动。”它使“整个和平运动已进入一个新底阶段”。严正声明：我们“决不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也决不允许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我们认为每个国家底主权都是神圣的。我们促进贸易上和文化上的接触。”因为这“两种接触乃是促进一切国家走向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方法”。我们“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现在我们“经常提出有益于人民的各种建议，并且尽最大努力来推动协商，以求达到某些协议。”由于我们两国都“怀抱着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同样决心，……我们底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政策就把我们和世界各地的广大的普通男女团结起来了。”可是“那些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战争集团的分子，……对于这种局势是极不愉快的。”他们正从各方面“进行挑衅”和“破坏”，因此，“我们有阻止战争爆发的重大责任”。并相信：“争取和平的团结意志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不容抹煞的”，它是“一定会胜利的”^①。

△ 晚，应邀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一起，出席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招待苏联政府代表团。

10月13日 在北京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机场欢送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国。

10月16日 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听周恩来作《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并决定任免

^①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

事项多起。

10月19日 午，同周恩来来到机场迎接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

△ 陪同毛泽东接见尼赫鲁。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参加接见。

10月21日 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共进午餐。

△ 晚，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应邀出席印度大使为尼赫鲁访问我国举行的招待会。

10月23日 晚，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尼赫鲁。

10月26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叔通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举行的酒会，欢送尼赫鲁。

△ 晚，应邀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出席尼赫鲁举行的告别宴会，并会谈一个半小时。

10月27日 上午八时，同周恩来、陈云到机场欢送尼赫鲁。

△ 下午，在北京，接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教授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接见时钱俊瑞、戈宝权在座。

10月29日 在北京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国民会议主席罗查·格罗查博士。

10月31日 晚，在北京，同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在北京举行的首次表演会。表演休息时，接见莫斯科音乐剧院院长利雅科夫等。

11月6日 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在北京，同吴玉章、沈钧儒、郭沫若一起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的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曾殷切地期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在实

现这一期望的过程中，“中苏友好同盟的力量是无敌的，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用和平的劳动创造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并且“用一切力量，通过一切途径，来巩固和发展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神圣事业。……这种共同努力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指出：“帝国主义拼凑的东南亚侵略集团是危害亚洲各国的安全和民族独立，是危害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利益的。”表明：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我们愿“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家及其他国家发展互相的关系”，还指出：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死敌”。对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上危险的备战道路，表示忧虑。”相信日本人民“能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走上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道路。”表示我们愿意“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和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认为“一切有民族自尊心的日本人，都会同意我们的见解和立场的，他们的和平愿望一定能够实现”^①。

11月7日晚，应邀同朱德、林伯渠、李济深一起出席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3日 在上海，邀请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共进午餐。王炳乾、姚仲明出席作陪。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也出席。

12月21—25日 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主席团提名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旋被推选为政协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12月27日 应邀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彭真、吴玉章一起出席苏联大使尤金举行的宴会，庆祝苏联展览在索结束工作和莫斯科音乐剧院结束演出。

① 《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

12月28—29日 在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发表题为《中苏友谊——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灯塔》的讲话。指出：五年前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了我们两国间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事务中的显著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我们两国“八万万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用兄弟般的联系固定起来了，这八万万人民是全心全意热爱建设和和平事业的。”它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文化程度，并保卫我们在建设新生活中所获得的胜利。”“这就是中苏友好成为一个和平与进步堡垒的原因”，也是“给远东和世界的国际事务中带来了一个深刻变化的原因”。并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强盛的，全国团结一致的，我们以自己的独立而自豪，并且我们完全能够保卫我们的独立。”旋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①

12月29日 晚，应邀同贺龙、陈毅、李济深、郭沫若一起，出席莫斯科音乐剧院举行的访问演出闭幕式。闭幕式结束后，观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歌剧《塔拉斯的一家》等精彩歌舞节目，及我国中央歌舞合唱队等演出的部分节目。^②

12月30日 在北京，举行宴会，欢送莫斯科音乐剧院人员，欢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并邀请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使馆工作人员及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人员。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来我国演出，“是中苏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大事”。对“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了卓越的贡献”^③。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9日。

② 同①，1954年12月30日。

③ 同①，1954年12月31日。

1955 年（乙未） 六十二岁

1月1日 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务院举行的元旦团拜。参加团拜者共八百余人。团拜后举行晚会。

1月15日 在北京，出席并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1955年工作计划和协会组织的若干规定。决定大力开展有关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情况的宣传工作，加强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并继续开展俄文业余教学。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齐冈宁列席了会议。^①

是月 作《第一个五年》一文，热情歌颂新中国成立五年来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五年前，“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从而“开始转变过去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苦难，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机构，以便为我国人民、世界人民最大的利益服务。”叙述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工农业生产、水利、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十分高兴地说：“1950年货币、物价都已稳定，十二年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苦难，宣告结束。”“国家预算已经平衡”，并显示出“和平建设的特点”。“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象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指出，“一切为公”是“我们的新道德标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标准树立了，旧的自私的观点被扫除了。”并特别指出：“我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权力，又获得新婚姻法的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月16日。

保障，在生活、工作各方面，正在赢得杰出的地位”^①。

2月9日晚九时，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等赴中山公园中山堂，亲视张澜遗体含殓。并担任其治丧委员会委员。

2月12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成立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名。会后，领先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②。

2月13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发表题为《新型的和更高类型的关系》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是“以真正平等和尊重民族独立为基础，并以互相关注，互相帮助和兄弟般的合作为特征的国际关系。”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源泉之所在，这种思想把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正如它把各族人民团结在一个国家里一样”^③。

2月14日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同毛泽东、刘少奇应邀出席苏联驻我国大使馆的招待会。

2月22日 庆祝苏联红军建军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担任慰问团副团长，同彭德怀（团长）一起，率团员郭沫若、章伯钧等二十人是日上午到达旅顺。下午出席慰问团在旅大举行的大会，并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献花圈。^④

① 《宋庆龄选集》，第336—340页。

② 《人民日报》，1955年2月13日。

③ 同②，1955年2月14日。

④ 同②，1955年2月23日。

2月23日 同彭德怀、贺龙、郭沫若、聂荣臻等一起，在旅顺口参加中苏友谊塔奠基礼，并执锹铲土，为友谊塔树立基石。

△ 晚，为庆祝苏联红军建军三十七周年，同彭德怀一起，应邀出席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举行的宴会。宴会前，观看了苏军歌舞团表演的精彩节目。

2月24日 下午，在旅顺，出席慰问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招待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代表。应邀者有驻旅顺地区苏军高级将领及各级军官、士官和战士代表，还有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和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在招待会上讲话，指出：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是“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贯给予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下”时，“英勇的苏联军队，彻底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东北的数千万我国同胞，使中国人民能够迅速地获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苏联军队“崇高的国际主义的行动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它将永垂在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光辉史册上。”新中国刚建立时，“我国国防力量还比较薄弱，帝国主义者曾从各方面来恐吓年轻的新中国，它们企图沿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走过的老路来侵略我们。”这时，“苏联军队，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帮助我们守卫着我们东北的门户——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现在，“当我国国防力量已经加强的时候，你们就开始从旅顺口撤退。你们对中国人民这种真诚无私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是举世共见的。”“苏联军队和我国人民之间建立的这种深厚的友谊”，是“中苏两国间新型国际关系的光辉体现。”并引毛泽东的话说：“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的亲密团结是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更加巩固和发展”^①。

① 《人民日报》，1955年2月25日。

2月26日 出席彭德怀在旅大市举行的宴会，招待苏军高级将领。

2月27日 下午，乘车返京。

3月25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五大原则》一文。指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明它“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五项原则的公布，把“整个远东局面向前推进了一步”。讲到台湾问题，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好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并为“世界上一切明白是非的国家所承认”。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明确指出：“这些建议侵犯了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权利，……是老式的殖民主义态度。”其用意是让美国“继续占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他“进行骚扰活动的一个基地”，是“违反五项原则的”^①。

3月30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件有意义的事》一文，谈旅大之行的感想。说：“看到了中苏关系上的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遵照条约的规定，宣布把它的部队撤出旅顺口，是中苏两国的“友谊和兄弟般合作的一个标志”。表示“中苏两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热核武器的挑衅”，并“为保卫我们正在建设的新生活的事业中紧密合作，肩并肩地为和平而斗争”^②。

4月16日 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石志昂等，因乘坐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是日，担任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筹备会委员。^③

① 《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

② 同①，1955年3月30日。

③ 同①，1955年4月17日。

是月 纪念列宁诞辰八十五周年，作《在列宁的鼓舞下》一文。追忆孙中山对列宁的尊敬和爱戴，引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誓言说的话：“俄国革命……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革命中最好的模范”，要“走列宁的道路”。指出：十月革命后，列宁的著作就连续译为中文，全国解放后“译本大大地增加起来”。中国人民向列宁学习，“不是口头的或书本式的”，而是“在行动中”。又指出：只有列宁领导的党“坚决一贯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且“指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总是遵循着列宁关于党的学说”。“中国人民所以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争得民族独立，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列宁不但给我们指出了革命的道路，并且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号召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解放后的中国妇女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工作“愈来愈多”。她们“对社会服务的能力，在一天一天地增加”。最后，引孙中山逝世前写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说：“苏联是‘自由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①

5月5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戈登夫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兰西妇女联盟主席、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以及法国妇女维尔德美夫人、亚力山大夫人、巴朗蒂尼夫人等四人。章蕴等参加接见。^②

5月19日 撰写《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反侵略的人士。指出：最近美国参议院在审讯约翰·

① 《宋庆龄选集》第341—343页。原载《苏联妇女》1955年第四期。

② 《人民日报》，1955年5月6日。

维·鲍惠尔夫妇^①时，有人认为凡是“和我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都是他们国家的卖国贼”。鲍惠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例子”。鲍惠尔“被指控为‘叛国’罪，他的夫人因他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幼小的孩子也受到牵累。”谴责美国政府“把所有主张在遵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道路的各国人之间实行和平谅解的人，都说成是‘卖国贼’”，使“反对侵略的人都受到迫害”。质问美国政府：“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指出：“当纳粹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威胁着我们”时，“我们同美国人民并肩作战”。末了说：“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埋没”^②。

5月26日 视察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听厂长和工会主席汇报生产、劳动保险及职工福利等情况。参观了车间、卫生室、托儿所、俱乐部、图书馆和单人宿舍。在托儿所停留了很长时间，极为高兴地和孩子门在一起。

5月27日 上午，和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的老工人、青工、技术员、管理员、劳动模范等十多人开了四个小时的座谈会。向工人了解其家乡粮食统购统销、文化生活、政治学习及婚姻等方面情况。下午，到工人住宅曹杨新村视察，访问先进工作者杨富

① 约翰·维·鲍惠尔，是解放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参加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代表。他1953年8月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就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后来，他和他的妻子又受到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妻子因此被解雇，他被诬陷为“不堪言状地出卖美国在远东的事业的行为”。所谓出卖，就是指鲍惠尔在美国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朝鲜战争的真相的文章，他本人为在朝鲜的美国战俘和他的家属传递过消息，以及在回到国内后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实况，并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② 《人民日报》，1956年5月20日。

珍等的家庭，询问其生活情况，并进行亲切的交谈^①。

5月30日 为即将召开世界母亲大会，作《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一文。表示“我们要尽力使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妇女的关系更加密切，使我们相知更深，使我们相互间的了解和尊重更加牢固。因为友好关系对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妇女要求和平，因为“任何战争，妇女总是最先和最沉重的受害者。”“人类和各国人民的进步，保卫和平和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都是紧密相联结成一体。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妇女儿童权利的获得必须经过“斗争”。因此，妇女“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原子战争的罪恶计划”，站在“阻止原子战争的最前线”。表示中国妇女将和全世界妇女一起，“尽一切力量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②。

5月31日 在上海会见日本东京都和平会议主席宫崎龙介和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委员宫崎世民等。接见时，金仲华在座^③。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强调指出：“关心儿童身心的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一个原则”。我们对儿童的关怀，是集体的社会主义方式，即“不断增加花在广大儿童身上的经费和精力”。批评对儿童的各种错误态度说：“社会交给每一位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一个庄严的责任：教养我们未来的公民，使他们诚实、勇敢、爱工作、爱祖国、爱同胞、并且有同志般的友爱精神。”“每一个人必须尽全部力量”，使“自己具有上述的品德”，然后，才能教育年轻的一代，“使他们具有这种品德”。“父母必须提供充满了爱、有原则和有意义的家庭，因为家庭是

①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本市进行视察》，《解放日报》，1955年5月31日。

② 《人民日报》，1955年5月31日。

③ 同②，1955年6月1日。

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基本单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以充满了对儿童的真诚的爱，来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获得主动性地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的动力。”最后指出：“必须履行我们对伟大祖国的责任，使它的儿女成为具有高贵品质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①。

6月4日 在上海寓所接待应政府邀请到我国访问的印尼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来访，共进午餐。^②

6月11日 赴江苏省松江专区视察工作，重点视察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所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合作社干部、老年、青年、妇女社员们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这个社的组织过程和生产情况，中农参加社的思想情况，社内经济利益的处理，新式农具的推广，如何帮助附近的新社、互助组和单干户，青年团在社里的作用，妇女参加劳动后家庭地位的变化，统购统销和“三定”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农民文化学习和卫生保健等各个方面，并征求农民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社员们发言非常热烈，用具体事实说明组织合作社后生产提高和收入增加，希望政府供给拖拉机和更多的化肥。座谈后，巡视了田地、水渠和副业生产。冒雨在泥泞的地里来回步行十余里。还访问了社员家庭。临行时对社员说：“希望你们努力生产，争取更美好的生活，为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榜样。”还视察了成立较迟、规模较小的松江县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同该社的干部、社员谈话。^③

6月14—15日 在上海市，先后视察第六医院、儿童医院、同仁医院和市妇女保健医院。分别听了医院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同护士、管理人员座谈，详细了解这些医院的工作、人员、设备

① 《宋庆龄选集》，第344—347页。

② 《人民日报》，1955年6月5日。

③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江苏松江专区视察工作》，《解放日报》，1955年6月14日。

等情况，及目前最流行的疾病和防治方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医务人员的学习和工作态度、病人对医院的意见和医院听取病人意见的办法等。视察了这些医院的门诊部、病房、营养室、厨房。在第六医院，一再询问实行保护性医疗制度，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和接受“姚大狗”事件的教训情况。并深入病房和病人进行了亲切谈话，征求他们对医院的意见，希望安心休养。在儿童医院，详细视察了儿童健康检查的各个项目，并关切地询问对儿童的营养和特殊照顾情况。在妇女保健医院，了解妇女产前产后检查、接生及多子女母亲情况，向正在休养的产妇了解无痛分娩法的效果。到婴儿室视察早产儿的健康状况。此前，还曾到公私合营仁德纱厂视察，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医务人员、多子女母亲、托儿所工作者、车间主任等进行座谈，并视察车间、托儿所、厨房，勉励他们说：“希望你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搞好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努力”^①。

7月5日 上午九时，在北京接待胡志明来访，交谈约三十分钟。^②

△ 出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等项。

7月5—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李富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彭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邓子恢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和周恩来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大会通过了五年

①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本市视察医院工作》，《解放日报》，1955年6月18日。

② 《人民日报》，1955年7月6日。

计划、国家预算、黄河规划和兵役法等重要议案。23日在大会上作题为《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发言，谈视察江南农村和上海纺织工业及社会福利事业的感受、情况和意见。指出：农村应重视“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加强工农联盟教育”。工厂中“正热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防止满足已有成绩的心理”，要“克服浪费”。认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分轻重缓急，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适当地解决人民的需要”，如办学校、建浴池等。指出：“医务工作人员态度不够好，群众意见比较多”，并“带有普遍性”，“应当首先加以改善”。还指出：五年计划是“和平建设的计划，它集中地表示着中国人民对于建立和平生活的长久愿望。”最后指出：“我们建设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增进人民的幸福，也将增进世界的和平”^①。

7月7日 在北京，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参加胡志明与我国会谈公报的签字仪式。

△ 晚，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胡志明。

7月8日 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到机场欢送胡志明离京去蒙古人民共和国。

7月21日 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起，到机场欢送胡志明回国。

7月29日 致函在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世界青年，指出：“你们具有一切条件来取得丰富的收获，这种收获不仅对你们个人有益处，而且通过你们，创造一种动力，来在全世界建立更深的了解和兄弟感情”^②。

8月10日 致电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感谢其为中苏友好协会主办日刊《俄文友好报》出刊一百期而赠给该刊的

① 《人民日报》，1955年7月24日。

② 《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贺信》，《人民日报》，1955年7月30日。

全套排字和印刷设备。谓：“我们得到了委派到我们这里来担任总编辑顾问的《真理报》副秘书长、和本报其他苏联工作同志在工作上给予的莫大帮助；现在又得到《真理报》给予我们的新的莫大帮助，赠送给我们这份珍贵的礼品。我们为《真理报》友好的支援所鼓舞，一定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使得《俄文友好报》在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事业中，作出应有的微薄贡献”^①。

8月20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所举行的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指出：廖仲恺是“中山先生的战友”。他“忠心耿耿、不分昼夜地执行了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大力地拥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政纲。”正因为他“那样赤诚地爱国，那样为革命努力，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要暗中谋害他。”不幸他被刺而牺牲。又指出：廖仲恺是“同盟会的积极会员”，“曾代表中山先生到日本热海地方去和越飞谈话”；以他“为党代表的黄埔军校，是革命武力的策源地”；他“对革命贡献很大”。今天纪念他，“要学习他”，要从他的牺牲“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即是：“帝国主义者要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面使用压力是不够的，他们必然要在我们阵营里培养一支反革命势力给他们利用。过去曾经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也还是如此。”“暗藏在我们中间的各种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两面派人物，却是很危险的。”“必须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防敌人的暗算，经常保持警惕”^②。

9月2日 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同刘少奇应邀出席越南大使黄文欢举行的招待会。

① 《人民日报》，1955年8月11日。

②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348—349页。

9月6日 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一文。指出：要关怀、培养儿童，“从各方面入手逐步满足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知识的滋养就是孩子们所迫切需要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供给他们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希望他们把为儿童创作列入“创作计划中”，并“鼓励和帮助年青的文艺工作者为儿童创作”。在文化馆、图书馆、编辑发行出版机构中服务的朋友们，过去“在供给儿童精神食粮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今后，要“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更多地出版、供销优秀的儿童读物，组织评价，引导儿童选择正当有益的读物。”此外“还需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增设儿童阅览室，给儿童更多的便利条件来购买和阅读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书籍。”明确指出：关怀爱护儿童，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并引高尔基的话说：“我们的孩子是生命的火花，它将放射出照亮许多世纪的火焰。……让我们共同努力，使这火焰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发出更为美丽的光彩吧”^①。

9月28日 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一起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式，并同参加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摄影留念。

△ 在北京饭店宴请苏尔科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吴玉章、沈钧儒、李德全、马寅初、邵力子及我国著名学者、作家、教育家五十余人出席作陪。

是月 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作题为《高举社会主义大旗英勇前进》一文。指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今天，“社会主义象一幅壮丽的图画，鲜明地、动人地展开在我们面前，党和政府对青年的关怀无微不至。”因此，“新中国青年一代是幸福的”，“新中国青年一代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朝气勃

^① 《宋庆龄选集》，第350—352页。

勃，勇往直前，站在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最前哨”，如革新者王崇伦、农业战线上的徐建春等等。教导青年：“决不能陶醉于当前幸福生活而停滞不前，决不应满足于现有的贡献与成就而故步自封。”“要用我们的双手，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艰险崎岖的，只有不怕艰苦的人才能达到幸福的顶峰。”因此，要“辛勤的劳动，刻苦的工作”，特别是要“努力学习，虚心学习，顽强学习，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①。

10月1日 庆祝建国六周年，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队伍。

10月4日 在北京，接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国际著名和平人士比利时伊莎贝丽·布伦姆夫人。接见时，李德全、史良、陈翰笙、刘贯一在座。

10月6日 在北京，接见印度卫生部长考尔。接见时，李德全、崔义田等在座。

10月7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宴会，欢迎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和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和夫人，及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和夫人。代表政协致欢迎词，说：“你们不但对保卫世界和平有卓越的贡献，而且一直热心于促进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你们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又说：“我们和你们的愿望和目的是共同的，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着人类当前最大的利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②。

10月14日 上午，在北京，接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

① 《宋庆龄选集》，第353—355页。

② 《人民日报》，1955年10月8日。

民会议访华团团长久原房之助和他的儿子久原统三郎，女儿久原文子。接见时，许广平在座。

10月15日 下午五时，在北京，同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接见上林山荣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全体团员。双方在友好气氛中，就中日两国关系和国际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①

是月 作《争取和平的新力量》一文。指出：“旧亚洲消失了，新亚洲正在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赢得自由的方式不尽相同，其共同的一点是：他们的人民同在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压迫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妥协的斗争。因此，现在亚洲人民在保卫他们已得的自由、摆脱贫困与无知的斗争中，“结成新的联合”。这“是东方世界的一个新力量，并且将影响整个世界。”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必须建立在“独立和世界和平的基础上”。著名的五项原则是争取和平的新力量的化身，这不仅是亚洲国家，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准则。五项原则提出一年多来，使许多国家通过条约联合到一起，并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奠定了基础”。新型的国家要求联合国倾听人民的呼声，用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最后，明确表示：中国以五项原则为准则，“继续寻求同东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为世界和平工作，为使全世界人民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及生活的幸福而工作”^②。

11月7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八周年，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在世界各个地方取得愈来愈大的胜利，……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的趋向。”国际和平力量“空前地扩大，谋求国际谅解、互相信任和发展国际友好合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6日。

② 《中国建设》，英文版，1955年第十期。

作，已成为世界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的一致呼声。”但是，“通往和平和国际合作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有人“力图破坏‘日内瓦精神’”。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要进一步加强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中的团结”。表示在为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永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团结一致，并给予苏联以全力支持”^①。

11月8—11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及《1956年国家建设公债条例》等。

11月29日 在云南省晋宁县，视察云南农业劳动模范李能领导的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同该社妇女干部交谈妇女工作情况，并到田间访问正在劳动的妇女生产队。向该社干部询问对烈军属、老弱社员和复员军人帮助的情况，社员政治教育，福利事业，以及怎样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斗争的情况。同时，听取他们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勉励大家保持先进、巩固已有成绩^②。

12月1日 致电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祝贺国际妇联成立十周年。指出：“全世界的和平保卫者的责任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为继续争取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维护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而付出更大的力量。这样才能为创造妇女儿童的幸福瑰丽的生活提供可靠的保证”^③。

12月16日 晨，应印度政府的邀请，由昆明乘印度政府所派专机赴印度访问。随同前往的有廖承志、陈翰笙等十人。郭影秋、张冲、刘岱峰等一百多人及印度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到机场欢送。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抵加尔各答。在机场欢迎的，有西孟加拉首席部长及其他官员、我国驻西孟加拉总领事柳雨峰及夫人、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8日。

②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云南视察工作》，《解放日报》，1955年12月2日。

③ 《电贺国际民主妇联成立十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日。

华侨代表等。^①

△ 印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欢迎宋庆龄来访。声明赞扬其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说：“不论她在我国走到什么地方，我国人民都会给她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从而将加强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纽带”^②。

△ 印中友协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其访问。声明说：“她从我国民族斗争的初期起就是我国的忠实朋友”。“希望印度人民将给她以热烈和诚恳的欢迎”。并且号召印中友好协会各地分会尽到特别的责任。^③

△ 新德里所有报纸都以首页刊登其访问印度的消息，并发表评论欢迎她。各报还刊了她的小传及照片。

△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到达新德里机场。在机场欢迎的，有印度总理尼赫鲁，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及使馆工作人员，还有印度政府其他官员和各界代表，印共总书记高士·爱德华、印中友协主席潘尼迦、印度妇女全国委员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群众团体代表，苏联驻印度大使曼希科夫和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华侨代表。在机场发表讲话，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欢迎。并说：“我的印度朋友曾经两次邀请我来贵国，然而英国当局两次都拒绝发签证给我。现在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才使得你们的老朋友能够实现她的愿望。”指出：“印中两国自古以来早就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的团结和合作，对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正起着重大作用。”^④ 随后，在尼赫鲁陪同下赴总理官邸下榻。

12月17日 上午十一时，受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接见，并在其引导下，参观总统府花园。随后，赴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7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在印度机场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8日。

南博士官邸，受拉德哈克里希南接见。

△ 拜谒甘地火葬场，并献了花圈。

△ 中午，由袁仲贤陪同，拜会印度国会人民院议长马瓦尔卡。

△ 下午，出席尼赫鲁举行的欢迎招待会。印度政府官员及各政党国会议员、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尼赫鲁夫人和社会名流，还有袁仲贤及各国驻印外交使节等共二百五十人参加招待会。招待会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

△ 晚，应邀出席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举行的欢迎宴会。参加宴会的，有尼赫鲁及印度政府官员，还有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袁仲贤及许多国家驻印使节也应邀出席。在拉德哈克里希南致欢迎词后，于致答词中指出：和平共处是“中印两国关系的基础”。我们曾“为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共同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一共同愿望“是进一步发展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中印两国更密切的合作“不仅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也将有助于保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①。

12月18日 上午，参观新德里儿童合作组织，受到儿童们的热烈欢迎，并接受儿童献的花环。随后，访问齐特普尔合作农场，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同农民进行交谈，并访问他们的家庭。

△ 午，应总统普拉沙德邀请，赴总统官邸出席午宴。

△ 下午，应新德里市政委员会主席鲁·纳·阿加瓦尔之请，出席欢迎集会。接受阿加瓦尔代表德里市人民的献旗赠礼，并发表演说。说“访问印度这个伟大国家一直是我个人多年的愿望”，并引毛泽东的话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

① 《在印度副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9日。

很好的人民。”指出：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采取了“各种行动”，特别是在台湾和果阿问题上相互支持。谈到远东问题时，表示：“中国支持召开远东会议，以便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并表示愿就台湾地区的“中美紧张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主张“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①。

12月19日 上午，参观印度工业博览会各个展览馆和印度的手工业馆、手织机馆。还参观了苏联馆、巴基斯坦馆、中国馆。对印度五年计划很感兴趣。接受印手工业局局长卡马拉德维·查托巴迪雅亚夫人赠送的两个玩偶，说：“将把印度朋友的这些礼品，送给上海的少年宫”^②。

△ 在印度政府国会事务部秘书恩·克·博杰瓦尼陪同下，访问印度国会联邦院和人民院。听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应女议员之情，出席为其所设的宴会。参加宴会者，有三十位女议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驻国会秘书拉克希米·梅农夫人、国大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共产党议员雷努·查克拉瓦蒂、人民社会党议员苏契塔·克利伯兰尼夫人。

△ 下午四时，出席我国大使袁仲贤为其访问印度举行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尼赫鲁、拉德哈克里希南和印度政府其他官员，印度各界著名人士如克其鲁、索克·森德拉尔、潘尼迦、乌玛·尼赫鲁夫人、斯瓦米纳坦等，及印度国会议员们，还有驻印各国使节。

△ 下午六时三十分，出席印中友好协会在海德拉巴大厦为其举行的招待会。潘尼迦致欢迎词，乌玛·尼赫鲁夫人也讲了话。在致词中，表示中印两国将加强关系，促进经济和文化交

① 《在新德里市政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0日。

②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2日。

流。谈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说：在“进行国家建设的长期进程中，这仅仅是开始。”我们“需要和平环境”。表示“愿同一切国家，特别是我们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①。

12月20日 上午，访问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 出席印度大学妇女联合会为其举行的午宴。

△ 下午四时，出席印度二十六个妇女团体在德里红堡联合为其举行的欢迎会。社会各阶层妇女五百人参加大会。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在会上致欢迎词，并赠送纪念品。在致答词中，表示：“衷心希望中印两国妇女，以及亚非国家的姐妹们，能够建立起持久的相互关系，并且保持彼此间的接触，以便发展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并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②。

△ 晚，在国家体育馆观看印度音乐戏剧院组织的音乐舞蹈表演。

12月21日 上午，乘飞机离开德里，前往亚格拉参观泰吉·玛哈尔陵。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到机场欢送。印政府外交部驻国会秘书和袁仲贤随同前往。

△ 下午，从亚格拉到达波保儿。当晚，参观有历史意义的桑吉佛塔和其他古迹。

12月22日 上午，参观波保尔城的建设工程和结核病医院，及巴拉加村的乡村发展计划工作。应邀出席波保尔首席部长特设的午宴。

△ 下午五时，偕随行人员到达孟买，受到孟买省代理首席部长布·斯·希雷伊的热烈欢迎。在场的还有中国总领事姚念和各国领事、当地各妇女团体和印中友好协会的代表。在希雷伊陪同下到政府大厦休息。

① 《在印中友好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1日。

② 《在新德里妇女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2日。

12月23日 出席印中友好协会孟买分会在无线电俱乐部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讲话，表示：“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于爱好和平国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大大地缓和了。但是，在进一步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障碍。”相信“依靠世界和平力量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这些障碍最后终能被克服”^①。

△ 晚，出席孟买市政机关在卡马拉·尼赫鲁公园举行的欢迎会。孟买市代理首席部长、市政官员及著名人士六百多人参加欢迎会。

△ 晚，出席各妇女团体在基尔德坦克广场举行的欢迎会，接受四十个妇女团体代表所献的花环，并观看小学生表演的马拉蒂舞和古吉莱特舞。

12月24日 上午，参观孟买塔塔纺织厂和博物馆。在惠灵顿运动场俱乐部，与孟买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们共进午餐。

△ 下午，在政府大厦接见孟买著名的女教育家们和社会福利工作者们。

△ 晚，出席孟买二十九个妇女团体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印两国妇女，曾遭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压迫”。现在，“获得了独立”，正在重建“各自的国家”，并“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指出：中印两国妇女必须加强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她们的应有的作用”^②。

△ 晚，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接见孟买华侨代表。

△ 晚，出席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姚念为其访问举行的招待会。来宾一百多人，有孟买首席部长斯·希莱、孟买文化团体代表和著名人士、各国驻孟买领事。

12月25日 偕随行人员，从孟买到加尔各答。途经那格浦尔

① 《在印中友好协会孟买分会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5日。

② 《在孟买妇女团体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6日。

作短暂停留，受到中央省府和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12月26日 上午，赴政府大厦，拜会西孟加拉省省长赫·克·慕吉克和首席部长罗伊。

△ 下午，出席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举行的欢迎会。各界人士三百多人参加。西孟加拉省立法会议议长、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主席沙·库·慕克吉致欢迎词，并代表友好协会赠送纪念品。去年访问过中国的加尔各答新闻工作者德·纳·达斯·古托塔也向其赠送纪念品。在致答词中指出：“在促进中国和印度的友谊方面，印中友好协会和中国的中印友好协会担负着很大的责任。”谈到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互访和他们关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指出：“已经进一步加强了中印两国的关系”，并表示将“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强我们的经济合作”^①。

△ 晚，出席西孟加拉省省长赫·克·慕克吉在省长官邸举行的宴会。西孟加拉省政府高级官员、立法会议女议员，加尔各答市市长出席作陪。袁仲贤、柳雨峰也应邀出席。

12月27日 晚，出席加尔各答二十二个妇女团体举行的欢迎会。参加大会的有各界妇女五百人，袁仲贤和领事馆女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会。受到西孟加拉传统方式的欢迎。西孟加拉省难民善后部部长致欢迎词，并赠送一块特制的上面绣着欢迎辞的绸缎。在致答词中，强调指出：中印两国五亿妇女的团结所产生的力量，“有助于树立近十亿人民的权利，我们将在团结中进行我们的和平建设。”并指出万隆会议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五项原则的影响已“超出了亚洲，并且正在成为全世界国际道义的准则”^②。

① 《在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分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8日。

② 《在加尔各答妇女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9日。

12月28日 从加尔各达飞抵马达加斯加。省长普卡萨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及各界人民团体、当地华侨代表到机场迎接。

12月30日 出席印度社会工作会议第八届年会，并发表讲话介绍中国社会福利工作。指出：“和平和福利事业是不可分割的。让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从事这个共同的事业”^①。

12月31日 同随行人员回到新德里，受到尼赫鲁和其女儿甘地夫人的接待。回德里途中，在阿兰迦巴作了短时间的停留，并乘车参观爱楼罗印度著名的古代石窟。^②

是月 访印期间，致函《中国建设》杂志社，询问在扩大杂志发行方面有什么事需要其帮助。^③

1956年（丙申） 六十三岁

1月1日 下午七时，在新德里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告别广播演说。谓：“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指出：“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每一个国家必须享有机会获得发展和作出进步，以有利于全人类”^④。

1月2日 结束在印度十七天的访问，于上午八时十分率随行人员离开新德里前往仰光。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他高级官员，印中友好协会和群众团体代表，缅甸驻印大使和各国使节，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等到机场欢送。^⑤

△ 应缅甸政府邀请，率随行人员乘专机于下午三时三十分

① 《在印度社会工作会议年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1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日。

③ 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宋庆龄纪念特刊》。

④ 《向印度人民发表告别广播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

⑤ 同①。

到达缅甸。到机场欢迎的有：缅甸总统秘书吴巴盛、昂山夫人都庆枝及其他官员。缅驻中国大使吴拉茂、缅中友好协会主席信波博士和群众团体代表，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及使馆人员、华侨代表，苏联驻缅甸大使及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中缅两国“国境毗连，两国间在很久以来就和睦相处；文化和经济交流在久远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我们都遭遇过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且都在经历过一系列的艰巨的独立斗争之后，在前后相差不远的时间获得了我们的一代人们所毕生企求的民族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两国的友好和睦关系日渐增进”。表示：把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缅甸人民“是我的任务”。“愿中缅友谊与日俱增”。旋在姚仲明大使陪同下，赴缅甸联邦总统府休息。^①

△ 晚，应邀出席缅甸总统巴宇举行的宴会。参加宴会的，有吴努、昂山夫人都庆枝及其他官员。姚仲明也出席了宴会。

1月3日 上午九时，在昂山将军陵墓前献花圈。

△ 上午，访问缅甸联邦国会民族院议长和国会代表院议长。

△ 中午，在姚仲明陪同下，访问缅甸总理吴努，并在总理官邸同吴努共进午餐。

△ 下午三时，应邀出席仰光市长在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会。在市长吴盛佩致词后，于致答词中表示：“要持续发展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关系”^②。

△ 下午四时，应邀出席吴努夫人都妙意在仰光童子军营举行的招待会。

1月4日 交吴努一信和一万缅元的捐款，表示对几天前遭火灾的仰光居民的同情。^③

① 《在缅甸机场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

② 《在仰光市长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5日。

③ 同②，1956年1月8日。

1月5日 上午，在仰光参观著名的大金塔。参观后，在意见簿上写道：“祝中缅两国友谊日益增进，愿亚洲与世界和平日益巩固。”还参观了和平塔和大石窟。在大石窟里看到供奉着从中国奉迎到缅甸的佛牙。^①

△ 下午四时三十分，应邀出席缅甸社会服务委员会举行的欢迎茶会。

1月6日 上午，应邀出席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为其举行的政治大会。参加大会两千多人。吴努讲话说：宋庆龄“同她的卓越的丈夫一样，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为她的祖国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繁荣而不倦工作的人。在那个伟大国家的许多变动中，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表题为《为和平而奋斗的中国和缅甸》的演说。指出：“中缅两国是很好的邻邦。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两国人民对于安全和进步的愿望上面的。”中缅两国关系，是“亚洲各种关系编织起来的整个结构的一部分”。它证明：“亚洲人民是极其亲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地区“获得广泛的赞许也是很自然的”。表明“亚洲人民中间存在着广大的一致性”。又指出：“亚洲觉醒了的人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求同存异的道路”。“我们都根据这一信念行事，那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来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内政。”说：“就中国人民来说，我们是要和平的”。相信缅甸和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想法。提出召开一个讨论有关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并认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在内，须要一个集体和平公约。明确表明：“中国将象过去一样支持任何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价值的必要的步骤”。末了说：“让我们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把亚洲和世界和平和进步向前推进”^②。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月6日。

② 同①，1956年1月8日。

△ 下午，由巴宇、吴努陪同，出席巴宇在总统府花园举行的招待会，庆祝缅甸独立八周年。

1月10日 晚，出席我国大使姚仲明为其访问缅甸举行的招待会。吴努及缅甸官员和华侨领袖共三百多人应邀出席。

1月11日 由吴努陪同，乘飞机到曼德勒访问。在机场欢迎的，有缅甸内政部长波庆貌格礼及群众团体代表一千多人。

△ 晚，出席曼德勒专员吴盛为其举行的招待会。

1月12日 出席曼德勒市长吴迎在曼德勒皇宫花园举行的欢迎茶会。

△ 晚，同波庆貌格礼共进晚餐。随后，观看缅甸艺术表演。

1月13日 出席曼德勒市政当局举行的全市欢迎会。一千多市民参加大会，有学生、工人、政府公务员、各党派团体代表、华侨代表。在内政部长波庆貌格礼致欢迎词后，发表演说。说：

“在我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一向是战友。中国人民始终真诚地支持缅甸人民在保持国家独立的事业中和国家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中国对缅甸政府和人民支持台湾归还中国和你们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而作的正义的努力深为感激。”引用周恩来在缅甸联邦国庆日说的话：“中国愿意象过去一样，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给予缅甸一切可能的帮助。”指出：“我们保持最密切的友好合作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是邻邦，我们都有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又因为我们两国都需要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获得现代化发展。”还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确定为国际道义的准则。……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提高警惕，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击败和平的敌人。”号召：“把万隆会议精神扩大到亚洲和非洲的一切地区和全世界，这是我们崇高的共同的任务”^①。

① 《在曼德勒全市欢迎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1月15日。

△ 下午四时，抵缅甸掸邦首府东枝（掸邦位于缅甸东北部，同中国接界，是缅甸最大的一个邦），受到五千多人的夹道欢迎。正在病中的缅甸外交部长兼掸邦政府主席藻昆卓，也写信表示欢迎。^①

△ 晚，出席掸邦内政部长藻吞埃代表藻昆卓在东枝政府大厦举行的欢迎宴会，并接受藻吞埃赠送的土产。

1月14日 上午，游览了掸邦著名的英莱湖。

1月15日 参观掸邦农业实验室、和有三十五名工人工作的罐头制造生产合作社及政府举办的手工纺织学校。

1月16日 访问海拔四千二百英尺的风景区葛鲁。

1月18日 下午四时半，从东枝乘机回到仰光。

△ 下午五时，在中国使馆举行的茶会上，接见仰光各界华侨代表一千多人。

△ 晚，应邀到吴努的官邸，同吴努共进晚餐。

1月20日 在仰光大学发表演说。指出：“拥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友谊的力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过去未有过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由印度、中国和缅甸制定和宣布的和平共处原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要求和平。世界的争取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又指出：“这一切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他们仍然企图用一切办法来分化我们。……仍然企图奉行他们的在世界屠杀的阴谋中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我们的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在这个反对殖民主义和奴役的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在介绍中国高等教育情况时指出：“高等教育同经济建设是不可分的，一方面高等教育培养建国人材，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必然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②。

① 《解放日报》，1956年1月16日。

② 《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1月21日 下午，访问缅甸第三大城市毛淡棉，昂山夫人都庆枝、姚仲明、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陪同前往。在机场上受到一千多人的欢迎。在发表简短的谈话中，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目标。^① 旋参观该市的孤儿院，观看大象拉木材，并游览毛淡棉城。

△ 午，出席当地华侨为其举行的欢迎茶会，八百多人参加。

△ 下午五时回到仰光。晚，同缅甸总统巴宇共进晚餐。

1月22日 晚，在仰光举行告别招待会。出席的有吴努和缅甸其他官员，苏联和其他国家使节。讲话中表示感谢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着重提到缅甸政府和人民对促进亚洲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的贡献。^②

1月23日 在仰光发表广播演说，向缅甸人民告别，感谢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款待。指出：“确信中缅友谊将日益发展，不会因敌人的恶意诽谤而受到损害。”中缅两国，“必须反对殖民主义”；“必须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铲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必须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这种独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我们有这些共同关心的事，所以没有理由不能在我们之间建立持久的友谊”^③。

△结束在缅甸二十一天的访问，离开仰光，应邀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到机场欢送的，有吴努夫妇及缅甸政府官员，苏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使节和姚仲明等。^④

1月24日 下午，率随行人员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亦译喀喇蚩）。到机场欢迎的，有穆罕默德·阿里总理及其他官员，

① 《在缅甸毛淡棉机场的讲话》，《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23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4日。

③ 《在仰光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宋庆龄选集》，第356—358页。

④ 同②，1956年1月24日。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还有各国使节。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将对加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有进一步的贡献。^①

△ 晚，应邀出席阿里为其专设的欢迎宴会。

△ 晚，出席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哈·胡·乔德里在国宾馆举行的招待会。阿里及其他政府官员、卡拉奇的著名人士、韩念龙及各国外交使节出席作陪。

1月25日 由韩念龙陪同拜会阿里，接受阿里赠送的礼物。

△ 上午十时，赴国宾馆会见哈·胡·乔德里。

1月27日 下午，从卡拉奇到达拉合尔。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表示能访问巴基斯坦这个文化中心拉合尔，感到非常高兴。说：对万隆亚非会议，“我们两国都作过贡献。我们两国都希望和平，并且都正在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我们有许多共同点，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②。

△ 晚，出席西巴基斯坦省政府专为举行的招待会。

1月29日 下午，出席卡拉奇市长阿里举行的全市欢迎会。阿里致词说：“中国象征着亚洲各国人民当中的一种要求使 他们各自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一席光荣地位的、新的觉醒和新的动力。因此，巴基斯坦是新中国最热情的钦佩者之一。”赞扬宋庆龄是热爱国际和平和社会正义的人们应该效法的榜样，特授予“卡拉奇公民权”，并赠送了放在精致的银盒中的金钥匙。在致答词中，说：中巴两国“都拥有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和平的邻居”^③。

△ 下午六时，接待巴基斯坦省督顾尔马尼来访，并接受顾尔马尼赠送的礼物。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② 《在拉合尔机场发表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9日。

③ 《在卡拉奇欢迎会上的答词》，《解放日报》，1956年1月31日。

△ 邀请阿里和夫人到中国大使馆观看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 晚，应邀在巴基斯坦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指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不能说造成极大破坏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引起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并肩作战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在最近的万隆会议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尽管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却一致宣布它们要共同致力于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明确指出：“殖民主义是同争取和平不相容的”。因为“它最后总是引向战争”。说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将会而且必须加强，这不能不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并“对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幸福有所贡献”^①。

1月30日 上午八时三十分，乘巴基斯坦总督专机离开卡拉奇，前往东巴基斯坦访问。行前，在国宾馆接待阿里来访，作短时间交谈后，同去机场。阿里在机场赠送了其在各地访问的照片册。^②

△ 下午，到达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在机场受到六百多人的欢迎。当走下飞机时，受到东巴基斯坦省督阿密尔丁·艾哈迈德和该省首席部长艾·赫·萨卡尔的欢迎。接受全巴基斯坦妇女协会东巴分会主席斯·纳·马茂德所献的美丽的花环。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我相信东巴基斯坦人民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给你们带来了他们的好意”^③。

△ 晚，应邀出席达卡首席部长萨卡尔举行的宴会。

1月31日 上午，访问达卡公立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院长，巴基斯坦著名艺术家宰努尔·阿巴丁陪同下，观看巴基斯坦风景

① 《在巴基斯坦电台发表广播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

② 《解放日报》，1956年2月2日。

③ 《在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机场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2月2日。

和农民生活的绘画及刺绣、泥塑等艺术品。出席艺术院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举行的欢迎会。^①

△ 下午，接受巴基斯坦总督伊斯坎德尔·米尔扎赠送的一只银质模型船。

△ 晚，应邀出席米尔扎和夫人在达卡政府大厦举行的宴会。

2月1日 下午，在政府大厦接待米尔扎和夫人的来访，交谈二十余分钟。^②

△ 下午四时，出席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仪式。参加仪式的有达卡大学教职员、学生、在达卡的各国外交代表。副校长詹金斯博士宣读了授予学位的嘉词。达卡大学名誉校长艾哈迈德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在致答词中，说：“授与我荣誉学位，在我看来，是你们对我的国家和人民的友谊的象征。深为感激”^③。

△ 晚，出席全巴基斯坦妇女协会东巴基斯坦分会在达卡专为举行的招待会。参加招待会者，有巴基斯坦总督米尔扎和夫人、东巴基斯坦省督哈迈德和夫人、东巴基斯坦政府各部长夫人、达卡妇女界著名人士，以及各国驻达卡的外交代表的夫人。

△晚八时，在达卡巴基斯坦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向巴基斯坦人民告别。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我们两国现在都在进行各自的国民经济建设。”我们两国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都希望增进我们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经济联系。”“都珍视我们的国家独立、并且必须巩固和保卫它。”又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人民都是亚洲的人民。我们应当彼此同情。

① 《解放日报》，1956年2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

③ 《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

我们不只是邻居，而且还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要争取，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够成为好朋友”。深信中国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促进我们的友谊”^①。

1月24日——2月1日 访巴基斯坦期间，致函《中国建设》杂志社。说“虽然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但必须把这封信寄出。在我们所访问的三国中，根本买不到尼龙打字带。……现寄上一盒雷明顿打字带。”^②（按：五十年代时，我国打字带的油墨较差，而且不耐用。）

2月2日 在巴基斯坦访问九天后，上午九时，率随行人员离开达卡取道仰光回国。东巴基斯坦省督艾哈万德陪同乘汽车去机场，在机场欢送的有东巴基斯坦省政府高级官员、达卡妇女界著名人士、驻达卡各国外交代表。^③

△ 中午，到达仰光。

2月4日 上午，离开仰光，吴努和夫人到机场送行。

△ 下午一时四十分，飞抵昆明。郭影秋等一千多人到机场欢迎。

2月5日 下午，乘机回到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彭真、李维汉、陈叔通、陈嘉庚、李德全、许广平、史良、巴基斯坦和印度驻华大使、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共一千多人。^④

2月7日 在北京，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式，受到会议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

2月11日 同钱俊瑞一起，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向苏联人民致

① 《在达卡发表的广播演说》，《宋庆龄选集》，第359—360页。

② 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宋庆龄纪念特刊》。

③ 《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

④ 同③，1956年2月6日。

以最热烈的祝贺。电称：“六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有了极大发展，这对中苏两国的繁荣给予了巨大和深厚的影响。”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中国的援助。^①

2月13日 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来电，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②

2月18日 作《视察云南省工作的报告》，报告1955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在云南和昆明所作的六天视察工作。指出：云南这个“具有优良自然条件的省份是个好地方。可是由于交通不便，工业技术落后，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目前，云南除了可以发展粮食的生产以外，还可以大大地发展经济作物。……如何贯彻执行发展云南交通的计划，特别是修通昆明的铁路计划，和大力提高技术，发展与农业相适应的工业是发展云南经济的重要条件。”还指出：由于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也就成为云南省的一项重要工作。”认为中央“在这项工作上应予以更多的帮助”。在谈到提高技术问题时说：“职工同志们要求学习技术，学习文化，……但是由于当地条件不够好”，因此，“中央予以适当的帮助是很必要的”^③。

3月10日 在北京，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作《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访问报告》，详谈访问经过和观感。当谈到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时说：“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我说：人类的进步是愈来愈快的，这固然是由于文化的积累，可是也由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不断的提高”，“今天，广大人民逐渐认识到战争的威胁

①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4日。

② 同①。

③ 《宋庆龄选集》，第361—363页。底本未注明向何处作此报告，从内容判断，可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报告。

和战争的危害。因此，这几年来，和平友好力量到处在逐渐壮大。……我们只要认识了历史前进的过程，我们就有百倍的勇气克服一切困难，向前迈进。”^①会议认为其访问三国增加和发展了中国人民同这三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对其访问工作，一致认为满意。

4月18日 致电《俄文友好报》编辑部，祝贺该报创刊一周年。说：“在这一年里，和平力量更加壮大和更加巩固了；在这一年里，中国和苏联继续沿着进步的道路向前迈进。”“希望《俄文友好报》在促进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合作事业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4月19日 在上海，由许建国陪同，参观工业生产先进经验展览。赞许上海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热情和重大成就，并为展览会题词：这个展览，“充分地显示出中国人民从事劳动的高度热忱，并且向全世界显示出中国人民为增进和发展同各国之间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和保卫和平反对战争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③。

4月21日 发表《纪念伟大的列宁——为苏联〈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作》一文。说，“列宁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孙中山在生前对他极为崇敬的，他曾将列宁誉为‘革命中之圣人’。”又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他说，‘因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希望’。”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在我的祖国实现”^④。

4月24日 致函祝贺国际民主妇联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理事会会议。指出：“这次理事会会议正好在世界各地要求和平的情绪和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举行。这个时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争取民族

① 《人民日报》，1956年3月17日。

② 《中苏友好报》，1956年4月18日。

③ 《参观上海工业生产先进经验展览题词》，《解放日报》，1956年4月21日。

④ 同②，1956年4月21日。乌里扬诺夫斯克，是列宁的故乡。

自治和复兴的运动在亚非人民中继续汹涌澎湃的时候。和这两个伟大的运动同时并进的还有争取妇女和儿童权利的不懈斗争。国际民主妇联的工作就是这个斗争的非常光辉的象征。”又说：“现在已经具备了在我们所最珍视的这些事情中取得新的胜利的条件，请相信这次理事会会议将进一步证明这是一个事实”^①。

5月6日 在上海私邸的草坪上举行茶会，招待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妇女朋友（系在北京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后到上海参观）。其中有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副主席埃及的西萨·纳巴拉奥维、尼日利亚的兰索姆·古蒂夫人等。接受埃及西萨赠送的一幅素描像和一封信，并对她们说：“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正在全国一致地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和平建设工作，上海正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祝贺大家身体健康，祝贺保卫和平，保卫妇女儿童权利的共同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管弦乐队为贵宾们表演精彩节目后，又说：“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我希望你们能欣赏并记住这些为我们中国孩子所喜欢的音乐。当你们回国以后，把它带给你们的孩子。愿所有的孩子在以后的年代里，生长在友谊与和平之中。”^② 李仲培、胡子婴等出席作陪。

5月7日 在上海私邸接见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后来上海参观的三位巴基斯坦妇女代表。接见时，沈粹缜在座。

5月11日 下午三时，在上海寓所接待到上海访问的尼泊尔妇女代表、国际民主妇联理事普·普·德维夫人和拉克·德维·西娃小姐，进行了亲切友好交谈。接受她们代表尼泊尔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和尼泊尔全国妇联赠送的尼泊尔制毛毯、拖鞋和金属手饰，及阿查里雅写给她的信。回赠她们每人一朵红月季花和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建设》。^③

① 《给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会议的贺信》，《人民日报》，1956年4月25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5月7日。

③ 同②，1956年5月12日。

△ 下午四时，在私邸草坪再次举行茶会，招待前来上海参观的二十四个国家的妇女代表。接受印度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分别赠送的台布、人参等。向各国朋友们致欢迎词。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向客人们表演了精彩节目。^①

5月12日 复函尼泊尔首相，感谢对中国人民的崇高友情，特别是对中国妇女所作的评价。说：“中国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我国人民以一个团结而有组织的力量出现了。”我们“要求和平和进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在我们英明的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在把一个封建的国家转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道路上前进，我国的人民正在以从来未有过的热情、创造性和力量重建着我们的国家。”该函托正在上海访问的德维夫人转交，并请将《为新中国奋斗》及中国出产的景泰兰器皿、刺绣品、钢笔等纪念品带回转给首相和夫人。^②

5月3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发表《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一文。指出：“儿童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人类命运”。“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具体地说，就是要为“儿童健康的成长创造各种条件”。要“用很多的精力去培养、教育儿童。……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正确地形成观念、行为和性格的基础。教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并且让他们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③。

6月1日 发表《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为苏联〈少年先锋队真理报〉作》一文。指出：在世界各地，“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和平地生活以及能够从事建设。因为和平和建设这是人类两

① 《人民日报》，1956年5月12日。

② 同①，1956年5月14日。尼泊尔首相给宋庆龄的信，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12日。

③ 同①，1956年5月31日。

个崇高的愿望。”“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使中国和苏联成为美丽的、具有伟大成就的乐土。”勉励苏联少年儿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增进知识，加紧学习”^①。

6月3日 下午，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别市市长苏迪诺和他的夫人、副市长达努布罗托及随行人员。接见时，张苏、胡愈之等在座。

6月13日 为欢迎尼泊尔王国驻中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拉纳，同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彭真、彭德怀等，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宴会。

6月14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并批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

6月15—30日 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批准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②

6月25日 致电加尔各答印中友好协会，祝贺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两周年。指出：两年两国总理根据五项原则发表的宣言表明，拥有人类半数的中印两国同意遵守这些原则。两年来，“各地千百万的人民已经看到这些原则的价值”和“实际意义”，并且“要求全世界根据这些原则行事”。“这就是我们两国人民已经指出的通往世界持久安宁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伟大人民之间以前存在，今天存在和将来永远存在的深切友谊的结果”^③。

7月10日 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该国政府的邀请访问

① 《中苏友好报》，1956年6月1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0日。

③ 同②，1956年6月28日。

印度尼西亚，率代表团离开北京，拟飞经昆明、仰光前往雅加达。在北京机场送行的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云等。^①

8月8日 在昆明翠湖宾馆接见以巴·夏尔马为团长的尼泊尔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交谈。尼泊尔著名诗人屠拉达尔将个人的诗集，约西夫人将自己的项圈，沙小姐将自己的手镯分别赠与。^②

8月11日 率领代表团乘专机离开昆明，由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参赞萨尼陪同，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谢富治、刘明辉、陈康，各民主党派、机关和团体负责人等一百多人到机场送行。^③

△ 在赴印度尼西亚途中抵仰光。在机场欢迎的有缅甸副总理藻昆卓、吴努夫人都妙意和昂山夫人都庆枝、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及使馆工作人员、印度尼西亚驻缅甸代办及在仰光的各国外交使节、华侨代表。^④

△ 在仰光，致函缅甸总理吴巴瑞慰问地震灾民，并附一万缅元的汇款作为对灾民救济基金的捐款。^⑤

8月12日 出席缅甸总统巴宇在总统府举行的茶会。姚仲明及夫人等应邀参加。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和昂山夫人都庆枝出席作陪。

△ 出席缅甸总理吴巴瑞举行的宴会。宴会前，同吴巴瑞进行半小时的友好谈话，关怀最近缅甸发生的地震，对灾民表示同情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7日。据新华社7月16日电，宋庆龄到昆明后因身体不适，暂不宜长途旅行，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日期（原定7月18日—22日）另定。

② 同①，1956年8月9日。

③ 同①，1956年8月12日。

④ 同①，1956年8月13日。

⑤ 同①，1956年8月14日。

慰问。向吴巴瑞和夫人赠送了礼物。①

8月13日 上午九时，拜访缅甸前总理、现任缅甸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和夫人。在吴努官邸，进行了一个小时亲切友好的谈话。

8月14日 晨一时，抵雅加达。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夫人、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普里约诺教授和其他高级官员及社会名流在机场欢迎。还有一万多人黑夜里等候在机场外面欢迎。在机场发表讲话，说：“在你们为民族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心常常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对你们的同情，随着我们自己为了同样的目标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更加强。”认为：“我们之间的友谊的增长和我们的合作的扩大，对于必将属于我们的最后和必然的胜利，是很重要的。”希望这次访问会促进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接触。②在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陪同下驱车前往独立宫，在那里受到苏加诺和哈达副总统的欢迎。

△ 上午十时，前往副总统官邸拜访哈达。随后又访问印度尼西亚国会。

△ 应邀出席苏加诺专为举行的宴会，随行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及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和夫人也应邀参加。宾主在友好中恳切交谈。③

△ 下午，由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陪同，前往印度尼西亚革命烈士墓。在乐队的哀乐声中献了花圈。

8月15日 由黄镇及张苏陪同，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官邸拜访。

△ 上午，出席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普里约诺在国

① 《人民日报》，1956年8月14日。

② 《在雅加达机场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

③ 同①，1956年8月16日。

家宫专为举行的茶会。在普里约诺致欢迎词后，于致答词中表示感谢邀请，说：“我带着我国人民的深厚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来到你们的国家”。相信“互相间的友好访问和文化交流不仅将巩固两国的友谊，而且将在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中起重要的作用”^①。

△ 下午，出席印度尼西亚华侨代表在雅加达举行的欢迎会。一千五百名代表分别从爪哇、棉兰、望加锡等地赶来（其中有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的会员和国民党的党员。在讲话中，报告了祖国经济建设情况，勉励华侨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建立巩固的友谊，友好地在一起生活。”讲话后，接受华侨所献锦旗和礼物。^②

△ 晚八时，出席苏加诺专为举行的盛大国宴。哈达和夫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各国外交使节出席作陪。苏加诺发表演说，说：“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许多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并说是在读了孙中山的著作之后才知道“亚洲是一家”这个概念。认为：“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在致答词中，祝贺印度尼西亚建国十一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当谈到亚洲近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后说：“一切国家，不问其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看待别人的情况下，国家之间才能够有真正的友谊和巩固的和平”^③。

8月16日 出席印度尼西亚妇女团体领袖在雅加达专为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致词说：“我们妇女尤其憎恨战争”。我们“要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团结起来，以便我们能够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寻求和平”^④。

① 《人民日报》，1956年8月16日。

② 同①，1956年8月17日。

③ 《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8月17日。

④ 同①，1956年8月18日。

△ 晚，出席印度尼西亚国会举行的特别会议，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一周年纪念。

8月17日 应邀出席在雅加达独立宫前面举行的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一周年的盛大典礼。

8月18日 由西爪哇省省长萨努西·哈贾韦纳塔和夫人陪同，从雅加达乘飞机到达万隆。万隆人民冒雨欢迎。

△ 参观聋哑儿童教养院，观看儿童表演他们怎样用特别的方法进行学习。捐助三万盾给教养院。

△ 晚，出席哈贾韦纳塔在省长官邸专设的欢迎宴会。在致词中说：“中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是你们的亲密朋友。说得更确切些，都充满万隆精神。”又说：“历史上还很少有一个城市（不管它多么富足、多么漂亮）曾象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心。”代表周恩来转达对万隆人民的问候。^①

8月22日 出席雅加达各界人民两千多人在体育馆举行的欢迎会，作题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的讲话。在讲述两国人民友谊发展的历史后说：“作为新近得到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根本利益今天较以往任何时间更为一致。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在谈到亚非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经验时指出：“历史教导我们，同国内最有活力的各种力量结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时，对于取得并且确保人民所要求的自由和进步的目标，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谈到中国的经验说：“我亲眼看到在中国背叛这条道路的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是因为一旦他们分裂了统一战线并且对其中一部分发动进攻，他们就抛弃了主要的斗争，最后就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并且完全受他们的支配。直接的后果是，中国不得不蒙受二十多年的苦难，辛酸和耻辱。”^②讲话后，苏迪罗市长代表苏加诺向其赠送了礼品。

① 《解放日报》，1956年8月20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8月24日。

△ 在印度尼西亚电台，发表题为《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的讲话，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告别。说：亚非会议表明了“旧殖民主义制度，正在从舞台上消失”；帝国主义“对亚非人民发号施令、把他们当作战争、掠夺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工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还表明：“这样众多的人民已经根据自己的权利作为一支力量出现，他们决心彻底消除恶毒的殖民主义制度，并且决心为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努力。”亚非人民的团结“对于在继续进行中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说：中国是“首创五项原则的国家之一”。我们“一直信守这些原则，并且积极努力把五项原则的影响扩大到世界其它各地去”^①。

8月23日 结束在印度尼西亚十天的访问，率代表团乘飞机回国。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到机场欢送。

△ 回国途中抵仰光。缅甸副总理藻昆卓，前总理吴努夫人，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到机场欢迎。

8月24日 在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接见缅甸前总理吴努来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 从仰光致电苏加诺，感谢友好款待和周到的安排，表示将把“愉快的印象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感情传达给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以便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间的友谊一天天地继续巩固和发展”^②。

△ 从仰光致电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感谢热情接待和善意协助，说：通过“同各界著名人士的接触，已经进一步增加了相互的了解。”深信“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文化和经济的交流”^③。

① 《人民日报》，1956年8月25日。

② 同①，1956年8月26日。

③ 同①，1956年8月26日。

8月28日 从昆明乘专机抵京。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李维汉，还有缅甸驻中国大使和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人员到机场欢迎。特往昆明迎接的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也同机回到北京。

9月6日 在北京，同毛泽东等赴机场欢送苏加诺离京到各地参观。

9月20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周恩来作《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报告》。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斗争。援引孙中山1923年给日本犬养毅的一封信，说明民族独立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孙中山在信中说：“欧战而后，受屈部分之人感得大觉悟，群起而抵抗强权，此部分人类以亚洲为最多，故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奋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讲话说：

“犬养毅没有认识这一历史潮流。日本帝国主义不到二十年后就在侵略亚洲大陆和大陆以南的一些国家时遭到失败。关于埃及的问题，同样可以用孙中山这段话来说，凡违背民族独立要求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遭到彻底失败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行动的国家 and 人民，一定会得到六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支持，因此，它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①。

9月21日 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

9月15日—27日 在北京，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6日，在大会上致词说，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是“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指出：“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

①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9月21日。

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深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①。

9月26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在会上作《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②

9月29日 在北京，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宴请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

△ 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赴机场迎接苏加诺。

△ 下午五时三十分，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陪同毛泽东接待苏加诺来访。

△ 陪同毛泽东和苏加诺共进晚餐。

10月1日晚，在北京，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一起出席周恩来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招待来自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的嘉宾，有苏加诺、阿查里雅等。

10月2日 在北京，同朱德、周恩来、乌兰夫一起陪同苏加诺、阿查里雅，出席彭真在颐和园举行的盛大游园会。

△ 晚，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国宴，招待苏加诺、阿查里雅等外宾。

10月3日晚，在北京，举行家宴招待苏加诺及随行的高级官员、妇女代表和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刘少奇、周恩来、郭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宋庆龄选集》第364—366页。

② 《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沫若、陈毅、张闻天、彭真、黄镇等出席作陪。在客厅里，挂着一幅印度尼西亚的画，这画原挂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府的墙上；还挂着苏加诺的放大照片，这都是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苏加诺所赠送的。苏加诺瞻仰了孙中山遗像。宴会结束后，又和彭真陪同苏加诺参观王府井百货商店。^①

10月4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讲话中说：“刚才我们听到了苏加诺的讲话（按：苏加诺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说），这是独立了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雄壮的声音。”又说：“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受过同样的苦难，现在又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具有共同理想的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并且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加强国内团结、建设自己的国家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感谢苏加诺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民向中国人民所表示的友谊，表示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加强这种珍贵的友谊。^②

△ 下午，在北京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这些参观团来自西藏、新疆、四川、甘肃、云南、青海牧区等。李济深、彭真、李维汉也出席作陪。

△ 下午，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华侨和港澳同胞观光团。李济深、彭真、李维汉等也出席作陪。

10月5日 应邀出席苏加诺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庆祝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应邀出席。

10月9日 在上海住所的客厅里，宴请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他的夫人。阿查里雅对其说：“尼泊尔人都知道您，并且都非常尊敬您。”并邀请其访问尼泊尔。在感谢阿查里雅的邀请时说：“为了增进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会去的。”在回答阿查里雅称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② 同①，1956年10月5日。

赞“中国儿童热情欢迎外国客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说：“我们一向教育儿童热爱全人类”。旋把珍贵的手工艺品——象牙雕成的和平鸽、象牙球、织锦灯罩和古代的绣花荷包送阿查里雅作纪念。^①

10月10日 赴上海火车站，迎接苏加诺到上海参观。

△ 下午五时，在上海住所接见印度国会代表团。和其在印度熟识的朋友——拉克希米·恩·梅农夫人畅谈甚欢。^②

10月11日 在上海住所宴请苏加诺。宴会后，陪苏加诺在花园里散步，将一对象征和平的鸽子送给苏加诺。出席宴会的，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部长和驻中国大使。陈毅、许建国、曹荻秋、黄镇等出席作陪。

10月12日 赴机场欢送苏加诺。

10月14日 出席鲁迅遗体迁葬仪式。参加迁葬仪式的，还有茅盾、柯庆施、金仲华、许广平等。^③

10月27日 中午，在上海寓所宴请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及其女儿阿赫塔·苏来曼夫人、巴基斯坦外交和联邦关系部部长及驻中国大使等。许建国和夫人、柯庆施、耿飚和夫人等出席作陪。在接受苏拉瓦底赠送的个人的照片及精制的沙笼、小手袋和银制的烟匣后，回赠苏拉瓦底一套福建漆制绿色茶具和中国出产的最佳品种的茶叶。对苏拉瓦底说：“我想你会喜欢它的颜色，我知道，绿色被称为巴基斯坦颜色。希望你经常使用这套茶具，想到中国”^④。

是月 在上海寓所，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① 《解放日报》，1956年10月10日。

② 同①，1956年10月11日。

③ 同①，1956年10月15日。

④ 同①，1956年10月28日。

△ 作《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一文。说：“鲁迅先生的对敌人冷酷，对朋友热情的性格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说，在旧中国，鲁迅“不但用他的笔，而且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战斗。因此，他的形象和他的著作就成了我们永远常新的记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财富”^①。

△ 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在上海整理出一批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孙中山的重要文献，寄到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其中有《建国大纲》手稿，手札墨迹一本共六十页，孙中山在上海画的一张中国地图和在上海作的《实业计划》英文底稿，生前活动照片一百多张，还有孙中山和其合拍的照片等。^②

△ 再次整理出一批孙中山文献，寄到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其中有孙中山和苏联特使越飞谈话记录原件一份共七页，1923年孙中山讨伐陈炯明通电及告粤军将士书全文和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通电原件一份，孙中山革命活动照片共六张，刊载评论孙文越飞宣言的中外报纸数份。^③

11月4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一文。指出：孙中山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他“把四十年的精力全部付给了人民革命”，及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忘我的忠诚”。“孙中山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是因为他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他“一生中经常冒着危险，他从不动摇”；在“斗争中遇到无数困难，遭受许多曲折，他从不灰心。”文中以无限深情叙述了孙中山怎样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的艰苦的、曲折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历程。最后指出：“孙中山所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理想。……还有对革

① 《宋庆龄选集》，第367页。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

③ 《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1日。

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号召：“向孙中山学习！吸取他的不息的热诚，学习他的不断进步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好地纪念孙中山。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遗产才能世代流传下去”^①。

11月8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一文。指出：“我国革命的成功，列宁的思想加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进一步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亿万人民，从而无可估量地加强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对帝国主义普遍的斗争。”又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他以新的精力着手进行他最后一次的革命运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然而，不久之后，“列宁和孙中山都去世了，这样一来，就中断了本来无疑会是密切和富有成果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事业“在俄国和中国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它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是一定的。”最后指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正是建筑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这种历史联系上的”^②。

11月9日 在上海，又清理出孙中山的一批遗物，有孙中山北伐时穿的两套衣服、呢帽、眼镜、碗筷杯匙，及从前当医生时用的医疗器具，共六十六件。^③

11月12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孙中山》一文。文章在概述孙中山曲折的战斗历程后，强调地指出：孙中山“不屈不

① 《宋庆龄选集》，第368—375页。

② 同①，第376—383页。

③ 《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1日。

挠的革命精神”，“虚心学习和不断地追求进步”的精神，使他“从失败中吸取了经验，……使他真诚地接受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从而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容。”从此，“革命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联盟，开展了新的革命斗争，使在1924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获得空前的发展。”明确指出：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转变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现在，“全国人民已认识到一条革命的真理，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最后指出：“总的一句，伟大的人民力量，已推动了历史的车轮，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变而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充满着无限的光明前景。不仅把孙中山奋斗一生的理想变成现实，而且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理想。”号召学习孙中山的“爱国热情”、“革命毅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继续奋斗”。^①

11月13日 在上海，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的苏联代表团一行三人。

△ 在上海寓所热情接见缅甸妇女代表团一行七人。

11月30日 电贺日本展览会在上海开幕，谓：“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发展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为“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②。

是月 给《孙中山选集》题写书名。

12月6日 在上海，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前，会见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和团长宿谷荣。会见时陆慕云等在座。

① 《宋庆龄选集》，第384—388页。

② 《解放日报》，1956年11月30日。

12月15日 为苏联的《火星》和《新时代》两杂志撰文，向全世界人民祝贺新年。^①

是月 作《漫谈新闻与历史》一文。说：“现代收集和传布新闻的设备有了高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浩如烟海的新闻，而不致给埋在里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文中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指出：几千年来，“人类坚持不懈地谋求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和世界”。“但是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它趑趄、停顿，甚至挫折。”明确指出：人类的发展却“遵循着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从低级的形式前进到高级的形式。从剥削制度前进到没有剥削的制度，……人类斗争的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这样。”末了指出：“既有真的新闻，也有所谓的新闻；同样，既有真的历史，也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是，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在你发现那揭橥、保卫和促进人类事业的地方”^②。

是年 为儿童剧团上演的《友情》、《马兰花》分别获得全国话剧会演一等奖和二等奖，感到非常高兴，约请全体演员到寓所吃饺子。勉励该剧院院长任德跃说：“不要满足，要搞得更好”^③。

△ 出国访问期间，惦记着儿童剧团，特寄回写着“祝你们工作顺利”的明信片。^④

1957年（丁酉） 六十四岁

1月10日 在上海寓所接见正在上海访问的印度孟买市市长卡德尔，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互相赠送礼物。卡德尔谈到访问

① 给两杂志贺词的全文，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日。

② 《新观察》，1956年第二十三期。

③ 《她的“掌上明珠”》，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④ 同③。

上海的印象时，盛赞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各种活动。^①

1月16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是月 为庆祝《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在该刊发表《五年以前和现在》一文。指出：五年来，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高潮，千百万人成为有文化的人。……我们的人民现在比以前吃的更好，穿的更好、学习提高，思想提高了”。“我们的进步赢得了其他国家人民和政府对我们愈来愈多的了解”。对五年来的变化，“感到兴奋、自豪”。说：“人民正在建设的今天，其美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他们正在建设中的未来，其美好又是今天所不能衡量的。”这正是“无数革命者和先烈在……漫长年代里所梦寐以求的”^②。

2月27日—3月1日 在北京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取并讨论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3月5—20日 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致开幕词：这次会议依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充分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我们的会开好”。又说：周恩来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十一个国家，对于增进我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欢呼这一伟大成就”^③。在会上，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陈叔通作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陈云对增产节约问题的发言、张奚若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和学龄儿童入学问题的发言。会议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及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紧密团

① 《解放日报》，1957年1月11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389—392页。

③ 《人民日报》，1957年3月6日。

结，艰苦奋斗，建设祖国。

3月6日 应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国家机关工会委员会主席吉日科的请求，为苏联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妇女们写贺词。祝贺她们“为争取妇女的解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指出：“帝国主义者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发动侵略战争”，“全世界妇女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击败一切侵略者的阴谋诡计的主要因素之一”。号召“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和保卫儿童的 权利；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祝愿她们生活“更美满，更幸福”①。

3月9日 晚，在北京同李济深等一起，出席毛泽东举行的便宴，招待捷克总理西罗基和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及随行人员。

3月23日 下午，到北京机场欢迎缅甸昂山夫人都庆枝和吴努的公子来京访问。

3月24日 午间，在北京寓所设便宴招待昂山夫人都庆枝和吴努公子。同昂山夫人象老朋友一样亲切交谈。希望昂山夫人下次有机会来中国时多逗留几天，多参观一下各地儿童福利工作。宾主互相赠送了礼物。唐孟君、姚仲明夫人出席作陪。②

4月22日 在上海，同刘少奇一起接见正在访问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前总统肖恢塔和夫人，作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 在上海，同刘少奇、林彪、刘伯承、柯庆施、曹荻秋等到机场迎接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

4月24日 午，设家宴欢迎伏罗希洛夫和其他苏联客人拉希多夫、叶留金、费德林、尤金及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儿媳。刘少奇、贺龙、柯庆施、曹荻秋，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夫人等出席作陪。宴会前，和伏罗希洛夫亲切晤谈。当谈及1928年在苏联相

① 《人民日报》，1957年3月7日。

② 同①，1957年3月25日。

见的情况，并谈到当时伏老说的话时，伏罗希洛夫说：“当时苏联的领导人非常关心中国革命，孙中山是苏联的伟大朋友，他去世了，我们非常惋惜。”赞誉其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说：“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意志是很不容易的，有人在困难面前就无能为力了。有人却能克服困难，孙夫人就是这样的人，是最勇敢的妇女的榜样。”还说对其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表现，都十分敬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也都十分敬佩。再三感谢伏罗希洛夫的鼓励，说：“没有群众的支持，我是什么也做不到的。”临别时，亲自把中国特制福建漆器、刺绣、茶叶等送给伏罗希洛夫和其他苏联客人。^①

是月 在上海，对刘少奇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不久，刘少奇、周恩来来探望，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情况看，你暂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党的一切大事都会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当即点头表示理解。^②

6月1日 为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教养儿童的责任担负起来》一文。指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必须象爱护幼苗一样的爱护他们，象栽培小树一样的栽培他们，为他们准备好一切生长的条件，帮助他们战胜风霜虫豸、同时也要注意矫正长得歪曲了的躯干，剪掉不成材的枝桠。”使之“长得茁壮、正直”，“经得住风霜”，“成长为有用之材”。并指出：“教育下一代是我们全民族的责任”。应该把教育儿童的要求“向一切成年人提出来，因为他们随时随地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着儿童，因为他们担负了教养儿童的责任”^③。

①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② 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

③ 《宋庆龄选集》，第393—394页。

6月2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文中针对在党的整风运动中有人借机否定党的领导，指出：党的整风运动，表明“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的信心”。并且，“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相信：通过整风可以提高党内外人士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明确表示：“决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尖锐地指出：“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①。

6月26日 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担任主席团成员。会议于七月十五日结束。听取并讨论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彭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会议通过、批准了上述各项报告，并通过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决议。^②

6月30日 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第一副议长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和夫人。接见时在座的有张苏、章蕴，还有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

7月13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说：“由于我们有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全国大团结，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帮助来寻求真理，我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把我们的团结提到更高的高度，认真地互相学习。”指出：“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只有共产党才具备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需要集合一切的力量

① 《宋庆龄选集》，第395—397页。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30日，7月16日。

和每一个人的知识。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党派的‘共存’与‘互相监督’、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这一切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为了国家利益进行真诚合作和有效配合。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我们全国力量的伟大团结和运用，历史已经使得共产党具备了领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并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象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不可摧毁的力量”^①。

9月9日 为庆祝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题为《妇女们要坚决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一文。指出：全国妇女“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旧社会遗留在我们身上的缺点和弱点，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各行各业中，“妇女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而在持家和教养子女方面，妇女的劳动尤其可敬可贵。”勉励妇女“本着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精神，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家庭的和睦生活、为儿孙辈的幸福忘我地劳动”^②。

9月21日 在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③

9月24日 在上海，到机场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9月25日 在上海寓所设宴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宴会上，宾主谈得非常融洽，交流了中印友谊不断增长的情况。出席作陪有郭沫若、曹荻秋、金仲华。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夫人及印度驻上海总领事也应邀出席。分别时，接受了拉达克里希南赠送的礼品。^④

① 《宋庆龄选集》，第398—405页。

② 同①，第406—407页。

③ 《人民日报》，1957年9月22日。

④ 同③，1957年9月26日。

△ 在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联席会上，被推选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的光明前途》一文。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有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进步是“团结的结果”。还因为“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并且，具有有利的国际条件。认为：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将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民在我国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①。

10月3日 在上海，同曹荻秋等一起，到机场欢迎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团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一行二十多人到上海访问。阿里斯托夫路过南京时，曾拜谒苏联人民伟大朋友孙中山陵墓。^②

10月4日 在上海寓所举行茶会，招待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叶里沙维金也出席。曹荻秋、魏文伯、金仲华、石西民等出席作陪。接受了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10月6日 同郭沫若等致电祝贺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电称：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表明“苏联科学技术已居世界最先进的位置。……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③。

10月7日 下午三时，在上海寓所花园里举行茶会，招待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捷克国民会议代表团和以斯沃波达市长为首的布拉格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茶会进行一个多小时。宾主愉快谈心，互相赠送礼物。陈叔通、王维舟、刘贯一、曹荻秋等出席作陪。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

② 《解放日报》，1957年10月4日。

③ 《电贺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人民日报》，1957年10月7日。

10月8日 下午三时，在上海寓所花园里举行茶会，招待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曹获秋、金仲华、鲍尔汉和夫人出席作陪。在茶会上，宾主一起观看儿童艺术剧院和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的演出。茶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一个半小时，结束时向哈达及夫人和其随行人员赠送了礼品。

10月16日 在上海，接见锡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古纳瓦地尼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 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行茶会，招待参加我国国庆后来上海参观的缅甸、锡兰、埃及、印度、日本、巴基斯坦、突尼斯等七国妇女代表。

10月25日 下午，在北京勤政殿，陪同毛泽东接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及其随行人员。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张闻天等也出席作陪。我国驻阿富汗大使丁国钰，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萨马德在座。

△ 晚，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宴请阿富汗首相达乌德。

10月26日 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团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10月28日 同钱俊瑞一起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祝贺苏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电称：“中国人民充分理解中苏友好合作的伟大意义。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坚如盘石的友好团结，不仅是我们两国繁荣富强的保证，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的可靠支柱”^①。

是月 写《〈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说：“孙逸仙

^① 《致电祝贺苏中友好协会成立》，《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

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儿子”，因而他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景仰”。

“孙逸仙没有什么财产，他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革命，死后只留下他的书和他的故居作为纪念。这些简单的东西可以使后辈对他生前的情况有一些感受，体会到他为了使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指出：“这个纪念馆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取得胜利而为建设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中山故居象征着重要的里程碑”^①。

△ 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一文，载苏联《真理报》1957年10月28日。指出：“和平和进步历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最神圣的事业。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这些东西的斗争的纪录。”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一声进步的春雷，它震撼了世界，并且，……一直在决定着世界的方向。”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辉煌表现。”又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死亡。也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帝国时代的死亡。”在十月革命影响和鼓舞下，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有十三亿亚洲和非洲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人民极深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异常重大的事件”，对帝国主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具有普遍性”。它是“一切地方的一切被压迫的人获得解放的钥匙”。最后强调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是人类的希望”^②。

11月2日 随同毛泽东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乘飞机离开北京赴

① 《〈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宋庆龄选集》，408页。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9日。

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陪同前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等到机场欢送。苏联大使馆官员和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到机场欢送。途经伊尔库次克和鄂木斯克作短暂停留。苏共中央领导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次克迎接。下午八时到达莫斯科，苏联党、政、最高苏维埃负责人到机场欢迎。

11月4日 上午十时，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一起拜会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领导人。

△ 下午一时，随同毛泽东等在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 下午四时，接待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来访，进行了友好谈话。刘晓在座。

△ 晚，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一起，在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11月5日 下午，同代表团全体成员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陪同前往。

11月6日 同毛泽东等一起，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宫召开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联席会议。

11月7日 在莫斯科红场，观看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大阅兵式和游行队伍。

△ 晚，应邀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宴会，并欣赏节日礼花。

11月8日 应邀出席莫斯科劳动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义》的讲话。出席大会的有苏联领导人，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参加大会一万多人。莫斯科第一书记福尔采娃主持大会。在讲话中说：“三

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三十年来，我们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人民是具有英雄性格的人民。他们的业绩真正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世纪。”在回顾当时个人的处境说：“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深信：“在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将成为全人类的选择”^①。

△ 应邀观看莫斯科举行的盛大演出，与各国贵宾和苏联人民同庆伟大节日。苏联许多著名演员表演了精彩节目。有《我们可爱的祖国》、《同志们勇敢前进》等著名歌曲，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影片中攻打冬宫片断。还有芭蕾舞、朗诵、话剧表演，显示苏联内战、社会主义建设、电气化、集体化及伟大卫国战争。演出结束后，全体齐唱国际歌。

11月11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一起，陪同毛泽东，接待伏罗希洛夫来访。苏联方面的费德林和尤金在座。

11月14日 下午三时半，同毛泽东及我国代表团成员一起，赴捷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捷克总统萨波托斯基逝世。

11月14—16日 在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出席了《宣言》的签字仪式。

△ 应邀出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四十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以无比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9日。

的英雄气概和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建立了第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连续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的新纪元”。并说：“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我国革命事业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光荣”^①。

△ 应邀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在莫斯科苏联大剧院观看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11月19日 在苏联《文化与生活》杂志发表《中苏友好团结是人类和平的保证——答苏联〈文化与生活〉杂志问》一文。指出：中苏两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文化科学界的互相往来和接触日益频繁和经常化，这对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经验有极重要的意义。它“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苏中友好协会的成立，将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以及智慧和经验的交流能够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和更有系统地发展”^②。

11月20日 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应邀在克里姆林宫同苏共中央主席团邀请的各界著名人士见面。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库西宁、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等。还有苏共中央各部负责人，共二百多人。

△ 在苏联期间，在莫斯科曾会见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

△ 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送别宴会。

△ 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一起，离莫斯科返国。苏共中央领导人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到机场欢送。

11月21日 下午，回到北京。

11月25日 晚，在北京，陪同毛泽东接见苏中友好协会主席

①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8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

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参加我国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在座的有吴玉章、廖承志、余心清、戈宝权等。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也在座。

△ 晚，在北京，举行宴会招待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代表团。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和使馆人员、正在北京访问的苏联国民教育展览代表团和苏联电影代表团的团员也应邀参加宴会。在宴会上致词中指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祝愿“为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团结和友谊，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早日建成我们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共同奋斗。”^① 安德烈耶夫讲话感谢中国人民的热情招待，赞扬中国的成就，并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宴会前，和刘少奇陪同安德烈耶夫与中国各界人士见面，并代表中苏友好协会向苏联各界代表团赠送礼品。

11月26日 应邀赴苏联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尤金为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讲话说：“请代表团全体同志们把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最真挚最热烈的友情和衷心的问候、转答给苏联人民。”^② 应邀出席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等及北京各界人士。

11月27日 为欢送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回国，出席在南苑机场举行的欢送仪式，并致欢送词。指出：“友谊是我们伟大力量的源泉”。并表示：中国人民“异常珍贵苏联人民的友情”，“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③。

12月2日 在北京，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

① 《在招待苏联各界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致词》，《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③ 《在机场致词欢送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8日。

真、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参加我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工会代表团。接见时，赖若愚、刘宁一、刘长胜在座。

△ 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彭真、李富春、贺龙等一起，出席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2月13日 在北京，设家宴，招待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迎觉和他们的夫人。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和夫人也出席宴会。周恩来、贺龙、陈毅和夫人、章汉夫、姚仲明和夫人出席作陪。

12月22日 作题为《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一文，载《中国青年》杂志1958年第一期。说，党和人民把青年看作“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在你们肩上负有‘承先启后’的光荣和重大责任。青年同志们必须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这种殷切的期望。”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接班人，“首先是跟着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应该有任何犹豫、怀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的前途。”其次，“要刻苦，工作和学习上都要下苦功夫。知识是从刻苦劳动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社会主义这样伟大的事业，就是千千万万人民劳动的积累，智慧的结晶。青年人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比较贫乏的，因此，更需要刻苦，更需要下苦功夫学习，需要埋头苦干。要下定决心钻研科学、技术、钻研业务。”并指出：青年“必须注意品德的修养，把自己锻炼成为德、智、体育兼优的青年。”最后，勉励青年“不能辜负革命领袖对你们的期望，要朝气蓬勃地、勇敢地朝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①。

是月 得知陈赓心肌梗塞症发作，派人送去亲笔信和一束鲜花，表示亲切慰问。还向陈赓夫人傅涯详细询问病情，垂念至殷。

^① 《宋庆龄选集》，第409—411页。

是年 为《人民中国》印度尼西亚文版创刊撰文。说：《人民中国》增出印度尼西亚文版本，“表达了六亿中国人民对勤劳勇敢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好的愿望和祝福。通过这本杂志，不但可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互相往来和友好关系，而且会更加巩固和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指出：“万隆会议的精神鼓舞着亚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信心。”

“侵略者注定要失败，胜利属于保卫和平、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①。

1958 年（戊戌） 六十五岁

1 月 1 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八年》一文。说：“1957年是最不寻常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并“产生了两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争取人民政权的巨大斗争中获得胜利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所签署的《和平宣言》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召唤。”指出：“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全世界愈来愈多的人的信念与目的。和平与和平共处日益成为最广的阶层所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②。

1 月 7 日 为庆祝《苏中友好》杂志创刊，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电称：“这个杂志的出版，完全适应着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它在进一步增进和巩固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的崇高事业中，必将作出重要的贡献”^③。

1 月 29 日 致电印中友好协会，祝贺其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

① 《宋庆龄选集》，第 412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1 日。

③ 《电贺〈苏中友好〉杂志创刊》，《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8 日。

的召开。电称：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通过双方友好协会的工作，

“加强了互相的认识，我们的互相了解加深了。”这“可以说是我们为热爱祖国和热爱国际和平的感情所树立的一座雄伟的纪念碑”^①。

2月12日 致电即将在锡兰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祝“在进一步促进亚非妇女之间的团结和联系，进一步改善亚非妇女和改进儿童的教育卫生事业的工作中取得成就”；祝“在亚非人民争取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严重任务中显出我们妇女的力量来。”代表中国妇女向大会表示：“在争取妇女的切身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运动中，中国妇女将永远是你们的最忠实的朋友，愿意和你们并肩前进”^②。

△ 给上海市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致祝词。指出：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求我们付出巨大劳动，努力增加生产”；而且，还要“克勤克俭，厉行节约。”而“‘勤俭’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勉励妇女“不但要在工作中贯彻勤俭建国的精神，而且在勤俭持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在家庭中养成勤劳俭朴的风气，是一个和睦幸福家庭的经济基础，同时，在教育子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转移社会风气，为国家节约物资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指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已经成为今后我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希望代表大力宣传，并且“以身作则去提倡劳动俭朴的作风”^③。

△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八周年，和钱俊瑞一起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愿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

① 《电贺印中友好协会三第次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日报》，1958年1月30日。

② 《致电亚非妇女会议》，《人民日报》，1958年2月14日。

③ 《给上海市第三次妇代大会的祝词》，《解放日报》，1958年2月13日。

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永远巩固和不断地加强。^①

△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八周年，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②

3月12日 致函中国福利会，指出：“孙中山生前学习勤奋，工作认真，待人谦虚，生活朴素，并常以此教导和勉励同志。他毕生为谋国家的自由平等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了数十年”^③。

4月1日 就苏联停止核武器试验对新华社记者发表题为《西方国家，你们也试试看》的谈话。对苏联单方面停止核武器爆炸试验表示“衷心赞成和欢呼”。要求：“西方国家立即采取类似的行动，撤除他们在外国领土上的许许多多军事基地和停止不断携带原子弹飞行的行动。”指出：“只有双方作出真诚的努力，才能创造全新的气氛。……苏联再度采取了勇敢的主动行动，我们也只有再一次对西方国家说：“你们也试试看”^④。

4月26日 为《儿童时代》题词，称：“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享受幸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⑤。

4月28日 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称：“祝贺苏联人民在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⑥。

是月 作《正视现实》一文。指出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需要解决，即：“要求面对现实的人们和拒绝面对现

① 《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

② 同①。

③ 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④ 同①，1958年4月2日。

⑤ 《宋庆龄选集》，第413页。

⑥ 同①，1958年4月30日。

实的人们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不应导致武装冲突”。“世界的出路只有一条：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让历史来选择那一种制度最佳。”“许多年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不懈地提倡这条道路”，近年来“最突出的是苏联声明它将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试验”。然而，有些国家对这种努力“持否定态度，其目的是阻止重大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这些建议的意义”。“人民明白并且坚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尽全力避免战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尊重，社会主义学说正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极浓厚的兴趣”。人民的态度是“现实的”。而“西方国家的决策人，正如李普曼所说：‘一次又一次地拒不面对现实’”。最后，强调指出：“谈判和和平共处”是“面对今日世界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方法”^①。

5月30日 在上海，接见以波布罗夫尼科夫为首的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团全体团员。接见时，在座的有：曹荻秋、石西民，陪同代表团前来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以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叶森。

是月 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五周年题词，曰：“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②。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发表《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谈几句话》一文。指出：“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父母必须“首先树立起某些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因为孩子们是通过大人的榜样进行学习的。”“我们要求自己和孩子都具有人类最优秀的品质。”末了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建设者，是我们今天所面

① 《北京周报》，英文版，1958年第十四期。

② 原件影印，载《永远和党在一起》扉页。

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个人或集体，无论在家庭或者社会里，我们都应该用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任务”^①。

△ 在上海，和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一起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6月13日 在上海长宁区，与该区一千多选民一起投票，选举该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在上海举行便宴招待特地从北京赴沪的何香凝、廖承志、齐燕铭、康克清等。陈丕显、许建国、金仲华等也应邀出席。参加宴会者共祝中国福利会二十年的卓越贡献，并祝将来取得更大胜利。

6月14日 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作题为《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一文。说：“中国福利会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成长的。”因此，“便于进行比较，能够就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的救济福利工作，得出某些结论。”指出：“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这种服务的概念也有所区别。”在旧社会，它的“观念和制度都是为了用尽办法使剥削制度永存。”“救济福利工作也正是为了使这种制度神圣化的巨大努力中的一部分。”其目的“不外是利用人类的同情和善意，来转移人们对于旧社会中所造成的对人的巨大损害和糟蹋的注意力。”在旧中国，“旧的制度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救济福利工作取得了“公认的地位”，是“国家职能中的一个部分。”极为兴奋地说：今天的中国，“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享受、对老年人的关怀、休息和娱乐，这一切在我们的宪法上都已有明文规定，给每个公民以保证”。不过，“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来实现这些保证，……而且不能算完美的，但是随着我们整个国家建设的前进，将会越来越取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大的满足”^②。

① 《人民日报》，1958年6月1日。

②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3—156页。

△ 在上海出席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到会有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及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大会陈列了周恩来、邓颖超、柯庆施等送的巨大花篮，何香凝的亲笔国画、蔡畅及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等单位的贺电、贺信和礼物。在会上发表题为《永远和党在一起》的讲话。说：在这个会上“觉得非常愉快。中国福利会当初成立并为之奋斗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勉励福利会的工作人员，“要珍惜过去的成绩和传统，……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把中国福利会工作推向新的高潮”^①。

是月 作《福利工作与社会主义》一文。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灾难的起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如战争及周期性的危机。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以造福于人民为其动力，劳动是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允许任何人侵占他人劳动成果，战备不使任何人发财，和平则是每个人的愿望。”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预算在经济建设、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方面开支越来越多，而在行政及战备方面投入的钱越来越少。”人民政府建立了劳动保险，其中包括公费医疗、女工享受产假并领受全工资、年老工人的退休金等等制度。此外，有社会主义的相互援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依靠救济的人比过去大大减少。至于孤寡老人及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者，住在城市的由国家照顾，在农村的由合作社照顾。尚能工作的残疾人被组织起来，尽最大可能为社会工作。“助人者与被助者是彼此平等的，大家合作，尽各自的能力。”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福利工作“不仅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发展做出贡献，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做出最大贡献，每个人都得到尊敬和照

^① 《永远和党在一起》，157—160页。

顾”^①。

8月4日 就毛泽东和赫鲁晓夫7月31日至8月3日会谈公报，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电称：“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合作，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捍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中苏友好协会全体会员，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而努力”^②。

9月8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制止美国的挑衅行为》一文。针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公然声言要把侵略范围扩大到我沿海岛屿，干涉我国内政，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挑衅行为，表示“完全拥护周总理的声明，并和全国人民一道制止美国的挑衅行为。”严正表明：“如果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是不会被战争挑衅者吓倒的。我们爱好和平，需要和平，但是绝不祈求和平。”美国侵略者“胆敢疯狂地挑起战争，它们就必然会被碰得头破血流！”^③

10月1日 应苏联《真理报》约请，作《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敬！》一文。向苏联人民介绍新中国成立九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④

10月3日 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祝贺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周年。电称：“祝苏联在征服自然和造福人类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⑤。

10月10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接见

① 《中国建设》，英文版，1958年第6期。

② 《致电苏中友好协会祝贺中苏会谈》，《人民日报》，1958年8月5日。

③ 《宋庆龄选集》，第414—415页。

④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日。

⑤ 同上，1958年10月4日。

时，金仲华在座。

10月15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0月16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阿拉伯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挪威、波兰等国的妇女代表十五人。她们都是应全国妇联的邀请来我国参加国庆观礼的。接见时，全国妇联和上海市妇联负责人在座。

10月17日 由上海纺织工业局局长张承宗陪同，视察上海国棉十七厂。听取厂领导的汇报，询问工厂的生产、炼钢、工人娱乐活动等情况。特别参观劳动模范黄宝妹车间，仔细看了工人的新创造，祝贺她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还参观了工人保健站。中午，在工人食堂同工人一起吃午饭。饭后，观看工人自编自演的《黄宝妹》影片，赞扬黄宝妹演得好。说：“这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工人自己写、自编、演自己，这是奇迹！”临别讲话说，在厂里学到了很多東西，看到了工人在世界史上创造的奇迹。热情赞扬工人的创造，说他们不但是生产能手，又是文化的主人；是诗人，是演员。还说事实证明：劳动人民最聪明、最能干。鼓励工人鼓起更大干劲，创造更大奇迹。^①

10月18日 清晨，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陪同，视察“七·一”人民公社。对社员说，知道大家干劲很大，很辛苦，特地来看看，一则表示慰问，再则向农民学习。问公社炼钢情况，特别关心地问起女社员的情况，如：劳动、托儿所、幼儿园、公社对怀孕妇女的照顾等等。到棉田参加劳动，见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正在那里帮助社员摘棉花，愉快地对他们说：“一起来个比赛”。其动作熟练，很快摘了一大把。参观农民食堂，并在那里吃午饭。访问了托儿所、幼儿园、保健站。观看幼儿园的孩

^① 杨瑛、叶世涛：《宋副委员长和工人农民在一起》，《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1日。

子唱歌、跳舞。关心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临别对社员说，看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的智慧 and 干劲是无穷无尽的。^①

10月20日 下午四时，在上海设茶会，欢迎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客人一一握手，共进茶点，并作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茶会结束时，宾主互相赠送礼品。刘长胜、连贯、郭建、沈粹缜等出席作陪。

△ 下午五时，在上海寓所，接见以马哈茂德为团长的伊拉克友好访问团。说：“在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永远是伊拉克人民的忠实的朋友。”“我们的共同事业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应代表团中的妇女请提几点希望的要求，对她们说：“我为伊拉克妇女对伊拉克革命的贡献感到骄傲，我把伊拉克妇女的胜利看作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是为着共同事业而奋斗的姊妹，我们都瞻望着人类的未来”^②。

是月 鉴于上海人民大搞土法炼钢，建议并鼓励秘书、花匠、厨师、管理员和其他工作同志在花园里也砌一座炼钢炉，进行土法炼钢，并曾在炉前掌钳参加劳动。

11月3日 作《光辉的时代，光辉的人民》一文。谈到视察国棉十七厂和“七·一”人民公社时，说“学到了很多東西，真可以说是‘胜读十年书’。”得到最深的印象是：“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及“劳动人民真正成了主人，不但做了生产上的主人，还正在变成文化的主人。”其次则是：“广大妇女已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社会工作和生产劳动，得到了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有同样参加工作的机会，同工同酬，使妇女的劳动力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是妇女的大翻身。”兴奋地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们有这样光辉的人民，让

① 杨瑛、叶世涛：《宋副委员长和工人农民在一起》，《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1日。

② 《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1日。

我们用最美的声音歌颂我们的人民吧，让我们推动这个时代向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飞驰前进”^①。

③

△ 同钱俊瑞一起电贺苏联人民，庆祝十月革命节。电称：“中国人民将继续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②。

11月4日 同陈毅及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到机场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

11月5日 在上海，接待金日成及其代表来访，并设宴招待朝鲜贵宾。陈毅、曾浦泉、许建国、曹荻秋、乔晓光等出席作陪。宾主畅谈中朝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伟大友谊，并互相赠送礼品。

11月6日 到机场欢送金日成离开上海。

11月7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目前局势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文。指出：“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其主要推动力的当前时代，是以人类空前未有巨大跃进为其特点的。”其发展趋势是：“总的说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千年不变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正被抛弃，新世界从旧世界中诞生出来了；同时，作为上述趋向的一部分，最恶毒剥削形式之一的殖民主义，现在正陷于分崩离析的最后涡流之中，不可避免地归于死亡了。”“维护社会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力量同企图保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状的力量之间的矛盾，是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必须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在保卫和平和帮助各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起的核心和鼓舞作用”^③。

是月 致函《中国建设》杂志社，说：“不要给我寄稿费来”^④。

12月5日 致函祝贺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的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3日。

② 同①，1958年11月5日。

③ 同①，1958年11月7日。

④ 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纪念宋庆龄特刊》。

召开。说，全国妇女“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涌现出了大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这次大会是全国妇女在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中，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伟大贡献和共产主义风格的检阅和交流的大会”^①。

12月25日 为《我们是怎样培育祖国花朵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保教工作经验》一书写序言。指出：幼儿教育工作是“培育祖国的花朵”，同时“也是解放劳动力，使做父母的从抚育子女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事业。”因此，这“既是培养人的工作，又是侍候人的工作，是直接服务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工作，……是一个光荣的工作岗位。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幼儿教育工作的经验是可贵的。”勉励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工作人员“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在工作中做出更多的贡献。^②

12月30日 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③

12月31日 作《伟大的一年过去了，更伟大的一年在前面》一文。说：我国“觉醒了的人民正在宏伟的规模上进行英勇的努力，并且在力量和智慧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党和毛主席对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以及他们的革命热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心。人民则相信党和党所制定的走向民族尊严和繁荣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的一切方面的群众路线的基础。群众路线就是使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相信未来的一年“真理和正义一定会取得新的胜利”^④。

① 《给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贺信》，《人民日报》，1958年12月5日。

② 中国福利会编：《我们是怎样培育祖国花朵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保教工作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 《致电向苏联人民贺新年》，《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

④ 《宋庆龄选集》，416—418页。

是年 赠送马海德一本《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二十周年》的纪念册，并在扉页上亲笔题词，称：“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得你治愈了我受伤的手指”^①。

△ 当社会上浮夸风盛行时，致函《中国建设》一编辑，对该刊准备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福利事业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说：“稿件昨晚收到。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指出：“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这个情况应该讲得更明确些，……虽然我们有了很大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一切。第四页上讲到了这点，但可以讲得更清楚些，因为从这里到文章结尾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可以解决每个人的困难，而且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另一点建议是，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救济仍是必要的，但国家要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立即直接发放救济；二是组织人民同自然作斗争。通过各种措施改变自然条件，用比以往强大得多的能力变灾区为稳产、丰产区。”并以特有的谦虚补充道：“这是我的两点意见，倘能写入这篇文章之中，当不胜感谢”^②。

1959 年（己亥） 六十六岁

1月6日 发表书面谈话，祝贺苏联成功地发射宇宙火箭。说：这是“进入1959年时对科学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出色的礼物”。它“再一次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它是“人类解决有关征服自然的问题并且在整个地球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限能力的象征。社会主义制度向一切国家和一切进步人士显示

①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纪念宋庆龄特刊》。

了持久和平、幸福和繁荣的前景”^①。

1月24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和随行人员卡里略及其子等。同卡德纳斯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郭沫若、金仲华在座。

2月13日 分别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九周年。同时，收到安德烈耶夫和波波娃分别发来的贺电。^②

2月14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九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开辟世界的新纪元》一文。说，中苏两国人民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他们没有神奇的单方，也没有‘秘密武器’，他们只有坚持无可辩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勇战士的勇气和意志。这就是把千百万人民动员起来，变成一个不可攻破的巩固堡垒的动力。”谴责美国侵略者长期霸占我国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干涉中国内政。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③。

3月11日 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推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月26日 给《儿童时代》题词：“小朋友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④。

4月15日 在北京，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

4月16日 作《和平、进步、正义——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一文。说，现在中国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知道中国是五项原则的创始者之一，又是万隆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月7日。

② 同①，1959年2月14日。

③ 同①，1959年2月14日。

④ 原件影印，《儿童时代》，1959年第六期。

原则的签字者之一。他们“以中国的成就为骄傲。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景象的热切的观众。这个景象是：曾经受压迫的、落后的人民，在迅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正在消灭他们昔日的苦难。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多数人的思想中所构成的真实印象。”明确地指出：“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这是我们对一切人民的希望，也正是我们对自己的希望。这是我们现在的宣告，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宣告。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背离这个立场。六亿五千万人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无疑地是这个伟大事业的巨大力量。”^①

4月18—29日 在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被这次会议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主席)。

4月20日 在北京，接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接见时，唐明照、朱伯深在座。

4月29日 在北京，接见以费多罗夫为首的来我国参加“五·一”节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接见时，钱俊瑞、胡绩伟、戈宝权在座。

△ 致电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②

4月30日 下午，在北京，同刘少奇、董必武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国驻中国大使、代办、临时代办。和他们一一握手。接见时，陈毅、章汉夫、罗贵波出席作陪。

5月1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

5月2日 在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

① 《宋庆龄选集》，第419—422页。

② 《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

会上发表题为《伟大的友谊，亲密的团结》的讲话。说，苏联和中国的友谊和团结，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显示了指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同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指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苏联和中国紧紧地连结在一起。^①在会上，再次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5月6日晚，在北京，出席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中国、匈牙利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

5月7日电贺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电称：世界和平运动已十周年，“这十年是和平运动胜利的十年，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再遏制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所制造的危险局势，捍卫了和平。”认为“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必将进一步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阴谋。”深信：“这次特别会议必将在缓和当前国际紧张局势和进一步加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方面作出新的贡献”^②。

△下午，在北京，陪同毛泽东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及其随行人员。接受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献的哈达。

△下午，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一起，先后接见云南、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参观团和青年参观团、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一”参观团，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党代表会议的全体人员。

5月15日作《中苏两国人民永远在一起》一文。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1905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革命者在中国进行了类似的斗争”。“孙中山的活动和1911年的中国革命，曾经引起了列宁的关心和同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① 《解放日报》，1959年5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59年5月8日。

之后，苏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关怀有了迅速的增进。”“孙中山从俄国的榜样中看到了人类的黎明和他为中国人民而进行的长期斗争获得成功的希望。这就引导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政策。”因此，中国革命“再次积聚了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得更加紧密，……互相取得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使两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巨大的进步”^①。

5月21日 在北京，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一起，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会议，全国烈属、残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全国公安检查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5月29日 致函全国各族少年儿童，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信中亲切地教导孩子们：“要准备将来为大家创造幸福。……要继承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一代要比一代强，一代要比一代好。”因此，要“学会明辨是非善恶，立志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用功读书、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注意锻炼身体，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诚实勇敢勤劳朴素的道德品质。”还“必须对于那些处在帝国主义魔掌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孩子们，给以深切的同情。我们要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②。

6月15日 为常州觅渡桥小学题词，谓：“希望小朋友们学习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长大

① 《人民日报》，1959年6月14日。

② 《向孩子们祝贺‘六一’》，《宋庆龄选集》，第423—424页。

了，为党为祖国贡献最大的力量，做个党的好儿女”^①。

7月3日 在北京，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沙拉贡的国书。在致答词中说：“中蒙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两国国境毗连”，“两国人民亲如兄弟”。十年来，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不仅有力地推进了我们各自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也为我们两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②。

是月 为在维也纳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青年朋友，撰写《和平友谊将给人类带来繁荣和幸福》一文，教导青年们珍视和平与友谊。说：“我对人类的未来抱着热烈的希望。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指出：“广大的人民群众正进行着一个庄严而崇高的事业，一方面使人类社会组织得更完善、合理；另一方面使人类不但成为这个地球的主人，而且要成为宇宙的主人。人类的未来充满着光明，而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是属于你们的。”祝愿青年“高举和平友谊的火种，并且把它传播到全世界”^③。

8月6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作《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谊——人类向未来的跃进》一文。文中热烈歌颂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二十世纪是一个人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在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领域内，出现了一系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努力使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这就使得人类有力量、有能力让自然服务于他们的意志，并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提高到这样一个地步，使生活中的最美好的东西都能无例外地供给所有的民族。”而“今天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工作，

① 原件照片，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② 《人民日报》，1959年7月4日。

③ 《中国青年报》，1959年7月26日。

是迅速而有效地完成在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然后致力于更加巨大的水电工程和最大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并指出：“我们将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直到再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再没有贫困、再没有民族压迫、再没有战争为止”^①。

8月24日 在北京，出席刘少奇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报告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提出厉行增产节约的任务。

9月5日 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林伯渠、黄炎培等率领的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归国。

9月15日 在北京，出席毛泽东邀请各党派团体负责人举行的座谈会，听毛泽东作重要报告，讨论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及对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问题。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彭真、陈毅等。

9月27日 到北京机场，欢迎应邀前来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典礼的苏联、捷克、波兰等国代表团。

△ 下午，在北京寓所接见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接受吉洪诺夫送给的义和团旗杆上用的一个金色拳头^②，非常高兴地说：“我把它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这礼物再次证明了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③

△ 晚，在北京寓所设宴招待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武元甲也应邀出席，董必武、林伯渠出席作陪。

9月28—29日 在北京，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各族人民的代表和八

①^c 《人民日报》，1959年9月16日。文中重点符号，是原文所有的。

② 这个金色拳头是义和团起义时大旗杆上用的，被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从北京劫到柏林。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时，一红军战士以此为战利品带回莫斯科，送给诗人吉洪诺夫。吉洪诺夫曾为此写过诗，把它送给宋庆龄时说：“物归原主”。

③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8日。

十三个国家的外宾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六十位贵宾在大会上发言，热烈庆祝我国建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庆祝大会开始以前，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越南、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及六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

9月30日 上午，在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一起，到机场欢迎赫鲁晓夫。

△ 午，亲自到警卫战士食堂，关切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求工作人员给警卫战士改善生活。有时，还请战士吃饭，给战士送糖果、香烟。

△ 晚，在北京，出席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宴会。宴请八十多个国家的来宾和中国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亦出席。

是月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作《四分之一的人类向前迈进》一文^①，说，中国三亿多妇女是“各方面工作的积极参加者，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国家在这十年内取得的巨大进展。”说：“中国人民将满怀希望，抱着新的决心进入我们民族新的第二个十年。”号召：妇女象过去一样，“站在这场伟大斗争的最前列，推动四分之一的人类前进”^②。

△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作《写给孩子们》一文。以祖母般的慈爱亲切地对孩子们说：“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了你们。因为你们这些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差不多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你们的记忆差不多是和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开始的。”殷切地期望孩子们要继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从小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

① 载《中国妇女》，1959年第十九期。

② 《宋庆龄选集》，第425—428页。

党；从小热爱劳动，学会为集体、为社会主义做有益的事，学会帮助人，学会为人民服务；从小做一个勇敢、正直、乐观而不怕困难的人。”又“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担当今后的建设任务。”还“要锻炼身体，要讲卫生。”强调“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①。

△ 作《欢庆建国十周年》一文。说：“中国人民永远珍视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同样也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国际友好团结，因为这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②。

10月1日 同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

△ 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七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有八十七个国家来宾参加观礼。

10月2日 晚，出席毛泽东和党及国家其他领导人举行的宴会，招待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 晚，出席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观看应邀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的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舞剧《天鹅湖》。演出结束，同董必武、乌兰夫、薄一波、陆定一、张奚若一起，上台祝贺演出成功。

10月3日 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第一届运动会闭幕式。

10月4日 在北京怀仁堂，出席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题为《伟大的友谊伟大的团结》的讲话。认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团结。说：我们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广泛地进行了庆祝活动，

① 《儿童时代》，1959年第十九期。

② 《苏联妇女》，1959年第十期。

“伟大的苏联人民把这个节日当作自己的节日”^①。

△ 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一起，到北京机场欢送赫鲁晓夫离京回国。

△ 同刘少奇、董必武等一起，到北京机场欢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亚力山大·萨瓦茨基率领的代表团离京赴越南访问。

10月7日 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一起，到北京机场欢送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率领的代表团离京赴朝鲜访问。

△ 下午，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和夫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前第一副总理哈迪和夫人，进行亲切的谈话。会见时，乔冠华、吴茂荪、何英在座。

10月11日 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一起，到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并献花圈。

10月13日 同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一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乌兰诺娃演出古典舞剧《吉赛尔》。演出结束后，上台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是月 作《马列主义胜利万岁》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是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丰硕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共同的胜利”^②。

11月6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

11月7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作《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着

①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5日。

② 《中国工人》，1959年第二十期。

我们前进》一文。说：“四十二年前，‘阿芙乐尔’的春雷般的炮声，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诞生了。它给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又说：“四十二年以来，苏联人民高举着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旗帜，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战胜了各种困难，大大地发展了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胜利地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在短短的历史时期中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给全人类指出了通往幸福未来的光明大道。”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①。

11月18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印度尼西亚第二副议长、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接见时，张苏平、沈粹缜在座。

12月31日 复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列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

1960年（庚子） 六十七岁

1月26日 致函中国福利会的同志们，就中国福利会的发展方向指出：“在‘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这一目标。”并建议把它反映在福利会工作的规划中，希望“这一规划能使中国福利会逐步地变成一个主要是科学研究机构打下基础。”说：将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逐步地发展我们的干部，发展我们的事业。”这样，会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最大的、

^① 《人民日报》，1959年11月7日。

最主要的贡献”；并且会使“‘示范性’‘实验性’工作更加巩固”。而“更加重要的是科学研究工作使中国福利会得到永久存在的前提，它将成为一个继续长期存在着的机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更重大的力量”^①。

2月5日 和孩子们在一起欢度春节。

2月8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

2月14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作《永恒友谊的基础》一文。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十年来，“生动地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联系；这种联系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胜利中形成的，是生根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之中的。”中苏两国人民“遵照友好条约的内容和目的，进行了和平建设的伟大事业，把我们的富饶资源用于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用于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因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不断发展的”^②。

是月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五十周年，作《把妇女的斗争继续向前推进》一文。叙述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起源，说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是“全体妇女志愿的象征”，是“国际性的象征”。因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共同的；……反抗和斗争也是共同的。”指出妇女的彻底解放，“同社会主义的建立有直接关系的”，“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才为妇女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完全不受障碍的前景”^③。

3月7日 向全国的姐妹写贺词，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祝贺妇女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光辉的成就和卓越

① 《给中国福利会同志们的信》，《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61—164页。

② 《人民日报》，1960年2月14日。

③ 《中国妇女》，1960年第四期。

的贡献”，勉励“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积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为攀登科学技术文化高峰，为征服大自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妇女的大团结；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为维护妇女权利和儿童的幸福贡献出全部力量。”并祝愿妇女在“生产、工作、学习各方面都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在各条战线上成为红、勤、巧、俭的女红旗手！”^①

△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五十周年，出席上海各界妇女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举行的盛大集会，并给先进妇女和先进集体发奖。

3月14—15日 由曹荻秋、沈粹缜陪同，视察上海闵行工业区和吴淞新工业区，访问工人家庭，视察工厂。在吴淞还视察了海军舰艇，关切地询问海军战士的生活、学习。途经吴泾、彭浦，见两年前的麦地里盖起了厂房和工人住宅，对工人的创造非常兴奋。同时，又视察了马桥人民公社。

3月30日—4月10日 在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春 作《中国工人阶级和继续大跃进》一文。说，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人民“在生产、科学和文化方面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新的革命高潮。”“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国工人阶级正在进行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一运动是今天我国前进的动力”；这也是“1949年获得解放以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必然结果。”又说：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迅速改进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资金积累加快，生产手段得到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这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大大改变我国的面貌”。相信“革命使我们达到光辉的现在，也将使我们达到光荣的未来”^②。

① 《人民日报》，1960年3月8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429—436页。

4月13日 同董必武、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一起，到北京机场欢送周恩来出国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

4月22日 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集会。听陆定一作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

4月27日 在北京，同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一起，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闭幕式。

△ 下午五时半，在北京，接受伊拉克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阿卜杜勒哈格·法齐勒偕同大使馆一等秘书递交的国书，致答词中指出：“中伊两国都是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伊拉克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① 递交国书时，罗贵波、何英、俞沛文在场。

4月30日 晚，在北京，出席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宴请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三千多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来自反帝、反殖前线的亚、非、拉地区的外宾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5月1日 在北京，同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分别参加群众庆祝活动。（毛泽东在天津，刘少奇在成都，周恩来在贵阳，陈云在上海，陈毅在昆明。）在景山公园观看孩子们的表演，参观少年宫里展出的工艺、美术等儿童习作。接受少先队员们所献赠的集体创作的绒制的鸡和线织的书包。

5月17日 同朱德、林彪、邓小平一起，到北京机场欢迎周恩来结束对南亚的访问归国。

5月20日 出席首都三百二十万人大示威集会，支持苏联，

^①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8日。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出席了大会。

5月22日 作《必须彻底揭露美国战争贩子》一文。谴责美国“破坏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及“威胁世界和平”。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①。

5月31日 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林伯渠，在遗体前默哀，并守灵。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一文。指出：为祖国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当代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强调说：“党和国家把塑造人的重任交给你们，你们是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工程师。”勉励儿童工作者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要认真地顽强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还必须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业务水平”^②。

△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进行亲切的交谈。

6月2日 上午，首都各界人民一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出席陪祭。

△ 下午，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一起，到首都机场，欢迎阿尔巴尼亚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

△ 晚，陪同刘少奇接见哈奇·列希及其随行人员。

6月28日 致电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努马，祝贺加纳共和国成立，并祝贺恩克努马就任共和国总统。祝愿总统和加

①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2日。

② 《中国妇女》，1960年第十一期。

纳人民“在为国家繁荣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开祝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①。

6月27日 作《各国人民能够而且一定会彻底击败帝国主义》一文。说：“中国人民鉴于目前的世界形势，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新浪潮。”在列举美国侵略者一系列侵略行径后说：“这些是多年以来的实际情况”。因此，“不要从中国身上找远东紧张局势的根源；我们绝对不威胁任何人！根源在于公开侵略中国并且正在准备更大的侵略、同时把其他亚洲民族和国家视为奴隶的美帝国主义！”严正表明：“我们准备并且有能力保卫自己，准备并且有能力帮助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平的正义斗争。”指出：“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保持着高度的战斗性和斗争精神。”“各国人民只要结成紧密的队伍，一心一德，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彻底击败帝国主义”^②。

7月22日 在北京，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

8月10日 在北京，接受匈牙利大使马尔丁·费伦茨递交的国书。表示在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中将得到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并祝愿中匈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团结和友谊日益增强。

8月14日 上午，在北京，同周恩来一起，接见分别以金仲恒、金汉奎、朴赞松为首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朝鲜电影代表团、朝鲜国家排球队全体成员。接见时，李先念、习仲勋、郭沫若、陈叔通、廖承志、沈雁冰、黄继光母亲邓芝芳在座。

△ 出席首都人民在政协礼堂举行的集会，庆祝朝鲜人民解放十五周年。

① 《人民日报》，1960年7月1日。

② 《宋庆龄选集》，第437—440页。

9月9日 上午，在上海，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吊唁威廉·皮克总统逝世。

9月14日 在上海，到机场迎接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和几内亚其他贵宾。周恩来陪同到上海。

9月15日 同周恩来及上海市党政领导，到机场欢送塞古·杜尔。

9月27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印度尼西亚党总主席阿斯马腊·哈迪和夫人，印度尼西亚党秘书长阿斯纳威赛义德，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刘述周、张跃辉等在座。

11月5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人类的希望》一文。追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苏联、中国、欧亚两洲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用。指出：过去一百多年人民斗争“成功的关键始终在于动员人民群众。”“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依靠他们的力量作为核心，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逐步粉碎他们的反人民的阴谋，从而保卫世界和平”^①。

△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列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电称：

“中国人民历来都把加强中苏兄弟般的友谊和团结，……看成是自己神圣的职责。让我们两国人民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我们的共同事业献出更大的力量”^②。

11月9日 在上海，接见苏中友好协会以斯托列托夫为团长的代表团，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石西民、李希庚在座。

11月26日 在上海，接受古巴驻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奥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

② 同①，1960年11月7日。

斯卡·皮诺·桑托斯递交的国书，并致答词。说：“中国人民一向以十分钦佩的心情关注着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中国人民十分珍惜同古巴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加强亚洲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必将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① 递交国书时，章汉夫、葛步海、林平、刘述周等在座。桑托斯夫人也在座。

△ 接见古巴驻中国大使奥斯卡·皮诺·桑托斯和夫人及大使馆一等秘书赛西尼奥·马丁内斯·奥尔特加，和他们亲切交谈。接见时，章汉夫等在座。

12月2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苏联发射宇宙飞船成功。^②

12月4日 在上海市基层投票选举人民代表。

12月10日 向上海市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致祝词。说，上海妇女和全国妇女一样，“在各条战线上与男子并肩战斗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先进儿童工作者、先进儿童工作集体和大批大批的女英雄。”勉励妇女“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进一步发扬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各条建设战线的任务”^③。

是年 当《中国建设》发行工作委托给中国国际书店后，提出发行部门不宜与编辑部完全分开。同时明确表示，对直接关系到刊物的推广发行的方针、计划等问题，我们仍有权决定^④。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7日。

② 同①，1960年12月3日。

③ 同①，1960年12月11日。

④ 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宋庆龄纪念特刊》。

1961年（辛丑） 六十八岁

1月27日 是日为旧历除夕，邀请陈赓和夫人到家里作客。

1月28日 时届春节，送给寓所警卫连长张宽一张精制的贺年片，上面用毛笔亲书：“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工作学习双跃进。”并让其带回送给警卫战士的迎春贺信，向大家致节日问候，祝大家好好学习工作。①

2月2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作《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一文。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过去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基础上竭尽其力加强我们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联系，首先是同我们伟大的苏联朋友和邻邦的兄弟联系，我们在今后将继续这样做。同全世界一切维护和平和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而努力的人们携起手来，促进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继续侵略和新殖民主义及其反革命输出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阵营正在策划的世界战争的计划”，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我们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的责任。”指出：“只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只要建立并不断扩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时代的最强大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就能够制止帝国主义者的黑手和防止战争”②。

2月8日 复信王光美，言及在北京西河沿的住宅问题。说：“该房子去年因新修好而迁进，比较潮湿一些”。认为经过一段时间，“不致象去年那样潮湿了”。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

① 北京卫戍区某部部分警卫战士：《宋庆龄名誉主席关心我们成长》，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36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2月14日。

正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表示“不打算再迁新址了”^①。

2月11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

2月16日 晚，出席上海各界人民两千多人在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的集会。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柯庆施、陈丕显、马天水、曹荻秋出席大会。

△ 晚，在上海，接见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共产党人》杂志总编辑康斯坦丁诺夫为首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接见时，柯庆施、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李雷吾、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拉兹杜霍夫、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柯立朝在座。

3月17日 致电陈赓亲属，对陈赓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电曰：“陈赓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陈赓同志的躯体虽逝，而精神永存”^②。

3月25日 首都各界两千五百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陈赓，献了花圈。

4月12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东方号”。向苏联人民、卓越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向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宇宙飞行员苏联公民加加林少校致最衷心的最热烈的祝贺^③。

① 《老一辈革命家书信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参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8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3月18日。

③ 同②，1961年4月13日。

4月28日 致电波波娃和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11日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接待毛泽东来访。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孩子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一文。文中引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为孩子们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说：“这个主人的身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才得到的，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指出：“做新中国的新主人，首先就要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学习革命长辈的英雄榜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切为了革命，从小学习做革命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生的精力。”其次，要看到将要肩负的重大责任，“不但要改造社会，还要改造自然，征服宇宙。……在进行革命战争时，不能赤手空拳上阵，必须拿起武器来。在建设中国同样也必须拿起武器来。”建设中的武器，“就是劳动的本领，就是知识。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第三，“要学习革命长辈的优秀品质”。“从小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先人后己，服从纪律维护公共利益。……树立艰苦奋斗，勤劳朴素的作风”^①。

6月29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作《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文中以满腔热情歌颂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说：“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站在我国历史的中心。”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和法西斯反动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建立一个各族人民兄弟般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艰苦斗争中，党一直是领导者和决定性的力量。”又指出：“党领导着四分之一的人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胜利，从而不可估量地加强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它的光辉榜样使世界各地愈

^① 《宋庆龄选集》，第441—444页。

来愈多的人们注意着未来。同样也使他们认识到毛泽东主席论点的英明和正确。”党的“脉搏随着中国人民的心一同跳动——动员我们鼓足干劲，号召我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全国人民的健康幸福，排除一切障碍，从而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号召我国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①。

8月7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苏联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二号”发射成功。电曰：“苏联在征服宇宙空间的事业中，又获得了重大成就”^②。

8月17日 下午，在北京，会见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古拉特，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习仲勋、葛步海、林平在座。

8月18日 下午，在北京，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兼政府首脑克瓦米·恩克鲁玛。同时还会见加纳共和国运输交通部长、总统事务部长，及驻中国大使释比纳·克西。会见时，周恩来在座。

9月9日 为《辛亥革命回忆录》撰写序言。指出：“辛亥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广泛地传播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也有失败的一面。……没有能够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以致使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后仍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孙中山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领导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坚持革命斗争。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但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

① 《宋庆龄选集》，第445—447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8月8日。

命的决定性胜利。新中国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它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亚洲的觉醒，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也有着深远的意义。”进而指出：“这部回忆录，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史实，提供了关于辛亥革命的有关的历史资料”^①。

9月15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成立筹备委员会。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1月5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十月革命四十四周年。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的重要意义，说：“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②。

11月28日 出席农工民主党举行的纪念邓演达殉难三十周年集会，并给大会题词。题词称：“泽〔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殉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③。

12月29日 致电苏联波波娃和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

1962年（壬寅） 六十九岁

1月 为纪念《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作《真实报导的传统》一文。回顾《中国建设》杂志的诞生，并追溯其历史渊源。说：1938年，当保卫中国同盟（出版《中国建设》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诞生后，由于国民党对于新闻报导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序言》，《宋庆龄选集》，第448—450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11月7日。

③ 同②，1961年11月29日，

封锁，它“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导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是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信》上第一次知道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也向全世界揭发了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在整个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时期，我们的组织继续不断地传播着有关我国真实情况。”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中国福利会开始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导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同时，也“报导全世界人民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实情况”。指出：“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并表示，当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服务”^①。

是月 出席纪念《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招待会。周恩来、陈毅、邓颖超亦出席。

△ 为庆祝《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到该杂志社祝贺，和同志们亲切握手。

2月12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巩固这一伟大同盟，是中苏两国人民的神圣责任。”表示：“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苏友好同盟，中国人民

^① 《宋庆龄选集》，第451—454页。

一贯把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看作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中苏友好协会将一如既往，继续为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团结而进行不懈的努力”^①。

3月21日 在北京，出席刘少奇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

3月27日—4月16日 在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4月29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1日 到北京景山公园，同一万五千多名小朋友一起欢度“五·一”节。参观儿童画展，欣赏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并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6月1日 出席北京孩子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欢会。

6月17日 下午，在北京，同刘少奇一起，接见并宴请以朴金吉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8月12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三号”和“东方四号”发射成功。“祝苏联人在征服宇宙空间的神圣事业中，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②。

9月16日 致函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全体工作人员，祝贺该院建院十周年。信中勉励保健院全体工作人员再接再厉，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不断为新中国的妇幼保健事业作出贡献^③。

9月27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印度尼西亚哈蒂妮·苏加诺夫人，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黄镇、曹荻秋在座。

① 《人民日报》，1962年2月14日。

② 同①，1962年8月13日。

③ 同①，1962年9月19日。

11月5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十月革命四十五周年。

11月7日 撰写《祝〈儿童时代〉创刊三百期》一文。文中以无限喜悦的心情说：“这一个为小读者服务的期刊，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在许多革命长辈、作家、教师和编辑象园丁一样的栽培下，成长为百花园里的一朵小红花，成长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好朋友。”指出：要让小读者们晓得过去的年月，认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并“学会看到未来，未来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创造新天地，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将被消灭，大自然也将更听人们的指挥，一个光辉灿烂的完全属于劳动人民的世纪必将到来。启发和鼓舞小读者们更加热爱学习、热爱劳动、更好地天天向上，丰富他们的知识和想象，增强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信心和志气，使他们认识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无比幸福。”并祝愿《儿童时代》这朵小红花“开得更加鲜艳、更加生气勃勃，成为小读者们更喜爱的能够从它这里得到更多帮助的好朋友”^①。

11月12日 作《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六周年。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孙中山同共产党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在俄国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人类道路上的一个新转折，表明社会制度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开始。人类第一次瞥见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当时中国的局势特别动荡。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任务，但是却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

^①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65—166页。

任何根本的改变，原因是没有唤起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也没有明确地确定国家的真正敌人作为集中攻击的目标。”“但是，孙中山是坚强的，他不屈不挠地沿着民族革命的道路前进。然而，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他原来的关于中国反击压迫者的思想必须修改，他不断寻求使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解放的蓝图。”“孙中山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重要性，……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于是，他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在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并指出：“国共两党间的统一战线的确是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的。”事实上，“历史证明孙中山和拥护他的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使革命情绪大大高涨”^①。

12月29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

是年 给广东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分别题字。

1963年（癸卯） 七十岁

1月7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及其随同到上海的锡兰贵宾，和锡兰驻中国大使阿·伯佩·雷拉等。同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周恩来、柯庆施和夫人、谢克西和夫人、俞沛文等在座。

1月21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加纳司法部长科菲·阿桑特·

^① 《宋庆龄选集》，第457—468页。

奥费里——阿塔和所率领的加纳政府友好代表团成员、外交部副部长阿·克·帕普兰普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黄镇、刘述周、孟英、葛步海等在座。

1月22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博，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陈毅、柯庆施、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张世杰等在座。

2月12日 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的纪念日。^①

2月20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宾主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陈毅和夫人、曹荻秋和夫人、姬鹏飞和夫人、我国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在座。

3月8日 致函上海和全国妇女，祝贺“三·八”节。函称：上海市和全国妇女中，“又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先进人物，并且在各个方面和全国人民一起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勉励妇女“再接再厉，做好工作，努力学习，……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优良风尚、争取更大的光荣。”并“要注意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儿童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并引导儿童好好学习雷锋同志那种爱憎分明、勤奋学习的光辉榜样”^②。

4月22日 下午，在北京接见阿拉伯联合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周恩来、蔡廷锴、章汉夫、中国驻阿联大使陈家康，阿联方面萨布里的随行人员及阿联驻中国大使伊马姆在座。

4月27日 在北京，接受瑞士驻华大使汉斯·凯乐递交的国书。在致答词中说，中国和瑞士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瑞两国

① 《人民日报》，1963年2月14日。

② 同①，1963年3月9日。

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增进。相信：通过中瑞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①接受国书后，同凯乐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场的有曾涌泉、马振武等。

4月30日 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一起，出席全国总工会等十一个人民团体举行的盛大庆祝“五·一”劳动节招待会。向各界代表和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节日的祝贺。

是月 从上海迁居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住宅（即现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5月1日 到北京景山公园，和一万八千多少年儿童一起观看歌舞、杂技和木偶戏。同孩子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5月22日 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到北京机场，欢迎刘少奇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刘少奇出国访问前，曾答复王光美函询出访东南亚应注意之事，亲笔列出许多注意事项，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等，并派秘书给予详细解释；同时告之王光美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②）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愿革命后代迅速成长》一文。亲切地教导儿童们说：“‘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长辈们在旧社会怎样受反动派的压迫，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不要忘记过去帝国主义怎样欺侮我们；不要忘记无数革命先辈怎样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不要忘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年代里，中国儿童一直跟着共产党参加了斗争，甚至许多‘红小鬼’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记住这一切，让革命传统在你们的幼小心灵中生根，这将帮助你们从小立志参加革命的

① 《人民日报》，1963年4月28日。

② 参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

行列，把自己锻炼成为智勇双全的革命后代。”又说：“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学习革命的道理，学习生产建设的本领，拿出勇气来做好人好事，拿出勇气来向坏人坏事做无情的斗争。从小锻炼自己能够经得住风雨，挑得起重担。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遇到大风大浪或毒蛇猛兽都不要惊慌、害怕，坚决跟着共产党，高举革命的红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直到最后胜利”^①。

△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缔造未来》一文。指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因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因此，老一辈人的使命不仅在他们那个时代为争取社会进步而进行胜利的斗争，而且还要使下一代人能在新的条件下把这场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为此“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该毫无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要使他们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要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树立明辨是和非、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谬误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从人类克服一切障碍而长期进行的斗争中吸取教训，这场斗争是为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消灭剥削、压迫和战争”^②。

6月11日 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努力》一文。指出：“福利会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儿童工作。”“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老一辈人们的责任……在于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强调指出：“这是革命工作的百年大计，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

① 《宋庆龄选集》，第473—476页。

② 《中国建设》，1963年第六期。

“必须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还指出：“为了教育革命的后代，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学校、家庭、剧场、校外教育机构，以至各种文化娱乐场所都要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号召：“福利会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同全国有关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一道，在培养中国人民的革命后代的工作方面，做出更多的更大的贡献”^①。

6月14日 下午，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在北京，出席中国福利会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举行的酒会。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何香凝、陈毅、聂荣臻等出席。应邀出席的外国朋友有爱泼斯坦、雷克和夫人、哥罗安涅和夫人、巴农和夫人、戴尼丝、谭宁邦、魏斯、艾黎等。周恩来在会上祝酒，热烈祝贺并建议为其健康干杯。

6月18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苏联人造飞船“东方5号”和“东方6号”的发射成功。电称：它“将进一步促进宇宙航行科学的发展”^②。

是月 作《为了下一代的成长》一文。指出：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增进妇幼身心健康和发展儿童文化教育的工作。”其目的是：“使下一代健康地成长，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经得住风雨，挑得起重担，而把革命推向最终胜利。”今后，要“继续努力，为我国伟大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③。

8月29日 致电美国杜波依斯夫人，对杜波依斯博士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指出：“杜波依斯博士为争取黑人解放，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献出了光辉的一生，他

①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69—173页。

② 《人民日报》，1963年6月19日。

③ 同①，第167—168页。

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和怀念”^①。

9月14日 同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到北京火车站，欢送刘少奇出访朝鲜。

9月26日 下午，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和其丈夫、印度尼西亚基本工业部高级官员哈迈德·纳塔库苏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黄镇、葛步海，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临时代办达宛在座。

9月28日 同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一起，赴北京火车站迎接刘少奇从朝鲜回国。

9月30日 庆祝建国十四周年，周恩来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各族各界代表和八十多国外宾。招待会结束前，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一起到会场，同全体来宾共庆节日。

10月1日 出席国庆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一起，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11月6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六周年。

是年 作《大无畏的中国人民》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是大无畏的，是善于斗争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点。我国劳动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战胜种种天灾人祸，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创造了无数光辉的业绩和大量的财富。他们坚持不懈地把生活不断地推向前进。几千年来，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剥削阶级抢走。后来，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国，更加深了中国人民难以忍受的沉重苦难。为了生存，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压迫，劳动人民屡次站起来进行斗争。虽然由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原因，他们多次遭到失败，但也曾取得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并且从未放弃斗

① 《人民日报》，1963年8月30日。

争。”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劳动人民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因而无限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敢想敢干的精神。”“任何人，即使是对新兴的中国抱敌视态度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钢铁般的意志”^①。

△ 为北京王府井儿童用品商店题名。（1966年又题店名为“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

1964 年（甲辰） 七十一岁

2月1日 应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决定将访问锡兰。

2月5日 晨，在昆明，同云南各界人士到机场，欢迎周恩来、陈毅访问亚非十国后，从索马里乘机回到昆明。

2月12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四周年。

2月25日 据新华社讯，和周恩来将于26日到达锡兰，陈毅及夫人陪同前往，孔原、黄镇等同行。

2月26日 晨，乘专机离开昆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陪同到机场，昆明各族各界一千多人到机场欢送。上飞机前，同前来欢送的党、政、军负责人握手告别，向欢送的人们告别。

△ 上午，在达卡机场停留。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长法兹卢勒·卡德尔·乔杜里、东巴基斯坦省长阿卜杜勒，以及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人民到机场欢迎。即将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陈毅及随行人员，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到机场欢迎。

△ 上午十时四十分，同周恩来、陈毅乘专机离开巴基斯坦

^① 《宋庆龄选集》，第469—472页。

坦，前往锡兰。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到机场欢送。

△ 飞越缅甸时，致电缅甸奈温将军表示问候，并祝缅甸联邦繁荣昌盛，人民幸福。^①

△ 下午，抵锡兰首都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各部部长、议员，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驻锡兰的各国外交使节到机场欢迎，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

△ 下午 同周恩来一起拜会锡兰总督高伯拉瓦和夫人，陈毅和夫人、随行人员、谢克西随同前往。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座。

2月27日 上午，由班达拉奈克夫人陪同，同周恩来到前锡兰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陵墓前致敬并献花圈。陈毅及其他随行人员、锡兰其他官员亦前往。

△ 晚，同周恩来出席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总理府举行的欢迎招待会。高伯拉瓦和夫人等四百人出席作陪。陈毅及其他随行人员亦出席。宾主亲切交谈，并观看了锡兰民间歌舞表演。

2月28日 同周恩来偕陈毅等，出席高伯拉瓦和夫人为招待他们举行的国宴，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满意地指出：中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特别是由于已故的班达拉奈克总理和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的卓越努力，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充分尊重锡兰政府的和平中立政策，坚决支持锡兰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② 班达拉奈克夫人、各国驻锡兰使节出席了招待会。

△ 在锡兰斯里帕里学院发表题为《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讲演。指出：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旧世界正在崩溃，……人类已经着手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他们正

① 《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② 《在锡兰总督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3月1日。

在摆脱迷信，摆脱那种以为旧秩序是不可改变的想法。以新的观点武装起来的人民，决心要从生活中消除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根源。他们决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指出：“二十世纪的伟大经验是：只要人民的思想上目标明确，紧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和团结同盟军，勇敢地同压迫者进行战斗，他们就能够赢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数次的人民斗争胜利，说明“团结起来的人民力量要比任何武器大好多倍，它说明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民而不是武器。”“如果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肩并肩地互相帮助，就可以走向一个所有国家都是独立平等、各国人民都享有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世界，走向体现人类以及文化团结的和平世界”^①。

2月29日 为感谢锡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和亲切接待，同周恩来一起，为锡兰总督、总理举行宴会。高伯拉瓦和班达拉奈克夫人出席，锡兰高级官员和驻锡兰的各国外交使节亦出席。

△ 晚，结束对锡兰的访问，同周恩来离开锡兰回国。陈毅及夫人和其他随行人员同机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班达拉奈克夫人、高伯拉瓦的代表、锡兰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及著名人士，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各国驻锡兰的外交使节、旅居锡兰的华侨代表。

3月1日 离开锡兰国境时，同周恩来联名致电锡兰总督高伯拉瓦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再一次表示感谢，并“祝锡兰繁荣昌盛，祝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②。

△ 返国途中，飞经缅甸国境时，在飞机上，同周恩来联名致电缅甸联邦政府主席奈温，向他致以良好的祝福。

△ 同周恩来一起回到昆明，陈毅和夫人及其他随行人员同时到达。云南省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三千多人到机场迎接。

① 《宋庆龄选集》，第481—489页。

② 《同周恩来联名电谢锡兰总督、总理》，《人民日报》，1964年3月2日。

3月8日 上午，由昆明乘专机抵上海。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到机场欢迎。

4月1日 致函儿童艺术剧院全体人员，祝贺话剧《小足球队》获文化部颁发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奖和演出奖。指出：它所以获得这样的荣誉，主要是由于“迅速表现现实生活，……用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贯彻了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正确方向。”这是“贯彻了毛主席和党的文艺方向的结果”，也是“坚持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不断努力，不断创新的结果。”希望“力戒骄傲，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剧目”^①。

4月9日 为《工人日报》讨论“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问题，作《把培养革命后代的责任担当起来》一文。指出：“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不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幼苗纵然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细心的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修枝，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而教育后代，“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很好的结合起来。其中家长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一言一行都给孩子深远的影响。”“要求父母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担当起来。”强调指出：“父母、教师以及社会各方面人士都要为孩子树立行为的榜样，为了教育下一代，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②。

4月29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

① 《祝贺话剧〈小足球队〉获奖》，《宋庆龄选集》，第490页。

② 《宋庆龄选集》，第491—499页。

5月7日 在上海，接见锡兰自由党妇女组织副主席塔玛拉·伊兰加拉特尼夫人率领的锡兰自由党妇女组织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沈兹九、沈粹缜在座。

5月30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让儿童读物更好地为培养革命后代服务》一文。指出：“革命的儿童读物，是儿童的良师益友。”“为了培养儿童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和满足儿童智力发展的需要，除了师长的谈话和教科书之外，儿童读物是必要的补充。”它“帮助小读者增进知识、扩大眼界、受到革命传统和革命前途教育，逐渐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使他们在德、智、体诸方面更加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更好地培养他们成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壮的新的一代。”充分肯定解放后，由于党的重视，儿童读物的内容、题材、形式、创作和出版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指出：“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目前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的情况。”“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需要紧紧跟上形势。”“质量应该进一步提高，题材应该更加广泛。”“要求有更多的作者和画家为儿童创作”；“还要加强儿童读物的指导工作。”“教师和家长都要重视儿童阅读的指导”^①。

8月25日 下午，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少年厅里，接见应邀来我国度暑假的七十五名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女及陪同他们的五名辅导员。和他们围座在一起，亲切热情的谈话。希望阿尔及利亚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坚强、更聪明、更健壮，成为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雄后代。祝他们在中国过得愉快，在上海过得愉快^②。讲话受到阿尔及利亚孩子们的热烈欢迎。接见时，金仲华、张苏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座。

9月26日 在北京，接见伦敦“亚、非、加勒比侨民团体委

① 《宋庆龄选集》，第500—503页。

② 《接见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女的谈话》，《人民日报》，1964年8月26日。

员会”主席、《西印度公报》月报主编，特立尼达的克劳迪娅·琼斯，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唐明照等在座。

9月30日晚，在北京，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联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八时，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卓琳等，陪同各国外宾进入宴会大厅，举杯向中外来宾致节日祝贺。

10月1日 在北京，出席国庆盛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首都七十万群众游行队伍。各国知名人士三千多人参加盛典。

10月4日 下午，在北京，同周恩来、陈毅一起，接见参加我国国庆典礼和进行友好访问的各国女贵宾。她们是：柬埔寨西哈努克夫人及柬埔寨其他女宾们，马里苏丹联盟党凯塔夫人，还有印尼、朝鲜、阿尔及利亚、刚果、新西兰等国女宾。蔡畅、许广平、史良、杨之华、康克清等出席作陪。

11月6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电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深厚的兄弟友谊。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①。

△ 晚，在北京，同彭真、陆定一、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程潜、林枫等一起，接见以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交通部部长鲍·巴·别谢夫为首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吴玉章、廖承志、李四光、邵力子等在座。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也在座。

△ 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日。

七周年集会。

12月18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

△ 在北京住所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廖承志、《中国建设》杂志社专家爱泼斯坦夫妇在座。

12月20日 在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预备会，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12月21日 在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这次会议于1965年1月4日结束。在会上，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谢觉哉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这次会议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在会上，再次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主席)。大会闭幕时，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大会全体代表。

12月27日 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出席政协第四届首次会议的委员。

△ 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少数民族业余艺术演出会代表。

12月30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

12月31日 晚，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首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新年联欢会，同五万军民联欢，迎接新年。晚会开始前，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四好连队代表、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击落美制蒋间谍飞机有功人员、活捉美制蒋机驾驶员的东海民兵代表及工农业劳动模范、民兵代表、烈军属、复员军人代表共二千八百多人。

1965 年（乙巳） 七十二岁

1 月 1 日 为《儿童时代》题写刊名^①。

2 月 13 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电谓：祝中苏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

3 月 8 日 上午，在上海，到机场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尤布·汗。

3 月 9 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尤布·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周恩来、陈毅、曹荻秋在座。巴基斯坦方面，阿尤布·汗的女儿奥兰泽布夫人、外交部部长佐·阿·布和夫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夫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佐罗查和夫人在座。

4 月 9 日 担任柯庆施治丧委员会委员。

4 月 30 日 复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

5 月 29 日 下午三时，到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同孩子们一起观看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三名女少先队员的乒乓球表演，为她们稳而准的削球技术鼓掌，并勉励她们好好学习，练好本领，长大为祖国争光。又观看上海第一师范学校附小的少先队员们所表演的《姐姐光荣去新疆》和《杀得美帝回老家》儿歌节目，引起浓厚兴趣，不断鼓掌，对身旁的孩子说：“表演得很好。”随后，和孩子们参观陈列在这里的“越南必胜、美国必败”的图片展览^②。

① 《儿童时代》，1965 年第一期。

② 《宋副主席同少年儿童欢聚》，《儿童时代》1965 年第十二期。

是月 为《北京周报》作《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一文，热情赞颂内蒙古草原的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不顾自己的安全，同暴风雪搏斗，保护她们所看管的羊群的英雄事迹；并指出，在今天的中国，这只不过是我们许许多多儿童新面貌的突出反映。因为“我们的儿童出生在英雄的土地上，从初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他们童年时期，社会和父母共同关心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品德，使他们成为有坚强意志和决心的新一代。”我们教育孩子“把革命进行到底”，“学习雷锋的榜样”。“现在，我们的青年，甚至年纪很小的儿童都知道雷锋的生活，懂得雷锋的生活的意义。”“他们力求成为雷锋所说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①。

6月1日 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6月8日 下午，在上海接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郭沫若、于立群、曹荻秋和夫人、连贯和夫人等在座。

9月30日 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出席国庆盛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10月5日 下午，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和夫人石泓，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在座。

10月24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并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工作，被推选

^① 《宋庆龄选集》，第504—512页。

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

10月27日 致函祝贺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祝愿“妇产科的医疗保健和科学研究工作继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取得新成就。”希望“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卫生工作革命化和面向五亿农民的指示。……认真研究如何真正作好农村妇产科常见疾病，多发病和计划生育等工作，对妇幼保健和卫生事业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①。

10月31日 在北京，出席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纪念方案。

11月6日 致电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向苏联人民祝贺伟大的十月革命节。

11月23日 下午，在北京，接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及其随行人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周恩来、贺龙、姬鹏飞在座。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瓦齐里·朱马也在座。

12月31日 作《解放十六年》一文，热情歌颂新中国成立十六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外交等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阐明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政策和工作方法。说：我国人民“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不再受任何人奴役”。我国“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各国之间”，“已经是一个非常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强国”。指出：“这些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能正确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领导，人民的干劲和才能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就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②的领导。

① 《宋庆龄选集》，第513页。

② 同①，第514—529页。

1966 年（丙午） 七十三岁

1月21日 在北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首都五万军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春节联欢会，向各族各界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致亲切的节日祝贺。并接见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和烈属、军民代表。

2月19日 为陈叔通追悼会送了花圈。

4月3日 下午，在北京接见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及和平人士西园士公一。接见时，廖承志在座。

4月14日 下午，接受阿尔巴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纳塔奈利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王炳南在座。

5月1日 上午，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一起，冒雨陪同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全体团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同首都人民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7月22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援越抗美集会大示威。

11月12日 下午，出席首都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万人集会。周恩来、董必武、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出席。在大会上，以无限的怀念和激动的心情宣读所作纪念文章《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说，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的人。……他的一生是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他“个人生活简朴，”并且“毕生好学。”详细叙述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的一生。指出：他“对革命的抱负并不限于中国。他对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特别注意。从1900年以来，他同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志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建立所有这些联系都是为中国及各国的革命服务的。”孙中山“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

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寻找引向革命胜利、中国获得解放以及使中国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中国人民得到自由的道路。”孙中山通过“严格的自我检查和许多新朋友的帮助，他开始看到了光明。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他“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援助。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党。”末了说：现在“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已经超过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他“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坚韧性经常鼓舞着我们”^①。

11月17日 在北京，会见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和夫人，以及日本纪念孙中山诞辰访华团的成员。

是月 《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发行后，即邮寄给杨小佛一枚。

12月 刘少奇虽处于逆境，仍给他的孩子送去贺年片、日记本及糖果等。

1967年（丁未） 七十四岁

2月6日 下午，在北京，接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西·哈米德递交的国书，并进行友好谈话，介绍了我国情况。在谈到中也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两国一向友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两国人民一贯互相同情、互

^① 《宋庆龄选集》，第530—546页。

相支持。祝愿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①。姬鹏飞在场。

3月31日 下午，在北京，接受瑞士新任驻中国大使奥斯卡·罗西蒂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罗贵波在场。

4月11日 下午，在北京，接受越南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吴明鸾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韩念龙等在场。

6月20日 下午，在北京，接受朝鲜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玄峻极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韩念龙在场。

9月23日 在北京，接受毛里塔尼亚首任驻中国大使哈尔希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友好谈话。徐以新在场。

9月30日 晚，同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等一起，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招待会。

10月1日 出席国庆盛典，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是年 接刘少奇的子女的来信，立即将信转给毛泽东。^②

1968年（戊申） 七十五岁

8月31日 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实朋友路易·艾黎写证明，说：“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

① 《接受也门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67年2月7日。

② 因刘少奇身处逆境，他们的孩子曾写信给宋庆龄。参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

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和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①。

1969 年（己酉） 七十六岁

9月30日晚，在北京，出席周恩来举行的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10月1日 出席国庆盛典，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四十多万军民和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的游行队伍。

是年 知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又托黎沛华带一套到上海，直接交给他。

1970 年（庚戌） 七十七岁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首都四十七万军民的游行队伍。

12月17日 在北京，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我国大使留宾·斯托扬诺夫递交的国书。乔冠华在场。

1972 年（壬子） 七十九岁

1月10日 在北京，参加陈毅追悼会。

① 影印原件，见《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第317幅，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是月 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针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文中所声言的：“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而提出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指出：二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个言行一致的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名符其实的共和国，并且，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解放前，中国“现代化工业企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上海地区”；现在，“无数崭新的工业单位，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发展起来了。”过去，“中国工业为外国帝国主义投资者和中国资本家所有，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润。但是今天，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制度下，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的性质。过去封建军队只不过是封建军阀们的工具，而今天的人民军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都起着支援的作用。……军民并肩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乳水交融。”这是人民的时代，“中国的劳动人民都认真地为和平繁荣而努力工作。”“在中国人民中间，到处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到处可以体会到团结的感情。”“正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对外政策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中国的做法完全不是为了攫取超额利润去进行投资，不是干涉和剥削，而是主张国际互助。”明确指出：“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①。

2月14日 春节前夕，从上海向北京寓所寄回桔子、香蕉等，让秘书送给警卫战士，并说：我不能回去和大家一起过节。对战士的辛勤工作表示谢意。

2月15日 接到埃德加·斯诺夫人洛伊斯及其子女西安·克理斯托弗电报，得悉斯诺逝世。

^① 《中国建设》，1972年第一期。

2月16日 电唁斯诺夫人。电称：“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将永葆长青。”^①

2月19日 首都各界隆重集会追悼斯诺，献了花圈。

4月26日 为李德全追悼会献了花圈。

6月26日 下午，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班达拉奈克总理的儿子阿努拉·班达拉奈克和总理的私人秘书在座。

是月 作《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深切怀念中国人民的忠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说，他四十多年前就来到中国，“如实地报道他所看到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报道了他的发现：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领袖们……使长征在遭到惨重牺牲的情况下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通过集体努力和斗争而前进的新道路。”从那时到现在，“他的这本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他的“作品，其中包括他翻译的一些当代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使长期以来被人冷漠地称为‘神秘不可测’的中国人民能为外界所了解。”由于他“对中国的‘赤色分子’的同情给他带来很多敌人。在美国的政治迫害时期，他遭到恶意诽谤，没有几家报纸杂志敢登载他的文章，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中国解放后，他“三次访问人民共和国。他不辞辛苦地重访了多年前他曾经到过的所有的地方，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巨变和这个地

① 《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

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了起来。”1970年12月间，他同毛泽东谈及为解决中美两国间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所毕生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深切指出：“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大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的中国历史的遗产”^①。

7月28日 下午，在北京住所，会见美国女作家、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和其女儿阿尔玛·塔克曼，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月28日 在北京，会见并宴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杜达光和夫人。

9月2日 凌晨，到北京医院向9月1日夜半去世的何香凝的遗体告别。是向何遗体告别的第一人。当时，其行动已不方便了。

9月5日 在北京，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说：何香凝“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是廖仲恺的革命伴侣、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革命派杰出的代表。她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对何香凝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②

是月 作《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一文，生动地描绘美国朋友格雷斯（1972年在作过一次关于新中国的讲演后，驱车回家途中与警车相撞而死。）和其丈夫迈克斯·格兰尼奇对中国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说：“1936年初春，四十岁左右的格雷斯和迈克斯·格兰尼奇来到了上海。接着，他们两位所编辑的《中国呼声》创刊号3月15日出版了。……这个杂志把当时在上海的少数几位进步的外国人士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都为杂志撰写文章。”它“描

① 《中国建设》，1972年第六期。

② 《人民日报》，1972年9月7日。

述了东北三省如何惨遭浩劫，全国如何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犯上海……。”它“刊载了鲁迅的文章，发表了中国美术家的木刻作品。……这本杂志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呼声’——中华民族在蒋介石统治下为生存而战斗的岁月里从痛苦和希望中发出的呼声。”1971年秋她重访中国回国后，“满怀豪情，情绪高昂，一心一意想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在离别了三十四年的中国的所见所闻。他们多次作了关于新中国的讲演，每次都使听众为之神往。”深切地追念格雷说，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认为。当她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为这些成就感到光荣和自豪。”指出：“格雷，格兰尼奇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热情将永远鼓舞着太平洋两岸所有认识她的人”^①。

10月22日 晚，会见并宴请美国友好人士陆慕德和普爱达。参加会见和出席宴会的，有在京的外国朋友路易·艾黎，耿丽叔、马海德。

12月14日 为邓子恢追悼会送花圈。

1973年（癸丑） 八十岁

1月 作《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1877—1972）》一文，详细记述女革命家何香凝的革命事迹，称她“是孙中山的亲密的革命同志，是国民党前辈廖仲恺的忠实的、勇敢的妻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说：“她的一生是异常丰富和有益于人民的，她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②。

7月12日 给章士钊追悼会送花圈。

7月23日 给张奚若追悼会送花圈。

① 《中国建设》，1972年第九期。

② 同①，1973年第一期。

10月19日 给埃德加·斯诺骨灰安放仪式献花圈。

1974年（甲寅） 八十一岁

4月23日 给傅作义追悼会送花圈。

12月7日 给滕代远追悼会送花圈。

1975年（乙卯） 八十二岁

1月13日—17日 在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向全国人民指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大会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月15日 给李富春追悼会送花圈。

3月18日 出席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4月3日 担任董必武治丧委员会委员。给董必武追悼会献花圈。

是年 秋，在北京，带领警卫连全连干部战士到总政排演场观看话剧《万水千山》。当看到动人之处，激动得流下热泪。看完后，致函祝贺演出成功。^①

△ 从上海致便条给《中国建设》杂志社，建议“登载一篇文章介绍这里外科手术的惊人成果”^②

① 北京卫戍区某部警卫战士：《宋庆龄名誉主席关心战士的成长》，《宋庆龄纪念集》，第234—238页。

② 爱泼斯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纪念宋庆龄特刊》。

△ 当闻悉人言其写的文章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他人改动时，生气地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其实，她对自己的文章，总是谦虚地要求编辑提出意见，加工修改，而且总是以其独特的坦荡胸怀和求实精神对有益的意见和修改表示感谢。^①

1976 年（丙辰） 八十三岁

1 月 8 日 担任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委员。

1 月 11 日 赴北京医院，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 月 15 日 下午，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并献花圈。

3 月 作《伟大的新运动》一文，论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指出：“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积极性，正是真正发挥了个人的力量”^②。

6 月 29 日 给刘文辉追悼会送花圈。

7 月 6 日 担任朱德治丧委员会委员。

7 月 8 日 赴北京医院，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向朱德遗体告别。

7 月 11 日 参加朱德追悼会，并献花圈。

9 月 9 日 担任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委员。

9 月 11 日 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毛泽东，瞻仰遗容，并守灵。

9 月 17 日 吊唁毛泽东仪式结束时，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再次吊唁毛泽东，并守灵。

9 月 18 日 参加毛泽东追悼会，并献花圈。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 出席并主持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① 爱斯泼坦：《宋庆龄与中国建设》，载《纪念宋庆龄特刊》。

② 《中国建设》，1976 年第三期。

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生前提议邓颖超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决议。

12月18日 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驻我国大使临时代办法索。接受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兹尔·伊拉希·乔德里赠送的一枚纪念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诞生一百周年的金质纪念章，表示感谢，并请法索转达其对伊拉希的问候。会见时，韩念龙等在座。

△ 给吴德峰追悼会送花圈。

是年 因史良爱人陆殿栋逝世，亲赴史良寓所探望。

*

*

*

1966—1976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心情沉重，百思不解，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由于酷爱音乐，工作之余喜弹钢琴，而在这期间，更常听《黄河》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有时，则伏案绘画以排忧解难。

1977年（丁巳） 八十四岁

2月18日 为欢庆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高兴地购送一条几十斤重的青鱼和一些年糕给儿童艺术剧院，盼望他们在艺术上再放异彩。

4月 作《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追忆说：“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叙述了他的革命事迹，说他“鞠躬尽瘁为人民。”“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①。

^① 《中国建设》，1977年第四期。

8月2日 作《追忆鲁迅先生》一文，追忆说：1932年秋季，和鲁迅、蔡元培三人都被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他。”又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①。

8月5日 下午，在北京，会见并宴请华裔美国友人杨孟东及其子女，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杨孟东一行四人，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9月9日 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一万多人一起，参加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紀念会及紀念堂落成典禮，瞻仰毛泽东遗容。

1978年（戊午） 八十五岁

1月19日 在北京，会见美国百岁老人尔蒂·费舍女士。

△ 晚，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美国友人韦尔西·费希尔夫人，及其助手加拿大人萨利·斯温森小姐，进行了友好谈话。他们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7日到达北京。

是月 为《儿童时代》复刊写贺词。说：这个刊物是“辅导少年儿童学习的一个好朋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粉碎了“四人帮”，“各方面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只有在这时，《儿童时代》才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又和小读者见面了”。对小朋友们说：“它诚心诚意地愿意和你们做朋友，帮助你们更好地学习，更健康地成长。”指出：“党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发奋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树立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的风气。这是革命的需要，

① 《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是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的需要。”希望小读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老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①。

2月24日 下午,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2月25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并主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预备会,并发表讲话。

2月26日—3月5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5月4日 前往机场,欢送华国锋出访朝鲜。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作《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一文。指出:今天,祖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青少年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革命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并且让他“照亮通往2000年的新的征途,照亮通往共产主义的前程。”要求儿童教育工作者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情操”。指出:“培养新一代,家长的责任非常重大。”还指出:“必须创作出版适合儿童阅读的大量课外读物”。呼吁:“老红军、老干部、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并大力支持儿童读物的写作工作,担负起为新一代提供精神食粮的光荣责任”^②。

6月14日 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年,作《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总结中国福利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和成就。说:“中国福利会一直肩负着双重任务:首先,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进步的斗争中帮助解决某些急需;其次,向世界各国朋友阐明中国人

① 《儿童时代》,1978年第一期。

② 《人民日报》,1978年6月1日。

民斗争的意义和目标。”抗战时期，“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抗战胜利后，我们“用各种方法为人民的胜利，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力量，尽了自己一份力量。”在全国解放后，这个组织“不再是个募集和分发捐赠物资的‘基金会’了”，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开展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的实验性工作”，同时，也开展“国际宣传”。表示：在新长征中，“中国福利会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象以往四十年一样，为人民服务，并且通过《中国建设》，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①。

△ 担任郭沫若治丧委员会委员。旋给18日举行的郭沫若追悼会送花圈。

7月 为《中国妇女》杂志复刊撰写贺词。说《中国妇女》从1949年创刊以来，“对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和团结各界妇女，起过一定作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1967年停刊。”指出：“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日子里都曾出过力量，……起了‘半边天’的作用。”现在，“在进行新的长征中，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她们需要自己的刊物来宣传、报道她们的活动，作为她们共同学习的园地。”因此，“《中国妇女》杂志复刊，适逢其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希望：它“将对读者作好宣传报导，鼓舞妇女们的干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②

8月29日 下午，在北京住所，应扮演自己的演员肖惠芳的要求，接见肖惠芳和化妆师及《大江东去》的演员。对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并介绍自己言谈、举止的特点。特别让化妆师看看并摸摸自己的发髻，对肖说：“你不要给我烫发，我一辈子都不喜欢

①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

② 《中国妇女》，1978年第一期。

烫发”^①。

9月17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致闭幕词。说：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指出：“精心培养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希望广大妇女“都能自觉地把培养下一代这一重担担当起来”。还指出：妇女“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同世界上被压迫的妇女“团结起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并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大会制定的妇女的新任务，“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②。在会上，再次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9月2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是月 为表示对朱德的深切怀念，题字曰：“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朱德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③。

10月11日 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撰写祝词——《祝百花园中少儿读物如梅花盛放》。说，打倒了“四人帮”，现在，是“畅所欲言”，“发挥智慧、才干”，“为繁荣儿童读物迅速努力的时候”。祝“通过座谈，迅速行动，让百花园中少年儿童读物开得如梅花盛放”^④。

12月18日 就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电贺美国朋友塞缪尔·罗森和夫人。电称：“值此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成为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时刻，我谨向你们和美中友协致以热烈的祝贺”^⑤。

是年 作《追念毛主席》一文，以寄托哀思。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

① 肖惠芳：《在宋庆龄同志家中》，《八小时之外》，1983年第五期。

② 《人民日报》，1978年9月18日。

③ 原件影印，见《纪念宋庆龄同志》第320幅照片。

④ 同②，1978年11月18日。

⑤ 同②，1978年12月19日。

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又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指出：毛泽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①。

1979年（己未） 八十六岁

1月1日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示完全赞成。

2月12日 针对当时有取消儿童剧院、儿童剧之风，致函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我创办儿童剧院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鼓励他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②。

2月13日 再次致函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强调指出：“儿童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③（重点是其所加。）

是月 作《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一文，就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妇女的地位和妇女的解放问题，指出：“正如康克清所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又指出：为了使迫切要求参加工作的妇女从家务劳动

① 原件影印，见《纪念宋庆龄同志》第319幅照片。

② 《新华社新闻稿》，1979年3月27日。

③ 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中解放出来，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①。

3月10日 下午，在北京，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泰勒书社社长、米契尔·比兹莱出版公司美国编辑主任费兰克·泰勒。（系中国的老朋友，1947年曾到过延安，此次是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来华），对其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再次来华表示热烈欢迎。会见在亲切友好气氛中进行。会见时，在京外国朋友路易·艾黎、柯弗兰、柯如思、米勒、中村等在座。歌唱家斯义桂、姜椿芳也参加会见。

3月12日 致函中国福利会全体工作同志，指出孙中山毕生以“不息的热诚”，致力于革命事业。^②

3月17日 晚，在北京红塔礼堂欣赏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举行的首场访华演出。

3月28日 晚，在首都工人俱乐部，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由沪到京演出歌颂人民教师的七场儿童剧《童心》。会见了剧院院长、导演和主要演员。演出结束后，向演员们祝贺演出成功，赠送花篮，并勉励他们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3月29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年会，并讲话。指出培育儿童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和革命未来的大业，培育儿童的工作涉及整个社会，人人有责任关心儿童。还指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儿童创造较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并向台湾儿童表示热切的关怀，希望和他们在一起，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表示支持联合国定今年为国际儿童年的决定，指出，我们要和各国儿童工作者增进友谊，互相学习，共同努力，反对侵略和压迫，争取一个国际的和平环境。^③

① 《中国建设》，1979年第二——三期。

② 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③ 《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

3月30日 作《我看〈童心〉》一文。说,《童心》“塑造了人民教师的形象,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这样的戏,教师看了一定落泪,发生共鸣,要为培养四化的生力军而献身;学生看了,对比今昔,一定发奋学习,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宏伟理想。这是一出好戏。”指出:这出戏“无情揭露了‘四人邦’带给教育界的浩劫,带给下一代的毒害。”希望戏剧工作者“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①。

△ 看《童心》后,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任德跃到家里作客,亲切地交谈一下午。询问剧院情况,反复叮嘱一定要创作出好的儿童剧,托带糖果、苹果等食品给演员们,并说:“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儿童剧团搞好,坚持下去”^②。

4月3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该条约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同年4月11日生效,1980年4月11日期满。)

4月24日 晚,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联邦德国友好人士安娜利泽博士^③,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并接受所带给的一支喜爱的节日蜡烛。后来,曾写信给安娜利泽说:“这是我的荣幸,……它使我想起了我们共同享有的一切快乐”^④。

4月25日 到北京八宝山参加田汉追悼会,并送花圈。

5月23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由团长朱庆祖率领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华团。接受朱以全团名义赠送的一个盛

① 《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② 同①,1981年6月5日。

③ 安娜利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6年来华,曾在中国福利会等机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对增进中国和联邦德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④ 宋克明:《热爱人民的伟大女性——安娜利泽追忆宋庆龄》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10日。

有红白两色鲜花的小花篮。副团长詹·威尔斯说：“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我们继续友好下去。”^①岳岱衡参加了会见。

5月26日 为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题写馆名。^②

5月30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致函天津少年儿童。说：“希望你们在新时期新长征中，一定要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练好身体，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感谢他们所送的礼物，并回赠书籍以表示谢意和节日的祝贺。^③

是月 作《孩子们，好啊！——祝一九七九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一文。亲切地对儿童们说：我“对你们寄与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好’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的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接班人，新长征的好接力手。”所谓“好”，就是：“要勤奋学习”，“要练好身体”，“要成为有教养的人”。而最要紧的是要“有远大理想、有革命志气，继承革命传统。”希望孩子们“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长为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人类的前途做出贡献的人”^④。

6月1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少年儿童集会，与首都儿童和外国小朋友们同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并发表讲话。希望孩子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好准备，争取做一个新长征的尖兵。指出：“联合国决定今年为国际儿童年，对这个美好的倡议和富有意义的活动，我们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赞扬。要进一步加强儿童的福利、丰富儿童的文化生活和普及科学知识。”并且，要加强中国少年儿童和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的友谊和团结^⑤。

①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4日。

② 《光明日报》，1979年5月26日。

③ 原件影印，《天津日报》，1979年6月1日。

④ 《儿童时代》，1979年第八期。

⑤ 同①，1979年6月2日。

6月15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美中友协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贾尼斯·政冈为团长的美国知名妇女访华团。该团中有州议员、教授、法官、政府职员、作家、医生、演员、售货员，年龄最大的六十九岁，最小的二十九岁。她们是应中国全国妇联邀请在中美建交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代表团。进行了愉快的、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康克清、黄甘英等在座。

6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6月18日 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于7月1日结束。

6月19日 下午，在住所，会见以美籍日本人小友吉幸治为团长的美国夏威夷各界领导人访华团。一位美国朋友以夏威夷传统方式给其带上一条项环，以表示祝福。宾主在愉快气氛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6月22日 给著名摄影家顾淑型追悼会送花圈。

△ 同首都群众两千多人一起欣赏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的演奏。休息时会见斯特恩和夫人、子女以及青年钢琴家戈卢布，向斯特恩表示祝贺，说：“我很欣赏你的演奏”。演奏结束后，由黄华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芮效俭和夫人陪同，走上舞台，再次向斯特恩、戈卢布表示祝贺。^①

6月23日 收到北京少年宫赠送的像册（上面贴有其在少年宫和景山公园参加儿童游园联欢的照片及少年宫活动照片）后，致函少年宫全体同志表示感谢。说：“你们精心搜集的照片，汇装成册送给我，这是一件很好的纪念品。对此，十分感谢”^②。

7月8日 给周士第追悼会送花圈。

① 《人民日报》，1979年6月23日。

② 北京少年宫工作人员：《“六·一”前哭悼宋奶奶》，《北京日报》，1981年6月1日。

7月24日 纪念邹韬奋逝世三十五周年题词：“韬奋同志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里。”^①

7月30日 下午，在北京，出席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8月3日 给全国妇联前副主席刘清扬追悼会送花圈。

8月25日 给张闻天追悼会送花圈。

9月10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老朋友马海德和耿丽叔。

9月28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八十二岁的老朋友迈克斯·格来尼奇和由他率领的美国友好访华团。同格来尼奇在三十年代相识，今天重逢显得格外高兴。接受格来尼奇的夫人所献的一束鲜花，热情称赞格来尼奇在过去风云变幻的年代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坚贞的朋友，对中国充满着感情，以及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谅解作出了贡献。^②

△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美国朱氏投资银行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理事朱庆祖和夫人罗沙琳·玛丽，并共进晚餐。

9月29日 作《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指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认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调强指出：一定要为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

① 影印原件，《人民日报》，1979年7月24日。

② 《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其需要“加倍地努力”。文中总结了三十年来的历史，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又说：当看到“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祝愿“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①。

是月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作《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向全世界各地的读者致意。指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对各国人民给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又指出：三十年来，我国“人民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制度，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与一百多个大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世界和平和进步共同努力”^②。

10月3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同陈慕华会见以坤仁泰马里·乍滴甲瓦尼夫人为团长的泰国妇女委员代表团，进行了友好谈话。表示很高兴中泰两国经常有代表团往来。康克清、黄甘英参加会见。

10月10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孟加拉事务部长阿米娜·拉赫曼为首的孟加拉妇女代表团。高兴地回忆起1957年的达

① 《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② 《中国建设》，1979年第九——十期。

卡之行，对拉赫曼说：“我们是姊妹，我们两国妇女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拉赫曼说：“我感到十分荣幸，能见到你这位历史上有名望的人物”^①。

10月12日 晚，在北京寓所，宴请西哈努克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0月16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巴基斯坦全国妇联主席，已故首任总理的夫人利雅卡特·阿里·汗夫人率领的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对阿里·汗夫人说，我很佩服你为自己的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把一朵盛开的红玫瑰花赠给阿里·汗夫人。^②

10月18日 下午，在北京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出版家弗兰克·泰勒，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共进晚餐。

10月29日 晚，在住所会见英国友好人士、英中贸易协会副主席约翰·凯瑟克爵士和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是月 给天津塘沽区团委题词，曰：“在少先队建队三十周年的日子里，祝孩子们身体好，学习好，很好地成长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③。

△ 同邓小平一起接见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

11月 给在北京举行的“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题词：“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④。

是年 给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题写馆名。^⑤

1980年（庚申） 八十七岁

1月1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举行的

①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1日。

② 同①，1979年10月17日。

③ 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④ 同①，1979年11月13日。

⑤ 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元旦茶会。同邓小平、邓颖超及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各界爱国人士三百多人，共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佳节。在茶会上，当听到邓颖超讲一年来《告台湾同胞书》在国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反映时，表现得特别高兴。

1月26日 给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追悼会送花圈。

1月28日 下午，在北京住所，接见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会长尤尼塔·布莱克韦尔、第一副会长玛格丽特·惠特曼等五位美国朋友，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畅叙两国人民间亲密的友谊。当谈到美中友协目前已有会员一万多人，几乎在美国各地都设有分会时，高兴地说，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怀有很好的感情。对外友好协会王炳南等参加了会见。^①

2月21日 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何连芝追悼会送花圈。

2月25日 复函近代史学者、《孙中山传》作者尚明轩，详细回答其本月22日来函所询问的若干历史事实。如：“和孙中山结婚的时间、孙中山给列宁贺电的拍发地点、孙中山和廖仲凯同越飞会谈的时间、情况等问题。”^②

△ 从童小鹏汇报得知全国政协决定举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活动，并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时，说，让别人做为好。但当童说明这是党组织采纳的大家的意见后，也就欣然同意^③。

3月5日 主持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集会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并致词。说，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他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极表同情，并大力营救被捕学生。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

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9日。

② 《宋庆龄同志关于若干历史事实的一封信》，影印原件，《百科知识》，1981年第七期。

③ 童小鹏：《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49页。

对日妥协投降，坚持保障人权，赞同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同鲁迅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切的战斗友谊。他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今天纪念他有重要意义，他的精神可以激励教育、科学、文化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更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①蔡元培的子女出席了大会。纪念大会前，接见蔡元培的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3月8日 下午，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出席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联欢会。三千多中外妇女参加联欢会。有各国使节的夫人、女外交官、女专家、专家夫人及各国女留学生等外宾应邀出席。还有台湾女同胞，港澳女同胞和海外女侨胞、女劳动模范、女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代表和女科学家、女人民教师等。在会上致词中勉励广大妇女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坚决和各国妇女在一起，谴责外来干涉和侵略，支持民族独立的斗争，保卫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我们更加怀念台湾的姐妹们。我们愿寄语台湾姐妹，热切盼望回来探亲访友，共叙骨肉之情，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②

3月10日 致函康克清，说：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联欢会，“开得很好，安排得很好，组织得很好，秩序很好，孩子们表演很好。”还说：“近来饲养的鸽子下了蛋，赠给您，请自己食用”^③。

3月17日 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许建国追悼会送花圈。

① 《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② 同①，1980年3月9日

③ 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3月22日 致函《中国建设》总编辑爱泼斯坦，说：“我刚刚读了四月号《中国建设》，这一期既有趣味又有指导意义。这是你及全体工作人员努力贯彻周总理生前对我们的亲切指示，实现他对我们的希望的结果。”这一期各篇文章都搞得非常之好。它“完全可以成为国外学校的外国文学课程的一部分。各篇文章细节生动、文字优美、而且内容十分充实”^①。

3月29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的纪念美国进步女作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十周年大会，并向斯特朗女士墓地献花圈。

是月 作《给孩子们的信——祝〈儿童时代〉创刊三十周年》一文。说：它“自创刊以来，以小说、故事、特写、散文、诗歌、童话和绘画等文艺形式反映广大少年儿童在学校、家庭、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飞快成长，反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蓬勃发展，反映各国人民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沸腾生活。”并希望孩子们“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四化’发奋学习；”“爱清洁、讲卫生、坚持天天锻炼身体”；“从小听爸爸妈妈的话，尊敬老师，有好思想、好品德。”象雷锋那样，“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②。

春 在北京，再次接见上海、北京两个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谈及对儿童艺术事业的殷切期望。^③

4月3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劳埃德·贝利率领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访华代表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当贝利提到早就知道其很关心保卫儿童的工作时，回答说：我们保卫儿童的工作从四

① 原件影印。原文为英文，见爱泼斯坦：《宋庆龄——中国杰出的妇女》，载《宋庆龄纪念集》。

② 《儿童时代》，1980年第七期。

③ 《光明日报》，1981年6月4日。

十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曾向国外呼吁，美国的友好人士曾给予我们一些援助，包括救济车等。^①

4月12日 在北京寓所宴请友人米勒和艾黎。

4月19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以朱莉·穆恩为团长的“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向她们介绍了我国妇女地位的变化和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以及有关我国儿童福利事业的情况。杨西光等参加会见。^②

5月12日 亲笔给王光美写一英文信，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③。

5月15日 下午，在住所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小保罗·罗伯逊（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之子）和夫人。对小保罗说：中国人民对你们全家怀有友好的感情，许多人都收藏着你父亲唱的歌曲的唱片，我自己也珍藏着不少。接受小保罗赠送的其父亲生前唱的部分歌曲所录制成的一盘磁带。宾主双方还就发展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进行了友好的交谈。^④

5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刘少奇追悼会，并献花圈。

5月30日 为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写祝词——《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的好作品》。祝词中充分肯定少年儿童文学家、艺术家及其他业余作者，“克服困难、坚持创作”的精神。说：“少年儿童是祖国大花园中初绽的花朵，他们身上寄托着祖国未来的希望。”“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者都是辛勤的园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亿万花朵培育得茂盛起来。”指出：“今天，百花

① 《人民日报》，1980年4月4日。

② 同①，1980年4月20日。

③ 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

④ 同①，1980年5月16日。

齐放的方针重新得到重视和贯彻，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也随之繁荣起来了。”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行列”，“更广泛地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以鼓励创作，繁荣创作。”“通过优秀的少年儿童文艺作品，宣传新风尚、好习惯、好人好事，让犯罪的儿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让亿万儿童从中得到思想营养、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长征的小战士，使他们能够接过前辈的革命火炬，向着灿烂的新世纪勇敢前进”^①。

是月 为福建泉州培元中学题字，曰：“为国树人”^②。（1921年，孙中山曾为该校题字，曰：“共进大同。”）

6月 为江苏常熟县虞山镇新建少年之家题词，曰：“愿少年儿童树新风，遵纪守法，有健康的身体，有知识，有志气，为祖国作贡献。”并为之题匾额——“少年之家”^③。

△ 为江苏常州觅渡桥小学第二次题词，曰：“少年儿童要炼身体、有理想、讲文明、懂礼貌、学文化、学科学、争取做好学生”^④。

△ 为沈阳市和平区少年宫题词，曰：“一定要求进步，守纪律，勤学习，敬师长，爱劳动”^⑤。

△ 为鸦片战争一百四十周年，给广东省莞县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题字，曰：“虎门是1840——1842年中国人民销毁鸦片，广州人民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平英团等抗英的地方，当年中国人民在虎门表现的爱国精神和进行民族革命的伟大行动永志不忘”^⑥。

① 《人民日报》，1980年6月1日。

② 影印原件，见《中国建设》，1981年第二期。

③ 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④ 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

⑤ 影印原件，《纪念宋庆龄同志》，第288幅照片。

⑥ 影印原件，《文物天地》，1983年第一期。

7月2日 给原最高人民检察长、党组书记李六如送花圈。

7月28日 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赞成废除干部终身制的提议，请求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8月30日 在北京出席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于9月10日结束。

9月6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泰国前教育、文化部部长蒙銮宾·马拉军和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27日 为《鲁迅画传》撰写序言。说：“鲁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笔作武器，冲锋陷阵，不屈不挠，以毕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而坚韧的斗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度热情与战斗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画传》很形象地反映了鲁迅精神。这种可贵的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好地团结，‘奋然而前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①。

10月7日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决定》，在会上，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剑英为主任委员）。

△ 复函季方，叙述了邓演达五十多年前客居国外时学习、生活情况。说：他“非常认真学习，不好游山玩水，专在德国图书馆看材料，研究经济、历史等，使人非常钦佩。”^②至于本月3日来函要求为《邓演达文集》写序事，告知要季方执笔，自己写书名题签，并予题词。题词谓：“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③。

是月 在北京寓所接待泰国妇女代表团。

① 《序〈鲁迅画传〉》，《光明日报》，1981年6月6日。

② 季方：《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载《宋庆龄纪念集》。

③ 影印原件，见《邓演达文集》扉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 为《中国建设》增出中文版作祝词。祝词中引她自己1938年9月在《华侨总动员》一文中的话说：“在海外千万的侨胞，对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之援助与参加，非今日始。在（孙）总理倡导革命之始，数十年来，未曾间断……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给国内同胞以极大的鼓舞奋慰。记得（孙）总理在世时，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华侨的帮助。甚至以血汗换得仅能维持温饱工资的侨工，都肯出钱帮助。’”又说：“岁月流逝，而海外侨胞对祖国的热爱、关怀和支持，数十年来有增无减。当前，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而努力，海外侨胞也都在关心和促进这两件大事。”“希望《中国建设》中文版将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让我们更紧密地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①

11月 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编辑孙中山图片集，把珍藏多年的一千多张照片拿出来给图片集小组的同志挑选。从中选出一百多张，有些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这些照片都是原件，每张照片都由其注明摄影时间、地点和照片中的人的名字^②。

△ 复函《中国建设》杂志社全体同志，说：“接读您们在孙中山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的日子里给我写的信，非常高兴！对您们亲切慰问的心意，致以由衷的感谢！从来信中得知今年《中国建设》第十二期的出版工作基本上完成，出版工作的速度比以前提高，这是令人感到高兴的一件事”^③。

12月30日 应北京少年宫的约请，为该少年宫建立二十五周年题词。曰：“青少年活动丰富多采，有助于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时，身体不适，却说：“有些事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

① 《宋庆龄题词》，《中国建设》，中文版，1980年第十期。

② 《宋庆龄同志和孙中山故居》，《宋庆龄纪念集》，第260—262页。

③ 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陈列室。

是不可以等待的。”在病榻上，挥笔练习了多次^①。

是年 对《大众电影》举办第三届电影“百花奖”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询问评奖情况，并问所得片子是不是都看过了。说，自己只看过少数一、二部，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授奖时，特派人送去祝词，在祝词中写道：“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②。

△ 为《安徽青年报》的“星星火炬”专栏题字。

1981 年（辛酉） 八十八岁

1月7日 作《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一文，谴责林彪、江青一伙对金仲华的诬陷、迫害。说：金仲华“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人。在过去的爱国和进步事业中，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和我的同志们。”他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杰出成员之一，他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作家，编辑和社会活动家。”抗战爆发前，他领导的刊物，“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政权所散布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论调及其对人民的恐怖统治，从而使许多爱国志士从中受到鼓舞。”抗战时期及其以后，他“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争取到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朋友的赞助。”解放后，他“作为优秀的，经得起考验的进步知识分子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兼任《新闻日报》社长、总主笔。”1952年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第一任社长。十年动乱中，他“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4月3日含恨而死。末了，语重心长地说：“写这些文字，作为对老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

① 北京少年宫工作人员：《“六·一”前哭宋奶奶》，载《北京日报》，1981年6月1日。

② 司徒慧敏：《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宋庆龄纪念集》，第159—163页。

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①。

1月19日晚，在家里，会见并宴请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美国友好人士韦尔西·弗希夫人和助手加拿大人萨莉·斯温森，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2月 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作《序——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

△ 函告秘书杜述周——《关于李燕娥葬礼的指示》。指出：“李大姐的后事，还是一下办定好！”又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指示中谈到她自己日后的安排，说：“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②。

△ 给李燕娥送花圈，上书：“悼念李燕娥同志，宋庆龄敬挽。”并为其立碑。

3月5日 患病中，亲笔复函童小鹏，对来信报告一海外友人求见事说，因病重不能见面，表示遗憾，并请友人向她海外的亲友问好。^③

是月下旬，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前来看望，进行亲切知心的谈话，商谈了重要问题。谈话中，明确阻止邓不要称呼其为副委员长。当邓说称呼庆龄同志好吗？即含笑频频点头同意。^④

4月 得知史良患病，即派人送去一盒从上海带来的柠檬点心，并嘱早日恢复健康。

4月7日 担任沈雁冰治丧委员会委员。旋于4月11日为其追悼会送了花圈。

① 《人民日报》，1981年1月7日。

② 《关于李燕娥葬礼的指示》，影印原件，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第345幅照片。

③ 童小鹏：《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宋庆龄纪念集》，第151页。

④ 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宋庆龄纪念集》，第57—62页。

4月21日 担任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

5月2日 作《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一文。指出：“历史赋予人类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一代一代地把希望的火炬传下去，以不息的奋斗去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我们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深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关心这年轻的一代，不断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用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去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的火炬接过来，传下去”^①。

5月7日 担任朱蕴山治丧委员会委员。为其追悼会送了花圈。

5月8日 下午，带病出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仪式。荣誉学位证书由该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亲自授与，并讲话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所以今天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称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在仪式上，身披着荣誉博士礼服，发表了近二十分钟的讲话。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谈到中国人民曾“得到酷爱正义的欧裔加拿大人的帮助”，说，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是在进步和正义事业中各国同甘共苦的最光辉的典范”，“他的名字深深

① 《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

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将使中国和加拿大千秋万代连接在一起”。今天中国的任务，即：“集中体现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达此目地，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加拿大人民就是这样的一种民族”。末了，说：“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培育和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愉快地接受你们的授赠学位。”^①我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应邀在仪式上讲了话。出席仪式的二百多中外人士中，有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研究所等单位的负责人及其中外老朋友等。

5月12日 应邹韬奋纪念馆的要求，为《韬奋手迹》一书的封面题字。清早，在他人扶助下，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题写了两份“韬奋手迹”，以供选用。之后，说：“我现在放心了”^②。这是最后的一次题字。

5月14日 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撰写贺信。说：今天的大会，体现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的结合。“我衷心希望这种结合更紧密、更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能得到发展。”“你们的辛勤劳动是伟大而光荣的。相信你们一定取得丰硕成果。”最后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③。

△ 晚，病情恶化，突然发寒战高热，体温高达摄氏四十点二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

5月15日 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再次明确提出入党要求^④。邓颖超、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去问候，向其表示知道入党

① 《人民日报》，1981年5月9日。

② 影印原件，《光明日报》，1981年6月7日。参见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

③ 《我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中国妇女》，1981年第六期。

④ 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

是她长期以来的宿愿，要向党中央报告。

△ 下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收其为中共正式党员。决定说：“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结束，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的委托，立即至其住宅，告知这一喜讯。当其在病榻上听到这个喜讯时，十分激动，连连点头。^②

5月1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称：“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建国伊始，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继续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七十年来，她一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定地和中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

① 《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② 《叫我“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17日。另据廖承志《我的吊唁》一文云：“邓颖超同志亲自向宋庆龄同志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接受她入党的经过。”今附注于此，待考。

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在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发扬进步文化、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① 旋，廖承志、宋任穷向其报告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的这一决定。闻知后，喜悦地点头，说：“谢谢同志们”！^②

△ 邓小平到其寓所探望，并祝贺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宿愿。

△ 白天，体温波动于摄氏三十九度上下。

5月21日 所作《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一文发表。文中亲切地对孩子们说：“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教导孩子们说：“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对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作风和坏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们“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这样，你们就会像小树苗一样，长成大树，聚成森林，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教导孩子们要“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锻炼身体”，“要有健康的文化艺术修养”。并热切期望孩子们“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③。此文为其生平最后一文。

① 《人民日报》，1981年5月17日。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

③ 同①，1981年5月22日。

△ 睁开眼睛看到沈粹缜在病榻前陪伴时，断断续续对她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哦？……一定要休息”^①。

5月29日 二十时十八分，因患细胞慢性淋巴白血病，在北京寓所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为宋庆龄举行国葬，以表彰其伟大功勋，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

5月31日——6月2日 首都各界十二万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缅怀其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

6月3日 上午，宋庆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近万名首都各界群众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深切悼念宋庆龄。胡耀邦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说：“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末了，说：“悼念宋庆龄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②

6月4日 根据宋庆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骨灰安葬典礼。

① 沈粹缜：《我的追念》，《宋庆龄纪念集》。

② 《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附 录

本书征引书目

(限于注释中提及者, 参考书目未包括在内)

宋庆龄著作

《为新中国奋斗》, 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宋庆龄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永远和党在一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凡引用以上三书的文章, 不再一一列出, 但查阅原文并以其为依据者除外。)

《广州脱险》, 《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 华光出版社 1938 年版。

《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 《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7 月 2 日。

《为廖仲恺遇刺逝世给廖夫人的唁电》, 《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8 月 25 日。

《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14 日;
《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8 日。

《论中国女权运动》, 《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9 日。

《向新闻通讯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晨报》1927 年 8 月 3 日。

《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 神州国光社 1947 年版。

《国共统一运动感言》, 宋庆龄等著:《妇女领袖宋氏三姊妹》, 战时出版社刊行的“战时小丛书之四十二”。

《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宋庆龄向美人士广播演说》, 宋庆龄等

著：《妇女领袖宋氏三姊妹》。

《向全世界妇女的申诉》，《妇女与抗战》，战时出版社出版。

《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9月23日。

《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0日。

《宋庆龄与何香凝、陈友仁等联电中央建议四项抗战方针》，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8日。

《宋庆龄等吁请捐卹国内难民》，香港《大公报》1939年2月25日。

《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纪念告美国友人》，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7月9日。

《宋庆龄先生来函称本报汇款收到（援助香港反汪工友之汇款）》，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日。

《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

《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

《关于“只要团结抗战必可战胜日寇，勿为敌伪造谣离间互相分裂”的谈话》，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5月31日。

《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函》，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关于宋子文退出“保盟”的声明的声明》，香港《大公报》1941年6月1日。

《纪念邓演达》，香港《华商报》1941年11月28日。

《就签订中美、中英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发表的谈话》，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

《在重庆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在上海发表谈话，吁请国际友人给中国人民以更多的援助》，香港《华商报》1946年1月16日。

《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5日。

《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9月20日。

《致美苏友好协会电》（1949年11月9日），《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

《一九五〇年元旦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0年1月1日。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话》，《解放日报》1950年2月23日。

《〈儿童时代〉创刊号题词》，《儿童时代》创刊号，1950年4月出版。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话》（195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给〈人民日报〉题词》，原件影印，《人民日报》1950年6月1日。

《给〈解放日报〉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0年6月1日。

《上海妇幼卫生展览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0年6月15日。

《抗议美国囚禁进步领袖致美民权保障大会电》，（195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1950年7月1日。

《为上海首届妇代会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0年8月12日。

《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专刊题词》，原件影印，《人民日报》1950年10月5日。

《电唁任弼时同志逝世》（1950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0日。

《致电居里祝贺第二届和平大会成功》(195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致函日本劳农救济会声援“松川事件”被捕工人》(1950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1日。

《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的声明》(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1日。

《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给日本爱好和平的朋友们的信》(195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1951年2月21日。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给〈解放日报〉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1年3月8日。

《电贺但尼斯出狱》(1951年3月29日),《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

《致王方颖函》(1951年4月19日),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给〈儿童时代〉题词》(1951年6月1日),原件影印,《儿童时代》1951年第26期。

《给〈解放日报〉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1年6月1日。

《致戈登夫人电》,《解放日报》1951年10月14日。

《保卫儿童》,《人民日报》1952年4月14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1952年2月21日),《人民日报》1952年5月14日。

《电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1952年6月3日),《人民日报》1952年6月4日。

《电贺印度人民的“亚洲周”》(1952年8月4日),《人民日报》1952年8月9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致词》(1952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6日。

《致约里奥·居里电》(1950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1952年

10月31日。

《中苏友好是和平的堡垒》（1952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1952年11月5日。

《在首都各届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致词》（1952年11月6日），《人民日报》1952年11月7日。

《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2年11月25日），《解放日报》1952年12月14日。

《为了和平到维也纳去——为迎接世界和平大会而作》（1952年11月），《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7日。

《人民能够扭转局势——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的发言》（1952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

《在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上的演说》，（1952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6日。

《在我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扩大常委会上的发言》（1953年1月26日），《人民日报》1953年1月27日。

《致斯大林同志电》（1953年3月5日），《解放日报》1953年3月6日。

《电唁斯大林同志逝世》（1953年3月6日），《人民日报》1953年3月7日。

《电唁法奇逝世》（1953年4月2日），《人民日报》1953年4月3日。

《我们为儿童与和平而建设——为〈人民中国〉而作》，《人民日报》1953年5月31日。

《致全体儿童保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同志们》，《人民日报》1953年5月3日。

《为华东中学开学题词》，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3年9月1日。

《电贺印中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会议》，《人民日报》1953年12月

12日。

《给〈儿童时代〉题词》原件影印,《儿童时代》1954年第11期。

《就日内瓦会议发表书面谈话》,《人民日报》1954年7月26日。

《一个伟大和平进步的堡垒——为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而作》,《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

《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11月6日),《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

《中苏友谊——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灯塔——在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9日。

《新型的和更高类型的关系——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55年2月14日。

《在招待驻旅顺地区苏军代表宴会上的讲话》(1955年2月24日),《人民日报》1955年2月25日。

《五大原则》,《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

《一件有意义的事》,《人民日报》1955年3月30日。

《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1955年5月),《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

《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维护和平》(1955年5月30日),《人民日报》1955年5月31日。

《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1955年7月23日),《人民日报》1955年7月24日。

《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贺信》,《人民日报》1955年7月30日。

《致苏联〈真理报〉电》(1955年8月10日),《人民日报》1955年8月11日。

《在政协宴会上致词》(1955年10月7日),《人民日报》1955年10月8日。

《向苏联人民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广播讲话》(1955年11月7日),《人民日报》1955年11月8日。

《电贺民主妇联成立十周年》(1955年12月1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日。

《在印度机场上的讲话》(1955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8日。

《在印度副总统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9日。

《在新德里市政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0日。

《在印中友好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1日。

《在新德里妇女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2日。

《在孟买印中友好协会分会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5日。

《在孟买妇女团体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6日。

《在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分会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8日。

《在加尔各答妇女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9日。

《在印度社会工作会议年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30日),《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1日。

《向印度人民发表告别广播演说》(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

《在缅甸机场的讲话》(1956年1月2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

《在仰光市长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56年1月3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5日。

《为和平而奋斗的中国和缅甸——在仰光政治大会上的演说》(1956年1月6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

《在曼德勒全市欢迎会上的演说》(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15日。

《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195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在缅甸毛淡棉机场的讲话》(1956年1月21日),《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23日。

《在拉合尔机场发表的讲话》(195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29日。

《在卡拉奇全市欢迎会上的答词》(1956年1月29日),《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31日。

《在巴基斯坦电台的广播演说》(1956年1月29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

《在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机场的讲话》(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报》1956年2月2日。

《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电》(1956年2月11日),《人民日报》1956年2月14日。

《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的报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1956年3月17日。

《参观上海工业生产先进经验展览题词》(1956年4月19日),

原件影印,《解放日报》1956年4月21日。
 《电贺〈俄文友好报〉创刊一周年》,《中苏友好报》1956年4月18日。
 《纪念伟大的列宁——为苏联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作》,《中苏友好报》1956年4月21日。
 《给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的贺信》(1956年4月24日),《人民日报》1956年5月12日。
 《给尼泊尔首相的复信》(195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1956年5月14日。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195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1956年5月31日。
 《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为苏联〈少年先锋队真理报〉作》
 《中苏友好报》1956年6月1日。
 《致加尔各答印中友协电》(1956年6月25日),《人民日报》1956年6月28日。
 《在雅加达机场的讲话》(195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
 《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举行的茶会上的讲话》(195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16日。
 《在苏加诺举行的国宴上的演说》(195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16日。
 《在印度尼西亚妇女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5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18日。
 《在万隆省长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56年8月18日),《解放日报》1956年8月20日。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日益增长的友谊——在雅加达民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195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24日。
 《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195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25日。

《给苏加诺的感谢电》(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956年8月26日。

《给沙斯特罗阿米佐诺的感谢电》,《人民日报》1956年8月26日。

《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讲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1956年9月21日。

《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195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在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上欢迎苏加诺总统的讲话》(195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1956年10月5日。

《电贺日本商品展览会》,《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

《给苏联〈星火〉和〈新时代〉杂志的新年贺词》(195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日。

《漫谈新闻与历史》,《新观察》1956年第23期。

《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1957年3月6日。

《给苏联库页岛、千岛群岛妇女们的“三·八”贺词》,《人民日报》1957年3月7日。

《中国的光明前途》,《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

《电贺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人民日报》1957年10月6日。

《电贺苏中友好协会成立》(1957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9日。

《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义——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8日),《人民日报》1957年11月9日。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95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

《中苏友好团结是人类和平的保证——答苏〈文化〉与〈生活〉杂志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

《在招待苏联各界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致词》(1957年11月25日),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6日。

《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26日),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在机场致词欢送苏中友协代表团》(195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8日。

《迎接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

《电贺〈苏中友好〉杂志创刊》(1958年1月7日),《人民日报》
1958年1月8日。

《电贺印中友好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8年1月29日),《人民日报》1958年1月30日。

《致亚非妇代会电》(1958年2月12日),《人民日报》1958年
2月14日。

《给上海市第三次妇代大会的祝词》(1958年2月12日),《解放日报》1958年2月13日。

《西方国家、你们也试试看》(195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4月2日。

《给〈儿童时代〉题词》(1958年4月26日),原件影印,《儿童时代》1958年第11期。

《给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十周年题词》(1958年5月),原件影印。

《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谈几句话》,《人民日报》1958年6月1日。

《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敬》,《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

《电贺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一周年》(1958年10月3日),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

《接见伊拉克友好访华团的谈话》(1958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1日。

《光辉的时代,光辉的人民》,《人民日报》1958年11月3日。

《向苏联人民电贺十月革命四十周年》(195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1958年11月5日。

《目前局势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人民日报》1958年11月7日。

《给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贺信》,《人民日报》1958年12月5日。

《〈我们怎样培育祖国花朵的〉序》(1958年12月25日),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致电苏联人民祝贺新年》(195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

《祝贺苏联人民成功地发射宇宙火箭的书面谈话》(1959年1月6日),《人民日报》1959年1月7日。

《开辟新世界的新纪元》,《人民日报》1959年2月14日。

《伟大的友谊,亲密的团结——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9年5月2日),《人民日报》1959年5月3日。

《致世界和平理事会电》(1959年5月7日),《人民日报》1959年5月8日。

《中苏两国人民永远在一起》(195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1959年6月14日。

《给常州觅渡桥小学题词》(1959年5月29日),原件影印,宋庆龄故居藏。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959年7月3日),《人民日报》1959年7月4日。

《和平友谊将给人类带来繁荣和幸福》,《中国青年报》1959年7

月 26 日。

《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谊——人类向未来的跃进》(1959年 8 月 6 日),《人民日报》1959 年 9 月 16 日。

《写给孩子们——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作》,《儿童时代》1959 年第 19 期。

《欢庆建国十周年》,《苏联妇女》1959 年第 10 期。

《伟大的友谊、伟大的团结——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9 年 10 月 4 日),《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5 日。

《马列主义胜利万岁!》,《中国工人》1959 年第 10 期。

《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跃着我们前进》,《人民日报》1959 年 11 月 7 日。

《永恒友谊的基础》,《人民日报》1960 年 2 月 14 日。

《把妇女们的斗争继续向前推进——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五十周年而作》,《中国妇女》1960 年第 10 期。

《致全国姐妹们的贺信》,《中国妇女》1960 年第 6 期。

《接受伊拉克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960 年 4 月 27 日),
《人民日报》1960 年 4 月 28 日。

《必须彻底揭露美国战争贩子》,《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22 日。

《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中国妇女》1960 年第 11 期。

《电贺加纳共和国成立》(1960 年 6 月 28 日),《人民日报》1960 年 7 月 1 日。

《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960 年 8 月 10 日),
《人民日报》1960 年 8 月 11 日。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人类的希望——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而作》(1960 年 11 月 5 日),《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6 日。

《古巴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960 年 11 月 26 日),
《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27 日。

- 《电贺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1960年12月2日),《人民日报》1960年12月3日。
- 《给上海第四届妇代会的祝词》(1960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1960年12月11日。
-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1961年2月2日),《人民日报》1961年2月14日。
- 《给王光美的信》(1961年2月8日),《老一辈革命家书信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电慰陈赓同志亲属》(1961年3月17日),《人民日报》1961年3月18日。
- 《电贺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1961年4月12日),《人民日报》1961年4月13日。
- 《电贺苏联成功发射第二艘载人宇宙飞船》(1961年8月7日),《人民日报》1961年8月8日。
- 《给纪念邓演达殉难三十周年集会题词》,《人民日报》1961年11月28日。
- 《给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全院工作人员的信》(1962年9月18日),《人民日报》1962年9月19日。
- 《向全国妇女祝贺“三八”节的信》,《人民日报》1963年3月9日。
- 《瑞士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963年4月27日),《人民日报》1963年4月28日。
- 《缔造未来》,《中国建设》1963年第6期。
- 《电贺苏联人造飞船“东方5号”和“东方6号”发射成功》,《人民日报》1963年6月19日。
- 《电唁杜波依斯夫人》(196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1963年8月30日。
- 《在锡兰总督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196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1964年3月1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女时的谈话》(1964年8月25日),《人民日报》1964年8月26日。

《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中国建设》1972年第1期。

《电唁埃德加·斯诺逝世》(197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

《纪念埃德加·斯诺》,《中国建设》1972年第2期。

《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中国建设》1972年第9期。

《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中国建设》1973年第1期。

《伟大的新运动》,《中国建设》1976年第3期。

《纪念周恩来》,《中国建设》1977年第4期。

《祝贺〈儿童时代〉复刊》,《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

《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人民日报》1978年6月1日。

《祝贺〈中国妇女〉杂志复刊》,《中国妇女》1978年第1期。

《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7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1978年9月18日。

《祝百花园中少儿读物如梅花盛放——给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祝词》(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

《就中美两国建交电贺美国朋友》(197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9日。

《追念毛主席》(1978年12月),原件影印,《纪念宋庆龄同志》。

《给儿童剧院的信》(1979年2月12日),《新华社新闻稿》1979年3月27日。

《再给儿童剧院的信》(1979年2月13日),同上。

《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中国建设》1979年第2—3期。

《我看〈童心〉》,《人民日报》1979年4月17日。

《给天津儿童的贺信》(1979年5月30日),《天津日报》1979年6月1日。

《孩子们，好啊！——祝一九七九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

《在首都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6月1日），《人民日报》1979年6月2日。

《纪念邹韬奋逝世三十周年题词》，原件影印，《人民日报》1979年7月24日。

《致〈中国建设〉读者》，《中国建设》1979年第9—10期。

《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给天津塘沽区团委题词》（1979年10月），原件影印，宋庆龄故居藏。

《给白求恩生平展览题词》，原件影印，《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3日。

《给尚明轩的复信》（1980年2月25日），原件。

《在首都各界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上致词》（1980年3月5日），《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在全国妇联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周年大会上致词》（1980年3月8日），《人民日报》1980年3月9日。

《给康克清的信》（1980年3月10日），原件，宋庆龄故居藏。

《给孩子们的信——祝〈儿童时代〉创刊三十周年》，《儿童时代》1980年第7期。

《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的好作品——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上的祝词》（1980年5月30日），《人民日报》1980年6月1日。

《给江苏常熟县虞山镇少儿之家题词》（1980年6月），原件，宋庆龄故居藏。

《给常州觅渡桥小学第二次题词》（1980年6月），原件，宋庆龄故居藏。

《给虎门抗英遗址题词》（1980年6月，原件影印，《文物天地》

1983年第1期。

《〈鲁迅画传〉序》(1980年9月27日),《光明日报》1981年6月1日。

《给〈邓演达文集〉题词》(1980年10月),原件影印,《邓演达文集》扉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宋庆龄题词》,《中国建设》中文版1980年第十期。

《给〈中国建设〉杂志社全体同志的复信》(1980年11月),原件,宋庆龄故居藏。

《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人民日报》1981年1月7日。

《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

《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在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5月9日。

《我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1981年5月21日。

《愿小树苗健康成长》(198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5月22日。

中文书籍、档案资料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纪念宋庆龄同志》,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纪念宋庆龄特刊》,《中国建设》杂志1981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1973年(台北)版。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

书局 1980 年版。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1936 年版。

宋庆龄故居档案。

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档案。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 年版。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林伯渠日记》（1926 年 7 月至 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胡去非：《国父事略》，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 文 报 刊

上海《民国日报》1920 年 11 月、12 月；1921 年 5 月、6 月、11 月、12 月；1922 年 5 月、6 月、7 月、8 月；1923 年 1 月、5 月、10 月；1924 年 1 月；1925 年 1 月、2 月、3 月、4 月、6 月、9 月；1926 年 1 月、3 月、5 月；1927 年 9 月；1929 年 3 月、4 月、5 月、6 月、9 月、10 月；1931 年 7 月、8 月、9 月、10 月。

《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1 月、2 月、6 月；1925 年 5 月、7 月、8 月；1926 年 1 月、3 月、9 月、10 月、11 月、12 月；1927 年 1 月、3 月。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9 月。

· 《晨报》1924 年 11 月、12 月；1925 年 2 月、4 月、7 月；1927

年1月、6月、7月、8月、12月；1928年3月、5月。
《民信月刊》1922年5月。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7期。
《申报》1922年6月；1931年12月；1932年5月、7日、11月、12月；1933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11月；1934年3月；1935年11月；1936年10月。
《江西日报》1927年8月。
上海《新闻报》1927年12月。
《红色中华报》1934年9月。
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3月；1939年7月；1940年2月；1941年1月、2月。
《文艺新闻》1931年9月。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第3卷第4期。
《救亡情报》第6期。
《抗战》杂志1937年11月。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3月、4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
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7月、8月、10月、12月；1940年2月、4月、5月；1941年1月、5月、8月；1942年3月、4月、6月；1943年1月、2月、3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944年4月、6月、9月、10月、11月；1945年6月、8月、9月、10月；1946年1月、3月、7月、8月、9月、10月。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5月；1945年12月；1946年4月、5月、7月、8月。
香港《大公报》1937年10月；1938年11月，1939年2月、11月、12月；1941年9月。
香港《华商报》1941年11月；1946年1月；1948年1月。

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1948年6月。

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

《人民日报》1949年7月、8月、9月、10月；1981年5月、6月；1983年3月。

《光明日报》，1981年6月。

《工人日报》，1981年5月。

《北京日报》，1981年6月。

《解放日报》，1949年7月；1981年5月。

《文汇报》，1981年6月。

《广州日报》，1981年6月。

《羊城晚报》，1981年6月。

《红旗飘飘》，1983年第27期。

《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新观察》，1982年第10期。

《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文史资料选集》，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出版。

《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外文书刊

[美]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THE WESLEYAN) 英文版。

[美] 项美丽(Emily Hahn):《宋氏姊妹》(THE SOONG SISTERS), 香港1941年英文版。

[美] 罗比·尤恩森(Roby Eunson):《宋氏姊妹》(THE SOONG SISTERS) 纽约1975年英文版。

[美] 斯宾塞(Cornelia Spencer):《三姊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THREE SISTERS——The Story of the Soong

Family of China), 纽约 1939 年英文版。

[美] 包德华 (H. L. Boorman) 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第三卷,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0 年英文版。

[苏] 薇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阿基莫娃 (VeVa Vladimirovana Vishuyakova-Akimova):《在革命中国的两年 (1925—1927)》(Two Years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

[日] 《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MT103、107, 北京图书馆制)。

[日] 《亚洲历史词典》, 平凡社 1960 年 8 月日文版。

[日] 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 昭和十四年二月日文版。

宋庆龄:《给爱泼斯坦的信》(英文), 1980 年 3 月 22 日, (载《宋庆龄纪念集》第 243 页。)

China Reconstructs (英文), 1952 年第 5 期, 1953 年第 2 期,

1954 年第 1 期、第 5 期, 1955 年第 10 期, 1958 年第 6 期。

Peoples China (英文) 1954 年第 4 期。

Beijing Review (英文) 1958 年第 14 期。